目　录

序

萧关鸿

一百年前，拿破仑曾经对中国说过这样的话：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去吧！因为他一旦醒来，就将震惊世界。

20世纪的中国就是一个巨人觉醒的过程，这过程虽然艰难而又缓慢，痛苦而又屈辱，但沉睡了二千年的巨人终于觉醒过来了，站起来了！

这一百年来，在专制与民主、分裂与统一、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科学、贫穷与强盛的风云兴迭之中，古老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凤凰涅槃似的沧桑巨变。

这一百年来，无数革命先辈、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慷慨赴义，为了人民的幸福、民主的理想和中国的现代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智慧与胆略、意志与决断、勇气与热情、血性与韧劲，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为波澜壮阔、风云激荡、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中国作家也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他们不仅用自己的笔墨记录下这些永恒的业绩和闪光的瞬间，而且投身于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使得他们的记录更加具有切肤之感和刻骨铭心之情，从而更能折射出历史的深刻与丰富，曲折与变奏。他们是实践者，又是记录者，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

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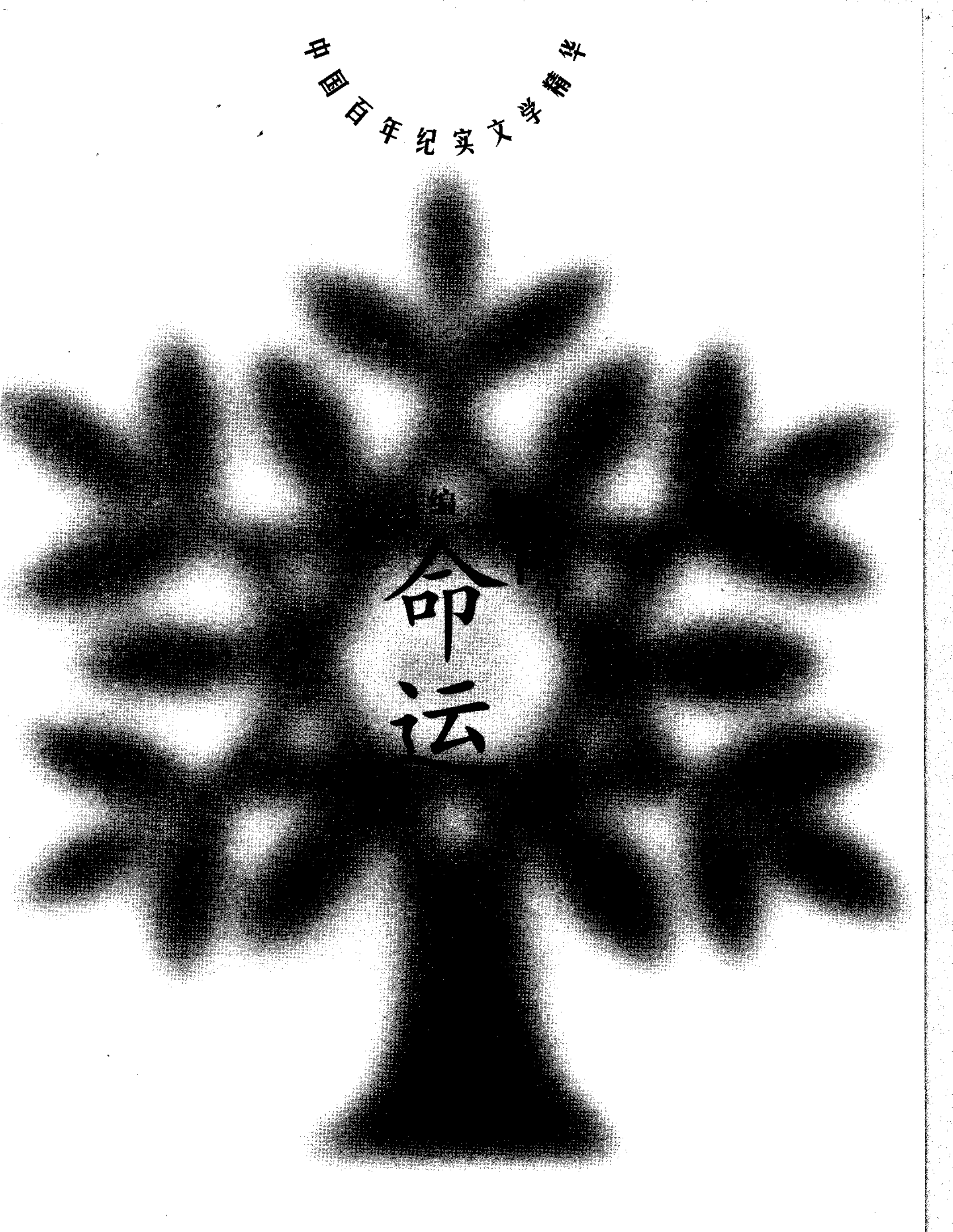
当我们着手梳理中国20世纪纪实文学的脉络时，深感这个特色更加鲜明，甚至我们很难把实践者与记录者区别开来。当我们从浩如烟海的纪实文学作品中选择这些代表作品时，我们把作者的代表性和作品代表性，作品的史料性和文学性，同时加以考虑。

本书分为《人间》与《命运》两卷，《人间》是人物卷，《命运》是事件卷。其实，在优秀的纪实文学中事件与人物是很难严格区别开来的。因为在历史大舞台上演出的活剧，人物的活动就是事件的演变。事件的冲突越激烈，人物的性格越鲜明；人物的活动越精彩，事件的发展越丰富。但一般而言，纪实文学主要分人物与事件两类，我们这样分卷编辑是为了从一个角度反映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因为读者读这套书与读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他不仅需要文学的享受，更需要历史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又不同于教科书的单调和历史书的枯燥，而是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或身临其境的回忆中自然而然地进入历史，深入角色，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世纪之交来读这套书是特别有意思的。经过一百年苦难与奋斗的中国人对未来的世纪充满了憧憬。但只有不忘记历史才能面对未来，只有把历史作为镜子才能观照未来，只有把握历史的脉搏才能驾驭未来。

一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说过，"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尽管忍受了20世纪最沉重的苦难，但注定要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之一。"过去的苦难是给未来的礼物，过去的奋斗是未来的保证。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历史。

1999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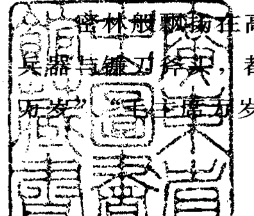
湖北人民出版社

林　韦

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这一声震撼世界的巨响，由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响亮地喊出的时候，参加盛典的三十万群众中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红底五星的国旗徐徐升上二十二公尺的高杆，五十四门大炮齐鸣，军乐队奏起十多年前曾经激发了无数爱国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冲锋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时间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

经历过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这个可珍贵的时刻：它宣布了旧中国完全死亡，宣布了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屈辱的殖民地与殖民地奴隶的代名词，而要永远地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尊敬了。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屹立于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祖国，有了真能保护自己、代表自己的政府。受过多少代封建帝王直接统治与日本法西斯、蒋家小朝廷血腥屠杀的北京人民，将更加清晰地永远记得这个珍贵的时刻。



密林般飘扬在高空的红旗，无数红色的五星灯、圆灯、各种兵器与镰刀斧头，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巨幅标语下标志出人们一致的强烈愿望：

要巩固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政府。所以，在朱总司令检阅人民的海陆空军部队，这些部队在会场中心举行分列式时，群众中涌起了同样狂热的欢呼。整整两个半钟头的检阅，许多人连坐也没坐一下。摄影机、照相机、望远镜和几十万双眼睛，一直集中凝结在受检阅的部队身上，生怕看不清或漏过任何一个可以看得到的武器与战士。

人民的武装部队两个半小时的检阅，给予人民的是更加坚固的胜利信心。我国年轻的海军部队与空军部队，第一次公开地列队出现在人民领袖和广大人民的面前了。海军陆战队整齐的步伐、焕发的精神，使人坚信它们既从无变成有，必将从小变成大。随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空军成列成队地飞过会场的上空，人丛中帽子飞舞起来，手巾挥舞起来，手里拿着的报纸和其他物件都飞舞起来。人们随着军乐队奏出的《解放军进行曲》的响亮节奏拍着手，合着拍子，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几十万人的脉搏同速地跳动。

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战车部队与骑兵部队以等距离、等速度整连整团整师地稳步行进，是检阅中历时最长的一段，一直到太阳西下。但是，人们不厌其多，不厌其久，人们互相询问着："这是什么炮呀？""这是什么人呀？"每个人都把别人当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对自己部队的知识。指挥台上久经战阵的军官们向身旁的非部队人员不断地解答着："头两辆并排的小吉普车是指挥员和政委，后两辆是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后面一辆是旗兵。这队野炮是日式九零野炮，能打三十华里，这是美国的十五发的大榴弹炮，这是中型坦克，这是装甲车营……"所有摩托车与战车、炮车……都是油漆了的，饰了红星与"八一"字样，轮子一圈白，颜色壮美而一致。这是人民的战士们加意装饰了的。

往西长安街看，不知部队已走出多少里；往东长安街看，不知还有多少里长的部队准备走进会场来，人们越看越振奋，觉得

自己祖国的武装力量已是如此的强大。骑兵部队的许多连队最后以极整齐的五马并跑经过主席台前时，激起多次的热烈鼓掌。不仅跑得齐，而且马的颜色也是以各个连队为单位，要白全白，要红全红。

最后一队骑兵跑过去的时候，天安门红墙上的太阳灯、各色灯光在黄昏里开始发亮，人丛里的灯笼火把都点着了火，全场一片火光红浪；爆花筒向高空成群地放出红色、绿色、雪白色火球，拉着无数美艳的火丝，回头下降，哔哔啪啪响成一片。东西长安街上夹道的人群，开始围观提灯进行的漫长行列，交互地喊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选自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田　间

板门店纪事

一、在谈判桌上

板门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我所带的朝鲜地图上，查不出这个地名。这儿只有三户人家和几间草舍。

这几间草舍，在公路的一旁。草舍的屋檐，已被枪弹打穿，至今它仍然挂着伤痕。那用枪弹把这屋檐打穿的人，板门店的居民能指出他的姓名，这就是美国法西斯，这就是战争贩子。这些强盗，毕竟受到了人民的惩罚，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到帐篷里来，坐一个钟头，或者坐半个钟头，或者坐几分钟。

这个帐篷就在草舍的对面。帐篷和草舍之间，只隔着一条公路。

在草舍的对面，有一小块平地，这一小块平地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座白布帐篷和一座绿布帐篷，立在稀疏的松树中间。板门店的这座绿布帐篷，虽然由于风吹雨打、日晒夜露，逐渐褪成白色，但是南日将军在帐篷中的发言，一天比一天更洪亮，更雄壮，好比一股瀑布，在曲折的山涧中奔流着。和平战士的意志，将要把这一座帐篷，变成一幅图画，挂在历史的教科书上。

在人类的历史中，板门店的故事，曾是历史的一页。现在让

我记录一点印象，奉献给公正的历史家们。

我到这里来访问，不是访问战争贩子，而是访问和平战士。板门店是属于和平战士的。板门店，现在已经负有盛名，不论是白天，也不论是黑夜，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听着它的消息。板门店这个地方，只能为和平服务，凡走到这儿来的人，也只准来谈和平。要不然，我们的军事警察，有权也有力量，不让他们进板门店。

在板门店的路上，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谈话：

甲：美国鬼子在一个山头上，一次要打三万发（有的还要打十多万发）炮弹，将近一年来，它在板门店附近打的炮弹，至少有几百万发，多少房屋、土地已成废墟。

乙：究竟多少，我们没有兴趣替它算，可是，美国鬼子在板门店附近，并没有前进一寸。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你看那个有铁架子的山头，已在人民之手。我们决不许战争贩子前进。

在板门店这个地方，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春山上校（我方联络官）：关于你在10月21日联络官会议上所提的十一岁孩子金元基一事，我已作了查问。根据开城中立区我方军事警察的报告，和金元基自己的陈述，金元基是受你方南朝鲜部队的罗部队的诱骗，在每人三千元的报酬允诺之下和另一孩童金富莱到板门店桥旁边的中立区来进行侦察工作，于10月12日上午10时30分在开城中立区内板门桥附近被我方军事警察发觉，形迹可疑，金元基当时被扣，金富莱则于当时过桥逃去。金元基除陈述以上情况外，并称他曾于10月11日上午受你方同一部队的唆使，到开城中立区内板门店附近作同样侦察工作，并取得二千元的报酬。

根据上述材料，金元基是负一定侦察任务前来中立区的，而且你方南朝鲜部队唆使金元基的行为，显然是违反你我双方关于开城中立区的协议的精神的，我还要指出，你方南朝鲜部队诱骗

无知儿童到中立区进行侦察工作，不仅是这一次，我希望你方对此予以注意，并切实地约束你方不再作这种违反协议的精神而又违反人道的行为。

因金元基是尚未成年的孩童，而你方又愿意负责将他领回去，我希望他以后不再受人唆使，作类似行为。如你认为需要，为证实我以上所说，关于金元基的情况，我们愿意在将他交给你方以前，和你们进行一次共同的询问。

肯尼上校（美方联络官）：在尚未彻底调查这一事件时，我还不能正面地作任何发言。这件事不过是一个朝鲜成年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将它转达你方罢了。

我必须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十岁的小孩，到有许多警卫驻守的板门店做间谍工作。

我们将把这小孩交还他的父母，并作进一步的调查，如果你方所说唆使的间谍工作属实，我们以后再作联合调查。

这是去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 时我方对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控诉，证据确凿，对方理屈辞穷，只得推脱再作调查等等。当时在散会后，我们的军事警察，将金元基交与对方恩德乌上尉，恩德乌想很快把他领走。我方军官当加阻止，为证明事实，向金元基询问了姓名、年龄、住址，以及如何过桥被扣等，金元基即缕缕陈述事实，均与过去供词相符，由我方译员译成英文。

这时，四周记者很多，都在倾听并且作笔记。肯尼在距离二十公尺处车旁等候，甚为不安，多次命恩德乌速将小孩带去。恩德乌因我方军官与小孩问答未完，屡次想将小孩带走不果。最后，肯尼命恩德乌向我方张上校说明（这时张在距离三十公尺处）。才将金元基领去。这时，华尔街的奴仆，脸上狼狈不堪。

华尔街的老板——美国战争贩子，自从他在正义的墙壁上，碰破了头之后，不得不派他的代表坐到板门店来谈判。他们坐在帐篷里，坐在一条长桌的一边，嘴上说是来谈判，心上恨不得放一

把火把帐篷烧掉。放火焚烧帐篷，他还不敢这么做，在他来说，也许还想留一个假面具，另外，有全世界的人民在看守着。假如他胆敢把炮弹打在帐篷上，历史和人民就会马上宣布：板门店这就是战争贩子的坟墓！

他们不诚心谈判，又不敢不谈判，我看，他们坐在帐篷里，不过是在替他们的枪炮打卦算命而已。我见过乔埃，这个吃战争饭的脚色，这一条老狼，在帐篷中喊着上帝，喊完上帝，脸上灰浊浊地，躬着背，驼着腰，走出帐篷来，对他的帮凶们说是他倒了霉了。这是和"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一模一样的人物。哈利逊呢？坐在谈判桌子旁边，打打呵欠，吹吹口哨，说不出一句有理的话。如果说，这些脚色是穿军服的商人，依我看，他又像是十字街头的扒手。不能抢就要偷，不能偷就要骗，不能骗就要赖，不能赖还要诈。在谈判桌上，没理可讲时，他们唯一的办法，是用大炮帮腔，替自己壮一点胆。

板门店附近每当会议开始，炮就响起来。炮声虽然传进帐篷，甚至摇动帐篷，但是我们并没有人理会。相反，我看哈利逊倒是缩在桌子边，心正在跳。在帐篷中，在桌子的这一边，南日将军的发言，是正义的铁锤，时时敲到他的头上。哈利逊像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人，有时也叫一声，当他要开口时，就是说要建议休会。他是很怕见太阳的。南日将军的语调，如泰山一般，斥责战争贩子说："你该知道你们这种蛮横霸道的态度，在战场上都行不通，在这里也同样是行不通的。"南日将军手上所捧的，正是人民请他捧的太阳。这种光芒照着帐篷，帐篷也在为人民欢呼，为和平战士欢呼。

在谈判桌上，这边是正义，那边是野蛮无耻，这边是和平战士，那边是战争贩子。我来板门店所要访问的是和平战士，我在板门店所欢呼的，也是和平战士。我在这里所见所闻，使我相信，中、朝的和平战士，会把光荣与勇敢，永远留在板门店，会把保

卫和平的赤胆忠心，写在帐篷上！我在这里，祝和平战士健康！

二、帐篷和血迹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兄弟姊妹，在这一段故事中，我要把朝鲜人民用鲜血写的一首悲愤的诗，寄给你们。我要对你们，再讲一件血案。——这一件血案，不是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发生在板门店帐篷外面很近的地方，发生在中立区。我希望这一首诗，能传到你们手上，能传到欧洲、美洲，以及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离板门店一两里的地方，有一个小的山岗。在这个丛草杂乱的山岗上，有一座很小的坟墓，这是半年以前挖的，坟墓上还没有长出青草，也没有盖上草，仅仅是在一片黄土上，攀着几根草绳。受难者的家属，为了不让狼和狐狸再来咬死者的尸首，啃死者的骨头，他们用几根稻草绳结起一个网，罩在坟上。

这一座很小的坟墓，左边离帐篷只有一两里地，右边离死者家门，也只有半里多地。它一边望着家门，一边望着板门店的帐篷。当我走到这里来访问，我仔细地看了又看，坟墓前没有墓碑，只有一两块石头，这一两块石头，也只是一种标记。我站在坟边，我心上在问：

——为什么没有一块墓碑呢？

我的心上又在回答：

难道板门店的帐篷，不是它的墓碑？难道帐篷里南日将军的控诉词不是它的碑文吗？

我想是的。受难者的家属也会说是。埋在黄土堆里的十二岁的幼童姜永敦，他自己也会说是。因为孩子的血，就流在帐篷的外面。因为板门店的帐篷，就在坟前。这虽说是半年以前的事，按时间说，已经过了半年。但是，帐篷外面的血迹，并没有干呵。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所流下的血滴，是历史的字句，永远留在世上，

不会凋谢。

去年10月12日下午的时候，在公路的一旁，在小桥的一旁，这里距板门店，还不到一里地，十二岁的孩子姜永敦，背上背着两岁的小弟弟姜永植，立在桥边，看着他哥哥姜永运钓鱼。

姜永敦指着小溪中的清水，快乐地嚷着：

“哥哥，有一条小鱼在游呵。”

姜永运把钓竿放到水里，他也高兴地嚷嚷：

“别忙，让我把它钓上来。”

当他把钓竿放到水里的时候，我们的军事警察从公路上走过来，站在小桥上对孩子们招呼，劝告他们要小心，小心别掉到水里去。稍微过了一会，这时敌机在山上盘旋，嗡嗡的响声，传到公路上。军事警察离开小桥往回走，走了几步掉回头来又对他们说：

“孩子们，注意防空！”

姜永运只顾钓鱼，聚精会神地提住钓竿，没顾得上答话。姜永敦反问军事警察：

“这不是中立区吗？”

军事警察回答：

“是中立区。——那边的山岗，山岗下的小河，也是中立区。”

姜永敦又问道：

“帐篷里不是在开会？”

军事警察又回答：

“是。但也不要麻痹。美国鬼子不讲理。”

姜永敦的脸上，笑了一笑：

“我们不怕他，不怕他！”

姜永运坐在那里，仍旧提住钓竿，他喊着弟弟：

“永敦，快来把这条小鱼捉住。”

这时，军事警察走了，姜永敦正要去捉鱼，还没有来得及动，

就在这几秒钟以内，板门店蔚蓝的天空中，朝鲜停战谈判帐篷的附近，一群活泼泼的孩子的头上，美国的三架喷气式飞机，两架在前，一架在后，自西北向东南，突然地拽过来，呜、呜、呜地凶恶地叫啸着，接着就俯冲下来，哒、哒、哒的子弹，扫到孩子身上。姜永敦从桥边滚到水边上，他再也不说话了，鲜血在流着。永敦身上背的两岁小弟弟，失声大哭。

敌机扫射以后，还在空中盘旋着。当敌机飞来往下冲的那时，姜永运手上的钓竿落到水里，他没来得及叫一声永敦，身子往桥下一侧，两眼愤恨地向上看，盯着敌机。他看得很清楚，“这是挑油担子的飞机！（即美国飞机）”——他心上说。当子弹从空中射下来，他的眼睛往前一看，永敦正往下一滚。姜永运身上一颤，大声一叫：

“永敦！弟弟！”

他也哭了。姜永敦在临死前，最后喊了一句：

“哥哥！哥哥！”

全世界的人，听呵，他也在喊着我们哩。在朝鲜，我们大家又牺牲了一个小弟弟。看呵，一个十二岁幼童的鲜血，把溪水染得这么红呵！鲜血，鲜血，你往哪儿流呀？哪里是你流的方向？——往板门店流！往帐篷里流！往谈判的桌面上流！鲜血要在那里警告美国杀人犯：你又欠人类一笔血债，你必须准备很快偿还；你把和平侵犯，你就要准备受罚！

关于这一件血案，我记到这里，我的拙笔，还不善于作历史的记录。这里，我请求你们：将来有一天，当你们也来板门店访问的时候，请你们也来看看姜永敦，他的血迹，他的坟墓，就在板门店帐篷的旁边。在你们来看他的时候，请你们带一束最美丽的白花，一束和平的花朵，放在我们这个弟弟的墓上！

关于这一件血案，还有一段附录：

在姜永敦牺牲以后，当天 21 时零 5 分，至 22 时 20 分，我方

联络官张春山上校、柴成文上校、李平一上校，偕同美方调查人戴罗上校、爱德华中校来到血案发生地点实地调查。那美国军官一见尸首，脸上也发白了。当时双方检查了弹痕、弹头，对方也不得不承认射击方向是自西北向东南。接着向死者的家属询问遭难经过。

那美国代表在地上画着两个飞机的样子，一个是两翼前掠的，一个是挑油担子的，而后问姜永运说：

“你到底看见是什么飞机！”

姜永运也在地上画着一个挑油担子的飞机，说：

“就是这样的。”

那美国军官他又画一个两翼前掠的，又反问姜永运，说：

“不是，这是志愿军的喷气式。”

姜永运说：

“不是。我看见的是带汽油桶的。”

死者的父亲名叫姜大兴，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站在一旁，看见美国军官那种样子，实在忍不住了。这位老人扑过去，一把抓住美国军官质问他们：

“你们来开什么会，不是开的和平会？我的儿子难道是一个军人？你们为什么要杀他？我的儿子，他是死在中立区。如果不是死在中立区，就是死十个，我也不到这里来说话。”

那美国军官一时无话可说，心上有点打颤，他们想要溜走。老人又一把抓住他们的领巾，把衣服也扯破了。老人要他们偿命。

“你们的飞机打死了我的儿子。你们打死了人，难道就这么走了？你们不能随便回去。你们不还我的儿子，我就和你拚命。我老了，我死也不可惜。”

那美国军官不得不向老人请求：

“这不是我负责，是我们代表负责。你放了我吧！”

这一位老人还是严厉地说着：

“你也是美国军官!”

后来由于我方联络官劝了一下老人，让他们暂时先回去，老人才慢慢松开了手。而那些下贱的东西，无耻的流氓，一上了车，他就嘻笑起来。在他们看来，血债是可以不还的。朝鲜的老乡说，那些混蛋们，今天干出这些事以后，在今天的会议上，准备怎样回答呢？大概又是不要脸地说是扔错了。我想，事实是证明，鲜血更是铁证，我们不能让他说是扔错了，我们必须追还血债。

最后那美国军官在临走时，说这是一个初步调查，要求再来调查。张上校指出，虽然人证物证都已经充分证明美国侵略者的责任，但不反对再次调查。张上校又声明，奉首席代表之命，向对方口头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保留提出一切要求的权利。

10 月 13 日上午 9 时，双方联络官在板门店会晤，在我方联络官的咨问下，对方承认 12 日晚在板门店附近公路上所检查的子弹头，是属于半英寸口径的枪弹。

三、英雄的谈话

这几天，我住在松古洞。

松古洞离板门店很近。村的东北面，一个小山坡上，铺着一块红布板。跨过这块红布板，就是板门店会场区。

我一来到这里，我们的志愿军和朝鲜老乡，热情款待我，给我让出一间草舍。草舍里面，桌子上放着一瓶红月季花。花正开着。

这一间草舍，使我十分满意。住在这里，使我知道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那一天我刚一进屋，就听到枪声、炮声传过来，好像是往板门店打的，甚至好像是打在帐篷旁边。不过，照我的推测，他还不敢。如果板门店的帐篷上，落上美国侵略者的炮弹，板门店，这就是他们的坟墓!

我们的战士，为了保卫和平，正在加修工事。修工事的战士，要到前面去，从草舍旁边路过，他们坐在屋檐下休息谈论。我听见两个战士的一段谈话：——

这一个战士说：——这一声炮又好像是往板门店打的。另一个战士说：——美国鬼子早就想把板门店的帐篷打翻，他又不敢。——有我们的大炮，在管着它。——不过，我们不愿意像他们那样浪费炮弹；也不像他们那样拿炮弹当饭吃，靠打炮过日子。——美国俘虏自供：你们（指我们）的炮不打便罢，打起来也真厉害；你们为什么拚命地打？打得我们（指他们）连门也不敢出。——就是这么回事。美国鬼子还要在帐篷里吹牛，要不就打着呵欠说，你们（指我们）不接受我们（指他们）的方案，就让炸弹、大炮、子弹去继续争辩。

他们总不愿坐在帐篷里好好谈判，总想要到山上来谈判。如果他们上山的话，让我来给他一个耳光，我来对他们说，在我们的阵地面前，你们的大炮、子弹没有发言权！——哼！美国鬼子想上山来找我们谈判？我们给他下个通知：要谈判就要坐在板门店，就要坐在帐篷里，坐在那儿不准动！——说的对。我们的阵地上有的是战壕，没有放着桌子，更没有放着椅子，这儿还有担架，愿当俘虏的，我们优待他，要不的话，来了就得把尸首丢下。

我们有大炮，也有担架，愿当俘虏的话，咱们还可以抬他。为了和平工作，咱们倒不怕这个辛苦！

这一段对话，正是英雄气概，这能震动河山。是对战争贩子的一个很好的回答。我喜爱这一段对话，把它记在日记上；并且我也作了一首短歌，也算是写了几句赠言，祝贺我们的和平战士：——

听呵，勇士发出誓言，

唱在朝鲜，唱在前线，

勇士不惜血和汗，

把和平担在两肩。

一道道的高山上，
是一层层的堡垒，
千里战壕百里电线，
坦克大炮排在前沿。

要是敌人敢来进攻，
他的刺刀就要粉碎，
叫它永远沉下海水，
再也不敢向人民挑衅。

看我们的和平战士，
脚踏高山头顶青天，
决心要把和平大旗，
高高地插在三八线！

当我看着这两个战士往阵地上走时，一个肩上扛着一根很粗的松木，另一个战士肩上一枝枪，扛着一把铁铣，身上染满泥土，很像煤矿的工人，又好像是樵夫。山上的一群战士是这样的。我们的战士，是战士又是工人，是全能的战士。

我很骄傲，我们的祖国，在毛主席的教养下有这样好的和平战士，他们远离了祖国，祖国视和平如生命，视朝鲜如家庭。这使我相信战争与和平的警戒线上，和平战士必胜，战争贩子必败！和平，和平，和平这两个字，一定会写在板门店的帐篷上。

我不是一个军事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军人，只是从北京来的一个普通诗人，我要以和平保卫人的名义，向和平战士致敬！

四、阿爸吉要算帐

现在，当我写这篇故事时，太阳正照在当空，时间也正是正午，村边的小山岗上，翠绿的松林里，在伞形的松树边，牛在吃草，孩子们在嬉戏。

阿妈妮的头上，顶着一个水罐。阿爸吉手中拿着镰刀，要到地里去耕作。他们登上山岗，望了一望板门店，望着那个帐篷。阿爸吉把镰刀一举，用镰刀指着帐篷，愤怒地说：

"我也要到帐篷里去?"

"你去干什么?"

"我也要去参加谈判。"

"你怎么去谈判呢?"

"我要送上证据：八万颗炮弹壳。去找美国强盗算帐。叫那些混帐东西把我们的村子修好!"

朝鲜呵，这壮丽的国土，虽然变成了废墟，我也欢喜它。我想，即使我在这个国土上流下了鲜血，永远和朝鲜的松树躺在一起，我也十分愉快。

我坐在草舍里，把格扇门打开，望着友人的国土，望着警戒线上的哨篷，以及开在哨篷旁边的野花，我心中喊道：朝鲜万岁!和平战士万岁！志愿军万岁！金日成将军万岁!

我的手上，握着一枝笔，我要歌唱朝鲜，我要歌唱板门店帐篷中的我方代表，我要歌唱和平战士。如果我手上有笔还不能歌唱时，我就决定拿出我的鲜血来写它!

昨天黄昏，我在这草舍旁边，在屋檐下，亲手拾到三颗子弹壳。为了让我自己和更多的朋友，不要忘记仇恨，我把这三颗弹壳放到桌上，并且，和桌上的一瓶鲜花并排地放在一起。我要研究一个问题：战争与和平。

我已经介绍过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军人。可是我也认得出来，

这三颗弹壳，是美国飞机扫射时用的子弹。

松古洞这个地方，过去是中立区。朝鲜停战谈判会场移到板门店以后，中立区的范围，变了一下。但是，松古洞仍然隔会场区不远。我住在这里，能随手拾到美国的弹壳，像拾小石头似的，随手就能拾到，并且，板门店对面的炮声，不断地传来，这草舍的门窗，震动得格格作响。

我拿着笔，眼睛盯在桌上，正想往下写时，有几个小学生，走到我的门前。这是我们的小兄弟，小妹妹。他们又给我送花来。他们说，这是他们的礼物。我谢谢他们：

“我很欢迎这个礼物。”

他们都说：

“明天再给你送来。”

这几个孩子把花插到瓶里，而后摸着桌上的三颗弹壳，问我：

“你这里只有三颗？”

我点一点头。他们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子，这个小女孩子会唱十个中国歌的，她说：

“我们村里能拾到三万颗。”

他们都说：

“我们反对这个！”

那个小女孩子说：

“我们反对这个！这个东西不能变成花，也不能变成书。它把我们的村子，全炸毁了！”

我问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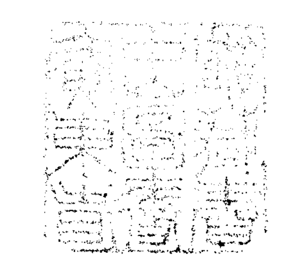
“你住的那个村子，是不是叫中立区？”

她回答：

“几个月前，就是叫中立区呀！”

我又问她：

“现在你住在哪里？”



她回答：

“村子炸了，我们住在地下了。”

我还不完全懂这句话：

“地下？——住在地下？”

她把我引出门去，叫我朝山岗那边望一望，在一片碎瓦堆后面有一排防空壕，她说她一家人住在那里，像战士一样，在志愿军的隔壁，和志愿军是邻居。她很高兴地对我说了几次：

“我给志愿军叔叔也送过鲜花。”

这时，还有一个孩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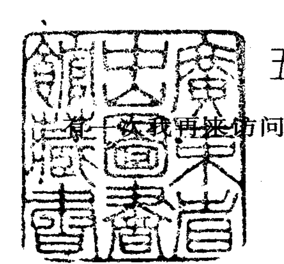
“美国鬼子打这么多炮弹，他是想要我们搬家哩。”

那女孩子倔强地说：

“我们就是不搬家，死也不搬家。村子炸完了，我们还要住在村里。阿爸吉拿着镰刀，天天在山上望着帐篷。阿爸吉说要把弹壳都拾起来，背在身上，到板门店去，到帐篷里去，和美国鬼子算一算帐。——要他赔我们的村子，把我们的房子全修好。他不干，就揍他。阿爸吉说他有力气，说他力气大！现在我们就是不搬家，要搬家的话，从地下搬到房子里去！”

我告诉他们：

“全世界上的人民，都要和战争贩子算帐。都要和平。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他们正在设法，要把你们从地下搬到地上。——要把废墟修好，有一天，让你们住到乐园里去。在那儿，人类要开公审大会，公审战争贩子，并且要用绞刑把他们处死。愿你们努力吧！我要把你们的话，记在心上。在我这一生，我有一个义务，我要在和平书上，控告美国杀人犯，保卫世界和平！”



五、苹果的故事

有一次我再来访问板门店，板门店的一位军事警察，和我讲

这苹果的故事；故事中人物的姓名，已经失传，但事实一点不假。

去年8月间，美国鬼子秋季攻势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到板门店来，坐在帐篷里继续停战谈判。他们刚一到板门店的时候，这儿的老乡，指着他们说：

——这是穿军服的商人！

老乡们又说他们是：

——一些疯子！

这一些疯子，坐在吉普车上，手里还拿着酒瓶，在车上喝着酒。表示他们很威风，而且阔气。

在他们坐的吉普车上，还带来不少的糖和苹果，要施舍一下子，一面开着车，一面把糖和苹果撒给路旁的孩子们。敌人，阴谋家想的倒妙，在战炮上插上几朵花，在刺刀上贴上慈善两个字，以为人民就会把强盗当做慈善家，会接受强盗拿鲜血泡制的礼物。哪里知道：人民不是瞎子，人民懂得什么东西才叫礼物。

在公路上，在一块稻田边，吉普车停住，一位美国军官从车上走下来，手上拿着一个苹果，走到一个朝鲜孩子的身边。脸上假惺惺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位朝鲜孩子，他手上拿着一束鲜花，这一束鲜花，他要送给我们的谈判代表。这时他回答那美国人，回答得很干脆：

“我不告诉你。”

那美国军官还笑着，把手伸过来想要看看孩子手上的花：

“这是送给我的？”

孩子提防了一下，把花放到背后，怕那美国军官动手抢，孩子回答他说：

“我不送给你。我要送给我们的谈判代表。”

那美国军官很想有人在板门店的公路上，送他一束花，他好拿着带到帐篷里去吹一下牛，他还想试一试孩子，说：

“送给我，我请你吃苹果。”

这时，孩子的眼睛，盯着那个可恶的无耻的家伙，一句话也没有说。话还没有想好。可是很快他就说话了：

“这是朝鲜的苹果，不是你们的。”

那个美国军官忍着气说：

“是，是我从美国带来的。”

这朝鲜孩子也硬着嘴说：

“不是，是你们把朝鲜的苹果抢走了。”

那美国军官忍不住了，正要想法报复一下，有一群孩子一下涌上来，围着吉普车，嚷着。车上的美国鬼子以为他们都是要苹果吃的，把苹果往下撒，撒给孩子们。哪里知道，孩子们把苹果拾起，掷到吉普车上，对着他们的脸上打。

孩子们回答他们：

“我们不吃你们抢的苹果。你们快回美国去！”

车上又把糖撒下来。孩子们照样又把糖拾起来，又掷到车上，掷到美国军官的脸上。孩子们回答他们：

“我们不吃你们抢的糖。你们快回美国去！”

接着是一片喊声：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吉普车开跑了。美国军官在车上，拿着酒瓶喝着酒，冷笑着。让强盗们冷笑去吧。孩子是天真的律师，他们可以无情地撕破强盗的脸。

人民知道，和平的价值，自由的价值，比糖果的价值大得多哩！人民是苹果的制造人，也是糖的制造人。侵略者抢下了人民劳动的果实，又把它撒给人民，想要人民承认强盗就是恩人，在强盗面前喊声“谢谢”，这是白日作梦。看吧，勇敢的孩子撕下了他们的脸，把它挂在板门店。

六、记姚排长

松古洞，这是朝鲜的一个小村子：村子虽说小，但在我们的和平书上，我们可以说，松古洞是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全世界的人，都早已知道，1951 年 8 月间在板门店，美国的谋杀者，谋杀了我们的一位和平战士，——姚庆祥。

谋杀的地点，就在这松古洞。

我住在这里，每天一清早，把草舍底格扇门打开，走到屋檐下，望着门前的小山岗、和山岗上的三棵栗树。我听到布谷鸟在树顶上高声叫着，我也看到布谷鸟，在树顶上飞来飞去。这三棵栗树，约有三丈高，很突出地长在山岗上，是独立的三棵树。它离我住的草舍，还不到半里地。我望着它，我怀念一位和平战士；他是中国的志愿军，因为保卫和平，他的血流在朝鲜，因为朝鲜人民的请求，他的尸首埋在朝鲜。他在生前，站在保卫和平第一线——板门店，牺牲后，他的遗体埋葬在保卫和平第一线——开城。在他的墓前，人民和战士共同修起了石阶、栽上了常青树，让他在绿荫下，永远安眠！

现在，我住在和平战士被谋杀的地方，望着这三棵树，来记录姚排长的故事。姚排长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这里，我先记下它的一页——

姚排长是山东人，煤矿工人出身，共产党员。他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这个年轻人，在他入伍以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射手，枪打的极准确。当他出国来到朝鲜时，他和战友们相约："我们好好工作，报答党，报答祖国！"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他就率领一个军事警察排，在板门店一带，担任警戒巡逻工作，保护中立区的安全。自从他担任警戒的第一分钟起直到他牺牲前最后一分钟，始终是忠实执行谈判协议。

当他初到松古洞，由于人地两生，住的是草棚、或者是土洞；

有时也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虽然如此，姚排长牢牢记住党的指示："不动人民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他要是进老乡的门，进门打个招呼，出门也打个招呼；进门喊着"阿妈妮"，出门也喊着"阿妈妮"，并且总要把手举起来，表示尊敬。因此，松古洞的老乡，很快就把姚排长当做家里人一样来看待，阿妈妮叫他是"儿子"。

姚排长这一排人，当时分三个班，住在板门店一带，板门店一个班，松古洞一个班，本松里一个班。松古洞、本松里这些地方，当时都是中立区，(板门店更不用说)。1951 年 8 月 16 日上午，双方联络官会议上，关于中立区新的分界线，已有明确的规定。美方代表肯尼上校除原则上同意我方提案外，并且具体提出，利用可以辨识的天然地形，即自开城中心划一五哩半径圆，再划一辅助小弧形直达板门店小河流，实际依穿过板门店桥下之河流为外线，即以该小河流为界。这是中立区的范围。姚排长他们，一直就在这个范围内担任警戒。

姚排长牺牲前的头一天，那天下午，他来到松古洞，在李大娘的家里，谈了一阵话。那天姚排长一到，这个阿妈妮，显得特别活泼。阿妈妮亲热地叫着："姚排长"和"阿得儿"(孩子的意思)！阿妈妮的女儿淳芬，也很欢喜。淳芬从墙上摘下一个玻璃镜框，取出她舅舅的一张照片，交给姚排长看。淳芬说她的这个舅舅和姚排长长的很像，不仅样子长的像，就是心也长得一样。她的这个舅舅，也是一个革命干部，他被美李匪帮在山上杀死了。姚排长觉得淳芬说的对，回答淳芬说："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是一家人！"当时阿妈妮坐在一旁，他们都坐在屋檐下，阿妈妮还和姚排长说了几句笑话。

淳芬还有一个舅舅，名叫李明奎，是一个铁路工人，参加过罢工运动；他这些日子住在淳芬家里。这时他从地里回来，也坐到屋檐下，攀住姚排长，问了问谈判的事。

就在这天傍晚，忽然之间，一阵大雷雨声响过。姚排长看看手上的指南针，叫了一声“阿妈妮”表示要走，阿妈妮也留不住。姚排长冒着大雷雨，带着一个班，向板门店方向走去。

姚排长经常地一夜不睡觉，一双眼睛熬得通红。他和战士们说，上级有指示，这两天情况又紧张了，敌人要找借口，制造事件，破坏停战谈判，要大家提高警惕。半夜的时候，他才从板门店回到高头山，到连部来汇报工作。

也就在这天半夜，美国的谋杀者，竟派出三十多人的武装队伍，他们穿的美国装，拿的美国枪，违反谈判协议，偷偷地过了小河，侵入了中立区。谋杀者从板门店的东南，进到白鹤洞，爬在小山岗下；另外又分出一股，进到松古洞，埋伏在一家民房里；这一家民房，就在三棵栗树的附近。这时，敌特分队长金昌植说：

“汶山美方的紧急命令，我们一定要完成。”

另一个敌特朴仁绪说：

“天快亮了，姚排长还不见来哩。”

金昌植又说：

“天亮了也要等。明天就是19号，完不成任务，怎么向汶山作交代？”

另外还有一个家伙问：

“完不成任务又怎么样？”

金昌植回答说：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件大事。既然进到中立区，就得完成任务，把人打死了，还要拿回尸首做证据。拿不回尸首的话，就要闹出国际问题。大家潜伏下来。听我指挥。胆子要大一些，有什么问题，美方说由他负责。”

当天快要亮的时候，姚排长心上，又警惕一下。这一位英雄，手上提着枪，精神抖擞地，又向松古洞这个方向走过来，这时，在稀薄的星光中，朴仁绪嘴上衔着一棵小树秧子，不时地从墙角边

探出脸来，晃了一晃，马上又缩回去。这时淳芬也起了床，要给志愿军做早饭，她走出门来到水井边打水。淳芬猛一抬头，望见姚排长，站在她房子后面的小山岗上，雄纠纠地了望着前方。淳芬急忙吆喝阿妈妮，说姚排长回来了。阿妈妮拉开后屋的格扇窗，远远地叫着："姚排长！姚排长！"

三棵树上，鹌鹑鸟也起飞了，它在树顶上飞过来、飞过去，高声地叫着。黎明前的天空，稀疏的星星已经落下去。姚排长站在山上，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阿妈妮的话，这时，突然枪声响了，一声冷枪射过来。——这是谋杀呵！

敌人打的这一枪，打在九班长的身边，没打中。九班长正在离三棵树不远的地方巡逻。姚排长听见枪声，不但没有退回去，反而迎着枪声走过来。他告诉他的战友，我们是在中立区，我们不要随便打枪；要打的话，要等到敌人进入腹心地区，要打的话，就要把敌人捉到手；否则敌人就要造谣，要找借口的。接着他又叫九班长快去控制那有三棵树的高地，防止敌人从右边迂回。于是九班长沿着山坡往右走。没走多远，他看见战士王仁元在叫排长，说三棵树下有敌人。王仁元的话还没落音，左边密集的枪弹又打射过来。就在这时，姚排长倒在斜坡上。九班长和王仁元赶过来，要把排长扶起，姚排长对他们说，不要管他，宁肯牺牲个人，也要保卫和平，个人死了算得什么，生要生的光荣，死要死得伟大，决不让美李匪帮破坏停战谈判。他命令九班长和王仁元，快去找三排副那个巡逻组来监视敌人。王仁元也挂了花，但都不愿离开排长。姚排长又命令他们快去。也就在这一阵子，阿妈妮、淳芬和李明奎，他们豁出命来，从麦垛旁边，往山岗上跑，要去救同志们。淳芬一面跑，一面喊姚排长。一阵枪声，把他们打回来了。枪声紧接着瞄准姚排长，他身上又中了一枪。美国的谋杀者，打了半天枪，而后鼠窜过来，一股敌人围住姚排长，竟想把他抬回去。姚排长从昏迷中猛然醒了过来，手上还紧紧地握着枪，勇敢

地挣扎，摔倒一个敌人，他自己也倒了下来。

另有一股敌人，走到阿妈妮门口。敌人问李明奎，问他家里还有志愿军没有？李明奎泰然地回答，说志愿军都在山上。这股敌人抬头向侧面山头上一看，果然，山头上来了志愿军。这是我们的连长、指导员，他们带着巡逻组赶上来了。金昌植仓惶地夺下姚排长的短枪，向阿妈妮的草舍打了七枪。他们又在姚排长的头上加击两枪。抢走姚排长的军装、军帽和鞋子，飞快地逃去。敌人一面逃，一面叫："志愿军来了，快跑！"

这是 1951 年 8 月 19 日的黎明。——阿妈妮的家里，墙上挂的大圆钟，时针正指着：五点五十分，这一个时间，在历史上记载着一位和平战士的光荣牺牲！它也记载着：美国战争贩子的一笔血债。美国的谋杀者，他们往哪里逃？胆小的杀人犯，他们往哪里逃？他们逃不出这个世界！他们在逃跑中，在板门店一带的小山岗上，丢下一顶钢盔和一把刺刀。那钢盔上有一个白色的记号，——A 字号。全世界上的人都认得，这是美国侵略者的记号。这是朴仁绪在一个月后被捕时自供的。关于这件血案，美方代表肯尼上校说了一句"遗憾"，遗憾不能算抵罪，我们一定要叫凶手站出来，偿还血债！

刚才我说过，当姚排长牺牲不久，连长、指导员、三排副他们，很快赶到姚排长身边。他们举起枪来，向光荣殉难的战友宣誓：一定要复仇，一定要在血迹上，把和平的大旗插起来！

这一天早上，松古洞全村的老百姓，宣布绝食一顿，纪念姚排长。姚排长的阿妈妮，她还没走到姚排长身边就问："尸首还送不送中国去？"接着她就请求：

"不要送了。把姚排长埋在朝鲜吧。他是为我们大家牺牲的。朝鲜人要留他。埋在朝鲜也很好。朝鲜——这也是他的家。

志愿军同志，请你们看吧，这三棵树，这个山头，染着他的血呀，挂着他的心肝。他的心——这就是和平！这个心是敌人害

不死的。我请求你们，告诉毛主席，告诉他的父亲、母亲，请他们不要挂念，有我在这里，做姚排长的守墓人！”

在阿妈妮的身边，淳芬站在那里，默默不语，握紧了拳头。在她的心上，在她的眼睛里，——姚排长不算是死了，姚排长还活着！

故事记到这里为止。下面我还要抄一段对话，作为附录。这是1951年8月15日，敌我双方联络官会议上的一段对话。

8月15日这个日子，距姚排长牺牲的时间，不过是三天。在这段话中，肯尼上校总是强调所谓“偶然事件”。事实证明，他的话里埋着炸弹，他的话里，藏着阴谋。我方张春山上校在发言中，曾经一一加以揭破。朋友们，你们听吧——

张春山上校说：现在我提出昨日未达成的协议事项。我方认为双方武装部队（包括空军）不得进入中立区。我提出后列两点，希望予以解决：

（一）关于你方昨日所说空军之可能飞入中立区（由于偶然事件或不能控制的环境）；

（二）关于中立区外，冲突造成落入中立区之流弹。

在昨天的讨论中，我的印象为，你方强调你方违反你方应遵守的规定时的借口，即引用字句，如不可控制的或偶然的等字样。如你方用此类字眼以逃避责任，我认为我们即不能完全达成协议。如用此借口，我方关于遵守协议亦可用借口，例如我方武装部队进入中立区，或武装巡逻进入会场区，亦可称为偶然事件。但我方不作此借口。

在我方部分，我方对此问题考虑极为明确而严格。所以一旦协议成立，即需遵守并负责，不能蓄意作任何借口，以不能控制或偶然性为理由。

肯尼上校说：现在回到偶然事件，这是司令部和代表团所不能控制的事件。

让我正面来说，我方相信有发生真正的偶然的事件的可能。

张春山上校说：你方所谓偶然或不能控制的事件，是假想的，我们只要求中立区安全的保证。在协议中不能把假想的偶然事件规定进去。

肯尼上校说：我们了解，并原则上同意你方所说的，我们亦愿意保持此地区之中立化。

张春山上校说：关于流弹事件发生于板门店，因我们已很熟，我愿坦白说出我自己亲自注意到射击子弹流入中立区。你方巡逻部队走近板门店太近，已进入板门店，而我方则已命令我方人员严格不得走进中立区，希望你方人员勿走近板门店太近。我今早已接到报告，早晨5时—7时，有事件发生。你方侦察部队出现于板门店边界附近。详细情况现在还不知道。

七、帐篷内外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访问板门店时，我看着板门店的帐篷，心上这么想：这样的帐篷，我曾经在那儿见过？是的，我见过。在历史课本上，我见过，我们古代的英雄，曾经住过帐篷，当他们征服了野兽，他们就住房子了。现在，我看到这样的帐篷，有这样的印象，仿佛走到一座古堡旁边，虽然我们的时代并不是古代，而是现代。

全世界上爱好和平的朋友们，你们不会说我的印象，是古怪的吧？是特别的吧？板门店的几座帐篷，是设在朝鲜的群山之中，是立在战火笼罩之下。在它的南面（还有一段路），是美李匪帮的阵地，在它的北面，以及东西两侧，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也是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阵地。坐在帐篷里进行朝鲜停战谈判的人，一方面的，是英雄，另一方面的，则是强盗，或者说是野兽。

英雄和野兽，在帐篷里已经斗争了一年。不，是一年又加一

个月。也许还要再加几个月。也许再加几个月还不行。朋友们，我们不必估计这个时间，让我们估计它的结果吧。让我们预祝英雄的成功，和平的胜利。要是敌人不肯坐在帐篷里谈判，像他所说的——要到山上来谈判，我们也要在山上，在海边，取得胜利！有一位在帐篷里坐了一年的人，他告诉我下面的故事。

这是1951年11月里的事。双方参谋人员，在帐篷里讨论军事接触线，要按当时的接火线当作军事划界线的方案。讨论之前，双方参谋人员都在看着地图。

一开始时，美方参谋人员建议，从东线到西线，逐段来校正。这是讨论问题的方法，我方没有什么意见，回答说可以。美方就摆出他们的地图来，地图上已经画好了接触线的，他们并且问我方参谋人员，说：

"你们的图画好了线吗？"

我方参谋人员一面看对方的图，一面回答说：

"先讲你们的图。"

我方参谋人员继续看他们的图，发现很多线画得不对。一面在对方图上画上我们认为正确的线，一面说：

"这不对。八八·六高地是我们占的，不是你们占的。你们部队进攻多次，都未攻下。还有某高地也是我们的。"

美方参谋人员坐在一旁，只得说：

"你且先画上。这不一定说我方同意了。如果按照现有的地形分界，你们应同意我方所画的线。"

我方表示要他们去查一查，究竟八八·六高地是在谁的手上？对方又只得把画好的线，稍微改了一下。就是这样，我方也不能同意。我方要他改得更南一些。对方表示还要再改一下，可是等一会又说不干了，对方说：

"这儿昨天我们还占着哩。你们已经丢了这个阵地。"

我方仍然坚持说：

"并没有丢。你们攻过，但被逐退，现在仍在我手。如果我们在帐篷里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的部队他们在阵地上会不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是参谋人员，不是司令官。"

对方也在坚持自己意见，说：

"我们还有侦察活动"。

我方参谋人员笑了一下，并且驳斥对方说：

"要搞清楚概念，并非碰了一下就算是占了阵地，就算是你们的接触线了。"

争执了半天，对方才打算动手改线，改线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是：昨天晚上他们攻过八八·六高地后，又撤了，所以可以改线。他们一面要改图上画好的线，一面叨叨不休。对方说：

"这儿我们常去的，昨天还去过。"

我方的回答：

"这也不是事实。"

对方又说：

"我们并且还有战车去过。"

我方的回答：

"战车被打坏了吧？"

美方的参谋人员把手放在图上，动作很慢，可是嘴上的话，说得很快，说的又多。隔一会，对方的口吻，变了一下，又说：

"我们感觉八八·六高地是我们的。"

我方的回答：

"这不是感觉问题。"

对方还在说：

"八八·六高地昨夜仍在我手。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坐飞机去看看。"

我方的参谋人员表示，对坐飞机没有多大兴趣；而且坐飞机识别具体的山头很难，近代作战要靠情报，司令官不能到每一个

山头上去看。对方仍然表示，最好的证明是去看。我方参谋人员于是说：

“要看的话，徒步去看。”

对方似乎觉得，坐飞机看山头比走到山头上去看还要清楚，总是说：

“坐飞机去。”

我方坚持自己的看法：

“走去看，更确实；还可以照相，带回给小组。如果坐飞机，空中看几秒钟，经过几个山头，不能看清楚。或者骑马去也好，我们有好战马，能送你们。”

我方的参谋人员并且补充说：

“有确实的情报，在帐篷内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你们抱着这种态度，去看也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站在阵地上争论，不如坐在帐篷里争论。并且你们要到我们阵地上去看的话，你们会被俘的。我们都是军人，战场的纪律，我们都是知道的。”

结果，对方把线改了，对方说：

“至此，我方已有好些让步，未见你方有让步。”

我方的回答：

“这儿都是部队所在的实际位置，并非你们让步。”

对方的脸上，假笑了一下，说：

“你们是在拿我的钱赌博。”

我方的参谋人员说：

“你们口袋里没有钱。”

对方又说：

“你们的口袋里可能有钱，但没有拿出来。”

我方参谋人员的脸上并没有笑。我方参谋人员觉得，这个会像这样开下去，不用说讨论别的问题，就是讨论军事接触线这一项，也要讨论几个月。于是特别郑重地说：

"我们不讲赌博，我们要讲公理！"

在帐篷里，双方关于军事接触线所争执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八八·六高地的问题。而八八·六高地这个山头，距板门店又并不很远，可以说是很近。相隔的路，只有几个山头。如果是在晚间，站在帐篷的门口或者站在帐篷的窗户旁边，拿起望远镜来看的话，山头的火光，是可以看得见的；就是在白天，山头上的炮声，机枪声，也可以听到。我们据守在这个山头上的志愿军战士，常常站在高处，望着板门店，并且面向板门店高声宣誓：

"我们的身边，就是板门店，我们的背后，就是开城；李奇微在会议桌上要开城，在这里伸手来夺开城，同志们，我们一定把敌人的血爪打断！我们要在阵地上给我们的谈判代表撑腰！"

我们的战士都很明白，守卫板门店，守卫开城区，对人类的和平事业，会有很大的价值。严守阵地的战士，早已写好决心书，头可断，血可流，决不让敌人向开城区逼近一步。他们磨刀擦枪，随时准备打垮敌人的进攻。

我们的志愿军某部三营八连，被称为"保卫开城的钢铁连队"，这一个连，是11月13日奉命开到洞子山一带，他们是来接防的，一到这里，敌人曾用强大炮火袭击他们。可是敌人的炮火，拦不住英雄们。敌人看见来势不妙，自己主动撤出八八·六高地。我们也并没有客气，就很快前进，占了这个山头。

从地形的观点看来，如果说大德山（这是主阵地，在板门店的东侧）是板门店和开城的一扇大门，而八八·六高地是大德山的一只手；我们为了保卫板门店会场区，为了保卫和平，这一只手是不能让敌人拿去的。自从我们占领八八·六高地以后，英一团和伪一师，（1952年3月间，调来美陆一师）不断来进攻，正如帐篷里的美方参谋人员在会议桌上一样的叨叨不休。

三营八连战士，一面和敌人打，一面赶修工事。八八·六高

地原来没有工事，山上连一棵树也没有的，只有二十多米的交通沟。当时，已经是冬天，天已经下雪了，指导员苏武禄带着他的一连人，爬在雪地里，大家一手执枪，一手拿铁镐，一面打仗，一面筑工事。由于在炮火中抢修工事，战士很疲劳。有的人，手上还拿着铁镐，眼睛就闭上了。虽然如此，一有惊动，最疲劳的战士，也立刻站起来跳出战壕，向前冲锋，一次一次地把敌人的进攻打退。指导员常到各班去看，和战士们攀谈：

"美国鬼子想要开城，你们给不给他？"

战士们回答说：

"叫他来打吧。他拿去了，算我们倒了霉，他拿不去的话，我们不会送给他。"

我们的将军，也来问过战士们：

"你们已经打退了两个连的敌人，如果敌人再来两个连呢？"

战士们回答说：

"完全有把握打垮它！"

我们的将军又问：

"敌人来了两个连，再来两个连呢？"

战士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说：

"欢迎李奇微多多来送礼！"

正当我方参谋人员和美方参谋人员在帐篷里争执八八·六高地的时候，敌人还在每天攻打这个山头，有的时候用一个排的兵力，有的时候用一个团的兵力来进攻，另外还有五个炮群，另外还有飞机、坦克配合作战。敌人一面在山上打，一面在帐篷里吹嘘要大炮参加辩论。可是，不论是在山头上，不论是在帐篷里，美帝国主义是：失败加上失败。而我们呢？不论是在山头上，不论是在帐篷里，是胜利加上胜利！不论是当时，不论是现在，八八·六高地始终是我们的；在这座高山前面，一批一批的敌人死在这里，他们死在这里，他们也不敢说这座山是他们的。

朋友们，当我们想起帐篷里的胜利时，我们要记住高山上的胜利，当我们想起高山上的胜利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帐篷里的胜利。尤其是高山上的战绩，我们更要把它记到心里！请允许我打一个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吧：我们的战士，是和平的高大柱石，是万能的工人，我们的谈判代表，是战士的光荣的代言人，是和平的高超技师。板门店的帐篷，和中朝勇士的阵地，应该同时写成一首万古不朽的和平之歌！

八、十天和九夜

在板门店的东边，有一道河川。这个地方，介乎敌我阵地之间。这个地方，有一条很小的河流。小河的旁边，有一间独立屋。独立屋的旁边，有一棵独立树。

1951 年 4 月底，某一天晚上，天色漆黑，板门店的上空，那作为中立区记号的灯柱，光线也很微弱，它好像是一团雾，笼罩着板门店和板门店附近的山地。晚上，风吹着路旁的荆棘、石头和野花。天也像要落雨呀。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们志愿军某部，为了保卫开城中立区，派出一个突击小组，去执行任务。志愿军战士张渭良带着他的两个战友要到一〇四点二高地去；由于天太黑的缘故，他们在执行任务以后，误入了敌人的布雷区。一个战友踏响了地雷，当下牺牲了。另一个战友，身上也挂了花。张渭良自己身负六处重伤，他的左腿筋骨被炸断了，胸部也被弹片划破。这时，张渭良把自己的冲锋枪取下，交给他的战友，说：

“天快要亮了。你还能走回去，你快些走。别管我。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这位突击组员，他哪里肯走，坚持要把张渭良背回去。可是张渭良也坚持不让他这么做。张渭良心上想：我也许活不了，何

必再叫两个人一道牺牲呢？张渭良又对他的战友说：

"你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我就是死了，也决不给祖国丢脸！"

河川里，敌人的枪声一直不停。东响一阵，西响一阵。这位突击组员，急忙地往回走，他仍然盘算要在当夜把张渭良救回去。因为我们的阵地离这里并不远。他走着、走着，心上乱得很。他总是放不下心来，他又想往回翻，还是要把张渭良背回来，可是再往回走时，路走错了。在敌人断续的枪声中，他恍恍惚惚听到，离他身边不远，有一个人在哭泣，他的脚步，停了一停，一听那哭泣的声音，是在独立屋的那个方向。可是他顾不上来管它了，只顾往阵地上走去。

当他回到连部，天已经亮了。他向指导员汇报他们的经过。营的教导员这时也在连部。自从他布置任务以后，一直是在等候消息。教导员和指导员，他们虽然知道他也挂了花，但是总觉得他还没有尽够责任，他没有把张渭良背回来，这是不好的。他们都批评了他。接着，教导员就问他，说：

"走到什么地方，把地雷踏响了？"

这一位突击组员回答说：

"在一间独立屋的右边。距独立屋还有几十步路。当天快亮的时候，我们能看得见独立屋左边的那棵树。"

于是，他叙述这间独立屋的情况：独立屋已经塌了。在黎明前的星光下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那个屋顶已经斜了，像是马上就倒的样子。这是被炮弹打的，或者是被炮火震的。教导员又问他，说：

"屋里大约没有人住了吧？"

这位突击组员回答说：

"不，我听到有一个人在哭泣，他哭几声，又叫唤几声。那哭泣的声音，就在独立屋旁边。"

教导员一听这话，马上惊异起来，甚至变了脸色。教导员说：

“你没有走过去看一看？”

这位突击组员，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况，说：

“没有去。那时天快要亮了，我又急着要往回走。”

我们的这位教导员，是有军事家的特点，和军事家的风度，他是要把事情问个清楚：

“据你听那哭泣的声音，它像朝鲜老百姓，还是像是敌人？”

这位突击组员，一时很不敢断定，心上说，那也许是种地的老百姓。教导员、指导员和他一同走到前沿工事附近，教导员指着独立屋的方向，问他说：

“张渭良在哪里？那哭的人又在哪里，在房子里面，还是在房子外面呢？”

他想了一想，手指着那一间独立屋和那一棵独立树，回答说：

“张渭良在这边，那哭的人是在那边，他们同在这一片地方，就是方向不同，一在左，一在右。”

教导员抱着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仔细思索很久，他一边还在问这问那，一边在进行判断：我们的阵地和敌人的阵地，相隔这么近，敌我之间，经常是枪声对着枪声，在枪声下面，还会有什么人？这是什么人？是朝鲜老乡呢，是敌人呢？想来想去，也很难想得清。于是决定，不管它是什么人，反正要打问清楚，我们去找张渭良时，也要把他找回来，等天一黑，要突击组员和副排长一同去找。

下面就是派人去寻找的经过，以及张渭良在小河旁边生活十天九夜的故事：——

第一夜：第二天上午，营教导员、连长、指导员站在前沿阵地上，仔细研究地形。他们一看，距右前方四五百公尺的地方，有一间独立屋，旁边有一棵独立树。他们再一看，左前方也有这么一个地方，他们再向侧面一看，营部后边，靠山下不远，也有这

么一个地方。大家都在发问，究竟是那一个地方，就连那个突击组员这时也弄得模糊了。大家都很难受，比割了心上一块肉还痛。张渭良会不会被俘，会不会牺牲了？营教导员决定，要再派人去找，死了也要把尸首找回来。这天晚上，三个地方都有人去找，也没有找到张渭良，也没有找到哭泣的那个人。

第二夜：第三天，友军阵地上打来一个电话，说昨天晚上他们听见河沟里有一个人在哭。当时是哭一阵，叫一阵，叫一阵又哭一阵；敌人朝着这个地方，打了一阵枪。营教导员想，这也许是突击组员所说的那个人吧？这一天晚上，他又派人去找，按照友军所说的方向去找。果然，他们在独立屋的左边，也就是在那独立树的附近，找见了一个人，这人已经死了。他们在月光下仔细观察，这人并不是张渭良，这是李承晚的一个伤兵，在他身边，还有一枝枪和没有打完的子弹。战士们很气愤，指着尸首说：

“原来是你这个奴才！”

有的战士说：

“你哭什么呢！你为什么来打仗？”

副排长说：

“敌人的下场就是这样的，伤了没有人救，死了也没有人埋。”

这天晚上他们仍然没有找到张渭良，只看到敌人的一具尸首，和尸首旁染着血的一枝美国枪。不过，也算有点结果，到底谁在阵地前面哭泣，这件事算弄清楚了，原来那哭泣的人，是敌人不是我们的人。

第三夜：这天晚上，营教导员又派人去，要他们再去找张渭良；同时把他们昨天看见的尸首埋起来。

第四夜：副排长继续带着几个战士，去找张渭良。营教导员吩咐他们，要一面找一面轻轻喊：“张渭良、张渭良。”副排长他们按照这个指示去做了。这天晚上又没有结果。

第五夜：有一个战士，原来是工兵出身，自告奋勇，要去找

张渭良。他说要去把地雷起光。这一天晚上，在稀薄的月光下，又发现一具死尸，这又不是张渭良，这是一个受难的朝鲜女人。战士们在附近，找见一个弹坑，轻轻地把这位受难者安葬了。人们都在思索，这个女人也许就是那独立屋的房东。要不是战争贩子，这个地方庄稼早就种上了。现在这里竟成了无人区，现在这里不是弹片就是血迹；所以，志愿军一定要保卫祖国、保卫朝鲜，过两天，我们还要把庄稼种上！

第六夜：副排长他们又去了。他们在小河旁边，在独立屋的右边，探来探去，这一次，发现一点痕迹，有一个草窝，好像有人曾经在这儿坐过似的，战士拿手去摸，可是在草窝里以及附近的地方，又没有找见张渭良，而且也并没有看到他的尸首。

第七夜：副排长他们继续去找，一面去找人，一面去起地雷。战士们下定决心：准备打一个好仗，为朝鲜人民报仇，为张渭良报仇！

第八夜和第九夜，每天晚上他们都去找。时间过得很快呵，我们的战士，为了保卫和平，为了人类不遭受战争的灾难，战士的勇敢，我们难以笔墨形容，战士的决心，也从不为时间所限。就在我所叙述的这一片地方，他们摸得很熟了，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岔口，甚至每一根草、每一块石头，也都摸熟了。以后的这两夜，他们每天晚上，都在独立屋的附近，在小河的两旁，寻找自己的战友。人们判断，张渭良会死的，但他绝不会投降。那末，他死在什么地方呢？他是死了呢，还是活着呢？

故事写到这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读者，一定要问：张渭良的下落，究竟如何呢？张渭良的情形是这样的：自从他受伤以后，因为伤是在腿上，一步路也不能走，他是把两手撑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回走。

当他受伤的那天夜间，他爬到附近的树丛里，自己包扎了伤部，不久他就昏过去了。第二天早上，炮声把他震醒。他睁开了

眼。阳光照在他的身上，鸟从头上飞过。野花开在身旁。小草上滚着露珠。他又饥又渴，这时吸了几口露珠，又拔了一根草，放在嘴里嚼着。接着，他移到树荫下，又把军装检查了一遍。把信件撕碎。把日记本打开来看了几眼，上面有几页日记，他也扯了。日记本的第一页上：是毛主席的像片，他托人从祖国买来的，前几天才贴上去的；现在当他困难中，他看见了毛主席老是对他微笑着，仿佛是和他说了很多的话，在他的心上，立刻涌来很多东西：——勇气、信心、祖国、和平等等。他牢牢地记住这些。把日记本又撕了，静静地睡在树荫下，和野花睡在一起。

他不时地作着梦。梦呵，都是很短的梦，像影片一样在他眼前闪过：——天安门，鸭绿江，平壤，送他上前线的母亲，和他一道到朝鲜的弟弟，以及朝鲜老乡的灾难，等等。赶到天黑，枪声、炮声和寒冷，又把他刺醒了。他借着板门店上空的灯柱，辨别方向，往自己的阵地这边爬行。事实上，白天是不便活动的，也只有到晚上才好活动。张渭良下定决心，决不当俘虏，不到必要时，也决不随便牺牲自己，他决心要回来，回去还要交代任务。就是死吧，死也要死在自己的阵地前面，好在他还有两颗手榴弹，万一碰到敌人，也要和敌人同归于尽。他把两颗手榴弹，挎在脖子上，两只手扶着地面，抬起脚，仰起身，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挪动的时候，身上痛得很，痛的时候，他咬紧牙关，心上在说：这就是考验、考验。一到白天，他拿草和树枝，把自己的身子盖住，躺在地上。他从怀里掏出毛主席的像片，捧在手上看着：毛主席呵，给了他无数的勇敢、信心和力量。他几次的在心上默默地宣了誓！头几夜他还能多爬几步，慢慢地越来越不行。头两夜，每天晚上就是这样爬几十公尺。第三夜，一道铁丝网，拦在他的前面，他把身子探进去，咬着牙，爬了几次，才爬出铁丝网。在铁丝网的旁边，又有一根一根的地雷线，横在他眼前；这时他也来不及多想了，就用牙齿咬断了雷线，从雷群里穿了过来。当他艰

苦地通过雷群时，他起了两个地雷。

第四夜，他爬到小河旁边。小河里的水并不深，河面也不过三四尺宽，这儿是水大了就是河，水小了就是沟。平时一步就能迈过河沟，现在对他来说，是千难万难。这一天晚上，天上有月亮，在月光下，他看见了水，又欢喜它，又厌恶它。他先喝了一口水，然后再想如何过河的办法。后来，他下定决心找几根木棒和小树枝，来搭一座小桥。他一共用了三个晚上，才把这座小桥搭成了。他从桥上过了河。脸上露出了笑容。心上也快乐起来。他呵，他就是这样，饥饿、死亡、寒冷、枪声、炮声、雷群，作了许多斗争，他就是这样，过了很多难关。他呵，他为了一种崇高的理想，他要活着。现在，他不是为了自己才要活着，如果是为了自己，他宁肯死。现在，他更加痛恨战争，他要活着回来，好和敌人狠狠地算一下帐！

张渭良——这位阿历克赛、密里席叶夫式的英雄，过了小河，又爬了一两个晚上，他知道，他距离自己的阵地，越来越近了，不过是一二百公尺的距离。可是，虽说这么近，他一下也走不到。再说，人也饿得不行了。草根、露珠究竟不是饭。当他到了阵地的前面，他就倒下来了。有时昏过去，有时醒过来；有时躺下，有时拚命挣扎着坐起身来，拿一块白手巾，向阵地上来回摇几下。第十天的中午，营教导员在前沿阵地上，正在视察地形，探望消息，偶然看见山下面有一个人，有时躺下，有时坐起身来，手上举着一块白手巾，面向我方挥动，像一面小旗子似的，被春风吹着。他把手上的望远镜递给指导员，高兴地叫着说：

“张渭良还活着！”

指导员顺着山梁向前看去，他也高兴地叫起来了：

“是他，是张渭良！不错，他是穿的旧棉衣。”

营教导员决定，天一黑再派人去接张渭良，这一天下午，担架准备停当，熬好大米稀饭。在这半天的时间内，营教导员和大

家，又高兴，又着急，看见自己的战友在刀尖上过着，还不能马上去援救他，如果在这半天之内发生问题，如何是好？

到了晚上，排长和卫生员按照教导员指定的地方，去迎接战友。可是到了那里，还是不见有人。他们就大声叫着：

“张渭良，张渭良。”

这么叫了好几声以后，好像听见有人在答应，声音是哑的，这就是张渭良。张渭良满身、满手都是血，嘴唇上的胡髭，又黑又硬。他躺在一个小山坎里。他们继续叫着，张渭良又回答了：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张渭良回来以后，头一句话就问：

“我的枪带回来了吧？”

他的枪挂在坑道洞口的墙壁上。班长把他的枪交给他。张渭良回来的消息，传到战士中间，大家都说，他是胜利了！他和那个哭泣的敌人是：两种思想，两种行动，两种结果，两种前途。我们的战士热烈地庆贺他！他有一个亲弟弟，和他在一个连队，也来看他，兄弟两个人互相约定，都要为祖国立功，为和平事业立功！

我要写的故事，写到这里为止。亲爱的朋友和读者们，这一篇故事中的故事，是有许多说法的；各种说法，虽然在枝节上有些不同，但它的梗概是完全一致的。据我所知，张渭良同志还活着，而且参加了志愿军某部的功臣大会。这一个故事，它可以告诉我们：目前世界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法，应该怎么想法。事实的本身，就是一种显著的对照，同在一个地方，英雄和敌人，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同呵！朋友们，读者们，让我们感谢英雄们，感谢和平战士们，他们给人类创造了多么美丽的故事。让我们把这样的故事，写成诗篇，编成歌剧，传到千百万人民当中去，和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去！

九、冷枪手之歌

在板门店的西边，距板门店几里地的一个地方，有两座山，一在北，一在南。有名的砂川河，这一条河，就流在两座山的中间。

砂川河的南岸上，志愿军的一个射击小组驻守在这里，并且常打胜仗。这里只有几个冷枪手，有一个电话员和一架电话机。这里可以说是河边阵地。它离我们的山头，是两千公尺，它离敌人的山头，是几百公尺。这就是说，它离敌人近，离我们的主阵地远，按照我们的想象说，这里是不大好坚持的，可是英雄的事实，往往胜过人们的想象。事实是，他们在这里，在这条小河岸上，已经坚守了四十多天。

电话员同志，日日夜夜坐在洞里。白天的时候，他坐在洞口，手上拿着一本书在看。他看的这本书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我曾经见到过三位战士，他们都是河边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叫：甘子曹、刘文龙和陈有定。他们对我说，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决不撤退。现在，在河岸上，志愿军的歌声、荣誉，伴着河水，向很远的地方流去，流向祖国，流到毛主席的身边。有一位冷枪手，站在炸弹坑里，他抬起头来轻轻唱道：

——昨天的前沿，

今天已成后方。

又有一位冷枪手，伏在树旁，他接下去唱道：

——今天的后方，

已是铁壁铜墙！

左边又唱道：

——志愿军的战士，

坚守在河岸上。

右边又答道：

——我们枪声一响，

敌人别想逃亡！

朋友们，爱好和平的朋友们，你们会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故事吗？有这样的奇迹吗，有这样的英雄吗？我想，你们一定会相信。

现在，这一条砂川河，河里流的不是水，河里流的是鲜血，流的是弹片，流的是火焰。当我住在板门店附近，我看见敌人的炮弹，每隔几分钟，就要爆炸一次，或者是爆炸在德武山上，或者是爆炸在砂川河边。

德武山这是板门店的一扇右门。山上有几户人家和一座庙宇，庙宇早已被炸毁，仅留下碎瓦一堆。六七月间，朝鲜的麦子早已熟了，早就该割了，稻子也要种了，这正是播种的季节。然而，就在这个季节，美李匪帮打的炮弹，一次比一次打的多，他们对着田地的播种人投弹、射击、屠杀。他们白天作梦，梦想夺取德武山，进攻板门店，进攻开城。

但是，看吧，我们的勇士提出，寸土必争，保卫板门店，保卫开城。看吧，强盗们不仅上不了德武山，它的脚步也跨不过砂川河，跨不过这一条河岸。

一天黄昏，我们的电话员，正坐在洞口看书；敌人的电话员，乔装老百姓，悄悄从南山上走下来，到河边来检查电线，他们朝河这边，远远地扔出一颗手榴弹，地洞外面冒起一股浓烟。接着又扔第二颗。第二颗手榴弹还没有爆炸，我们的电话员，顺手把它抓起来，在乌黑的浓烟中，立起身来，对准敌人扔过去，打死一个敌人，另一个敌人慌忙逃走。在这以后，我们的电话员，再也没有见什么动静。他向团部摇电话。团长这时正坐在办公室里，桌上点起一支洋蜡烛，摆着日记本，正要记日记；他拿起耳机，一边听，一边问：

"打死一个敌人？——很好！"

电话员听到团长的称赞，又说明一句：

“这是敌人来送死的。”

团长大声地笑着说：

“敌人自己来送死的？——也好，我们也很欢迎。”

电话员问团长，说：

“昨天晚上关的两个俘虏，一男一女，送到团部去，团长收到没有？”

这几天，前面阵地上不断地送俘虏来，团长为了慎重起见，把桌上的蜡烛移得靠近一些，并且查了一查这两天的日记。脸对着烛光，愉快地笑着说：

“还没有收到。收到了，我会给你们开收条的。你们放心。这两个俘虏，也许还在营部。”

团长回答了这句话，又继续问：

“还有什么消息？”

电话员同志，停了一停，眼里含着泪花，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擦了擦眼里快要流下的泪珠，说：

“又有一位割麦的老乡，被炮弹打死了。死的是阿爸吉。这是上午打死的。下午阿妈妮来了，把尸首背回去，我们一个战士，帮助她，送她回去的。”

这时，团部的外面，不时听到炮弹的爆炸声。敌人打来的炮弹，似乎就落在团部的门口。团长仍然安静地拿着耳机，他要班长接电话。不久，班长刘文龙进到洞里，向团长汇报：在这四十天以内，冷枪手一共打死打伤敌人七十八个。团长问刘文龙：

“你打死几个？”

刘文龙想了一想，回答说：

“我打死敌人八个，打伤敌人两个。”

团长又问：

“用了几发子弹？”

刘文龙又回答说：

“三十发子弹。”

团长似乎还不很满意。在他看，我们的射击组，要做到一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他觉得现在用的子弹，还有点浪费。团长对刘文龙说明，祖国的子弹很可贵，不能浪费，敌人在山上，就用冷枪打，敌人下山来，就要捉活的。要多捉活的。团长说：

“你们也要给我捉活的来，我要看活的！”

刘文龙很有信心地说：

“要捉活的，也没有问题。”

在放下耳机以前，团长最后的一句话是，今天晚上，他要到前边去看他们。班长走出洞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他在的这个地方，这儿是一个大的炸弹坑，有一间屋那么大。弹坑里有几个冷枪手，枪架在坑边，眼睛望着南山上，正在那儿瞄准。这时敌人的阵地上，也正有这么一个家伙，靠在壕沟边，看样子是换哨的，他一手拿着口琴，一手拉着一个女的。有一位冷枪手对班长说：

“班长，看我也来练习一下，打个活人靶！”

刘文龙刚下到弹坑里，把枪也架到缺口上，说：“我来打一个给你们看看。”

别的冷枪手也争着要打。班长把三发子弹放在一个广东战士的手上，说：

“我给你三发子弹，三发子弹打一个敌人，今天还可以用三发，明天就要用两发，后天就要用一发了。看我们能不能及格？这好比是考试。”

那广东战士接下班长给他的三发子弹，脸上微微一笑：

“用不着这么多。最多两发，一发也差不多了。”

果然，一声枪响，一发子弹，就把对面山上那个敌人打倒了。不久，又有几个家伙，来抬尸首；广东战士又在瞄准时，班长的枪已经响了。几个来抬尸首的敌人，又倒下一个。这天晚上，团长来到河边，正如他前次来的时候一样，他的肩上背着一枝枪。团

长走在前面，通讯员走在后面。通讯员带着慰劳品。当他们两个人走到哨兵的身边，哨兵向团长敬了礼。团长表示，没有带来什么好礼物，只送来几条烟和几壶热水。哨兵喝着团长送来的水，团长给他们赶着蚊子。河岸上的蚊子真多呵，一抓一大把。

这儿是前沿的前沿，这儿是神圣的阵地，战士所处的环境，比在坑道里还要艰苦些，也正因为这样，坚守在这儿的战士，更加光荣。这儿的勇士，像旗帜一样，插在河岸上，飘扬永远飘扬！

十、看呵，板门店！

我现在所记录的，这是一位朝鲜老人的故事。这一位朝鲜老人，名叫李相淳。

按年纪说，他今年五十岁，如果按他的精神看，可以说他今年是二十五岁。

板门店解放以前，他当过三十五年的雇工。过去没有地，也没有个家。他结婚很晚，到了晚年，才有两个孩子，孩子都很小。这一位老人，正如他的民族，正如松岳山，遭受过多少灾难，经历过多少艰辛，身上的血痕累累，但是他也正如松岳山似的，虽然山上打过无数的枪弹，至今仍然英勇不屈，仍然屹立于大地之上。李相淳同志，现在精神勃勃，眼里都滚着火焰，思想上很年青，如盛夏的树木，枝叶非常繁茂。李相淳同志常说：

——假如我还年青，

我要站在前线！

李相淳同志也常说：

——我虽说五十岁，

要守着板门店！

一天傍晚，指导员和我，我们去访问他。这时李相淳同志手上拉着一头牛，正站在他门前的山岗上。这时，板门店附近，炮

声在轰鸣着。在炮声轰鸣中，他站在山岗上，指着板门店，指着那座帐篷，对我们说：

“看呵，板门店！板门店在我身边。板门店，像共和国的一道大门。这一条山，像是他的一只手臂，这一只手臂，它把我抱着；板门店活着，我才能活。我住在这里，我怎么能让敌人进门，他们要进门，我就要和他们拚命！”

确实不错。他不是带枪的人，可是他也是一个哨兵，他日日夜夜，守望着板门店。

他住的房子，是一间独立屋。是在我们的警戒线上。房子的四周围，没有邻居。如果说还有一个邻居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他的门前，就是一架小山，山和门，相隔只有两三尺远，这一架小山，好像替他看着门。

这一架小山，也确实如老李所说，它在板门店的一侧，很像是板门店的一只手臂，向着这老人伸过来。小山上有一个哨篷，这是志愿军的哨篷，离他门前，不到一丈远，他坐在家里，就可以和志愿军说话。这一家人，常常送水给志愿军，送水到哨篷里去。

李相淳同志和志愿军，互相照应，他给志愿军、给板门店担任警戒，志愿军也给他看着家。有这么一件事：一天清早，老大娘到小溪边去打水。当她提着水往回走时，她望见山沟的土坑里，露出一撮黑头发，头发恰好伸在外面，盖在土上。老大娘心想：这难道是个鬼？不是鬼，没有鬼。他们捉过好几个特务，这一定也是个特务。一定不是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不在大路上，而要躲在土坑里。她就赶忙把水提回来，告诉她老汉。李相淳同志稍为思索了一下，出了门，双手举起一块大石头，穿过一块麦地，走到土坑旁边，他愤怒地大叫一声：

“赶快投降，——投降吧！”

接着他又叫着：

“你别动。动一动，我就喊志愿军，满山上都是志愿军！”

那特务伸出脸，爬出来，说“我可不是特务。”

李相淳同志严厉地问他：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特务没有说来处，只说去处：

“我的故乡是平壤，我要回家去。”

李相淳同志在他身上仔细摸了摸，看他带着武器没有？一摸没有。就带着他到屋里来。那家伙还说他是好人，李相淳同志还是狠狠地望着他，说：

“这儿是警戒线。是好人，也跟我到人民委员会去！”

李相淳同志坐在我们身边，铁黑铁黑的脸，微微笑了一下。他很有兴趣的叙述这件事。我们也很称赞。他越受鼓励，脸上越兴奋。刚才他说的是捉特务。下面他又和我们说，他也救过志愿军。

这是1951年的事：又有一天，四个敌人追着志愿军的一个侦察员打枪，志愿军跑过来要水喝。李相淳同志听见枪声，赶忙把他藏在草堆里。敌人追过来问他，说看见志愿军没有？李相淳同志回答敌人，说没有看见。这时，他有一个小舅子，正在山坡上站着，敌人又去问他，说看见志愿军没有？他也照样回答敌人，说没有看见。敌人就把他的小舅子抓走了。时间已经过了半年，被抓走的人，至今还没有消息。

这一位朝鲜老人身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不来一一记它。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为了复仇，为了争取和平，山上的石头，也可以变成武器，手不拿枪的人，也可以为保卫和平而战！在我们的警戒线上，人民即是战士！这些故事还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民是最懂得爱和恨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李相淳同志，过去当过三十五年的雇工，过去啥也没有。不用说，人类的幸福，他没有得到一分，就是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得不留一分。他九岁时，死了父亲，十岁时死了母亲。他现在住的这间独立屋，这是看坟的屋子，是人

民委员会让他来住，他修理了一下，住进来了。1950年8月30日，人民军第一次打到板门店这一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给他分配水田二千七百坪，旱地七百坪。并且给他发了土地证。他把这张土地证，从一个小布包里取出来给我们看，上面写着：第一一五八九号。当人民军从这一带撤走时，有的人把土地证扯了，他没有扯，他说这是共和国的土地证，我为什么扯掉它、永远留着它！

就在那一阵子，他带着土地证，他报名要求参加三八线的游击队，游击队觉得他年纪大一些，他没能够参加。他自己没有能参加游击队，常常动员别人去。美李匪帮知道了，逮捕了他，把他抓去关了两天，用大木棒狠狠地打他，他们一面打，一面审问：

“你为什么要宣传参加游击队？”

李相淳同志当时回答：

“共和国的命令，我为什么不服从！”

敌人放他走的时候，李相淳同志愤恨地反问过他们：

“你们为啥要打我？种地的人一天到晚劳动，劳动有什么罪过？”

李相淳同志说，过去的痛苦，一下说不完。我想也是这样。现在是不同啦。共和国给了他的生活，叫他当主人，劳动党给了他的生命，也给了他的青春，李相淳这个名字虽然没有变，但是换了一个命运。1952年五一节，在开城的纪念会上，他登上主席台。他以一个模范劳动者的资格，向全世界上的人提出号召：——我们要争取和平，要保卫和平！

现在，李相淳同志已经有了土地、自由、青春和做人的权利。现在，他更有资格要求和平。和平这也是一种权利，谁要来剥夺这种权利，就是强盗，就是犯法；被害者死在地下，也愤恨它，也要复仇。前几天，李相淳同志的大哥，一家人被炮弹打死了，人死了只剩下一头牛。老李愤恨地埋葬了死者，把牛牵回来拴在牛

棚里。他知道和平的可贵，但是他决不坐待和平，他也并不害怕炮弹。他预言美国的炮弹，响不了几天。他差不多每天要到砂河边去，在炮火中插下稻秧。人们在要求和平，不是因为害怕炮弹，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一天晚上，当我们向他告别，快要走的时候，他说，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讲过中国是大哥哥。大哥哥帮助我们，怎么说都可以，我们和美国鬼子有什么关系，他有什么理由不滚出朝鲜去？老李称呼我是他的弟弟，说这是一家人，不要分你我，要常到他家里来。后来，一天早上，指导员和我，站在警戒线上，离老李住的地方，离他的独立屋，要几丈远。他在屋里听见山上有人声，走出门来。这时太阳正照在他的草舍上，照在他的门旁，也照在老李的身上，老李像个孩子一样，一脸欢笑。这一位可爱的劳动者，板门店身边的和平战士，一位新入党的劳动党员，对我们远远招着手，走到我们身边，又和我们握了一次手。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还认得你！"我回答说："我也永远忘不了你！"

十一、和平战士颂

7月6日傍晚，我坐着吉普车，要到大德山去。这一辆吉普车，在曲折的山道上，向前沿阵地奔驰。车子越往前开，炮声越来越近。偶尔也有一两颗炮弹，落在车子后面。据我们指挥员的估计，今天晚上会有一场战斗。今天晚上，敌人又要进攻——大德山。

我曾经提到过大德山这个名字。现在我要重复一句，大德山是在板门店的东侧，和板门店相隔不过几里地，这是板门店的一扇门。我们站在大德山上，不仅可以看到板门店的帐篷，而且也可以看到临津江。临津江碧蓝的水，似乎就流在大德山的脚下。大德山山势很高，山路也很陡，我们上山时，手要攀着荆棘。我第一次用手攀着荆棘时，手上的鲜血，随着荆棘流下来。当我爬到

山上，我才完全明白，荆棘上的刺，已经少得多了，不知有多少战士，流下多少鲜血，把刺拔掉，从荆棘丛中登到山上。

大德山上，山顶上的青草和小树，早已被炮弹削平，变成一片白土。山上和山下，山前和山后，弹坑密如蜂窝。有的弹坑，已经成了水池。虽然如此，在高高的山顶上，我们的志愿军英雄们，仍然站在山上，枪尖笔直地和天空连成一片。

就在这个高山下面，有一位阿妈妮，一天下午，她站在弹坑附近，安详地播种。美国强盗的炮弹，打在她的身边，她的一个孩子，被炮弹打死了，骨肉被打得飞散，尸骨都找不全。阿妈妮也没有哭。她默默地拾起孩子的两条腿，把自己的围裙解下，裹住它，放在地边，接着又种她的地。这时有一位志愿军的战士，从她身旁路过，看见她的身上有血印，地下也有血印。他正要问阿妈妮？阿妈妮迎上来，把围裙打开，请志愿军同志看。阿妈妮还是没有哭，这一位战士忍不住哭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这位战士的名字叫叶茂华。

阿妈妮给叶茂华揩干眼泪，愤恨地说道：

"同志，你用不着哭呵！"

叶茂华自己也擦擦眼睛，说道：

"我没有哭。我这不是哭！"

叶茂华把枪一挥，恨不得立刻就要去和敌人算算这笔血帐，他立刻奔到山上，找到排长。对排长李满说：

"我们快去，给他好好埋一埋。你看炮又打在那里？——哈，如果打死我，你背我；如果打死你，我背你！"

叶茂华一边往山下走，一边指着山下，指着阿妈妮播种的地方说：

"是一颗炮弹，打在阿妈妮的身边。"

副排长李满和叶茂华，奔下山来，把尸首埋了，把地也种了，并且在一座新的坟前宣了誓。他们宣誓：我们不在这个山上为朝

鲜人民复仇，哪怕就是死，也不下这个山！

李满带着一个班，守着一座小山。这座小山和大德山紧紧相连，它在大德山和板门店之间。因为这座山上，有一个铁架子，有的人就叫铁架子山。它和敌人的阵地，隔着一道山沟。敌人的阵地上，住的是美国陆军第一师，号称王牌军队；他们把篷帐设在流水沟里，篷帐面前架着铁丝网，埋着地雷，树上也挂着地雷。李满和他的战士，时常把敌人的地雷搬过来，按在自己阵地的前沿。

我到大德山的这天晚上，副排长李满坐在洞里，给他的战士讲英雄故事。战士们抱着枪，坐在草铺上，听副排长讲故事。一盏油灯，挂在坑道的墙壁上，风从洞口吹进来，灯光一晃一晃，离坑道不远的地方，炮弹一声接一声地爆炸着，山谷里一片火光。副排长李满讲完一个故事，他猛然地把手一挥，问同志们，还记得不记得自己的誓言？在场的同志，都回答说记得。

叶茂华补充一句说：

“我不在这山上为朝鲜人民报仇，我死也不下这个山！”

副排长李满问叶茂华说：

“你记得我们的战斗方案吗？”

叶茂华笑着回答：

“记得，我和王少青、左世才在一组，守在右边。”

这时阵地的两侧、背后、落满了炮弹。这天晚上敌人的四个炮群，外加坦克炮，一齐响了，在几个钟头之内，倾泻了炮弹四万多发。惟独这个阵地上，炮弹落得很少。李满心里明白，敌人的企图，是要切断他们的后援，今天晚上，估计一定要打响。他把手一挥，要大家立即做准备，要打好仗，见毛主席去。

也就在这时间内，枪声响了。枪声从哨位上传来。这是晚上10时20分，美国陆军第一师，以一个营的兵力，开始向李满的阵地上进攻。敌人一群黑影，爬到阵地前面。哨兵左世才，对着黑影，一梭冲锋枪扫过去，两个敌人倒下来。左世才按照副排长事

前的吩咐，开了枪以后，马上从哨位上撤到单人掩体。

敌人跟着涌上来。副排长李满他们听见枪声一响，立即把灯吹熄，冲出洞口，三个战斗小组，一齐跳进工事，迎接战斗。敌人两次冲锋，都被打垮了。枪火也稀了一些。可是不久，枪火又密了，敌人想从侧面往上冲。这时，李满和班长正在中间一组担任指挥，和左右两组联系。李满的头部和脸上已经被子弹擦破，手也被喷火器烧伤了，他自己还不觉得；班长从洞里取子弹回来，在火光中，看见副排长头上有血。班长说他已经挂了花，劝他下去，他说自己并没有挂花。坚决不肯下去。

从侧面迂回的敌人，快要接近洞口了，企图爆破洞口。战斗组长张国，迅速投出手榴弹。他又掉回脸来一看，还有四个敌人，已经上了洞顶。张国这时，手榴弹打光了。他抄起冲锋枪一打，子弹卡住了。他想上去活捉敌人，又觉得敌人太多。忽然他像箭一样的跳进洞里，搬出一箱手榴弹和一个飞雷，又迅速跳到掩体里，敌人离他只有几步远了，正要动手爆破洞口。

他拿起枪来，打了三枪。打了三枪，枪又卡住了，他心上想：洞如果被炸毁，那是不行的，我是共产党员，这是考验我的时候，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决心一下，扔出他的手榴弹，打倒三个，还剩下一个，这一个鬼东西，是敌人的一个排长，还在大喊大叫，意思是要派人来救他。张国又投出一颗手榴弹，这个野兽，也送了命。

副排长李满沿着壕沟，左右两边奔走，来回鼓动战士，鼓动的口号震撼山谷。副排长叫着张国的名字，问：

“有问题吗？有问题吗？”

张国这位战士，少年英俊，精神非常旺盛，一双眼睛正在严密地监视着敌人，他很有把握地回答：

“副排长放心吧，没有问题，有我们在，决不叫敌人上山来。”

副排长李满又向他喊：

“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坚守阵地。”

他虽然十分相信张国，但是，当他看到敌人连续地要往上冲，五挺机枪对着阵地上扫射，他实在不能放心，跑到二组，伏在工事里。他和张国两个人，轮流来打手榴弹。他给张国揭盖子，拉线，张国打。李满一面把手榴弹递给张国，一面教他打，叫他等敌人近了才打。一颗手榴弹，好几斤小米，祖国的财产不能白费。打了一阵，李满要打，张国又给副排长揭盖子、拉线，副排长打。李满一口气投出一百多枚，打了左边打右边，打了右边又打左边，终于打垮敌人的机枪阵地。敌人一群一群地滚下去，死尸一堆一堆，堆在阵地前面。枪声又渐渐稀了。

敌人多次的冲锋，被打垮以后，重新整理了一下队形，改变打法，分成十几路，野兽似的，想四面八方往上冲。这时右翼很紧张。几分钟以前，左世才全身着火，棉衣上火光沸腾；他身上的皮肤，也被火焰烧枯。抽身一撤，撤至洞口，把棉衣脱下。刚脱下棉衣，听见枪声很急，他咬着牙，鼓舞着自己，像飞着似的回到三组。三组的王少青和叶茂华，仍在坚守右翼。

王少青看得很清，这边的敌人，带着四挺机枪，在距阵地五十米的小堡上，要抢着把机枪架起来，准备掩护队伍迂回进攻，想接近阵地背后的坑道。王少青一连投出六十枚手榴弹，将敌人机枪打得一声不响。随后，敌人才以他为目标，向他这里集团冲来。他奋不顾身地站起，一手投出两颗手榴弹，高呼保卫和平、为祖国争光的口号；手榴弹像闪电似的在敌群中爆炸着。敌人又被打下去。可是不到十分钟，又有两班人往上冲。忽然，敌人一枪打在王少青的右眼上。他的右眼因此失明了。肩部也负重伤，一身是血。他还是打。卫生员拖他下去，他说他不能下去，他还有一只眼，还有手，还要完成他的计划。他又把敌人打下去。

不久，被打退的这两个班敌人，又要往上冲。这时王少青的胳膊，已经麻木了，手抬不起来。左世才和叶茂华，靠近他身边，

集中火力，打退了这股敌人。一个钟头以后，王少青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怀里还紧紧抱着冲锋枪。卫生员把他抬进坑道。约摸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他醒过来，一看自己是在洞里，就急得往外爬。副排长李满下了命令，不许他再出去，他才作罢。李满估计战斗一时不得结束，他来到洞口，用报话机和营部取得了联系。他向营部说，不要送人来，要多送手榴弹来，并且请营部通知炮兵和他联系。

李满和营部取得联系以后，就到了三组。三组现在只有左世才和叶茂华两个人了。敌人不断地要往上冲，一个指挥官，抱着卡宾枪，带着炸药，窜上来，还是想夺取洞。叶茂华早就想要捉俘虏，捉到俘虏，请上级批准他加入青年团；现在他一发现这个指挥官，就忍不住立起身来，抱着反坦克枪，拿着手榴弹，冲出工事，跑到工事外面。左世才光顾打，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当李满到了三组，他知道叶茂华人年轻，好冒险，怕他出事，他大声叫着叶茂华的名字，问：

"叶茂华还在吗？"

没有回声。李满有点惊异，又大声叫：

"叶茂华你在哪里？"

叶茂华已经跨出工事，已经站在火光和枪声之中，听见喊声，急忙忙答了一句：

"我在这里——在工事外面。"

接着，他就插到敌人中间去，手榴弹一响，他和那个狡猾的指挥官一同倒在地上。

这一次战斗，上半夜十点钟打响，下半夜两点钟结束。在一个葫芦形的阵地上，在板门店和大德山之间，我们的英雄和敌人，大战了一场。我们是一个班，敌人是一个营。美国王牌军的一个营，在几小时以内，被打得落花流水，被打得这样悲惨！

朋友们，读者们，我仍然要这么说，我是一个见证人。这一

天晚上，我是站在大德山上的。我听见枪声是怎样响的，我看见战火是怎样被扑灭的。现在，请让我说一说，在这次战斗中，美国强盗们悲惨的结局吧：

当叶茂华这位和平战士抛出他最后一颗手榴弹的时候，我们的大炮，开始发言了。它如巨雷一般，横空而过，愤怒的火光，劈到敌人头上。我们的战士在阵地上，只见火光爆炸，和残敌的叫喊。残敌的前面是死路，后面也是死路。十五分钟以后，副排长李满在阵地上宣布：这一次战斗，已经胜利结束！

大德山上，天也渐渐亮了。黎明的时候，李满和他的战士走下山来，打扫战场。看吧，在我们阵地的前面，将近三百多名的敌人，横七竖八倒在那里，有的是四肢裂开的，有的是头颅打烂的，有的是胡子烧焦的。一大堆死尸中间，露出手表和还没有打完的子弹。一大堆死尸中间，露出一件世界上最奇怪的东西："盔甲""盔甲"，哈哈，这倒是一个新的发现。于是有人说，要把它送到板门店去，也有人说要把它送到国际展览会去。

十二、给祖国的信

当我离开板门店的前夕，我和一位师长，到了礼成江前线。礼成江在板门店以西，距板门店有几十里地。

1951年11月，在板门店的帐篷里，我方代表说过，我们不但控制了砂川河、礼成江，而且一直控制到海岸，美方代表一听这话，故作惊讶：

——是你们控制的吗？

我方代表回答：

——并没有错。

美方代表装聋装哑地说：

——问题在于要有材料。

我方代表肯定地说：

我们有材料，材料都正确。

对方表示，请我方再查一下。可是，在另一个会上，他们居然厚着脸皮说，江河都是他们控制的，因为他们有船在江里。我方驳斥对方说，我们是有大炮的，我们的炮在控制着它。对方仍然说，江河上的船才能控制江河。我方坚持说，船已经被炮打坏了，应该知道：炮是可以打船的。

当时在这一场争执之中，我们的敌人，简直是闭着眼睛说话。他们老是诡辩。上一句话说："你打不着"，下一句话又不得不说："只是一两月前，你们打中了一只船。"当我方代表拿出更多的证据，我们的敌人，还想一口否认，认为这是过去的事：

——你们还在讲古代历史。

我方代表说：

——我们是在讲现代史！

我们的敌人说：

——我们昨天有一个记者从前方回来，能否把他叫来问一问。

我们的正义的代表回答得很好：

——他不见得是最好的见证人！

我们的敌人，叹了一口气，说这比写历史还要难，历史过去了，人睡在地下，历史还没有写成。这是敌人的看法和想法。事实上是，历史已经一页一页地在写着，在这个时代，历史的执笔人，不是海盗，不是侵略者，而是人民，是和平战士。

我们可以说，时间和历史好像是一只船，它载着和平战士，走向胜利的彼岸。时间和历史，好像是一只船，在这只船上，和平战士驾驶着它，冲过狂风暴雨，走向胜利的彼岸。我们向前迈进一步，人类的历史就写成了一页。

在礼成江的江边，我们不仅控制了江岸，也控制了江水。我们的敌人，如果想要在礼成江里安安静静地装一船水，也是不行

的。在这个江岸上，我们有一个阵地，这是一座很小的小山，说得更恰当些，这是一个丘陵，它紧靠着江岸，江岸说是它的山脚。就在这个阵地前面，敌人的木船，被我们炮弹打毁的，何止一只呢？被打毁的木船，飘到江岸旁边，那腐朽了的船板，和破碎的木片，也早已被浪花冲到岸上，成了遗迹。这些遗迹，它可以让考古家慢慢地来研究，我们的考古家，他会理解许多问题。

他会理解，美国侵略者的谎话，已经破产。他会理解，美国侵略者的劫夺计划，在这两年之中，已经被打碎了，如同被打毁的木船一样，飘浮在汹涌的浪花上。他还会理解，我们的指战员，一旦掌握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一个班可以歼灭一个营的敌人，一座很小的山，可以成为坚强的堡垒。这些并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我们来到礼成江这一天下午，师长和我，我们到阵地上了望很久。在这个江岸上，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坚守了一年多，英雄的身影，不仅映在山上，也映在江水之上。

这一位师长，是红军战士出身，抗日战争中，他担任过营长，我们在一个前线上待过。师长和我，可以说是老战友了。在指挥部里，我读过他出国作战的日记，在他的全部日记上，写得最多的话是："学习毛主席，就能歼灭敌人。"现在，在这个阵地前面，我看到，我们的敌人，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歼灭；他的说客，虽然还有时间在谈判桌上耍赖，以便拖延时间，以便破坏停战谈判，部署新的阴谋，再来大打一下；但是，侵略者的命运，已经注定要最后失败。

我到礼成江来的意思，是想看看敌人的木船。师长和他的战士，都对我说，现在很不容易看到。去年我在朝鲜的时候，那时候如果能到这里看一看的话，敌人的木船，差不多是天天在江面上来往；现在呢，请它出来，它也不敢出来。如果我一定要看的话，就要在这里长期住下，也许什么时候，敌人还想从江上偷渡一下，它要偷渡的话，不难看到它；或者不住下，只是看看，那

就当一个考古家，看看遗迹吧。师长知道这对我都不合适。我们的老战友知道我是一个好写诗的人，他很想给敌人下一个通知，请他放出几只船来，我们和它打一打，让我写一首诗，带回祖国。我们站在阵地上，师长一边和我笑着说，一边把望远镜交给我，指点我：

——江那边有敌人的壕沟，你看一看壕沟里的敌人吧。

这时，我按照师长的话，拿起望远镜，望来望去。敌人的壕沟，我看得很清楚，可是看不见一个人影，那儿似乎并没有人。师长又对我说：

——壕沟里是有敌人的。不过他很怕叫你看见了！现在，情况变得多了。要是过去，敌人连壕沟也不挖的，他们常常在山头上喝酒，打扑克。现在他挖了壕沟还不敢在壕沟里待。

我们的老战友，把我引到这里，他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心上有点遗憾似的。在我看来，我在这里看到一种真理：最后的失败，在等待着敌人，更大的失败，在等待着敌人，和这相反，更大的胜利，在等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等着朝鲜人民军，在等着我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于是我向师长要求：下一次我再来的时候，我要看俘虏，我要看我们的木船开到礼成江上。

我相信，下一次我再来的时候，我可以住在江边，住在新房子里。现在，在这个阵地的附近，在山下，志愿军的战士，正在给朝鲜人盖新房子。他们有一个计划，将来在胜利归国以前，一定要把废墟建设起来。现在，在山崖上，傍着一个小的树林，已经有几间新的房子。就是他们盖的。我替战士们夸耀：

——这几间房子盖的很漂亮！

战士们回答说：

——盖的好一些，为的我们要在朝鲜留个纪念！

有的战士说：

——要是我们的谈判代表愿意到这里来开会，也可以，这几

间房子和板门店的帐篷也差不多哩！

在这几间房子的旁边，种着菜园，园里瓜果都结得很好，这儿是战士之家。敌人的木船，我们可以打毁它，这个战士之家，敌人是打不毁的。我们的战士，我们的英雄，听说我是从祖国来的人，他们要我告诉祖国，他们是胜利而来，也要胜利而归。如果祖国没有命令叫他们回去，他们在这里再住上几年也乐意。我想，这是英雄们的伟大的志愿，让我把这个志愿，写给祖国吧！

（选自 1952 年 7 月 8 日—23 日《人民日报》）

唐文权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这场运动以文教界为重点，波及各行各业，狠揭猛批，上纲上线，开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之先河。而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即在事过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够得上等级，有资格谥之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的。

然而，对于当年运动的绝大多数经历者来说，无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也不管是作为“动力”或“对象”的，他们在批判武训和当代新武训陶行知，以期努力肃清自身或他人头脑中的《武训传》流毒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是非非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陶行知是《武训传》这部电影最直接有力的催生者。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自励励人，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其中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

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四海惊悼，成为国人共仰的民主先驱。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的材料，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据此，陶行知实为《武训传》问世的原动力。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初映即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映完后，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1951年春节后在各大城市公开放映，京、津、沪等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几乎作了一致肯定的评价。《大众电影》杂志特为组织专辑，并把它列为观众喜爱的十大影片之一。

但很快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意见，顿使情况骤变。五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陶行知身上。六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径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论还一一罗列了发表在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四十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三本颂扬武训的新书。这一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胡乔木1985年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场被

“过分夸大”至于“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程度”的运动，不但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和“非常粗暴”的，而且批判方法“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为这一批判运动推波助澜的江青，这时在文化部文艺处挂名任职。批判运动开始后，她终于走到前台，投入讨伐。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十二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作为结果，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 7 月 23 日到 28 日，分六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文章之长，连载之久，在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都是罕见的。由此，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运动添加了不可多得的发旺的燃料。

在运动中，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公开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劫难逃，尤以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与江青有过恩怨关系的赵丹等人首当其冲。《人民日报》特为主演武训的赵丹发表专文《赵丹与武训》，足见一斑。在教育界，运动的声势更是凌厉异常。文件三令五申，号召斗争，肃清流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教师暑期集中学习，开展人人过关的面上运动。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带头引路，在一年多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文章。

这样，在建国不久的政治舞台上峥嵘初露小试锋芒的江青，便一石二鸟，分别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击中目标，踩着已经死去的武训和陶行知，踩着在世的陶行知弟子及其“武训精神”的信从者，悄悄地以文化教育为阶梯，向权力中心爬去。

对于陶行知来说，批判《武训传》和武训精神使他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他的身后荣名从四海仰慕的辉煌顶峰被推落到少人问津的晦暗幽谷。从此，陶行知成为一名“可议人物”，其人其事连同其教育思想，被一并划入禁区。虽有少数几位风骨铮铮的朋友冲破禁戒线，喊出了诸如“陶行知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

的源泉之一”（陈友松）和“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论”（邓初民）的呼声，但1957年“反右”之风一刮，又把陶行知卷到乌有子虚之乡。此后，除别人笔下偶一涉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记忆中，大教育家陶行知这个曾经大红大紫的名字被逐渐淡忘了。直到1981年，以纪念陶行知诞生90周年为契机，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并重新审察当年批判《武训传》一事。这样，人们在欣喜地拂去当年泼在陶行知身上的污水，重新摩挲这颗尘封一世（30年）依然光彩照人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明珠时，理当对那场使陶行知及其学生含垢蒙辱的文化罪案加以冷静的反省。于是，我们发现江青的插手介入，与其三十年代以来同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恩恩怨怨不无关系。

三十年代援助江青之恩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

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以创办晓庄学校而风靡海内外的陶行知，因为不满南京政府所为，支持进步青年学生，其学校于1930年春被封，身遭通缉。在经历了流亡生活和“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洗礼之后，思想更趋进步。1932年秋，他为了探索中国教育革命的新路，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主张，倡导将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求中华民族的新生。他先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年冬天，又派晓庄学生徐明清和王洞若在上海北新泾镇陈再村创办了晨更工学团。陶行知放手将晨更交给中共党员徐明清负责，使晨更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在“文总”领导下的“教联”、“左联”、

“剧联”和“社联”等组织均积极在此开展活动。正是在上述特定背景下，江青因“剧联”的关系被介绍到晨更，受到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庇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领受革命集体生活的教育。在晨更，十几名成员过着一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生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陶行知在晓庄倡导的有关做法。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日常生活安排也很有规律。早起有晨会，上午分头工作，下午在自置的菜田里劳动，晚上轮流进行内容丰富的集体学习活动，其中有学习马列理论著作的读书班，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外语学习班等等。他们做饭烧菜轮流值班，吃的是大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没有一分工资，生活相当清苦，但大家工作情绪十分高昂。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这个特殊的革命集体之中。对外，她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对内，她教大家唱歌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与田原共同负责主持时事讨论会。她还同吴甫生一起跟随田原学习日文，据当事人回忆，她为此还专门添置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语词典。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环境中，初到上海尚无很多社会联系的江青，必然会与陶行知及其学生建立颇为密切的关系。据知情者回忆，江青曾有好几次通过陶行知设在市内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负责人曹建培找陶行知谈事。特别要指出的是，江青同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非同一般。徐是这个小集体的负责人，也是江青在此最重要的同性伙伴。她是浙江临海人，大革命失败后无处容身，慕陶行知开明办学，她投考晓庄。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团书记，1930年初继任党支部工作。晓庄被封后，她辗转

来沪，奉陶行知之命负责晨更，继续坚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苏镇江人，在晓庄时受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影响，但学校被封和同学死难擦亮了他的眼睛，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渐转向。同时，他在个人婚姻生活上的苦闷也因个性活跃的江青到来而有所舒解。江青到晨更后，他们同教小学，接触较多。王洞若的才华无疑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交情，他实在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在陶门弟子中，有关此时的王洞若是江青的追求者一事并非秘密。

平实而论，江青在晨更时期政治上颇有进步。1933 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住居。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 1934 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来，说敌人业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江青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这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 1934 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

但此番来沪情势已有所变化。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引起当局严重注意。徐明清多次受到当局查询，无法容身晨更，经陶行知介绍，转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陈企霞等五人。所以，江青此时来沪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

江青参加了“教联”。当时在“教联”沪西区委中，党团负责人为孙达生，徐负责组织，王负责宣传。据称，江青当时表现不错，组织上准备解决其入党问题，并让她在“教联”沪西区委中担任一定负责工作。

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 年 10 月江青突然被捕，身陷囹圄。有关此事起因，据当事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的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处在敌人跟踪追查之下，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逮捕。江青被捕后，孙达生等曾通过关系到狱中查找，个把月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可惜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在探监和保释过程中，陶行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江青保释后继续得到陶门弟子的帮助。

三十年代开罪江青之怨

江青第三次来到上海已是 1935 年春天。

这一回来沪后，江青主要同“剧联”打交道，据江青后来得志时向美国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经历时所说，是“剧联”写信要她来沪，点名要她主演《娜拉》，但有的人瞧不起她，她发愤钻研剧本，深入角色，终于一举成名。这位飘飘然的“红都女皇”在自夸自赞之时，有意略去了许多基本事实。江青（此时起用“蓝苹”的艺名）此番初演成功实在离不开许多朋友的帮助，她既得益于对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素有心得的章泯的执导，也受教于当时在影剧界颇有名望的赵丹和金山（他们分别出演剧中男主角郝尔曼和格洛克斯齐），更离不开章、赵的共同好友唐纳的关照。唐纳是一位与“剧联”关系甚密的进步文艺工

作者。过去，他在一些文章中被描绘成纨绔公子，恐怕主要是受累于和江青的那一段罗曼史。唐纳多才多艺，既当演员，又任报刊编辑。在银幕上，他以英俊潇洒的小生现身，拿起笔头又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在影剧评论方面某种程度上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同这样一位"影报双栖"的明星人物发展关系，对江青来说，其价值不言而喻。所以，尽管影剧界中追求她的颇有人在，她却唯独留意于唐纳。唐纳一铸丘必特挽弓，立中芳心，马上同居。随后，在唐纳推助之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也担任角色。从此，"蓝苹"的剧照及大大小小的捧场文章频频出现报端刊尾，上海影剧界新添了一名二流明星。

灯火辉煌欢腾活泼的影剧生活，显然有别于昔日默默无闻清苦冷寂的教育事业。风度翩翩气概不凡的艺术家，更不同于手执教鞭粉灰沾身的教书匠。生活环境和工作性质的变化，使江青与"教联"的联系渐少，也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来往渐疏。

1936 年春夏之际，江青和唐纳戏剧性的婚变事件一度成为上海滩上的热门话题，由此引发陶行知的感慨劝导，从而开罪江青，成为一个不可解开的冤结。

1936 年 4 月 26 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话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颇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而据江青自述当初与唐纳虽行婚礼而未立婚书的"理由"，也似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在 1937 年 5 月 31 日出版的《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中，江青以《一封公开信》为题，解释这一"留有余地"的做法："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

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放在心里。”当不耐相思之苦的唐纳追到山东，从江青之姐处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启威那里，愤恨失望之极，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即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幸而及时发现获救，而那封写于6月26日留给“阿苹”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报刊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之唐自杀事件》加以披载，致使海内轰传，脍炙人口。作为变情者一方的熟人和殉情者一方的朋友，陶行知自不能不对此表示关注。当陶行知从报上得知唐纳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出于对年青朋友的关心，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劝勉对方：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苹是蓝苹，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也要问一个分明。
人生为一大事来，
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
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如果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
爱她，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
灵。
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的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
命，
才值得我们去拚命。
若是为意气拚命，
为名利拚命，
为恋爱拚命，
问我们究竟有几条命？

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但将其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劝唐纳不必为之轻生，却绝对是冒犯蓝苹之词。

于是，这首小诗便成为睚眦必报的江青必欲报复消恨的事由。

江青得知怨端前后

然而，这首发表在邹韬奋刚刚创办（1936 年 6 月 7 日）于香港《生活日报》上的小诗，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传，也不曾为江青所寓目。虽然在 7 月 10 日陶行知离港前夕，《送给唐纳先生》一诗连同另外二十余首同期所作诗，已汇编成《行知诗歌集》，由生活书店在当年 11 月出版，但是，剧烈动荡的时局几乎把人们的呼吸目光全部吸引到救亡大业上去了，这一小小的诗集在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反响。

因此，在江青不知陶行知“诋毁”自身的情况下，她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继续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

1936 年 11 月下旬发生的“七君子事件”，把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一起推到了抗议当局消极抗日的政治斗争前列。陶行知因为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担任救国会领袖，与沈等 7 人作“同案犯”被当局通缉，并同被起诉。在持续半年有余的全国抗议浪潮中，终以当局公诉书的提出而达到高潮。1937 年 6 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时收审，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等同受处罚。宋等登高一呼，各界纷纷响应，顿时汇成一个爱国入狱运动。这种义无反顾、视狱如归的精神，确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风格。在此过程中，上海影剧界中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如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等均在具状要求入狱者之列，唐纳和江青也在报端公开亮出同一立场，尽管他们此时已经分离，但无论就国家民族的公谊，还是与沈、陶等的私情，他们的声援都不失为一种见义勇为的豪举。这一行动，与陶门弟子在教育界的声援抗议活动，与陶行知在美国组织推动爱国华侨和美国上层知识界如杜威等的救援活动，完全桴鼓相应，一致敌忾。

“七七事变”之后，在王洞若的帮助下，江青和徐明清一起经西安前往延安。此后，她便以江青的名字行世，开始其生活中全新的一页，成为另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的表演者。待到陶行知再度与她相见，已是1946年春。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已非当年沪上“阿苹”。她趁国共和谈尚在进行，从延安到重庆比较方便，专程前去医治龋齿病。到重庆后，她曾相约唐纳见面，但唐纳出于种种考虑有意回避了。陶行知则与她一度聚首在山城。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仆以创办不久的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名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两路远方来客。一为刚从狱中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一为刚从延安来渝的邓颖超、滕代远和江青等。据当事人忆称，江青是日因到医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来专程到重庆管家巷二十八号陶行知住处相访，并邀请陶行知和王洞若随机同往延安。据此看来，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对他尚无恶感。笔者推测，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线则是《送给唐纳先生》一诗的入目。

陶行知1946年7月猝然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为了纪念他，曾开展过一场颇有声势颇具规模的悼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由大学出版公司印行问世，因陶氏新丧国人痛惜之故，诗集流传颇广，举凡与陶氏有交谊者莫不争相致之。江青极有可能是在这本诗集上得知陶氏把自己称为莺莺燕燕的雅喻，由此怒不可遏。

同时，另一条消息也可能引起江青的极度不快。1946年12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曾引起海内外的注意，追悼会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美国诸著名人士分别讲演逝者一生事迹。讲演之后，由游美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喜爱的四首歌曲。这条消息先后刊载于当年12月30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当入江青之目。王莹其人，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仇。

1936 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一时曾成为上海影剧圈中一桩很有影响的事件。这一争角之败，曾被江青引为终生大辱之一，王莹也从此成为她切齿难忘的仇人。按照江青的人生原则，仇人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陶行知地下有知，恐怕也难以逆料。

人世间恩怨相报和爱恨相替，始终是实际生活和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恩其所恩，怨其所怨，也始终是除超凡人圣者外的肉身凡胎无从超越的一方欲界。为了鉴衡有关恩怨所施是否得宜，人们又铸造了公德和私德这两重社会道德尺度。持此度量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之间的恩怨公案，人们不难判断其德与不德。

（作者附记：陶夫人吴树琴先生和陶门弟子徐明清、方明、吴莆生诸先生曾为本文提供情况，原陶行知研究会刘季平会长的夫人吴瀚先生热情鼓励，尤所感谢。）

（选自《历史谜案揭秘》，南海出版公司 1998 年 3 月版）

戴知贤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始末

1955 年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这是一件历时二十五年的错案。这个错案是怎样酿成的呢？事情要从胡风本人的经历和文艺思想的论争说起。

分歧的开端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省蕲春县人。1922 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 年冬自动退团。1929 年 9 月去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左翼组织活动。1933 年 3 月，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7 月被驱逐回国，到上海，参加“左联”，初任“左联”宣传部长，不久继茅盾担任“左联”常务书记。1934 年秋，“左联”的一位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谷非）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为了在政治上负责，胡风辞去“左联”书记职务，并同“左联”断绝了组织联系，开始了

职业作家的生活①。

在“左联”时期，胡风和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和其他几位“左联”负责人之间有误解和矛盾。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有一段讲到周扬、夏衍等人曾经告诉他，说胡风政治上有问题，提请他注意。鲁迅不信，并为此对周扬等有反感。他认为胡风“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胡风鲠直，容易招怨，是可以接近的”；鲁迅认为胡风的缺点是：“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②；“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③。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问题的论争。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后一个口号由胡风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提了出来。胡风在文章中没有说明这个口号是经过鲁迅同意的，而且只字不提“国防文学”。本来对胡风就有看法的主张“国防文学”的“左联”成员认为胡风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而另提新的口号，分明是蓄意标新立异，就批评胡风提出的口号。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国防文学”意义不明确而且有右的倾向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于是在两三个月之内，围绕“两个口号”的孰是孰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在各自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坚持己见，批评对方。后来因为鲁迅逝世和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第二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新局面的到来，“两个口号”的论争不了了之。但文艺界的宗派成见并没有根本消除。胡风只写了一篇文章就退出了论争，但主张“国防文学”的不少人的指责矛头是对

---

① 参见《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372页；李何林《〈胡风评论集〉简介》，198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②③ 《鲁迅全集》第6卷第535、536页。

着胡风，而不是直接指向鲁迅的。这次论争为中国新文学史埋下了隐患。此后每一次文艺论争甚至政治运动无不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同这次论争相关。

“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抗日战争初期，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他担任文协理事会的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

胡风独立创办《七月》杂志。《七月》从1938年7月至1941年9月，出了三十二期，发表了大量的进步作家，包括延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鼓舞人民抗日，反映抗战的艰难和人民生活的艰苦，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颂扬解放区的新人新事。《七月》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当时国统区的刊物中是少见的，它在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有相当大的影响，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胡风还为《新华日报》主编“文艺周刊”。

胡风和进步的文艺界人士一起共事。但是在文艺观点上，他和大多数人有分歧。例如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关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问题等，观点都不一致。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他说：

>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根据这个指示，1939 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

…………

在这次讨论中，胡风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独当一面的。他不仅是葛一虹、向林冰等人的“论敌”，而且和周扬、郭沫若、艾思奇等文化界著名人物公开对垒。这固然表现了胡风理论上的勇气，但也使他进一步处于“孤军”的境地。他的正确观点没有得到肯定和支持，而他的上述理论上的偏颇之处，被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是对祖国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从而受到长时期的批判。

…………

批评与反批评

1941 年“皖南事变”后，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中共南方局把在重庆、桂林的大批进步文化人（胡风也在内）转移到香港。同年年底，香港沦陷。1942 年 3 月，胡风回到桂林。他在这里组织了南天出版社，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等文艺丛书。1943 年 3 月，胡风回到重庆。这时候，延安整风的精神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胡风读到了包括《讲话》在内的《整风文献》。他受到了鼓舞，同时他对《讲话》中的某些观点显然有他自己的理解。

1945 年，重庆文艺界对当前文艺的主要倾向问题的看法发生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00 页。

分歧。文艺界的某些领导者根据《讲话》精神认为，当前主要应该反对“非政治倾向”，首先要解决文艺是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则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和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出发，认为当前应该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首先要求作家“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的饱满”。

1945 年 1 月，胡风主编出版的《希望》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该文从宇宙本性、人类历史，论证了“主观”的意义和作用。胡风在《编后记》中推崇这篇文章。《希望》第二期，又发表了舒芜的另一篇长篇论文《论中庸》，据胡风在《编后记》中说，本文是作者对《论主观》的补充，其中心论点是个性解放。他说，“真的个性解放，必定是战斗的”，而“真的战斗要求”，又是本能的，即“万千蚩小民”求生存的本能要求。从胡风所写的两篇《编后记》里，人们往往理解为胡风是赞同舒芜的观点的。后来胡风对此作过多次解释，说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①。但他的解释始终没有获得批评者的谅解。

人们把舒芜的文章同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联系了起来。整风主要反对主观主义，《讲话》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生活，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而《希望》却宣传主观精神的重要性，宣扬“个性解放”，这岂不是从思想本源上论证胡风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而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唱反调吗？所以《希望》第一期出版不久，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负责文艺工作的同志召开小型座谈会，批评胡风和《希望》的思想倾向。胡风没有接受批评，而且表示反感。

1945 年 8 月至 1947 年，人们处在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复

---

① 例如胡风在 1950 年 4 月为他的文艺评论集《为了明天》所写的《校后附记》加了一个长注，说明当时发表《论主观》的思想动机和自己在《编后记》中所写的几句话的本意。见《胡风评论集》（下）第 259—262 页。

员”的忙碌和内战爆发的紧张混乱之中，无暇顾及文艺问题的论争。

1948年，一批共产党员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相继发表邵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和《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林默涵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等论文，点名批评胡风。该刊同人认为，当前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主要不是“客观主义”或“主观公式主义”，而是以个人主义的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思想，即“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邵荃麟说，“主观论者”（指胡风）“把生存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这是他们哲学上的“中心错误”，也是他们文艺理论上许多错误的根源。“主观论者”把“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这同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方针是根本对立的。除了批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他们还批评了胡风的两个具体论点：“人民大众身上负有统治阶级加给他们‘精神奴役的创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反动环境下也还有可能用真诚的态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结合，锻炼自己，担负起有某种积极性的工作任务，随着人民斗争的深入推动历史前进。”批判者认为胡风歪曲和丑化劳动人民；过分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而忽视他们的世界观改造。

胡风没有被这些批评所说服，也没有立即反驳。倒是有些在上海、北平、南京、成都等地的文学青年，在半公开的和“非法”的同人小刊物（如支持胡风的《泥土》、《呼吸》、《歌唱》等）发表反驳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掺杂着浅薄的谩骂，甚至用污秽语言进行人身攻击。胡风本人没有参与这种攻击。这种混乱情况，使胡风想到自身的责任问题，他说：“我应该把我对问题的实

质和一些重要争点的看法正面地提出来，供给双方参考。”① 于是便在 1948 年 9 月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小册子，作为对批评者们的总答复。

在这本小册子里，胡风不是抽象地、答辩式地解释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深入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

这次论战的对方是邵荃麟、林默涵、胡绳、乔冠华等同志。胡风说他“在着手之前，颇有踌躇，有过顾虑”。他一再声明，这些同志都是他“所尊敬的友人”，希望这些讨论是“对事不对人”，请予以谅解。②

1950 年前后，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和投身于建国工作，原来的文艺思想论争成为往事，被搁置一边。这时和胡风比较接近的一些同志，分散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地，办刊物，写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如阿垅的文艺论文，鲁藜的诗，路翎的剧本《迎着明天》、《祖国母亲》，胡风也写了歌颂新中国诞生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但是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几乎都遭到了批评。

1952 年，在纪念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时，写过《论主观》的舒芜写了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检讨自己过去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他说：

> 我所以写出《论主观》那样一些谬误的文章，实在是因为，当时好些年来，厌倦了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所要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碰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怎么办

① 《胡风评论集》（下）第 406 页。

② 《写在后面》，《胡风评论集》（下）第 263 页。

呢？找来找去，找到一句“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这一下好了，有“理论根据了”。于是把这个“主观”当作我的“个性解放”的代号，大做其文章……

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文章，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语，肯定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然而胡风没有理会。

这一年，文艺界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但不承认在根本问题上有错误。于是由林默涵和何其芳执笔，分别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发表在1953年《文艺报》第二期和第三期上。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些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这就引出了胡风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

“三十万言意见书”

胡风感觉到了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量，他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说：“在我的理解上，问题带有极严重的性质，处理的态度如果杂有一点急躁的情绪，都会带来危害性的结果。”① 他没有公开反驳。1954年，他借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于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

① 胡风《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前记》。

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同年7月送交中共中央。《报告》约三十万字，通称为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

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中，胡风引出林默涵文章中的三个基本论断和三个批判他的原则性的结论，一一加以辩驳。这三个基本论断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创作方法和世界观不可能分裂而只能是一元的”。

“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怎样的现实主义都是有阶级性的”，胡风“始终离开阶级的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

三个原则性的结论是：

胡风的错误是“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

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

胡风“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

然后胡风又对争论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辩。这几个问题是：一、关于生活或生活实践，二、关于思想改造，三、关于民族形式，四、关于“题材”。

…………

“五把理论刀子”

胡风在《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中提出了论争的“关键在

哪里?”的问题。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几年来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是“更加集中力量运用组织形式”和“作为统治武器的主观主义”没有受到清算。在这里，他提出所谓“五把理论刀子”的问题。这是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也是遭到最严厉批判的论点，所以有必要把《意见书》中的这几段话摘引如下：

>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
>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
> 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
>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
>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底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
>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
>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
>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问题提得十分尖锐，字里行间透露着愤慨。语言难免有些过激，但不带偏见的人们还是可以发现这些意见的现实针对性，和

它背后蕴含的相当成份的真理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囿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成见，这些尖锐意见是无法令人容忍的。“五把理论刀子”本来是文艺理论家和诗人的一种形象化的比喻，被简单化为胡风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五把刀子”。

1954年10月，发生了《红楼梦》研究问题。10月底至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八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负责人，说《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以贵族老爷态度对待“小人物”，压制新生力量。

胡风本来对《文艺报》就很反感，他认为这是批评《文艺报》的好机会。他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垄、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十多个文艺界的负责人。路翎也在会上发了言，认为对他的批评是“宗派和军阀统治”。可是胡风的发言，却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慨，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之机发泄私愤。11月25日，文联作协主席团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就有人在发言中反驳胡风。12月8日，第八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告一段落，转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这次会上，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专门有一节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会后，报纸上一面发表周扬的发言，一面发表胡风的发言。实际上在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在文艺界开始了对胡风的公开批判。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因此，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必须进行彻底批判，肃清他的影响。报告建议公布胡风送交党中央的《意见书》。

1月26日，党中央在中宣部的报告上批示说，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产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大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工作来看待。党中央将胡风的《意见书》交中国作协主席团处理。作协主席团将胡风的《意见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二、三期合刊附发。

各级党委根据中央指示作了批判胡风思想的部署。各地都分别召开作家、文艺工作者、大专学校有关教师的座谈会和讨论会。从1月至4月，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其中最有权威性的是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文章认为胡风在《意见书》中所说的"五把'理论'刀子"，是胡风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

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始末

从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如林默涵说："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何其芳也说："胡风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中，对胡风和"胡风派"作家有批评也有所肯定。他说，我们与胡风先生等在文艺思想上的基本分歧，并不等于否认胡风先生、阿垄

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同时，胡风先生和路翎先生在大会上所发表的意见也有一些是好的，值得重视的。但是，到了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所谓《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于是胡风问题的性质就起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批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三十四封信的内容摘编。舒芜在材料前边，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活动作了这样的结论：

> 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共文艺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他把有关材料分为四类：一、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二、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三、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给信加了注释和说明，指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胡风把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称为“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号召他的集团中的人要“费点力气”把它从根“动摇”；胡风把斗争矛头指向文艺运动的领导，鼓动他的集团成员“与阵地共存亡”；胡风要“以天下为己任”，轻视人民，轻视共产党，妄想以

他个人和他的集团的面貌来改造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舒芜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舒芜的说明，虽然还限制在文艺思想、文艺活动方面，但胡风和他的“宗派集团”的“反共、反革命”的性质已经确定无疑了。

《人民日报》还将胡风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与第一批材料同时发表。《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像舒芜那样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编者按语最后说：“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第二、第三批材料是根据胡风和他的“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一百三十五封信（第二批六十八封、第三批六十七封）摘编的。

第二批材料分为三部分：

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

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

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这批材料除分类标题和注解以外，还加了四大段《人民日报》编者按。其中有一段按语说：

（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

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这就给胡风等人问题的性质、集团成员的政治成分、他们的政治目的，都作了极为严重的定论。

第三批材料分为五个部分，除了分类标题、词语注解，还加了十八段“编者按”，进一步断定胡风等人“同国民党特务早有联系”，“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第二、三批材料中的许多“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6 月 15 日，《人民日报》将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并将第一、二批材料中的“反党集团”字样一律改为“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为这书写了《序言》。这本书当时印了 7 629 000 册。

三批材料的公布，人们大为震惊，于是开展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一场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对于胡风，已经不是文艺思想的批判，而是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了。

《人民日报》从 5 月 18 日开始到 7 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多至四版）的篇幅发表“揭露”和批判文章，几乎所有文艺界的著名人士，老作家，艺术家，电影、京剧和地方剧的著名演员，社会科学家，教育家，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全国劳模，以

及其他各界的知名人士都发表了文章，还有解放军战士、工人、工商界人士、大学、医生等联名写的声讨信。《人民日报》的专栏标题，先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继而改为“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后又改为“坚持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改为“坚持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步一步地升级。再看看那些知名人士写的文章的题目：《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不是作家，是阴谋家》、《胡风是最阴险的阶级敌人》、《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披着人皮的豺狼》、《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胡风是蒋介石的忠臣肖子》、《胡风是人民的死敌》、《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讨伐胡风》、《严惩胡风》……仅一个半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二、三百篇文章。同时，全国各地的所有报刊一齐声讨，真可谓是一场“暴风骤雨”。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胡风被监禁了十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四年。十年已经过去，还有四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是在当时历史条

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决定凡是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平反后，从 1980 年到 1985 年的五年中，“他病了，他写；他写，他病；他病，他又写，一直到他的身子和他的笔一起倒下。”① 1985 年 6 月 8 日，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三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终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②

1988 年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知》指出，1980 年 9 月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等方面的问题，当时还未来得及仔细复查研究”，以致“仍沿用了过去的一些提法”。《通知》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平反：一、说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二、说“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三、说“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经复查，这三个问题都应从 1980 年 9 月的《通知》内撤销”。

---

① 楼适夷《记胡风》，《新文学史料》1987 年第 4 期。
② 楼适夷《记胡风》，《新文学史料》1987 年第 4 期。

（选自《文坛三公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

朱学勤

迟到的理解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
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
——元遗山

顾准遗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产生相当影响。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为此，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编辑者——陈敏之先生。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介绍顾准先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以回应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念。

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抗战前后，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因为与领导意见相左，即遭批判。1949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第一次冤案发生在1952年。当时，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顾准则认为，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

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现代条件，通过“查账征税”的办法，完成税收任务。1952 年 2 月 28 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出顾准“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第二次冤案发生在 1957 年。当时，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中苏边境水利资源。顾准为维护中方主权，抵制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触犯时忌。顾准人未返京，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老账一起算，反复批斗。

第三次冤案发生在 1965 年。顾准有一外甥，时在清华大学念水利，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康生意欲从顾准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孙冶方、张闻天编织在一起，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经过隔离四个多月的严厉审查，证明在组织上毫无瓜葛。然顾准却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实属罕见。

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致断绝关系，亦可理解。1966 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顾准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蛰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但是，他内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1962 年、1963 年苦熬心力，译述两大本著作，部分原因即为了挣点稿费，借以改善家庭经济。1969 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还是买了一只表，准备送给长女；同是在这一时期，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

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离家分居时，他什么也没带出，后来思念心切，从陈敏之处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贴在照相簿中。1972年从河南干校回北京，他探询到子女地址，曾写信要求会见，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所附，是他刚回北京后拍的八张半身照片，并特别说明，如果子女和亲属中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此外，还有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的油票……

1974年，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勿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两地通信答疑的结果。在那次会见中，顾准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子女的思念之情。陈敏之劝他，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这个结论。有一次，他们一起坐在紫竹园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顾准情绪激动，长叹一声说：“这个问题，在我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蕴藏舐犊之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后来病危临终，他对七弟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顾准又是个孝子。他年届六十，却始终经常牵记九十高龄的老母。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

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遭委婉拒绝。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

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

1974 年 11 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 月 16 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 17 天时间了。母亲闻讯后提出，要到医院去："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指顾准）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着泪水说这番话的。噙忍十年的泪水，再也忍不住，默默流淌下来。老人态度很坚决。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手推车。最后还是陈敏之劝阻了母亲，不料却因此造成陈敏之的终生悔恨——母子十年生离，临终死别，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还是未能相见！陈敏之当时深虑母子见面一恸，会产生更大的悲剧，故而加以劝阻，然而老人内心深痛的遗憾却再也不能弥补了。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 年 11 月 9 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此信在当时顾准尚未摘帽，政治气候尚未解冻的氛围中，需要一些胆识。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读：

>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更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

〔——顾准用铅笔在此处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陈敏之后来将这一悲剧称为“两代人的悲剧”。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在那个黑暗年代，顾准的精神与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也不是没有感召者、敬仰者。与陈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临终前的顾准收到了一个年轻姑娘来信。这封信更可一读：

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萌（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供（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经济所一锅端到河南息县劳动）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河南息县所属）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

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这个目标是自欺其（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做（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恳（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这封信写于1974年11月18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得，这是个什么年月。顾准当时读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泪。

此信作者徐方，小名咪咪，是经济所张纯音女士（已故）之女。1969年11月，经济所迁离北京时，咪咪十五岁，随母南迁。在干校期间，咪咪给予顾准最难得的关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给顾准补养身体。她对顾准的同情随着理解加深与时俱增，以至顾准成了她年幼心灵最敬仰的人。她与顾准的忘年之交，后来在顾准的遗嘱中得到了反映。

顾准遗嘱立于11月15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①；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赠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它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顾准看完初稿，认为前面两段是空话，删掉。关于遗体供医院解剖，是他嘱咐陈敏之后添进去的。11 月 17 日修改稿抄录了两份，由他过目以后签了字。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使人欣慰的是，顾准这份“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终于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理解。

1982 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 年 2 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1957 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

① 顾准幼子。

地狱中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附记”引用了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知父莫如女，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理解。然而，迟迟不解顾准者，又何止他一个女儿？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见！而在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却已经把它所产生的思想家悄悄扼杀了。

“附记”随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意义远远超越了顾准及其亲人的家庭悲剧：

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不愧是顾准的女儿。她理解父亲，迟到了十年，却提出了一

个十年后的今天也未必已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顾准已听不到这一追问了。他把追问留给了活着的每一个人。

顾准于 1974 年 12 月 3 日凌晨去世。弥留时，经济所吴敬琏在身边。这个当时还年轻的经济学家，遵嘱接过顾准有关希腊史研究遗稿，以后协助《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那本书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广泛流传，教育了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谨以陈敏之当时记述的一段文字结束本文，同时亦祭奠顾准先生不屈的英魂：

> 12 月 6 日下午。感谢经济所的杜培荣同志，是他扶着我走下陡峭的三里河前面的小河河岸。
>
> 我默默地把五哥的一包骨灰抛到河中心，看着它缓缓地随着南去的流水漂浮了一阵，随即就被无情的流水吞没了。河岸上白杨萧萧，一抹落日的余晖透过树林斜射过来，四周一片静谧，我的心情是哀凄的！我知道，活着的人心中怀念五哥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我并不孤独！

（选自《文汇报》）

徐铸成

“阳谋”——一九五七

1956 年 5 月，《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1) 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1955 年刚调来的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2) 教育部正拟模仿苏联，创立《教师报》，乃派人与我们商量，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教师报》创刊后，我们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个人的前途来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湜（后来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湜副部长审阅，立刻被批驳：“《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另应由部里审阅的稿件，且经由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与《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相遇，他

热情地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纸不能代替的作用。"当晚我回家后反复沉思，《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色值得邓拓同志怀恋呢？人代会后不久，我去中南海听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批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粗暴的批判，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同志还建议新华社不妨办一张自己的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毅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不少以前未有过的新品种，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延请萧乾同志为附页顾问，帮助文艺作品的充实，还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三号一条胡同里，那时改名为《教师报》城内记者站，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一起交谈。对《人民日报》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之新面貌甚为鼓舞。《教师报》一周出两期，发行数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都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月组织两次编前会议外，多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报外，可在城内及四郊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六七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

报社访问，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讲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报纸里泡着，能安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们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光把一个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大概觉得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去参加该国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站在一起，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到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浦熙修约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颇熟，立即掏出她的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夜，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第二天恰好当时任《教师报》管理主任的严宝礼来看我，得知这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到灯市口的萃华楼便餐。夏衍同志向来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道确信。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地候着吧。"第二天，浦熙修同志忽然想起，说："我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待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

们。你们安心等候着吧。”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和我浦熙修两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同志立即出来会见，在坐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处长。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通知。请你们立即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成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基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望《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现分散参加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夺取一部分回来。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的。第二，《人民日报》经济组主任钦本立是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可请《人民日报》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以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须《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同邓拓同志磋商。”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会见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好办，找几位管理部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编辑方针怎样写，我很费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正在为难之际，钦本立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极为关切，如果你愿意，是否可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从 1949 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请钦本立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第二天本立就来谈，说：“邓拓同志很高兴和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

留出充分时间，在《人民日报》金鱼胡同他的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同志家中，邓拓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落座后，我简单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点点写出来，我思想还不成熟。”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看法：“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受到知识分子们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已自己封锁多年，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

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而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之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基本按邓拓同志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下午分别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同意。张际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与延见，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言论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言论方针，阅毕即对我们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

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也下来了，除批"照准"二字，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对我的信任。关于钦本立调回问题，曾一再商之于邓拓同志，他答复先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中宣部即将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我上的副总编辑名单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附页）、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是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后，地点问题曾有过一度反复，留在北京呢还是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的《文汇报》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职工眷属，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以免搬迁的耗费。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 同志特地作了一次安排，由他约石西民、浦熙修同志及我在浦的个人客厅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

话，上海就知道了。”西民同志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多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可和分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尽力代你们解决。”姚溱同志还说为了与中央报的同等待遇，以后中央的宣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也可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备了几样小菜，我们四人边酌边谈，心情十分舒畅。在这一席三角四方会谈上，基本打消了我们留京复刊的计划，而姚、石两位同志后来也确实履行了各项诺言。

为了加强在首都的采访，决定扩大北京办事处的编制，请夏衍、姚溱、罗烈（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三位同志为北京社外编委，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另外还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分别地请各方权威人士及《文汇报》老同事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张奚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邀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教育部的柳湜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八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社址、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必须有一定的质量，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实践有限，应广泛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邀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虞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体育报》的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审阅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我认为操练已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 1956 年 10 月 1 日国庆日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是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工作，并全局掌握二三版的学术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委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必和浦熙修同志通电话，有时还向《人民日报》联系。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及郭根同志主持新闻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唐海同志负责。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前后给我三封信，表示赞扬（后来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公室撬开我的抽屉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当全力支持《文汇报》及俄文《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的感谢外，也体会到他如此支持我们，因为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文汇报》当时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启导和鼓励分不开的。

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的三十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9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

期，另一个就是那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而起为止。不论版面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下场”，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第二天，我去参加，看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吴永刚、石挥等都到了，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仓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定好车票，今晚某时的某班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料理公事业务，整理好行李，以便准时登车。”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是闻名），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日上午到北京，上海的干部全都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为之兴奋的下面一段话，是：“国内形势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听到他讲话时，不时引起轰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一直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后来老先生的两类矛盾出来了，到发表时又加了一段，说：“但是，被推

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段话讲话时没有，是文章发表时加进去的。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这时特地来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地代表按界分组座谈意见和体会。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此时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说，这正如电影《甘露寺》中所说的：“贾化。”

3 月 10 日下午，我饭后在灯市口一带散步，刚回到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携登车，赶中南海。到了一处院落，院墙粉刷陈旧，一丈间客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四周围着座椅。我被引到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等在门口。听到康生一一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对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看看其他报纸。”毛主席的赞赏使我心中涌上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及舒新城，其他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反正没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着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坐在我对面。康生先说：

"今天毛主席全天邀约新闻出版界的朋友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地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会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克思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他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的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小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说他片面性较少呢？接着我发言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报纸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宣传后，各报的读者都大大增加，但政府仍按原定额配给白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出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很风趣地说，钱武穆王的后人来了，这个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同志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同志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的白报派配额。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摘要载于《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后来毛主席问到："各位在宣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得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我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判相当尖锐，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见的。我们故意放一放，让人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展开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主持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的小结，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了两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了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主席对出版新闻界的讲话。当时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一份给上海。北办人员听了很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分别接见了教育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大概在12号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上海文化局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会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小不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完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点头，不掩其得意之色。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到的迟了几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身旁，说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提。”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在大会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出发，团员人选已经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

惑，怎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在，我挂个空名，大约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这篇文章是专门谈1957年那场阳谋的详细经历，我们访苏的见闻我不想多谈。简单谈些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和苏联的日程安排。第一件事，我们刚到苏联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件后刚刚上台的卡达尔到苏联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欢迎酒会，我们应邀参加。走近主席台时，看清楚几位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全部神采奕奕，笑容满面。真想不到，我们回去不久，苏联即发生所谓“五月会议”，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赫鲁晓夫指为反党分子，从此被赶下了台，或贬居、或降职。

在那次晚会上，还会见了不少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波列伏依等等。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们热情地握手，还和我拥抱。

第二件事情是赫鲁晓夫的会见。在临走的前几天，陪同我们的苏联外交部人员说，赫鲁晓夫可能要亲自接见你们。会谈后，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文革时，这张照片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抄去，指为我的反革命罪证之一，使我多尝了喷气式的味道。

那时国内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鸣放已入高潮，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如当年延安整风一样，怕错过锻炼改造的好时机。

我们决定5月9日回国。这次访问历时四十四天，收获不少。加上回京后又处理了几天事务，那时所谓的鸣放，已接近尾声。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

到京的傍晚，即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此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回京的第二天晚上，先访了邓拓同志。先向他汇报访苏经过。他说：你们这次出国很成功，完成了任务，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还是说说报纸的工作吧：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三十万了。我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他说：这些是小毛病。接着他对我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提高了一步，但是上面卡得很紧。比如我准备一组题目，共十篇社论，报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写好的社论稿大部分扣压了。只其中放下一二篇，把我们计划全搞乱了。接着他悲愤地说：“有时我真想辞去《人民日报》的职务，另外去干一张报。”

留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曾在办事处设便宴与全团同志欢叙话别，感谢他们的合作。那时浦熙修同志正参加全国政协东北考察团，尚未回京。我向来每次入京，必须访问的夏衍、姚溱两位老领导，这次因时间实在仓促，未及拜访。至于章伯钧、罗隆基等民盟首脑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飞回上海后即以全部精力写访苏见闻，差不多每隔一天交出一篇。白天无非去报馆看看，打算在访苏见闻写完后，正式上班。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曾到我家中希望我参加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我说正在赶写访苏见闻，而且《文汇报》现在党与非党同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坚决地回绝了。第二天白彦副部长又来说，谈得很热闹，你一定去听听，会也快结束了，我们不准备发给你出席证，你拿我的证，下午一定去参加吧。说毕即掏出他的出席

证交给我。盛意难却，我当天去了。发言确是争先恐后，发言的内容差不多集中在消除党群之间的隔阂即“拆墙”的问题。（听说这一名词还是中央某首长找出来的。）记得那天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发言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发言，说他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说了算数。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有一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赴京，还贴出了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我由此触发，要求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大意说：墙是很容易拆掉的，只要彼此尊重，有共同语言，党与党外人士就可以水乳交融，很好地进行合作。我举《文汇报》为例，说我和钦本立同志等就合作得很好，遇事坦率相商，《文汇报》，就不存在墙的问题，可见领导的党员至少要懂一点本行的业务，如果完全是外行，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现在领导干部应当懂行，已成为常识，可是我那天的发言却闯了大祸，被指为“大毒草”，说是“推广反党经验”，而且不久进行“反右”斗争，伟大领袖还进一步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的规律。当时钦本立同志问我，这个发言要不要见报，我说当然见报，我认为我问心无愧，一片热诚想介绍当时《文汇报》党内党外坦诚合作的事实，来平息社会上“墙”能不能拆除的争论。即以后来发明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来检验，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后来一声令下，“反右”之风匝地而起，这就成为我的重要罪证之一了。

运动是由一位国民党员写的一篇文章开始，接着6月初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作为序幕。我当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人民日报》另一篇社论（据说是伟大领袖亲写的）是《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我就到苏联去了四十四天，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已经过去。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

时刻，我为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响应。这就是被伟大领袖指的“《文汇报》写了检查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有些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面人物很像，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像”。在同一篇宏文中，还明确指出，“大鸣大放，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他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原来一切都是早已部署好的。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开始，市委宣传部希望我接替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国民党立法委员开始点了我的名。我想到风已慢慢刮了，但是还没有想到雨点会溅到我身上来。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见面后，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作不了主，必须请示柯老。于是我们又设法面见这位“一言堂”，他开头就说：这事不能由您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看法，不愧后来被称为好学生了。

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我赴京出席。初到京时，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四位“酒仙”，照例每年必聚一次的。云彬兄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了几次，恐怕这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

人真正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为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出来拥护党。云彬兄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为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是有些看不透，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过了一天，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预设的安排。不是那篇宏文就说，“章罗联盟”的罗隆基与“文汇报”编辑部是右派系统的两帅，两帅之间还有一个能干的女将浦熙修吗？我翻阅 1957 年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完全是有计划、有领导、按步骤进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关于纲领性的文件，自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宏文印成文字时比 1957 年我们听到的录音，大部分已大改动大补充，这是尽人皆知的，斗争的对象也一步步有计划、按步骤推开。就民盟范围来说，先是创造一个章罗联盟，集中力量斗章罗两位，从而涉及浦熙修，然后抛出索涉兴教授。在差不多的时间，也以我为中心之一，然后一步步推开到各省市的民盟负责人（名之曰“章罗联盟代理人”），同时揪新闻界的盟员，最后牵到基层。斗争的方法也非常技巧，当集中力量斗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以立功赎罪。

7 月初，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同志到办事处来看我，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别叫我来传达他的意见。”我在是年 7 月 2 日的日记照抄如下：

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场合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天比一天提高。初来京时，还没有认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满头大汗，人像掉进水里一样，不知怎样才能安排自己，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已列入打倒对象了。

（摘自《国情研究》1989年第1期）

李　锐

庐山会议实录

引论——庐山会议的由来

回顾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就不能不想起在这前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但也同样在极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的半年中，不断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之后，为了进一步纠"左"，克服混乱现象，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才又举行庐山会议。可是，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

三面红旗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有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建国之后，为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国家，则认为需要五十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从 1955 年下半年批评农业合作化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各项建设事业应当大大加快，当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农业改造速度促进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速度，并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后，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因此，1956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就过快过粗，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当时对此种快速进度尤其经济建设上的加快速度，党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1956 年初，周恩来提出过，既不要犯右倾保守又不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957 年的经济建设是健康发展的，国民收入有所增加，消灭了财政赤字。直到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都对克服急躁冒进做了工作。这次会议制定了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注意到综合平衡，压缩了基建规模，控制了过高的增长速度。但毛泽东认为 57 年的增长速度低于 56 年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马鞍形，反冒进反错了，是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他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说这是吹了一股阴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会”吹掉了。于是，从 1957 年 10 月三中全会开端，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实际上否定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经过 1958 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广州会议，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反冒进的错误。从此，“反冒进”的声音噤若寒蝉。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 20%到 50%。钢从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0 万吨，煤从 2 亿吨提到 4 亿吨，粮食从 5000 亿斤提到 7000 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

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8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一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以上。1962年指标，钢变为1亿吨，煤为11亿吨，粮食为15000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三年和十年了。

1958年春，毛泽东就说过“乡社合一”的问题，4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渐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发表）8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到，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应通过公社摸索

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就是这样刮起来了。1958 年 6 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二千多斤放到七千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宣布为旱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 1000 吨，禹县 4000 吨，接着是广西鹿寨 20 万吨，广东 87 万吨，后来河南三天 300 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有的地方四十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凡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大战的阴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我们的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

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建国前的二十八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漫长的二十八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这二十八年，毛泽东确实做了全党的表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建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成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片面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并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一次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作全欧洲革命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他在1920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离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1957年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

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十五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曾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作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着。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已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1919 年 12 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1918 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

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的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学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含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作他是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不久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其中哪些是应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

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1959 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斗争。

神仙会阶段和毛泽东两次召见

研究党史的人，一般以 1959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庐山会议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各半个月）：7 月 2 日到 16 日彭德怀信印发，为真正的神仙会；16 日到 8 月 1 日，从纠"左"与反右的对立交锋，突然转到大反右倾；8 月 1 日前为政治局扩大会

议，8 月 2 日到 16 日为八届八中全会，大批彭黄张周，最后全会通过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关于反党集团的错误两个决议，为反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为什么叫做神仙会？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就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经历来说，除开江西和长征，恐怕是遇到了抗战时国民党封锁边区不发军饷后，从未遇到过的困难；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从来未有过的紧张。大家已不断检讨，顶风迎浪苦斗了大半年。一般认为，许多问题在解决中，形势已开始好转，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可以让大家来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安排好今后工作，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夏天到庐山开会，可以避暑，远离尘嚣，精神都放松一下，过一阵较闲适的生活。庐山是天下名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权且都来当当“神仙”吧。

我是第一次登庐山。7 月 4 日寄出的书信写道：“1 日下午 7 点半开船。甲板上啖荔枝，谈形势，早稻丰收在望，人们心情倒还舒畅，江风甚凉，留连甲板，十二点后始入睡。2 日天亮之后，庐山在望。九江曾是口岸，立过租界，岸上仓库颇密，昔日繁华当远胜长沙。一路车队爬上牯岭，共 24 公里，登 1100 余米，转 400 个弯道。云雾满山林，不识真面目。当年蒋介石仆仆此道，乘四人抬滑杆，一条公路也修不成。这次中央来开会，当地主人紧张动员，尽力招待。北京部长们多住在原来一所疗养院，其他散居山崖诸楼台，不辨方向。案头有《注意事项》，诸如加衣盖被之类，并云：“此间空气清新，使呼吸加深，胸廓肌肉加强，血液循环增进，红血球增多，氧化作用良好，食欲增加，发汗咳嗽减少，等等。窗外满岭松杉，烟云弥漫，清风习习，时感阵雨欲来。午饭前，看完两本《庐山指南》。午饭吃两碗半，午睡一小时，晚饭照旧，当是‘空气清新’奏效。整理带来文件，阅当地报纸。预报有雨，不敢外游，夜观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皆主

席所点也。”

以下是3日所记：“晚上跳舞，舞场为一小教堂。上帝有知，都进不了天堂的。一切都极安静。有戏、有舞，却消没在山风松涛之中。跟北戴河另一番滋味，那儿总是让你挂念着海，想到海中飘游整日才好；这儿是‘深山养道之心’，尘嚣世俗之感皆被融化也。”

4日晨又记：“清晨被阵雨惊醒。夜来风雨声，云雾知多少。至今只见窗外庐山，真面目还不清楚，讨论问题增至十八个。先开小组会，我在中南组。”

7月10日第二封家信中写道：“7月5日上午阴晴未定，同京官们登含鄱口（壑谷正对鄱阳湖，似口含湖水也），归来得句，三、四两句甚为小舟所欣赏：

含鄱口上鄱阳含，水色天光变幻间。

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

情景完全写实。”这天同游的是哪些人已记不清楚。但一阵阵雾气扑面而来，两人对面坐谈，忽然不见人影，转眼之间雾散云开，又一切重现。此种反复图像，至今如在眼前。

初上山的几天，人们游兴极高，诗风很盛，这同毛泽东的两首诗传开来很有关系。6月23日，毛泽东到湖南，24日下午畅游湘江，25日由周小舟陪同到韶山。28日小舟随同到武汉。毛泽东即乘船到九江，29日上庐山。小舟与我们同船来山。《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一上山毛泽东就写给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我与小舟同在中南组，这时他就兴致勃勃地将原件给我看，并将两首诗抄在我的记录本后面。诗中词句，同后来发表的有些出入。《登庐山》还有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由

此可见当时诗人的松快心情和豪兴不减。《登庐山》最后两句同后来发表的不同："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

最初几天，人们于开会空隙，游山玩水，成群结队到仙人洞看晚霞。传说唐朝吕洞宾在此修仙，系悬崖绝壁之天生石洞；7月是庐山云彩变幻最美的月份。古往今来，胜景古迹，能诗者自不免引发诗兴。我的本子上还有董老亲笔写的一首七律：

庐山面目真难识，叠嶂层峦竞胜奇。
乍雨乍晴云出没，时高时下路平陂。
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遗迹在，访仙何处至今疑。

花径离仙人洞不远。周颠和御碑是朱元璋得了天下后编造的一段天人感应的故事，以说明他是真命天子。不知何故，这首诗没有收入《董必武诗选》中；也许选编时，觉得此诗尤其第一句仍不合时宜吧。在《朱德诗选集》中却有《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一首：

庐山面目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不但是步原韵，意思也是回答原诗的。朱总这诗是7月7日写的，他们的诗正好反映神仙会初期人们的普遍心情：陶醉自然，忘情物外。我还记得游东林寺时，匾额为康有为所书，出寺不远，总理在寺门口向我大声问道："李锐，康有为的字是中年写的还是晚

年写的?”我回头竟随口大声应道:“是晚年写的吧。”我似乎记得康氏晚年才到过庐山,当时也没有细看字迹。在神仙会阶段,会议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

“大跃进”时期历次中央会议,同我来往交谈最密切的是田家英。家英也好诗词。这几天他同康生、陈伯达也有游山赋诗之举。他告诉过我,他们三个人的几首联句,也抄在我的本子上:“三人结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见鄱阳湖,恨无拿云手。鄱阳忙开言,不要拿云手;只因圣人来,羞颜难抬首。五老牛马走,鄱阳紧闭口;东海圣人来,群山齐拱手。若请诸葛亮,西风去借求;晴日君再来,畅饮浔阳楼。”家英对陈伯达历来有看法,曾跟我详谈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时,这位“经济学家”趋时邀宠,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泽东批评挖苦的情况。但家英对康生其人历来敬重,以至诗中称之为“东海圣人”(康生是山东诸城人),未能识破其阴险奸诈。这大概也同他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处于安全状态有关。

关于神仙会的情况,我的《龙胆紫集》《庐山吟》九首的第一首,说得颇清楚: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古今句,高谈且饮云雾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云雾茶为庐山产名茶。全诗句句写实,没有丝毫夸张。

7月16日,我的第三封家信还谈到:“挤时间小游山几次。此山特点在高,绵延90余座山峰,经历了第四纪冰川,高峡深谷,‘磅礴五百里,奇秀甲东南’。因夹在江湖之间,云雾不断,气候变化较大。坐在屋子里,有时太阳进来,只能穿衬衫;太阳遮没,

又得穿上毛背心。上山后，只热过两天。”由此可见，直到16日，我还有兴致顾到山景，心情还是愉快的。信中还写到这样重要的情节：“几天来参加起草会议纪要文件，特疲劳。主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颇为融洽。会议已近尾声，但具体的日子还不清楚。原来说是开到十六、十七号的，今天已经十六了，还没有开过大会。”

这以后就没有再写过家信了。直到8月1日，为使家中先有个精神准备，写了这样几十个字的“报丧”书：“二十多天来，会议极为紧张。我在会议期间，由于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犯了错误，在作检讨，心情极为沉重、紧张，很难再写信了。还要开全会，大概十号以后，会才能结束。”

如果有“神仙会”的话，可以确切地说：7月16日后不几天就结束了。

7月3日开始，按大区分六个组开座谈会。中央各部委同志分别参加各组。我被分在中南组。组长是陶铸。按照十八个问题，摆情况，谈看法，提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自由活动，星期天休息。当时讨论的情况，大概是各人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来谈。我的记录本只记了些要点，也不是每个人的发言都记，前几天记得较多，后几天记得很少。小组会并没有按照问题逐个讨论，多是一揽子发言。

关于读书，大家发表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读书，作用极大。在北京没法读书，要看的东西太多。学习制度取消了，星期日名存实亡。几个人一组，读一个月。一把手没有什么离不开的。价值法则、商品经济等问题，认识上并未解决。过去不知钢之厉害，去年碰了钉子，也应当利用人家经验。不学，书记当不下去。还有千万人饿肚子的问题。觉悟有了，就需要逼着读，读完交篇心得文章，很有必要。协作区应当搞点理论协作。《红旗》应当有争论文章。关于去年秋收与炼钢之间的矛盾，还有深翻土地等问题，

中央当时未能当机立断，等等。

7月3日，陶铸首先谈广东情况：今年广东洪水灾害，早稻约损失三十亿斤。经过救灾与克服共产风，党群关系有改变。群众说："共产党可共患难。"广东粮食一向宽裕，多给群众留一点，挽回在港澳的影响。去年向港澳吹过牛。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搅成一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副食伤的太厉害。群众回家吃饭，听其自然，回去一个时期有好处。这样，家庭养猪能快恢复。群众懂价值法则，我们不懂（农民舍得杀三只鸡给母猪吃）。过去七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步增长。去年前者大增，后者很少增，都各顾各了。手工业纷纷下马。过去供300万吨煤，今年只几十万吨，33万人又返回农村。先安排人民生活，再安排基建。不能光看这一年、半年中发生的问题，要看三五年，看长远些，看积极方面。广东有了年产500万吨煤，5万吨钢的能力，也有了水压机。去年苦战一下，不后悔；兵无苦战不行。不要光看消极东西，不要有埋怨情绪。去掉盲目性，主要是没经验。广东讲了三个月的一个指头，现在不讲了。落实指标已差不多了，仍要鼓起干劲。人们对总路线是有怀疑的，定要坚信，不能动摇。

我同陶铸在延安时就认识，接管沈阳时，他是市委书记，军管会时期，天天在一起。他对我们年轻人并不摆老资格，有话脱口而出。他为人直爽，曾经对我说过："我这个人是只左不右的。"虽然当时广东形势严峻，他还是干劲十足，只承认有一个指头的问题。

同日，刘建勋也多少讲了点广西"大势"：感觉有压力。今年很紧张，但秩序好，跟1957年散社时情况不同，说明"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胜利已巩固"。去年许多措施、作风，使干群间有隔阂。缺点那么多，讲了就完了。再不搞什么八百斤、千斤省之类虚名

了。给农民小自由非常重要。人心思定。政策三定，粮食归户，群众最满意。刘建勋特别强调广西煤的问题，现在只有200多万吨，明年需要300多万吨，也没有焦炭。周惠后来在闲谈中跟我说：刘建勋滑头，言不及义，每次发言都强调煤的问题，其它要害都不谈。

7月4日，周小舟发言，他不仅谈了湖南情况，还对总的形势提出了看法。他首先说：不可估计太乐观。去年底，湖南号称粮食翻了一番，达450亿斤，估计只330亿斤（按后来落实到245亿斤，只增产约8%）。生铁76万吨，实际60万吨。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我们没有搞敞开肚皮吃；但其他一样紧张。基建搞多了，县以上1000个项目，只有300个经批准，其他是自由化的。上下都想多干。工人从90万增加到134万。下面干部对经济失调，还不感觉严重。钢指标定为1070万吨的决心是好的，但安排800万吨就好了。公社问题，当时似乎是因为农业、工业形势所迫而建立公社，但太快、太大，几股风一刮，越包越多。（谭震林插话："根本是把老规律打破了，不也过来了。"）现在条件下，农业、工业到底能按什么速度发展？农业不能30%，每年10～20%还有可能。过去农业提出要赶日本，可见头脑发热程度。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1. 根本不节约；2. 不利于养猪；3. 破坏林业；4. 不能积肥；5. 不节约劳力；6. 吃得不愉快。我们还是努力办好。粮食定要分配到户，但只能是指标，粮要按月领，否则必过多喂猪、喂鸭，斤谷斤肉。小自由范围放宽些，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去年变化不大，只顾了吃穿用，再没人盖房子了。现在普遍人心思定。但转弯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转。

接着吴芝圃发言：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者3600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等，都算了细帐，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谅解，已有95%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

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1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的，全省有10%发工资，从六七元到十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一些经验。最大变化在水利。去年600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个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小修配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完成60～70万吨，钢5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来。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过的不讲；领导没讲过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大集体、小自由要稳定下来。计划要稳定些，年年能增产，浪漫主义变现实主义。吴芝圃讲的精神，同周小舟的显然不同。大家觉得他对河南严重形势太轻描淡写了。实际上在1958年12月河南省委召开的会议上，粮食产量虚报、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等等问题，即已发现，尤其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王任重谈了湖北许多实际情况，心情是沉重的。首先对1958年看法：成功与失败都尖锐，取得的宝贵经验，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说，都有长远意义。教训确实沉痛，比1954年大水灾情况更困难。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很深刻。1954年没吃过十二两以下。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病。早稻下来才能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粮食只产200多亿斤，却按450亿斤过日子。今年1月还相信有400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仍说有430亿斤）；3月还说有350亿斤；4月再摸，不到300亿斤；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230亿斤。1957年是219亿斤。为什么增

产不多？“大跃进”掩盖水旱灾情，500 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 100 多万亩早稻失收。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面，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假相掩盖了真相，芝麻 100 斤可说 1 万斤。大半年冷不下来。大家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刘少奇插话：不要轻信，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评右倾保守，插白旗，老在帽子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群众批评：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年底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出警告。今年不可乐观，无大灾荒，可增产，但也到不了 300 亿斤。粮种得多，油料就会要少产。努力干，从困难处着想。去年错误对经济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有的要一两年才能好转。手工业搞掉了，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超支 5 亿。3 万吨半成品，所赔的钱谁出？说大话，吃大亏。纱厂办钢厂，用掉流动资金。各县盲目盖了些工厂，可以改办学校或变成仓库。总之，1958 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说右倾，我也不怕。人的认识总有局限性，过程是曲线的。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党内有互相埋怨情绪，不利于团结。

7 月 6～9 日几天，转入讨论食堂问题和农业问题（这是地方最熟悉的问题），以及计划、任务，各省谈今明年和 1962 年的指标。例如湖南 1962 年指标较低，按人均计：粮 1000 斤，猪一头，油 6 斤；认为粮食指标过高不利，使用劳力过多，会影响其他副业。大家对林业意见很多，认为森林工业局实际是森林商业局，木材在深山搬不出来。河南再三讲开发三门峡以下梯级水库，还要大办水利。

1958、1959 年两年，我以工作人员身份（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列席历次中央会议，在小组会上从不发言。鉴于当时形势，7

月 8 日上午，我破例在中南组谈了两点意见。一是“以钢为纲”、“元帅”等口号，不再提为好。二是，去年怕提综合平衡、怕提按比例发展。1958 年一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我就不以为然。一次同乔木谈及，他只说，这不过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而已。因这口号不合经济规律，从而对于它引起的工业内部关系问题，他没有我感受得深切。关于“元帅”，他倒有过同感，说：“元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这时我特地细读了一遍《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章节，关于综合平衡与比例关系想得比较多。自己管电，电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有密切关系，是“大跃进”中最为被动而紧张的环节，电力当时虽被封为“先行官”，却根本无法先行。我在发言中还谈到钢的产量达到 1 亿吨，美国花了 80 年，苏联花了 40 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快一倍，但苏联人口也多些。我们可能比苏联快些，但究竟能快多少？速度要大致划一条线，在某个数字的左右，摆动的幅度要有个限度，即某种波浪式，不能偏离太大，不能打摆子，扭秧歌，尤其要有长期计划（当时毛泽东不同意定死长期计划，我几次进言无效）。还谈到工业速度由钢来决定合不合理？以什么“为纲”的口号，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单打一，滑出界限。综合平衡即相对的稳定性，要瞻前顾后，要看长远一些。关于必须按比例的问题，我提到 1958 年《红旗》一篇否定比例的文章，似是计委的同志写的。我的这些意见，有的人很不以为然。我发言时，罗瑞卿还打断过我的话，但我还是坚持把意见讲完了。我的记录本上只写了“引起争论”四个字。

7 月 9 日下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综合平衡问题，记录本上没有具体写是哪一个人的发言，记了这样一些意见：综合平衡中最重要的比例是积累与消费。积累率苏联是 25%左右。其次是工业与农业、劳动力分配。工业内部轻与重、原材料与加工业等。关于轻重缓急，重重急急，六保户都失灵，专案（指必须保证的）变悬案等，大家意见甚多。认为越跃进越要有后备，越要留有余地。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共产主义社会还是需要的（列宁的话）。农业“八字宪法”也包含比例关系。主观能动性须根据客观规律办事。统计很重要，去年多假统计，因此也就导致假计划。去年规律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群众说：共产党九年半讲真话，为什么这半年如此爱听假话？1958 年那种突击性决不能经常，要根据经常现象做计划。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鼓足干劲应当是经常的能持之以恒的干劲。领导经验不能代替农民经验，农民说，“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手软”。衣服可以几年不做，饭不可以一天不吃。农业要很慎重，一点不能冒风险。由此可见，当时大家头脑基本上都清醒的。

7 月 4 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有不少插话，最后还讲了这样一大段话：1958 年跃进，吃了 1957 年库存，预支了 1959 年。因此 1959、1960 年都要补课。领导看好的多，而且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苗好，过于密植，施肥不当。产量有的红旗队低，白旗队高。1958 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训；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斯大林似说过，平衡有了破坏，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没碰钉子就知道转弯，是难以办到的。不要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性错误非犯不可，犯了有好处。全党全民取得经验，同个人取得不同。全民炼钢，亲身体验。碰了钉子转弯，就是正确领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王明路线，短促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道转弯，要让历史来总结。对去年问题，当前形势，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因为有了教训，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一步。有些半成品还有用。对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经验。工厂达到设计能力，要时间；快，也要时间，欲速不达。双轮双铧犁的完善，还有个过程，何况小高炉、小转炉。去年的经验教训，不是以前七八年能取得的。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也难免，以不泄为好。要不要

革命？革命就要出问题，不能怕出乱子。不要责备下面，所有错误和问题都由省地县担起来，省委主要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了。很显然，这时刘少奇虽然谈到教训深刻一面，仍是以“革命”的名义来为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辩解。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现在，有些农民不安定，想进城，不盖房子，不买家具，养猪、种菜比以前少了，有了钱就吃掉，这不好。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要让农民自己想办法过好日子，兴家立业。家庭制度巩固起来（按：毛泽东1958年有过废除家庭的思想，几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到家庭，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饱、吃好，人心才能稳定。总之，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这是有关5亿人口安定的问题。多年以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多么紧。北戴河一高兴起来，是从粮食多了出发的。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总是越来越多。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肉蛋，可以出口，换回东西。各省不要搞工业体系，但工业方向是重要的。

“大跃进”期间历次中央会议，我同田家英来往最多，交谈也最深。我们在延安就比较熟识。1941年后，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内组，我在《解放日报》评论部。我们对历史与杂文、诗词都有同好。从1948年起，他就担任毛主席的专职秘书。建国以后，他住在中南海。1952年我调来北京，主管水电工作，跟他隔行隔山，但并未因此减少我们间的共同话题。我在悼念家英的文章中

曾写道："大跃进"期间的交往，就不仅限于摆摆龙门阵，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

刚上山的7月3日晚饭后，我散步路过胡乔木住处，他让我进去闲谈，实际上是火车上漫谈的继续。随后陶铸也来了，三人一起谈。

陶铸愿意参加这种漫谈，当然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因为广东去年的教训太大。他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上游》1958年第十一期发表了《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文章的摘要于7月4日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和比例有所论述。他认为广东经济建设受"反冒进"影响，1957年慢了一些，而1958年下半年又过了一些。原因是没有很好掌握速度的客观法则，跃进速度是在条件允许之下一定的速度，去年将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从去年实践来看，重工业和基建搞得过多是有问题的；今后两者发展速度，必须在确保人民的生活资料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进行。以下这些我们三人的谈话内容，我都记在记录本上，大体上以乔木的意见为多：

共产风是北戴河刮起来的，也是公社化后刮起来的。会后，张春桥肆意迎合，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很受毛泽东的欣赏，亲自写了按语，在《人民日报》转载。因此郑州会议时，柯庆施将张带了去。但当时对共产风刹得较快，这个问题就没再谈了。毛泽东对徐水等地农民那种"铺天盖地"的劳动生活（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等），极为赞赏，希望推而广之。关于钢翻一番，并非从农业生产而来（当时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这个意图，是1958年6月间，毛泽东在游泳池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听到他说的，这时冶金部还毫无精神准备。我认为此事同1958年各大区安排1959年指标时，华东区首先刮起钢的上涨风，有最密

切的关系。我参加了华东区的这次计划会议。华东区1959年的钢指标，要达到600～700万吨，冶金部曾据此计算过，1959年全国可达到3000万吨。因此，促动毛泽东下决心：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但乔木说，这也同他对国务院的领导不满有关，想以抓纲张目的方法，用此口号来带动其他工作，带动各方面的"大跃进"。从这里又谈到在去年大风大浪中顶不顶得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在成都会议时，冶金部写的报告，强调小高炉、小转炉作用，大大受到表扬，因此就更加迎合，后来就更加无法抵挡高指标之风了。三人都谈到必须遵守客观经济规律，不论如何政治挂帅，也不能违反规律。还认为应当尊重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而去年刮风以来，就都避免再提苏联经验了。对毛泽东所讲经济发展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说法，我们表示很大怀疑。乔木除开再一次引证天体运行的规律等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本人似乎忘记了。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必须经常保持平衡，不能以此来套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包括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然后又谈到上海会议。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精神。乔木说，毛泽东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正在谈着，富春进来了。这种谈话也就中断了。大概是由于在火车上我转述了乔木的意见，富春特来找他漫谈的。

7月6日夜，我到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他们住在一起）闲谈，乔木和陈伯达也在座，几个人谈得很晚。以下所记也是乔木谈得较多：

综合平衡的问题进一步肯定，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是

要保持平衡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此才经常出现危机（其实当年我们对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情况所知甚少）。这个问题当时谈得最久，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引经据典，举了不少例子，以说明我的观点：经济工作必须保持经常的平衡，尤其不能人为地破坏平衡。我们还从理论上搬出，平衡是否即列宁所讲的“均势”，还把书找出来了，又认为并非如此。随后谈到，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总是平衡的，而政治现象才是不平衡的。富春提出“运动中求平衡”也是一种遁词；认为毛泽东提出这个说法，是为自己1958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接着说到比例问题，不按比例，结果钢铁本身也终于上不去。“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等提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乔木又谈到，对元帅的命令是要绝对服从的，去年陈云被迫说过这样的话：“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实际是过不了河的。关于公社的由来，是受嵖岈山、七里营、徐水三地的影响，当时供给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来。公社与供给制的问题，在北戴河会议时，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产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乔木，而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为此，上海会议时乔木挨了批评，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时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乔木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谈到，自南宁会议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这个期间，我同田家英还有几次单独的闲谈，记得田详谈过他在四川蹲点调查的情况。关于过分密植的问题，农民很反对，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还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四川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罗说，过去高产是干部逼迫下虚报的。田有一个专门调查的材料，我催促他赶紧弄好，送与主席一阅。吴冷西也同我谈过，书记处开会，有些意见都是让乔木去反映的。

1959 年五六月间，为查看一些水电工程，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湖南（资水柘溪水电站正开工），6 月初到长沙。1949 年到 1952 年我在湖南工作时，周小舟与我是正副职关系。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当年我们一见如故，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一定的交心关系。这次我在长沙只停了两天，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一夜。他正从湘西调查一个月回来，途经湘潭、邵阳，丰富了第一手材料，曾边检查边解决实际问题。5 月底开了省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就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作业组、大队核算、怕不怕发生资本主义、人心思定、山区经济、湖区负担、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农民积极性与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作了长篇汇报，对“大跃进”、公社化以来的“五风”等“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着手布置较全面地纠“左”。1981 年我在怀念小舟文章中回顾了这夜的谈话：关于一年的看法，我们毫无顾忌，交换见闻，观点一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讲到他的先见之明。他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结果是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计的低，邻省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作了一天活，身上有（没有）出汗”，提出

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食堂，办食堂浪费人力物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也不能搞。还谈到1958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14%。他的总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路过长沙时，我同周惠也有过两次闲谈，觉得关于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等，湖南做得比较好。有3万小土炉没让点火。中央关于自留地和粮食分配到户的指示，湖南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也接受了。印象深的是，他谈到广州开会，压粮食高产指标，谭震林嫌湖南低了，被插了白旗；他同谭为此有过几次争论。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许多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前后酝酿了十八个问题。去湖南时，王任重同行，似乎也是有意让王接触湖南情况。当时湖北粮食与市场全面紧张，想向湖南借粮。到湖南后，对毛泽东来说，这大概是当时印象较好的一个省，颇为称赞，因而采纳了小舟对去年总结的三句话，作为庐山会议的基调。周惠有基层工作经验，虽然有时思想也难免"左"(反右时欠了帐，后来作了检讨)，但1958年粮食抓得紧，对大炼钢铁等一套做法是怀疑的。关于粮食估产，他同广东、湖北都发生过争论。他挖苦过陶铸：广东粮多，你卖给湖南一两亿斤吧。因此，随后也通知周惠上山开会。我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即熟识，南下湖南时又碰到一起，在山上自然也是很谈得来的。

神仙会阶段，我与二周同在中南组。我们脑子中都装了一堆问题，他们装的农业方面的多，我装的工业方面的多，正好互相补充。小组会的各家发言，自然也是我们闲谈的话题。他们认为农业的高指标是由上而下压下去的。因此，去年讲大话、吹牛皮的一些人，一个时候很吃得开。小舟认为那些拆房并居、砸锅炼铁之举，简直是反动的。周惠说，去年第一书记应当各打五十大板。我们都认为在小组会上还难以畅所欲言。例如我唯一的一次

短的发言，就有人将我顶住；又听说田家英在西南组的发言，挨了批评。因此，觉得会议确实还有压力。

由于都是老关系，我在上述的两处闲谈，自然择其印象深而观点一致的互相沟通。小舟同禾木还有过单独的交谈。这种“危险的交心”，当时是无“危险”之感的，而且颇感我们的看法居于上风。胡乔木与田家英在华东组，其他几个组的情况大体相似，这时会议《简报》发得不多。彭德怀在西北小组的发言，是后来听说的，当时并不知道。那时也没多打听别组讨论的情况。北京来的工交各部委的人，都没参加过两次郑州会议，对综合平衡等问题的看法意见相差不多。“钢铁元帅”升帐之后，一机部同冶金部的矛盾最大，因为钢材品种特别是生铁质量不合格，一机部非常为难。上海会议时，赵尔陆同我详谈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听说他带了几箱不合格的生铁上山，准备让会议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后来也并没有摆出来。

7月11日夜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当他们谈到在小组会上我的发言被人顶住，马上就通知我也去参加。(所谓顶住，是前述中南组的会上，我的发言被罗瑞卿频频打断。后来罗在8月日第二组的会上批判周小舟时，罗是这样说的：“我和李锐同志有点冲突，他说以钢为纲不对，政治挂帅有副作用，还说有人不喜欢讲缺点，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虽然没有展开争论，但有几次短兵相接。”)我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气氛之融洽。大概小舟是同情我的观点，看到我被人无理打断，而难以畅言，这样向毛作反映的。谈话完全四个人轻松愉快地交谈，有时相互插话。我的记录本上分别记了些简单要点，现照抄如下：

周小舟谈：农业是根本。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毛泽东说：也不尽然。)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

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毛泽东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几万斤，因此就相信了。）“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谭震林）有的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向下传。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因此没有失收的问题。会议还有压力问题，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周惠也插了话。都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这个意见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 16 日以后，开会人员就打乱平分，但组长没动，仍分六个组。

南宁会议之后，我有多次同毛泽东单独谈话的机会，从未感到过拘束，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次还是照旧。我主要谈冶金部的问题。关于各地大炼钢铁中的情况，如指标落实及质量等问题，冶金部一风不透，问不出消息；不如计委内部，还能及时知道点实情。今年 4 月上海会议之前，我就是从计委廖季立处问到钢铁若干实情（1959 年 2000 万吨绝对不能完成），以及自己从其他方面特别是电力平衡上感到的问题严重，于是向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 1958 年 6 月华东计划会议时写的，对那次会议泼了冷水），明确提出钢的产量必须下降，落实指标，这样才免于影响全局。对钢铁还提出关键是质量问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关于综合平衡问题，这时我谈到苏联经验，以及列宁、斯大林的说法，随手将 1959 年第九期《宣教动态》（中宣部内部刊物）送上，请毛泽东过目。上面有一篇引证苏联经验和斯大林语录的文章，社会主义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会比资本主义严重得多，因为社会主义是集中计划体制。我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

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说，以后可不提这些口号了。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一路大概同王任重等发表过这样的感想：去年大跃进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这句话随后柯庆施等都知道了）。我这时乘机建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南宁会议以后，陈云只担任建委主任，历次中央会议很少发言）。二周也当即附议。毛泽东于是向我们讲，“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说陈云当总指挥好，陈云有长处也有短处（短处大概是指对群众运动注意不够之类，我的记录本上没有记具体内容）。

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如下：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说关于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的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胡思乱想起来。“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关于公社的由来，毛泽东说：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马上就都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接着谈到乱传讲话，传得快。我们说，还是形成文字为好。毛泽东说，讲得不对，文字也一样不好。钢翻一番，谁知道当成了法律，党比人代会厉害得多。（他似乎忘记了，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北戴河会议还内定了6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北戴河规定翻一番，索性登报，是薄一波和胡乔木的建议。接着谈到自己的性格，回忆起江西时代的往事。一次向毛泽覃大发脾气（或者还要动手打人），毛泽覃回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郑州会议后，开始右倾。去年是几件事都挤在一起了（承认粮食、钢铁、公社化等几大跃进不对

头）。关于下面讲了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这以后毛泽东反复讲了钢的问题。我再三提到，二五计划轮廓要定下来，否则不好办事。）搞到六七年，十年计划，明后年再看，能达到2100万至2400万吨就很好了。今年1月开政治局会，关于钢指标，陈云讲2000万吨不易完成，同陈云意见原来一致，不知为什么他后来要检讨。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很不平衡，有各种灾情，有丰收有歉收，一填平补齐，三成很不易得。还谈到他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

毛泽东这夜同我们的谈话，对纠“左”的许多看法，比头天在组长会的讲话还要明确。关于对粮食与钢铁的增产和高指标的看法，同我们是很接近的。因此，我们三人谈完话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尤其小舟大胆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这时，毛泽东似已多日没有找下面的人个别谈过话，大家都在摸风向，不知他的意图如何。我比较谨慎，许多人向我打听（包括总理的秘书），我都没吱声。刘澜波同我住隔壁房，我也没有向他透露什么。这是从田家英那里得来的经验：常有反复之变，不可轻易传话。可是后来才知道，小舟随意向人流露了高兴之情（罗瑞卿曾陪毛泽东一起到湖南，小舟向罗讲了“上有好者”的话），于是有的话就传到柯庆施这些人耳朵里去了，他们正在窥测方向。他们对去年的所作所为，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认真检讨，反而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护身。他们打着保卫总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旗帜，将“神仙

会”变为“护神会”，将中国继续推向大灾大难之中。

我的《庐山吟》第三首“初登楼”，即写这晚奉召谈话的轻松愉快情景：

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
话到曹营事难办，笑声震瓦四心通。

7 月 16 日上午，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要求当天立即排出一个新表，从第二天起照新表办事。所谓“新表”即开会的六个组不按地区分，将人员打乱重新组合，只是组长依旧。信中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第二封是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位部长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一个星期的会议。信中还问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要来。根据这两封信，这天下午，周恩来主持一个 15 人的会议，有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参加，讨论今后会议如何进行。

从这两封信主要看到两点：一是彭德怀的信已印发，同彭德怀历史上关系密切的人应来参加（如安子文是七大前华北座谈会批彭德怀的重要当事人）；二是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一周内结束会议。

这个时候还发生过周惠闲话事件。中南组各省的人住得靠近，一起就餐，也常打麻将。在牌桌上周惠讲过这样的玩笑话：1958 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滑头），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到 7 月 20 日，周恩来不得不为此事专门开一次会，批评了周惠。

如果要说得形象一些，当时庐山会议的形势，正是密云不雨，气压很低；或者如每天常见的窗外景观；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

面目。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7 月 17 日下午五点到夜十点，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其中四人是《议定记录》的起草人。胡乔木与田家英不消说，在毛泽东身边已十多年，其他三人，应当说，当时也是很受毛泽东信任的或看重的。这次谈话，还是毛泽东谈得多，也谈得很融洽，最初大家还议论了他的《返韶山》、《登庐山》那两首诗。一起吃饭，喝茅台，还敬了酒。下面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按记录本上一条条记的（括号中的话是笔者加的）：

关于总路线，真有 70％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 30％也不得了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昨天晚上我谈了（指组长会上）：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这里讲的右派，很可能是虚的即打引号的，但也可能是实的即不打引号的。近三十年之后，写到这里，我也无法肯定是虚是实，请读者和史家来研究。据笔者回忆，当时的意思是虚指的，也许毛泽东本人当时也确定不了。当然，按照后来历史的发展事实本身来确定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也无不可。）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韩哲一、宋平），正面有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这是承认管理经济比革命难。）

六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这是 11 日夜谈话时，我们三人的建议），使之不成体系，免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之所以搞“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国务院

工作不满的一种表现——抓不住“主要矛盾”。在成都会议时，乔木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指井冈山时期），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这是说明自己为何要亲自抓经济的道理。）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人。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了，因为干部经过了这样艰苦的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这个话的意思，还是指1958年虽吃了亏，但取得经验，大家得到锻炼。）接着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这是指1959年落实的年产钢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指各省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密植，（关于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

关于密植这段话，是由田家英的插话引起的。1959年初，田在四川他舅舅的家乡蹲点，才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关于1958年稻子平均亩产千斤，原来都是一个口径。食堂经常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后来才查清楚，亩产只有580斤。这个现象在四川是普遍存在的。上海会议时，家英就告诉过我，他在家乡如何饿肚子。上海会议后，他又到四川调查，发现省委规定的“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只有行距，没有棵距）的高密植，社员都接受不了。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他就据此在蹲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于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反对高度密植，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最后省委还是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是让田家英所在公社可以稀一点。早在1958年10月，田家英在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调查时，就发现过小麦产量浮夸，食堂伙食很差，社员体质下降，劳动生产率低等等情况。同时还根据修武县委书记的意见，反映了公社所有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四川将近半年的调查，使他

对农村五风的情况，有了更多的感性的了解。在西南组开会时，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这些问题时，他受到组长李井泉的批评，以致讲不下去了。上山时，他领导的工作组交来真假罗世发的材料。这些当时他都直率地谈了。毛泽东不能不相信在自己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人讲的话，但又还得维护那些最忠实地、勇敢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的威信，认为他们是身挑重担的人。

毛泽东接着说：现象与本质有时不容易看清楚。万人检查团（这是“大跃进”时各地流行的造声势的方法）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群众不会当众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这两个内部刊物都反映了1958年以来的某些真实情况），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食产量估计，比7月11日夜谈的更为谨慎。毛泽东说真正高产的恐怕只有5%，一般水平的是95%。而我们做工作，只能立足于95%。因此，年增产30%是不大可能的。

谈到粮食问题时，小舟又说到全民炼铁，各种高指标，其根子在粮食估产高了。毛泽东认为也不尽然。接着他又谈到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胡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种理论的。毛泽东颇同意乔木提出的，各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的建议。说孔夫子的职业为道士，作过会计，管过田地。也同意我们说的，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我还说到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工作要统一。乔木说，少奇的意见，还是由陈云主管计委工作为好。他还反映了刘少奇的一个说法：有人在观测中央仍有两派（促进与促退或左与右）。毛泽东说，富春是依靠王鹤寿的。接着又谈到袁绍之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之后又谈到不要怕乱的问题。周惠说，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毛泽东却说，乱了才好。1957年汉阳学生闹事，

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一二三万学生想闹事不等，也不过几百万人吧。意思很显然：大乱了才好大治。胡乔木当场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脓疮需要有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此时彭德怀信刚发出。毛泽东便从彭信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华北军委分委发的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1980 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我在国务院第十组（能源系统），曾应小组同志要求，介绍庐山会议情况。谈完 7 月 17 日的召见后，大家插话说，这次谈话已经把你们几个人当作右派朋友了；你们还蒙在鼓里。当时我即不以为然。后来也曾听有的老同志谈到，上海会议时谈海瑞问题，就是"钓鱼"就是"引蛇出洞"。我认为，"1959 年的夏季形势"是否可以套用"1957 年的夏季形势"，这个问题有待史学家研究。

这是 7 月 17 日，彭德怀的信刚刚印发。从这天谈话内容以及情绪来看，特别是饭桌上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应当说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上述两封信也可为证。但对彭德怀的信（及彭德怀本人），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按照黄克诚后来同我谈过的，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相互成见很深，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上海会议毛泽东做报告，批评了一些人的时候，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跟我兄弟也是这样。"以此作为印证，黄克诚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记得 1958 年 4 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当夜我同彭德怀住在一起，在广州又同住一层楼，他除同我谈过平江起义的情况，想专门写战史这些事外，还谈到在江西时，同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如何随便：有事到他屋里去，如果还睡在床

上，把被窝一揭就是了。于是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彭德怀是“山野之人”，始终保持某些“游击习气”，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也不喜欢叫“主席”。这种性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这次找我们几个人再次谈话，关于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多说，只是顺便提到洛川会议，应当说是含有深意的：让我们知道，彭德怀这个人同他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一边去。同11日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在防止彭德怀的信出来之后，形势可能向右发展。光几个“秀才”讲点偏激的话，讲点不爱听的话，无关大局（有时还有好处）。总之，事后细细想来，17日找我们五个人作如此长谈，而且有些话可说是“知心话”、“私房话”，其原因可能是，听到“左派”们对我们有议论，希望我们能同他一条心，照顾到各方面，以大局团结为重，这样使会议能较快圆满结束。

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毛泽东正式找过哪些人谈话。田家英同毛泽东的保卫负责人王敬先（庐山会议后被调离，“文革”中去世，时任苏州市委书记）、英文秘书林克及机要秘书等，都关系密切，有什么动静，田家英都会知道。当时人们都皆知毛泽东找我们谈过两次话，都想探问，摸摸风向，这时我是守口如瓶的。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泽东这时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还说过要印发《阿Q正传》的话，意即要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

大概是17日谈话后第二天，我来到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都在。谈到彭德怀的信，我们都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很好，观点跟我们一致。我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这样写。胡乔木却讲了这样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大概

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后来听说，毛泽东同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说“现在我不发言”。此事胡乔木可能知道了。

我的《庐山吟》第四首，这样记述了第二次召见：

登楼再度群言堂，尚在闲谈新乐章。

都觉畅怀言已尽，谁知一夜落飙狂。

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和“斯大林晚年”问题

不只是对彭德怀和张闻天，就是对我这样无足轻重的人，康生也不放过。8月6日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作检查，讲到他同高岗关系的时候，说“高岗到朝鲜去了两次，谈到彭真，对延安审干有意见。”康生就插话：“彭真同志在延安审干是正确的，高岗想利用这个口号打击彭真同志，利用一些对延安审干不满的人，团结起来反对彭真同志，李锐就是一个。”康生在延安就说我有杀父之仇，此刻仍继续造谣。就在8月6日这一天，我在小组作检讨时，外组的一位同志走进来，指着我说：这个湖南老乡的历史要审查一下，他的家庭有被镇压的，延安坐过牢，高岗把他从热河带到东北去。因此，我不得不写一封信辩诬。我声明：一、我的家庭。共四口人，母亲，两个姐姐，均健在。从我出生不久直到高中毕业，四人都在长沙。二姐是38年的党员，大姐是中学教员，同情分子。两个姐夫是党员。我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1922年病逝以前是孙中山一派的国会议员，与李六如、方维夏是好朋友。我在延安被审查时，就有人说父亲是被红军杀掉的，当即由李六如作证澄清。二、我在延安被审查情况。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我在保安处被审查，原因是有人诬告，有一时弄不清楚的历史上

的问题。做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之后（还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关心），1944年6月释放，仍返《解放日报》工作。我是当时保安处几百人中最早放出来的一个。我对党从没有埋怨情绪。三、我同高岗的关系。1947年秋高岗到热河。我当时管报社，同他接触较多，替他整理过报告，并被派到农村去了解情况。1948年他回东北，我同车一起走，是为了看爱人和小孩。后来他留我做政治秘书，同住在一起。接触多了，觉得他对干部有打有拉；工作不负责，靠左右去做；根本不学习；生活腐化，觉得此人不好，甚至有可怕的印象。留了半年多，坚决要求离开。沈阳解放时，我就随陈云同志参加接管沈阳的工作了。康生的插话是登在《简报》上的，因此我要求《简报》上登一个更正，删去"李锐就是一个"这句话。这时，我已被划入"军事俱乐部"，是要打击的对象，当然不会听取我要求更正的请求了。

形势已经是动员全体与会者揭批"军事俱乐部"了，人人表态，万箭齐发。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周惠和我也作了检查。开始，都不承认有一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大家如实说明了这几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对形势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也不是有意串连的结果。黄克诚在小组会上甚至很激动地说：把他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砍了他的头也不承认。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找他个别谈了话，他终于禁不住大家的耐心帮助，最后还是承认了"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承认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黄克诚在检讨中，不止一次说了"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这话，表明他的过头的检查是言不由衷的。

张闻天与黄克诚一样，在检讨中几次说过"不管主观怎么想"这类话，他甚至这样说："第一次检讨说是动摇，同志们说，

这样检讨还不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我想了好久，主观上是没有这样想的。后来想，光从主观说是不够的，我开始感到同志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后来想”是批判、逼迫的结果。从他检讨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不承认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点罢了。比如，他说：“过去我同彭德怀同志是很少来往的。武汉会议、上海会议很少见面。在工作中也没有什么联系。在北京时，有时在中南海见到，没有谈什么。……到庐山，开始是神仙会，游山玩水。中央发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念了社会主义部分，后来会议快结束时，他说对缺点、总结缺点的经验谈得不够，应该强调一下，以便引起注意。这方面是有过些交谈。来往也就多了一些。但也是饭前饭后，时间不长。23 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后，大约到 25 日止，我同彭德怀同志又谈过两次。以后问题严重了，就没有来往了。”张闻天这番同彭关系的“交代”，细细一体味，是否定所谓“军事俱乐部”的说法的。即使是“有限的来往”，张闻天也坦诚地说清了原因：“为什么同他来往较多？一方面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了，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解释原因的这番话，同样是对着“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去的。

周小舟也是这样。他在小组会上作检讨，开始只承认“实际上起着给彭德怀同志提供材料的作用。我和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接着还要撇开一笔：“当然，他的另外一套东西是与我无关的。”经过十多天的帮助，他终于承认了“我陷入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为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要他承认这一点，真是痛苦不堪的事。8 月 13 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而解剖我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后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这一篇声泪俱下的陈情表，并没有能够感动毛泽东。由于小舟这封信中反映了我同田家英、胡乔木等接触的情况，毛泽东在这上面批的是：“印发各同志。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唯有“军事俱乐部”的当然领袖彭德怀，却始终不承认有这样一个“俱乐部”，甚至对于那些“批判”也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见。这可举出 8 月 4 日下午第四组会上的一段对话：

彭德怀：我不喜欢李白的诗，喜欢杜甫的诗。（他应当知道毛泽东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的诗，是否以此说明他是不喜欢浪漫主义的呢？）我有我一些看法，我还是要革命的。人家斗我我受得住。你斗，不开除党籍和杀头就行。就是撤职、开除党籍，我可以劳动生产。

苏振华：百团大战的后果应该想一想。

彭德怀：过去没有了解到中国战争的规律性。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没有解决。

李井泉：彭德怀同志不老实，总是讲你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是不准备印出的，是仓促写的。那信决不是 13 日晚上写、14 日完稿的，许多材料在脑子里积累了很久。（彭德怀：这是真的，参考消息装得太多了。毛泽东同志讲，参考消息不可不看，不可尽看）因此，你的信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写的。彭德怀同志讲三种可能性，说要革命，只要不杀头，也不会自杀，开除党籍，还可劳动生产，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这不是积极的态度。

彭德怀：这是过去说的。

康生：我怀疑。这是一种向中央的对抗，完全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劝彭德怀同志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我想起延安整风、华北会议，你经常说不会当反革命。当时我是社会部长，对我刺激很大，谁想你会当反革命？这完全是造谣的手段，来拒绝自己改正错误。

有人说：今天是中央委员会开会，是不是对中央全会不信任？

康生：毛泽东同志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小组也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精神进行批评。我们的批评只有不足，没有过分。你这样提法是企图堵着别人的嘴，使人不敢讲话。你的想法影响你进步，越走越远，很危险的。

李井泉：彭德怀同志还是从个人出发来看党对他们的态度，设想自己会撤职、开除党籍、坐牢，势必使自己对治自己的病放松，马马虎虎地过去。你为什么翻来覆去有那么多的错误，这应当从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去寻找，这是客观存在，犯错误的原因应从这方面找起。为什么犯了一次又一次，华北会议40多天没解决问题，原因也在这里。

彭德怀：去年人代大会后，政治局几个同志在一起，我提出不当国防部长，毛泽东同志说：现在备案，以后不准提。这次是前几天我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康生：你的思想总是从个人打算出发，当你犯路线错误的时候，不彻底地检讨错误，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何动机？

彭德怀：我的这封信是路线问题，发下去像刺猬一样，伤很多人，伤群众、伤毛泽东同志。只是一封信，如打仗要流血的。

李井泉：我们对你确实是好意，没有个人恩怨，没有报复的目的。这叫过五关，五次了，你应当忍痛过去。

彭德怀：我没有那样想，那样想就不来开会了。

彭德怀在八中全会上发言，虽然也说了“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

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但这只是在高压之下不得已的表态，完全是言不由衷的。他接着说俱乐部的“具体事实，就表现在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从他叙述的这些具体事实中，人们实在得不出一个有组织的“俱乐部”的印象。如果说，在庐山，他还这么应付了一两句，那么，在紧接庐山会议后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就完全不能接受“军事俱乐部”这个提法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逼他老实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他火了，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后来，彭说过自己的心情：“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为了动员有关的人出来揭发彭德怀，会内会外都有人做工作。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这种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什么事不能做呢？

批判升级之后，我受到的压力也随之升级了。3日下午的小组会上，一开始组长就要我对上次会上所提的意见作交代。我还很纠缠，“思想不通”，说：去年“大跃进”，最根本的是解决了速度问题，没有群众的发动，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速度。我从来是这样看法。

有人说：我承认你讲过速度问题，但是你举例说湖南小高炉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发展快了。

有人说：李锐对速度是怀疑的，你现在说是解决了速度问题，实际上你谈的“出轨”、比例失调、数量与质量等等，都是在实际上怀疑发展速度。

我解释说，第一次发言我谈了许多正面问题。曾以电力的发展为例，八大规定的指标今年就接近完成了。认为总的速度至少可比八大的指标快一倍。当然，我也说了，去年对一些过高的指标，我一直是有怀疑的。

关于“以钢为纲”口号，我说，在武昌会议时，我同别人谈过：没有这口号，群众不能发动，但这口号不完整。钢容易上去，小土群容易上去，机械可是难办，问题多。在庐山，我在小组会上谈过，今后以不用“以钢为纲”口号为好。对“1070”我也想过，以为少一点，例如800万吨，可能情况会好些。我认为这并不是对大办钢铁持否定态度。

我谈到，今年五六月间到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看到的农村情况是好的。只是联系到本部门工作的情况，感到有些紧张。上山前脑子里装了许多问题，例如哈尔滨电机厂由于让路，积压各种成品半成品8000万元，而全厂资财总值为1.1亿元。比例问题，平衡问题等等，脑子里装得多些。

有人问我：你说庐山会议不让讲缺点，对讲缺点有压力，究竟怎样想的？

我说：我是从这一件具体事来说的。田家英在小组会上谈到

他在四川所见到的公社工作中的缺点，被组长批评了两次，有一次批评得还很严厉。

有人问：你是代表田家英讲话？

我答：这样说也可以。

有人问：你去年对中央的方针实际上是怀疑的，是不是这样？你必须从思想上真正弄清楚。

一下午的对话，我没有来得及回答大家的所有批评和问题。第二天上午接着开小组会，我说，上山时，思想是混乱的，对总路线的看法有矛盾。在具体工作中遇到一堆具体的问题，如指标过高，屡次下降，造成被动。对冶金部的意见多些，感到一机部的困难很多；但实际上对冶金部的情况并不清楚，冶金部也有困难，担子重。昨天我讲过1070万吨是否少一点为好？我对“以钢为纲”口号是有怀疑的。至于浮夸风气，在自己的工作中感到并不那么严重。上山后，听到这方面一些事情。对综合平衡，比例速度，认为应当有个框框；没有想到，总路线的执行只有一年，到底应当有个什么速度，还要在继续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来解决。但总感到速度应当有个框框，否则计划不好安排。

关于质量与数量的问题，在第一次发言中，有一个想法：总认为质量、品种、规格不解决，有数量也不完全解决问题，这是从我亲身工作中体会到的。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没有全部解决。算小帐的思想很多。离开北京时，听说由于去年计划几次变动，产品不成套，暂时不能使用的产品，所费材料上百万吨。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很混乱，很矛盾。上山时，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鹤寿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当前有松劲危险，我是毫无所感的。对几个月来各省的同志向群众、向党内作了多次检讨，我也没有去了解。去年“以钢为纲”，1100万吨，几千万人上阵，解决了“大跃进”的速度问题，推动了全党办经济，管工业，推动了公社的发展，地方工业的发展，小土群推动

了小洋群的发展。这些道理过去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在思想上被那一堆问题、缺点挤下来了，因此我就不像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一样，站在几亿人民的立场上、总路线的立场上，从继续鼓足干劲方面来看问题，而是站在总路线的外头，对一些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还指手划脚加以指责。在这样一个右倾思想抬头，向党进攻的紧急关头，自己动摇起来，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去了。

接着谈了同周小舟、周惠的关系问题：南下到湖南后，周小舟同志是宣传部长，我是副部长；后来他去湘西了，我接替他的工作。周惠同志1940年在延安时就熟的。我们开始都在中南小组。我去小舟那里打过麻将，扯过话，主要是谈些湖南情况。“插红旗、插白旗”的问题，是小舟跟我说的。插白旗的省粮食多些，插红旗的省倒少些。小舟谈过，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之后，关于粮食问题，他同王任重同志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一个估产高些，一个估产低些。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在场，也谈过高指标是上面压下来的。还有密植问题，四川较密，湖南较稀。在会议过程中，也谈过有压力的问题。这一点，田家英同志在四川的经历以及同李井泉同志的争论和受到严厉批评，使我产生这种感觉。关于7月11日、17日，毛主席找我们谈过两次话的情况，为了避免受到“歪曲毛主席意图”的指责，我是这样分析和说明的：毛泽东同志发现我们的情绪不正常，因而鼓励我们讲话，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思想上的牛鬼蛇神放出来。我承认，第一次的发言有怨气，情绪是根本不对的。对已经解决的问题，对冶金部、对计委、对华东600万吨大加指责，这与整个会议精神是不对头的。

于是就有许多人插话：毛泽东同志说牛鬼蛇神（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说），你恐怕有，有就讲出来，要讲彻底些。等等。

我继续说：讲一下彭德怀同志的信的意见。我对彭德怀同志是一般的认识，在延安有过一次接触，为《解放日报》的一篇社

论，去杨家岭找过他。当时他问起我本人的一些情况，因我刚从保安处放出来不久。记得他讲过一句话："光荣的孤立是很难的"，印象很深。去年去广州开会，在汉口时与彭在一个地方住，晚饭后和他一起散步，我并没有提起在延安找过他之事，他问起我哪儿人，我说是平江人，他就讲了平江暴动的经过。我与彭德怀同志单独接触就这两次。在我的感觉中，彭有朴素英雄的印象。对彭的历史只晓得百团大战的事。对彭的信，接到后，曾在两个地方闲谈过，同田家英谈，他们是觉得信有问题的。说彭伟大是在周小舟处讲的，旁边有人听到。意思是彭将问题尖锐提出，觉得总的精神是好意。只是觉得这信词句上提法上有些地方不妥当。主要是信中有不少与自己思想共鸣的东西。如虽不同意浮夸风吹遍各部门，但觉得去年浮夸风是一个问题，去年有些东西是"左"了，对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具体领导，也觉得是个问题。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没有很好解决，以及应当系统总结经验。我的第一次发言，只讲了彭德怀的信作为对立面提出，引起深入讨论，精神是好的，内容上有些问题。说彭伟大，说我基本同意此信，是后来作检讨，暴露自己思想时提出来的。

接着谈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黄是南下后湖南的省委书记，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三年，感到他谨慎、朴素，印象很深。我调北京后，每年到他那里看望一二次。最近一二年来，工作忙，没去过。18日晨恩来同志召开大会前，接到小舟电话，约我去看望黄老。我去得较晚，小舟、周惠已在，大概谈了会议中的压力问题。彭德怀与黄克诚住同一所房子，去开会之前，彭走进房来，谈到他的信，黄提了一下："你的信问题很多，漏洞很多。"彭说：我的信是独立创作，假如你来了，我会跟你商量一下。

23日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思想很震动，才知道彭德怀的信是严重政治性问题。那天晚上我在小舟、周惠处，大家心情沉重。小舟一下不能转过弯来，还说问题是不是那样严重？我的思

想比较混乱，但问题到底怎么样，也不太清楚，感觉要经过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小舟情绪有些紧张，打电话约黄老谈谈，我们三个就到黄那里去了。黄说："你们不要紧张，彭的信是有问题，你们的错误应该检查。"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正要走，彭德怀进来了。房子里凳子不够，我们站了起来。彭说："我的信是写给毛泽东看的，不是要他发的。"讲了一下当天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散会出来，他们碰到时谈话的情况。这时我心里有些紧张。听彭谈了几句，大概十点多钟，我们就走了。这种行动是会引起怀疑的。30日毛泽东同志又找黄克诚、小舟、周惠和我谈了一次话。

我在庐山的思想过程大体如此。对彭德怀的信，有两个阶段：23日以前是共鸣；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我列席了31日的常委会和8月1日常委会，听了常委同志对彭的本质的彻底揭露，我才知道彭是怎样一个人。一年多来，我担任了毛泽东同志的兼职秘书，中央会议参加的比较多，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同我谈话，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应当了解的较多的。但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在这次大风浪中严重摇摆，对去年大跃进，对伟大群众运动泼冷水，错误是非常严重的。这点非常痛苦。毛泽东同志这次一共和我们谈了五次，为了教育我们，用心很深。但到8月1日那次谈话，我还向毛泽东同志说，去年1070万吨是否少一点为好，可见我之顽固、动摇到何种程度。当时他严厉批评了我，说我斤斤计较。现在我对彭信的看法同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对大跃进的攻击，对总路线的攻击，对党、对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我这一次的动摇，根本的问题是：我虽入党时间比较长，但我是一个未经过很好改造、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经过群众运动的锻炼。不要说在广大群众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同左派同志呼吸与共。

我平时在工作中，看困难的一面多一些。最严重的是常自以

为是，对总路线实际上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总路线的根本问题，是发动群众，鼓足干劲的问题，多快好省是与群众路线分不开的。只有鼓足干劲，发动群众，才能力争上游。自己总觉得多快与好省有矛盾。自己在这方面是并不通的，对总路线这个根本的问题，体会得很不够。对数量与质量的问题，也还没有完全通，认为可以在今后计委的会议上再去解决。特别向鹤寿同志提一下，去年钢材与钢是不大成比例的。钢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 66%，而钢材只增长 26. 2%。第一个五年计划钢的成材率是 79%，而去年是 56%，今年上半年是 67%。（这时还讲这些具体问题，可见我的"顽固立场"。）

最后，我说：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愿意进一步作检讨。

我说完以后，小组共有 15 位同志相继发言，对我提出批评和问题。据《简报》的综合，他们的意见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点：

一、说我开始暴露了一些思想，有进步，但暴露得很不够，检查得很不深刻，没有接触到根本的本质的问题，对我的发言是不能满意的，还不能过关。

二、说我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个立场问题。庐山会议是大是大非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站在错误的一面的，已经离开总路线走得很远了，而且已上了反总路线的阵，已陷入"军事俱乐部"而不能自拔。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划清界线。

三、说我骄气很重，态度傲慢、狂妄，目空一切，有对抗情绪，怨气很大。自以为颇有先见之明，但没有被重视，被接受。还有人说我有宗派情绪，什么插红旗的省指湖北问题多，插白旗的省实际上是指湖南问题倒少。

四、说我的检查总纠缠在一些具体的枝节的问题上，对思想、活动躲躲闪闪、含含糊糊、零打碎敲，态度不老实，不诚恳。还说我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毛又找我们谈了三次，我又列席了两次常委会，小组对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仁

至义尽了，应该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把思想活动和盘托出，站在党的立场，划清界线，彻底检查交代。

8月6日上午继续开小组会。首先是我发言，回答前天会上对我的意见和批评。我说：上庐山以后，前一个阶段在中南小组，与周小舟、周惠有些接触。上次会上已谈了一些情况。红旗、白旗，是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他们告诉我，是谭震林在广州一次会上给湖南插的白旗。

刚说到这里，就被人打断了，说：你今天第一句话精神就不对。不是因为同在一个小组里，你才和小舟、周惠有接触。

有人接着问：庐山会议的前一段，你经常与周小舟同志来往，并放出庐山会议有压力的空气。究竟你们都讲了些什么？当中彭德怀同志曾与周小舟两次谈话，他们讲了些什么？黄克诚同志头一天上山，第二天清早你们就在黄那里聚会，又讲了些什么？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你们感到很紧张，当天晚上又在黄克诚那里聚会，这两次彭德怀都参加的，都讲了些什么？要交代清楚。

我接着交代：关于湖南的情况。现在记得起的，他们谈过这样一些事情：去年高指标，湖南钢铁高潮是由对粮食估计比较乐观引起来的。食堂的原则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谭震林曾倾向于自愿参加，小舟也是这样的意见，周惠则有不同意见。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省委稍有不同意见，与中央通了电话，中央同意湖南根据实际情况去办。对粮食分到户，他们在做法上也有不同意见。湖南的粮食分到生产队、食堂，只是指标分到户，粮食并不分到户。对会议有压力，我们几个谈得比较多。周惠同刘建勋等人一起开玩笑，后来传成省委第一书记有三种人……

接着有人问，是哪三种人？我说：一种是老老实实讲假话，一种是对情况不了解，一种是讲了假话。周惠对刘建勋开玩笑说，去年广西放卫星，一天生产20万吨生铁，登了《人民日报》，第二天又给中央打电报作检讨，名利双收。我听到王任重同志在小组

会上检讨，过去老老实实说了假话。以后三个小组都责问周惠。

于是有几位同志连续向我质问：照你刚才说的话，你听了周惠说的就相信了。现在要划清界线，不要这样解释了，要和盘托出。

谭震林、曾希圣为这事在恩来同志那里拍了桌子，追问三类什么人。后来就改称为三部分人。

这话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后的话。你又不在场，怎么能说是开玩笑呢。

我说：我记得清的就是这些。当时感到这是开玩笑。后来周惠为此事受了批评，我错误地认为这就是压力。

我过去与黄克诚同志在湖南一起工作，对黄的印象很好。前几年，有小事情，如为水电工地要旧汽车，去看过黄一两次，最近一两年没有去过。18 日早晨，恩来同志召开大会前，快 9 点了，到黄那里，看到小舟、周惠在黄那里吃早饭。谈到浏阳有人给黄一封信，大概是反映这个县的干部作风问题。还说了一些湖南情况。快到开会的时间了，就住在黄对面的彭德怀夹着本子过来了。我又再次说到，黄对彭说，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这样讲，漏洞很多。彭德怀说，你如果早上山，我会找你商量的。

23 日以前，我已将彭德怀意见书看了两遍，感到只是在提法上，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处，有些疑问。这在当时也和别的同志谈过。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并不完全是支持。记不清哪一天，到小舟、周惠那里，在座还有王任重同志，谈起彭的信，大家表示了一些同意的看法。我说了一句“彭总伟大”，别人不敢写这样的信，信很尖锐，对引起讨论有好处。当时还谈到了会议的缺点等等。

毛泽东同志于 11 日找小舟、周惠和我去谈话，17 日找小舟、乔木、田家英和我去谈话。毛泽东同志是知道我们脑子里有问题的，气味不对，鼓励我们有问题就讲出来。毛泽东同志还从《三

国演义》谈到密植，要求不要太密。总路线，如果有30%坚决执行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随大流，也不会有问题。第二次谈话时，田家英比较长时间地谈了他在四川一个公社工作两个月的情况，谈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产量要落实的一封信，他所在的公社传达了，周围的公社却没有传达。有一个四川有名的劳动模范反映，去年产量有虚假。我听了这些情况，总认为有浮夸风的问题，这对我第一次错误发言是有影响的。听了毛泽东同志23日针对彭德怀的信的讲话，我感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我到小舟那里去，谈到讲话，小舟说：问题是否要提得这样严重呢？周惠也谈到与小舟在工作中有争论，小舟保守一些。刘澜波也对我说过他们同组别人的反映：小舟的发言关于彭信的说法不对。这时我的思想也还是模糊的，因为我也偏到彭信的一边去过。不过，我想，既然毛泽东同志讲话了，当然问题是有这样严重的。

有人插话：对小舟的这种态度，你怎样表示的？

我接着说：小舟感到有些紧张，想找黄克诚谈一谈，就给黄打了个电话：可不可以来？李锐、周惠都去，好不好？这已经是九点多钟，比较晚了。大家去了之后，小舟谈了心情，一下转不过弯，还有抵触情绪。周惠好一些。我没有表示什么抵触，就是思想很混乱。黄克诚对我们说，不必紧张，彭的信是有问题，你们发言有错误，要检讨。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去年钢铁指标高，湖南是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在西北小组发言，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有人问：周小舟、李锐两人都说到钢铁指标高是由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的发言也是如此，以前你们是否谈过？

我说：我曾错误认为，1959年原来的钢铁高指标是华东600万吨带头的。过去好像感觉大家觉得粮食无后顾之忧……

有人问：谈到比较紧张，怎么一下子又转到了粮食问题？我答：记不清楚了。又有人说：一提紧张，又说到粮食问题了。

我接着说：两次到黄处，记不得哪一次，黄克诚还谈过，北戴河会议时，他同柯庆施、王任重、小舟谈过公社问题，说公社暂时挂个牌子好了。

又有两位同志插话：粮食也讲了，公社为什么不讲？

我接着说：我们要走时，彭德怀进来了，黄的房子较小，只两张沙发，两张椅子，我们都站起了。彭谈到当天散会时他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经过，说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看的，不是要印发的。我们三个不想再坐下去，就走了。因为不是住在一处，走出门口我们就分了路。一出门小舟就遇见了罗瑞卿。28日我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说我是迷失了方向，偏到中间派的右边来了。认为彭的信只是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还没有朝反中央、反毛泽东同志这方面去想。同志们对我的检查不满意。30日一早，毛泽东同志找黄克诚、小舟、周惠和我谈话。主要是问黄克诚一军团、三军团的事，黄与彭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单刀直入，问是否父子关系？黄谈了自己在三军团的历史，反对过立三路线，被斗争过、撤职过。与彭的关系，批评过彭，与彭的意见并不都一致。又说了第二次王明路线时他的情况。又说了在北京工作中，也与彭不完全一致，但两人感情是好的。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政治与感情可以不统一的说法，指出这样说是不对的，说人的意志、思想、感情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还提到湖南集团，我们四个听了感到很紧张。黄解释说，过去是同事关系。毛泽东同志又谈了交心问题，对小舟的意见多一点，说他格格不入。对我的批评是发言的气味不好。我谈了一下自己思想情况，开会前一阶段同小舟、周惠谈缺点多一点。谈话以后，为湖南集团问题，我心情很紧张，一夜未睡，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信，交代这件事。信中检讨：这一年多来，挂名秘书，参加中央多次会议，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多次，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应当有更多的体会。但到庐山以后，同情彭德怀的信，小组发言的精神不对头，乱讲一些话，

严重右倾，严重自由主义。内心很痛苦。湖南集团的事情……

有人插话：是湖南派。

我接着说：湖南集团的事情，我交代同几个人的关系。同彭德怀的接触，只是去年去广州开会面谈过一次。同黄克诚的关系，在湖南一起工作，尊重他，信赖他，同他谈过两次心里话。一次是1950年，谈高岗的干部政策不好，这是看到韩进被开除党籍一事引起来谈的。1948年我当过高岗半年多政治秘书，由于对这个人不满意，才坚决要求离开的。黄克诚听我说了之后，即就干部政策作了一般的解释。1953年安排高岗为计委主席，我以为中央如此安排不妥，和爱人议论过，曾想给中央写信，又不敢写，就去找黄克诚谈。这一回较多地谈了我对高的看法。黄克诚说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担任了兼职秘书，工作又忙，即没有再去过黄克诚那里。同周小舟的关系，当时在湖南，周是宣传部长，我是副部长，后来接替他的工作。周惠在延安就认识。这次开会的前一阶段，对于要多谈些缺点，是气味相同的。两次去看黄克诚，彭德怀也去了，谈的内容已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简单写了。31日早晨五时，把信送去。上午10时，毛泽东同志召开常委会，谈彭德怀问题，黄、二周和我四人列席。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你的信已经给常委传阅了。会上谈彭的历史情况。散会时毛泽东同志留下“湖南派”（大家觉得“湖南派”比“湖南集团”更如实些，我就马上改口照讲）吃饭。第二次常委会，会后又留我们吃饭，谈了一阵。我又提出去年1070万吨是否可以少一点，毛泽东同志批评我“斤斤计较”。上次同志们批评我这是向毛泽东同志进攻，从我的内心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同志们批评我有宗派情绪，红旗、白旗问题。还有同志向我提过，两湖水利纠纷，有无这种情绪。这次同小舟、周惠接触多一些，对湖南事情感情多一点，我承认自觉不自觉有这种宗派情绪。5月4日至6月15日，我到了四个省，原来思想上有病，对去年大跃进中某些事情有怀疑，纠缠在1070。

内心感到人民公社是否快了，会议前一阶段感到有压力，向党要民主，这一系列右倾思想，形成我对总路线的动摇。我只觉得这次虽犯了严重错误，但是还没有什么个人意图在内。我是愿意暴露思想的，如说“彭总伟大”，基本同意彭的信，是28日检讨中谈的。以前纠缠的出轨或翻车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大跃进”的怀疑。我的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热情，没有站在几亿人民的立场来看去年的大跃进。这种动摇状态，碰到彭德怀同志的信，就暴露出来了。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指出，同志们的帮助，我的认识才改变过来。不过我原来根本不了解彭德怀写信的意图，是有意向中央、向毛泽东同志进攻。但我的发言确起了呼应的作用。有的同志说，是否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摸气候，押宝。我要说明不是这样的。庐山会议原来要谈的十几个问题，好多就是我思想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是鼓励我们有话讲出来，他对彭信有什么意见我并不知道，也没去试探。我最近才听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找我们谈话以后，小舟很高兴，同别人谈过，我当时是没有同别人谈过的。

我说了这些，马上就有好几位与会者抢着发言，分析批判起来：

——感到同我们之间有异己感。从火车上就进攻总路线，不仅上了阵，而且是打先锋的。“以钢为纲”，你是不赞成的，几个“元帅”升帐，你是不赞成的，全党全民办这办那，政治挂帅，这些口号你都反对，1070已经超过，而且拿到手了，你到今天还在怀疑，人民公社你也有怀疑。从你的一系列的语言、活动上看，你是系统地反对总路线的。

——已经进了军事俱乐部了，也是反对总路线的，你对人民公社、大跃进、1070、比例关系都有意见，这一联系就联系到总路线。这一次来庐山，你说带来了很多关于比例关系的资料和本本，显然是准备进攻的。

——彭德怀根本不认识李立三、王明，却拥护立三、王明路线。你说和彭德怀同志不熟识，却可以说他伟大。你说你和黄克诚、小舟很熟，常去看他们，但是还有人也和小舟很熟，给小舟打了几次电话，小舟就是推故不见，这怎样解释？

——你们一次两次去找黄克诚，为什么不找别人？

5日上午的小组会上，还有人发言说，我两次发言都“没有把根子挖出来”。而且把我作为这个小组里的“碉堡”，说我如果不把自己的观点和问题全部交代出来，那么“小组里的碉堡就没有攻下来”。

以上我将小组会上自己的几次检查，如此不厌其烦，罗嗦而重复地录出，目的就在如实反映过去政治运动中，挨整的人过关之难。

会上耐心帮助的同时，会外也在收集我的材料。1958年11月，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我曾应邀率一个代表团去过苏联，同留学生有过一次谈话。一份驻苏大使馆党委从留学生那里得来的反映（大概曾刊外交部的内部通报），8月8日以《李锐同志在苏联访问时的一些言论》为题，作为会议文件发下来了。不到600字，没有多少内容，可以跟当时的批判话题扯得上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对留学生说过，“中国现在有点乱糟糟，开始提出1070万吨钢时，中央也是没有底的”。我当然懂得，发这个文件，目的并不在于揭发我多少材料，而只不过是发一个通告，表示把我列入“军事俱乐部”了。只是这个几百字的材料也与事实大有出入（写这个材料的人是水利部派出去的一位实习生），我看了之后，就向会议秘书处写了说明，可是也没有更正。

回忆起来，也有使我至今感动的事情。还在会议初期，一次同工业各部部长游山，大概是在植物园，大家谈到在农村的一些困难情况时，我冒了一句“中国的农民好”，意指要是在东欧，早闹事了。走在旁边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听到了这话，没有作

声。到小组会斗争我的高潮中，他将这话悄悄告诉了刘澜波，却没有在会上揭发，显然是有意包庇。这位保护过我的同志后来于“文革”中惨死。前述回忆刘澜波的文章，其中也写到了这件事。

我在 1980 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发言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这十多天我没有再到饭厅去吃过饭，犹如一个病号，饭送到房间里，吃得很少，任何佳肴美味都食之无味，睡得也少。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参加会，勉力作点记录。我的悲观情绪，田家英是觉察到了的，以致我常用的安眠药，后来都受到控制。

8 月 10 日一早，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让我到黄克诚组去对证一件事。有人写信揭发，说我曾两次同黄克诚谈过高岗的问题，黄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1950 年在湖南，1953 年初（高岗刚被任命国家计委主席时）在北京，我确两次同黄谈过高岗的问题。1948 年我曾当过高岗 8 个月的政治秘书，住在他家里，根据直观，对高岗的思想、作风、用人和生活等方面，很有些看法。第二次尤大胆谈到中央这样安排不当。黄克诚和高岗的关系，正是大家追究的题目之一。关于 23 日夜我们三人到黄克诚处活动之事，当时都认为是一个没有“突破”的口子，如上面《简报》中的反映，对黄克诚和周小舟都逼得很厉害。

这个组里有人一直追逼，说黄克诚没谈什么新材料，并以张闻天已经交代了一些新东西，作为逼黄的理由，说黄克诚知道的应当比张闻天多，应老实讲出来。所谓“张闻天交代”一事，是 8 月 9 日下午第二组的会上，关于同彭德怀交谈过什么，张闻天被逼作了这样一些“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

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说到这里，会场顿时惊讶不已），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

黄克诚被一再追逼，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1）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给他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但说，彭德怀没有讲"犯了错误不认帐"这句话。（2）彭德怀给他谈过"集体领导问题"，但没有讲"常委会都是主席一人讲话"。（3）彭德怀过去曾给他谈过："主席说要下毛毛雨，但给送去文件又不看。"（4）彭德怀没有同他说过，"去年 9 月以来出了'左'的错误"，只说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的话，说不清是彭谈的，还是自己讲的。（5）彭德怀给他说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的话。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 23 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 23 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特别强调了黄如何批评我们，认为我们情绪不对头，有错误就应当好好检讨。"斯大林晚年"这话却不是我说的（"一手遮天"这四个字我仍没有交代出来，大家也都忘记了）。我说我并不想逃避责任。黄克诚没有记错。肯定是我们三人中有人说了。

就在我讲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施加压力，说什么"防线守不住了，已经有的材料也可以做结论了。现在看你们的态度，你趁早痛痛快快讲了算了"。"你们在党面前讲话这样困难，你们在一起就无所不谈，你们还有一点党性么？""你们不保护党，就只想

如何保护你们那个小集团，这样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想订攻守同盟，自以为很巩固，其实哪能守得住！不信，就看吧。”

我讲完之后，陈正人马上到周小舟所在组，问周小舟：黄克诚已交代，你们三个人 23 日晚上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会出乱子，你说了没有？小舟答：“我说了。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个错误。”李富春、廖鲁言都问：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么？小舟说：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反“左”到反右。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陈正人随即回来，说周小舟承认了，这话是周讲的。这时，薄一波为我解了个围：李锐的问题，由我们组织工交几个部的同志来解决。

在黄克诚和我作交代时，会上不断对我们批判和揭发。罗瑞卿讲了一大段话（我特别记得他对黄克诚疾言厉色的神态）：你们是不是把彭德怀、黄克诚同志那里变成了反党司令部，变成搞阴谋活动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黄克诚同志，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你们究竟要搞什么鬼？你们不是正人君子、一贯正确吗？周小舟刚才在那个小组会上讲，他们在你家里议论过现在像斯大林晚年，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可是他还骗我们说，他虽然说毛泽东同志是晚年斯大林，他还是爱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我顶他：你说这些话，脸都不红一红吗？像你这样的拥护者，如果多了几个，那还得了！克诚同志，你说你给他们泼冷水，这就是你的正确吗？是不是说他们：你们别把我这司令部暴露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周小舟刚才讲，承认他们分裂党，周惠承认他们订了攻守同盟（24 日或 25 日订的）。李锐你们几个要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是不是要“逼宫”？有人说，李锐的尾巴有 1 万公尺

长，我看至少有15000公尺。以前我对你印象好，但感到你有一股气味"逼人"，那么骄傲，狂妄，连毛泽东同志都不放在眼里。

8月10日这一天，是揭批"军事俱乐部"中突破最后"堡垒"的一天，在三个临时小组中，都是上午开始揭开所谓"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的。

8月10日下午和晚上，临时第二小组组织少数人继续开会追逼周小舟同"俱乐部"主帅的关系，以及"斯大林晚年"问题。

陶铸、廖鲁言等问周小舟：你说基本同意彭的信，又说与他基本不一致，彭的信中提到粮食与钢铁的关系；全民办钢铁；人民公社搞早了；不讲缺点，有压力，民主不够；浮夸作风；认识过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纠"左"比纠右难，你同意哪些条？

周小舟：前五条基本同意，后三条不同意。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讲一部分干部我同意，讲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我不同意。

陈正人：黄克诚同志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锐三同志说，现在是不是达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没有集体领导，现在反右会不会出乱子？这些话你都说了没有？

周小舟：我说了。23日晚上到黄克诚同志那里，我心情紧张，李锐和我讲的多，周惠讲的少。讲到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是什么道理？这样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18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当时黄克诚同志说，不能这样看，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这点黄是对的，正确的。这两句话不敢讲出来，当时有一种心情，准备向毛泽东同志自己讲。

有人问：你们想向毛泽东同志讲，目的是什么？

周小舟：我们是想向主席进忠言，觉得主席的批评过分了。

李富春：就是实际上给彭德怀同志打抱不平。

周小舟：是有这个意思。

罗瑞卿：算不算阴谋司令部？

周小舟：我说不是阴谋司令部。

陈正人：你说不是阴谋司令部，为什么在黄克诚同志那里敢讲，而在其他地方不敢讲？你回答。毛泽东同志说是反对派、湖南集团，是毛泽东同志错了，还是你错了？

周小舟：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湖南派，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毛主席的。8月7日上午我与周惠同志讲过，我们这次犯了错误，但我是清白的，我与反党集团无任何关系。但我与彭、黄、张谈过话，我的问题洗不清。第二，我是爱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如果一时搞不清，我估计关起来，或许杀头，但我绝对不会自杀的。第三，你回去以后对我的小孩子关照关照。当时周惠同志讲不至如此，问题最后是可以搞清楚的。我的心情是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总路线的。我也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毛泽东同志讲话有抵触情绪，认为批评彭德怀同志的罪名大了、重了。因此，我说毛泽东同志是否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了。

廖鲁言：你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一点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不知是什么心情？

周小舟：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错误。

李富春、廖鲁言等问：斯大林晚年是什么意思？

周小舟：直接形成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

8月10日临时第四小组开会，彭德怀首先作检查，随后与会者发言，追问彭与张闻天、黄克诚的关系，其间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

彭德怀：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我只讲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

有人插话：你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古书，很厉害。

彭德怀：我讲过毛泽东同志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中国革命中是很厉害的人。这个我讲过。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他还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

李井泉：他讲的你赞成，你讲的他赞成，这不是共同的吗？

…………

李井泉：你与黄克诚究竟谈过这些问题没有？你们的关系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彭德怀：工作关系多，谈别的很少。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小组会还没有全散，人们还在继续追问黄克诚时，我看着薄一波离开会场，由他主持，有刘澜波、张霖之、彭涛、孙志远、吕正操等几位同志参加，听我的交代。其实有关的种种情况，我同二周与黄老的关系，在山上的来往，这个爆炸性的“晚年”捅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最担心的是同田家英（也还有胡乔木）的来往，再这样被追逼下去就复杂而麻烦了。田家英也在第五组，当我退出会场时，我见他是面无人色的。一方面觉得不能再牵连他们，同时也认为，这样对主席有什么好处呢？把我

们之间那些议论都揭发出来，主席身边多年最亲近的几个秘书，对老人家竟有这样一些看法，这对主席的威信也毫无好处。可是关于我同田、胡间也有活动，第二组的《简报》上已有反映。于是我就先单独同薄一波谈出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周、黄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一波很同意我的想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即写篇自我揭发的检讨。于是解决我的问题的小组会也就无必要开了。11 日上午我交出检讨，检讨由薄一波看过。他在"对彭德怀的信起了呼应的作用"之后，加上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句。这是当时毛泽东给张闻天信中用过的话。我把帽子戴的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题目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 23 日夜晚的活动："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30 日夜晚写的信，"还欺骗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由于思想、立场相同，有反党活动，同黄、周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俱乐部的一员"。同主席的两次谈话，小舟早已同别人并在第五组谈过，为了避免引起诸如此类的误会：难道是主席鼓励你们鸣放吗？我是这样写的："主席了解到我们这种不正常的情绪之后，便鼓励我们发言，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将自己的牛鬼蛇神放出来，公之于众。"这也算是我当时的一点"苦心"吧。从延安起，就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说实在的，我对毛主席一直是极其崇敬的，至少有一本《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为证（此书写于 1952 年，有英、日等外文译本，为国际公认研究毛泽东早年的必备书）。现在也没有失去这根本一面，这有《龙胆紫集》为证。（这是秦城监狱中八年作的旧诗词，《庐山吟》等即引自此集）。只是不能一切盲从，遇事保持自己的一点独立思考而已。为了"主客观"的一

致，我一开始就写道："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结果他 13 日写的交代材料，如前所述，被主席批示："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可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呵！"扑朔迷离假与真"，确是自己的深切体会。毛泽东同我们几个人的头两次谈话，小舟曾跟罗瑞卿等人谈过，结果后来遭到"假传圣旨"的指责。

当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相提并论，确实引起义愤，一般都认为是一种诬蔑，绝对不能接受的。保卫总路线，保卫毛主席，这已是会议中惯用的口号语言。只有我们这些狂妄之徒，如此斗胆私下议论。因此，8 月 10 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参加第二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已经听到彭德怀和张闻天之间谈过这个话。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1) 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2) 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

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大家坚持建议不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意见。(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了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最后，胡乔木从恩格斯《论权威》一文，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胡乔木发言时，好些人插话。康生插了几次，有一段这样的

话："彭德怀同志有反动的一面，有革命的一面。现在是你反动的一面向革命进攻，革命怎能不击退你这反动的进攻？就是你自己的革命一面，如果不歼灭你这个反动的一面，你还做什么共产党员？"

到了8月13日、14日、15日的大会上，关于"斯大林晚年"的事，还有些人在追查、批判。14日的大会上，陶铸又数落了一遍：这是张闻天在"军事俱乐部"立第一功，后来是黄克诚谈的，接着又点周小舟、田家英说过"斯大林晚年"的话。15日的大会上，康生发言说：你们诬蔑主席是"斯大林晚年"，信是俱乐部的纲领。彭德怀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指责，辩解说：洛甫没看我的信，我念几句，他就走了，不是共同纲领，没同周小舟谈过。林彪马上插话说：共同思想就是共同纲领。贺龙接着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庐山可能有两个司令部，另一个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反对党的总路线。他们要中央，更准确地说，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做检讨，因为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同志犯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这还了得，非改变中央领导不可。这次会议维护了党的总路线，特别主要的是解决了党的团结这一百年大计的问题。更不能容忍的是，污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到了斯大林晚年的情况，党中央已没有集体领导。这些恶毒的攻击难道不更甚于罗隆基、陈铭枢等右派分子对党和领袖的攻击吗？

"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一攻破，人们的"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我就感觉到，庐山会议可以结束了。

（选自《李锐往事杂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刘西尧

从原子弹到氢弹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6月12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援助。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撤回在中国的全部专家。所有这些丝毫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和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赤胆忠心、博学勤攻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们，其中许多带头人都是从海外归来的赤子，他们满怀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激情，和全中国各族人民一道，不信邪，不怕压，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继承中国工农红军“天欲坠，赖以拄其间”的革命英雄主义，坚定地继续前进。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建国初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对我国的援助，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他们把我们卡得很紧，一片过滤膜掉在地上，也要用吸铁石把它吸走，怕我们拿去仿制。断援后，他们的人都走了，不但打掉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的依赖心理和行为，也使人们可以放开手脚了。

苏联拒援，聂荣臻提出研制新型材料的任务，毛泽东批示说“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

1959年聂荣臻副总理向国家科委提出了研制苏联拒援的国

防尖端所需新技术原料和材料，简称为新型材料的任务。为此，把原来主管国防军工协作任务的国家科委一局改为新材料局，章竞三任局长，由我分管，从此我跨入了国防科研领域。为了解决国防尖端的配套所需，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还先后成立了三个协调小组，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一机部、三机部、物资部组成的材料、设备五人小组，一个是由五院即导弹研究设计院、科学院、国家科委组成的核武器研制的协调小组；三个小组都由我代表国家科委参加。

1959 年 7 月，毛主席对聂荣臻副总理关于组织各有关部门研制新型材料的建设作了“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的批示。中共中央在批这一文件时再次指出，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原料、材料的基础上，必须下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一问题。

1960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聂荣臻和我关于研制新型材料的汇报，当场批准成立新型材料国家专案，正式组成由国家科委牵头的新技术材料小组，统筹安排，协调解决新型材料研制中的问题。会后，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程子华副主任多次亲自过问、审查、落实。原来我们提了一百多个中间试验、试制项目，当时正值三年困难，从中选出了最急需的 96 个项目正式立案。由于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有关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与生产单位的努力，这 96 个项目都如期保质保量地建成投产，拿出了合格的产品。

新型材料研制任务为什么能那样顺利的完成，我体会除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外，还有如下几点：一是使用部门与研制部门密切协作，在确定技术指标时，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双方专家经常在一起研究商讨，制定既先进又是在当时条件下能得以实现的指标，一步达不到的，分步骤进行。凡是这样做的，都较快地取得成功；反之，个别项目，因使用部门要求过高、过急，走了

较大弯路。二是在安排研究试制的同时，就安排中间生产；能利用现有工厂的，就在现有工厂中，加一个流程或车间，需要大量生产时，再另作安排，这样既省又快。三是各有关部门都成立了专管这一工作的机构，指定了专门的负责人领导，督促并协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冶金部是刘彬、陆达、李东英，化工部是李苏、陶涛，建材部是祁竣，石油部是侯祥麟，科学院是裴丽生、谷羽，电子部是王世光、何华生，一机部是陶亨咸、张树楠，还有轻工、纺织部，负责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四是参加这一工作的全体人员的高度爱国热忱和忘我的工作。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很低，而这些研究试验工作，有许多都需要日夜不停地进行，值夜班的同志就白天睡觉，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定量留在夜间工作时吃。

随着新型材料和国防尖端的研制，新技术元器件、仪器仪表和各种配套的大中小型设备的研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就是聂荣臻副总理所说的研制国防尖端所必须的"开门七件事"。国家科委又会同一机部、四机部等作了安排，并由沈鸿牵头，自行设计出我们在研制新型材料中提出的"九大设备"。"开门七件事"的顺利进行不仅满足了当时我国国防尖端研制、试验的及时需要，而且为以后我国自力更生地建设三线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把我国整个工业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足之处，是我们对整个电子元器件，特别是半导体，虽然也注意到了，但是没有提到开辟科技和工业新时代的高度予以重视，起步并不晚，却未能跟上世界的步伐，被甩在了后面。

陈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它们（原子弹）搞上去；二机部的工作表明：两三年内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

苏联断援后，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及有关建设一直没有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考虑，正如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所说的那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它们搞上去"，否则他这个

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当然这是对我国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下决心把核武器搞出来的形容语。因为没有这个吓人的东西，人家就看不起我们，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就难以大振。问题是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经济实力上能否承受，在科学技术上有没有能力，这都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实践证明，我国搞核武器并没有影响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在这方面所花的钱和核大国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进行核试验的次数也是最少的。

1961年夏，聂荣臻副总理把我和国防科委计划局的同志找到北戴河，那时我已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导弹要继续上马的报告给中央。他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支持。

1961年10月聂荣臻副总理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又派张爱萍和我在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等的陪同下，到二机部所属主要单位去调查研究，我国能否自力更生地制造出原子弹？什么时候可以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核武器研制的核心机密。

我们一行在湖南，看了两个矿山，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出铀矿，一个即将投产，都是地下开采。我们还看了苏联援建的水冶厂，已经基本建成。这是我这个祖籍湖南长沙的湖南人第一次到湖南。我们顺路到了毛泽东的韶山故居，刘少奇的花明村故居。回长沙夜渡湘江时，橘子洲头万家灯火，我不禁默念毛泽东的“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词句，更增加了一定要让我国早日爆炸自己的原子弹的豪情壮志。

在西北先看了一个浓缩铀厂。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为推动该厂早日建成投产，发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做自己人”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帮助我国建设该厂的苏联专家，他们在我们职工的影响下，一起鼓足干劲加油干，积极地向他们的政府催要设备材料。到苏联政府撤退专家时，该厂的主要

设备、材料已基本到齐，只要再解决一点零配件，就可以开工生产，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大跃进期间，该厂有的同志想改动某些工艺，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不同意，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发出了“先学楷书，后写草书”的指示，不但使该厂没有受到大跃进中歪风的影响，也使二机部事业始终沿着客观科学规律的正确轨道前进。

我们到选在地处青海高原的原子弹研制基地了解情况时，李觉、赵金璞、吴际霖等正在海拔3200米的地方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日以继夜地开始建设。他们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被职工誉为“青天”。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在那里先后制造出来的。后来我填了一首怀念那里的词《忆江南·银滩颂》：“高原雪，六月降银滩。篷帐连营来玉璞，迷津屡渡跨关山，举世另颜看。”

在那个基地开始建设以前，二机部就在北京附近简易的棚子里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我们奉命去了解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航弹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的试制、试验工作，只剩下一个技术关键问题，正从两个途径研制，且专家们认为这两个途径都有成功的把握。我凭自己懂得的一点科技知识判断，也同意这个看法。以前，苏联曾答应给我们一个原子弹的模型，后来变了卦，他们派来的专家，在他们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什么也不敢讲，我们的同志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但是，出于革命的友谊，他对我们倒不是毫无帮助的。

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经过二机部和有关各方面同志们几年的努力，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制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只要进一步抓紧时间，加强组织协调技术攻关，安排所需的配套件的研制、供应，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二机部的同志也是按这个目标安排的，但是在给中央写报告时，他们为了留有余地，建

议写三四年内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我们认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宜早不宜迟，应该尽可能抓紧时间，抓紧工作，力争早日爆炸，因此坚持写了两三年。我们确信，只要抓紧，是可能的。这样就以张爱萍和我两个人的名义于 1961 年 11 月 14 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周总理。张爱萍把这个报告送了一份给邓小平总书记，邓阅后，在重要的地方打了杠，呈送给了毛主席。

此行，二机部的工作给我以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土"洋结合，全民找矿虽然造成了浪费，但为核武器研制提前提供了铀矿，再即前面所提到的，他们不等基地建成即提前在简易棚子里搞原子弹研制，以及"土"法上马搞铀矿水冶提取二氧化铀等，都为我国早日爆炸原子弹赢得了时间；二是他们的全体职工，包括一些卓越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隐姓埋名，艰苦奋斗的高度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远值得炎黄子孙尊敬、铭记和学习的。

我们回北京后，正值流行甲型肝炎，张爱萍和我都因转胺酶偏高住进了三〇一医院。秋天恢复工作后，我又奉命给二机部和核武器试验基地增调高级科学技术专家。主要是从一些大专院校选拔，没有完全按当时仿照苏联定的从事国防尖端机密人员条件的规定，主要看是否有真才实学和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在出身、社会关系以及是否党员等问题上苛求。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做对了。

我还再次和张爱萍一起先后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作了汇报，在具体落实二机部所需的关键配套件等的研制供应方面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上海的工业技术基础再次显示出了潜力，几个关键的原材料都是上海的研究单位和工厂协力做出来的。有一个气压密封配件，东德援建的新厂做不出来，却在上海一个弄堂工厂试制成功了。我对上海是有感情的，因为我是在那里找到党的，搞国防科技有不少难题是在上海解决的。因此填了一首《清平乐·忆松江》："苏州河畔，北斗终寻见。匆返钟山催雾散，初

识风云雷电。重来地赤天红，春光普照吴淞。树大根深叶茂，新花郁郁葱葱。”

在此期间，还参与了编制发展国防尖端的补充规划，那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已经提前完成，国家已开始作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由于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发生矛盾，中央让张爱萍和我都兼任了国防工办副主任，张是管装备的副总参谋长，也兼了国防科委副主任，以便于协调军队装备与其科研、生产中的问题。邓小平又专门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来协调双方日常发生的矛盾。

为了解决国防科研和国防生产的矛盾，张爱萍曾提出国防科委与国防工业合并的意见，“文革”中受到批判。1971 年，我再进国防科委时，又提了这个意见，1974 年又受到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终于实现了国防科委与国防工办的合并，即现在的国防科工委。

周恩来先提出“三高”要求，后又指示：“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八届十中全会后，二机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在 1964 年，不迟于 1965 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两年规划。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审阅后附了一个报告，提出力争在 1964 年实现规划的要求，并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原子能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保证这一规划的顺利完成。1962 年 11 月 3 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大力协同作好这件工作。”1965 年原子能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改为管两弹，即既管原子弹又管导弹，参加人员也扩大了，办事机构仍设在国防工办。

1963 年初，二机部党组的两年规划经中央批准后不久，刘杰去广州从化休养，二机部有的同志认为“两年规划”不可能如期实现，在京党组同志反映到中央。为了弄清情况，落实“两年规

划”，周恩来总理和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三位副总理商定，由我负责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检查组到二机部检查并帮助解决有关两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联合检查组接受任务后，先在北京与各方面的专家和负责同志谈话并仔细了解了在京各单位情况，认为1961年张爱萍和我向中央军委作报告中的观点仍然是符合实际的，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是可以如期实现的。当时，核燃料生产加工已无不可解决的技术问题，前面讲过的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个技术关键，也已选定方案，在试制中。我们就调查了解的情况写了书面简报，并向总理和聂荣臻、罗瑞卿副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向二机部提出了在工作中“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后来我们把这三点要求简称为“三高指示”。我和刘杰谈话时，刘杰建议派一位较强的干部到二机部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以加强二机部的领导，我将他的建议向总理作了汇报，并推荐了两位同志。

汇报后，联合检查组于1963年3月分两路到二机部南、北两片的主要单位去进一步了解情况，落实问题。我先到南面，然后到兰州，拟再去青海，回头再到玉门。刚到兰州，接到先去玉门的检查组同志发给我并报总理的电报称，按苏联工程建设经验推算出来的“绝对工期”计算，玉门厂不能按“两年规划”要求如期拿出产品。我见报后，立即回电并报总理：“我即去玉门，查明情况后再报”。到玉门后，我把有关人员都请来，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玉门厂厂长周秩为首的多数同志认为苏联所谓的“绝对工期”并不绝对，是可以打破的。经过他们仔细陈述和现场实地考察，大家统一了认识，肯定“两年规划”中的要求，在玉门厂也和其他单位一样，只要认真抓紧落实，是可以如期实现的。我把这一结论立即电报了总理并专委，至此，北京、戈壁关于“两年规划”能否如期实现的疑云都驱散了，剩下来的，就是按“两

年规划”倒排的日期扎扎实实地工作了。回到北京，周总理找我谈话说，当初派我组织联合检查组去二机部，就已决定把我留在那里，不另选他人，我当即表示服从。聂荣臻副总理曾问我，抓原子弹，是去二机部直接抓好，还是留在国防科委好，我说，还是去二机部好，于是中央免去了我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的三个副主席兼职，任命我到二机部任副部长。

1964 年 6 月，刘杰在草原电告不带核燃料的原子弹模拟装置试验成功，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最后一个技术问题解决了，这是北京房山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个重要贡献。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直接准备。

我国试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个航弹装置。我们决定把它放在一百米高的钢制架上进行试验。为了防止万一，试制了两颗弹，一是防止加工装配及零件上出现差错，二是防止科学家们经过计算指出的，在原子弹爆炸时可能出现的千分之三的过早点火。为此，1964 年 8 月，张爱萍和我受命，开始了紧张的试验准备工作，一是检查试验弹的制造，二是检查试验场区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多次往返于北京、青海、新疆之间。

新疆核试验基地司令部离核试验现场有四百多公里，早饭后出发，在二百公里处的食宿站甘草泉吃中饭，到试验现场正好赶上吃晚饭。我们第一次去时，在马兰的试验基地的机关已经建设好；试验现场还正在抢建，到现场都是露天搭帐篷宿食，后来有了两间石头修成的房子。戈壁滩空气特别干燥，每天要喝大量的水，那水和吃的副食品、大米都是用汽车从几百公里外的铁路线上拉去。尽管喝了很多的水，但是没有汗，也很少小便，小手帕洗后甩两甩就干了，水分都通过皮肤、空气很快就挥发掉了。我们经常于回基地司令部途中看到戈壁蜃楼，时间大多在下午傍晚。

我们在那里主要忙三件事：一是布置建筑安装爆炸原子弹的钢塔。二是建设离爆心 20 公里的地下指挥所和 60 公里外的地面

指挥所以及爆心附近的直升机降落场。那时，基地司令部附近已经有了可以降落伊尔 14 的飞机场，后来又扩建成可以起飞、降落图 16 的机场了。三是遵照周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组织安排各有关单位，包括各军兵种及民防送去原子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生物（狗和白老鼠）及民防建筑等。

为了保证第一次核试验的成功，周总理先后发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丝不苟”的指示。张爱萍和我将试验场区的准备工作检查完毕后，又飞到西宁，乘火车去草原，即有名的金银滩中的银滩。在那里，我们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看，有的工序就陪着操作人员从头到尾看加工及装配，后来又看了总装配。这个单位的重要工序加工、装配、测试都是高等级的技术工人或大学毕业生。我们还检查了保密通讯网。在这里加工装配好的核弹，是装配好，检查合格后再拆开，由专车运往试验场地，再用直升机运往测试现场，在那里再装配好，检查后再吊上塔顶。

原子弹爆炸了，事先起草好的我国政府声明，却一直等到外电报道后，毛主席才批准发表。

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张爱萍和我回到北京向总理和专委汇报后，总理把我留下问我，假若暂不试验行不行？我说估计没有问题，肯定可以实现核爆炸，但是为了研制氢弹，还得先爆炸原子弹，弄清我们的原子弹的梯恩梯当量才行。总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人所周知，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国是险恶的，霸权主义者扬言，中国若进行核试验，他们就要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中央专委经多次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另一个是晚试，先抓紧三线建设，待机再试。凡遇重大问题，提出两个或更多的方案，供中央决策，这是我党的例行作法。经反复考虑，从战略上进行认真分析后，毛泽东说，原子

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中央果断地选择了早试的方案。

中央作了早试的决定后，我们建议国庆节进行，中央没有同意，要我们在10月15日到20日间选择适当的时间进行。在回试验基地前的专委会上，贺龙元帅连问两声："你们能保证响吗？"刘杰和我都没有吭声。从会议室出来，张爱萍对我说，你们这些部长怎么不吭声？我没有答话，只笑了笑，心想，我们的原子弹虽然肯定是研制成功了，但是谁能保证在试验瞬间不出现万一呢？！就是在这次会上，周总理向我们说，对这次试验要严格保密，万一不成功，让外国人知道了，风险会更大。他接着说：凡是和试验无关的人员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他的妻子，中央委员，因为她和核事业没有关系，所以他没有对她讲。回到现场后，张爱萍把总理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参试人员进行了传达，使大家深受教育。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泄露出去。那时超级大国的侦察工具还只有U—2飞机，飞到江西就被我空军拦击回去了，还曾被我国新试制出来的地空导弹打下来一架。因此，当我国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及放射物，分别经地震波和高空烟云传出去时，全世界大吃一惊。

根据试验场区气象预测，经中央批准，定于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进行试验。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完全是巧合。原子弹装配好，吊上塔顶后，张爱萍和我等大部分人员退出场地。张爱萍等返回60公里外的地面指挥所，我在离炸心20公里处的路口指挥撤退。基地司令张蕴玉、核武器研究院长李觉、副院长吴际霖、朱光亚等，现场指挥陈长仪接好引爆装置后才撤离，李觉下到地下指挥所。他们都撤离警戒线后，我再次检查了地下指挥所并将启动钥匙交给了在那里的张震寰，然后回到地面指挥所。在地面指挥所每人带上一副黑眼镜，以防光辐射伤害眼睛。张震

寰按动电钮，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北京时间下午3时整，一道巨光，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起。从巨光的强度和蘑菇云的形象中，我判断是原子爆炸，叫了一声："是核爆炸！"张爱萍拿着电话机正在和北京通话，北京也听到了我的叫声，连问："是不是核爆炸？"我回头问了问王淦昌，他点了点头，我放心了。当时吴际霖、朱光亚因为走岔了路，都还没有回到指挥所。原定部署，取样飞机已经过我们上空直插蘑菇云。北京来电话，毛主席、党中央要我们拿出确系实现了核爆炸的证据。以程开甲为所长的二十一所的有关人员开始了紧张的分析、化验工作。两小时后张爱萍和我等六人穿上防护服，坐直升飞机到了爆心上空，只见钢架像面条样歪歪曲曲地躺在地上。

经过对各种测试结果的仔细分析，16日19时30分张爱萍向总理再次报告，我国确实实现了核爆炸，经计算，爆炸威力在两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此时，日本已发出我国进行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他们是从地震波和高空烟云放射性含量的测量中判断出来的，高空放射性烟云出我国国境，是首先经过日本的。周总理向正在人民大会堂排练演出《东方红》的人员、观众宣布了这一消息，全场欢声雷动。

在准备爆炸原子弹期间，周总理就已起草好了我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于10月14日19时报给了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毛主席一直等到外电发出我国进行了原子弹爆炸消息后，才批准发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重大战略问题的非凡魅力和认真谨慎态度。我国政府在正式声明和新闻公报中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当晚，我们在试验基地会了餐，朱光亚等能喝酒的同志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晚上基地的文工团演出了张爱萍参与编导的《孔雀春雷》。

塔试成功后，我们又紧张地作准备空投试验的工作。张爱萍和我又一同指挥了两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一次是空投航弹，一次是空投能装上我们当时已研制生产出来的东风二号导弹头的小型化了的原子弹。吴法宪、成钧参加了这一工作。早在1963年12月，中央专委鉴于原子弹、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及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后出现的国际形势，决定核武器要以发展导弹核弹头为主。1964年6月，刘杰从青海草原向中央报告原子弹技术过关后不久，7月初，周总理就派他主管国防的秘书周家鼎到二机部向我传达加快进行原子弹小型化的指示。我国经过小型化了的原子弹空投试验后，1966年10月25日，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成功地在我国国土上进行了一次带有原子弹头的导弹发射，我国自制的导弹准确地把原子弹送到了预定地点爆炸。

我们进行原子弹试验，每次选择风向，都是让低空烟云首先经过我国上空东去，这样核爆炸烟云飘出国境时已经稀释，使外国人不会受到超剂量的污染。在核试验区附近的敦煌等地，一开始就布置了临试前将人口、牲畜等转移和必要的防护。由于地面风向经常变化，每次试验，都要两小时了解一次气象情况。第一次空投试验，飞机已挂上弹待命起飞，气象预报，场区地面风突然转向，爆炸后，烟云有可能从新疆首先进入邻邦。总理命令我们待风向变化后再试，这样我们只好让飞机挂弹待命，等了八天后才试。

在这八天中，我去看望了二机部在新疆的一个地质队。吉普车走了一天才到达那里，一路都是戈壁、沙漠，只是中午时刻在一条小河边遇到一户人家，一老一小。到那个地质队后，他们把库存的一点食品都拿出来表示欢迎之情。没有大碗就用洗脸盆装菜，做了四菜一汤，主食是一位维吾尔族的老汉做的新疆称作“馕”的大饼。我在试验现场还和张震寰一同到了孔雀河边，那是

一个干枯了的河，河两旁的大树多已枯死，春夏有一点水，但是苦的。张震寰过了河，到了“不灭楼兰誓不还”的楼兰遗址，发现了许多红绸子包着的大小不一的骷髅头。我回京后专门请教过郭沫若，他也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八天无事，大家就到处捡贝壳，那里原来是海底。九院去那里参试的同志捡了个最大的完整的贝化石，我要来带回北京送给了周总理，总理问我需不需要留着考古用，我说不需要，他说：“那我就处理了。”我估计大概送给毛主席了。

攻氢弹，一开始就瞄准高水平；接受专家意见，“三步曲”一举成功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周总理立即指示要加快氢弹的研制。有关氢弹，除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1960年就开始了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积累了一些数据外，其他一点资料也没有。二机部党组决定把该所研究热核聚变理论的黄祖洽、于敏等同志的小组集中到核武器研究院（简称九院）以邓稼先为首的在北京的理论设计部，他们在突破氢弹原理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九院理论设计部除邓稼先外还有秦元勲、周光召、周毓林等一批物理数学专家，九院副院长彭桓武也是搞理论的，长期在理论设计部和他们一起工作。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做事要先抓龙头。二机部是核事业的龙头，搞核武器九院是龙头，理论设计部又是九院的龙头，要研制氢弹，要在理论设计上首先突破才行。因此，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九院的理论设计部，也就是邓稼先、于敏他们那里。同志们形象地把这个想法、做法称为“龙头三次方”。当时，为了完成航弹的制造和小型化的设计试制，九院领导很忙，要到草原去，就把九院主管技术的副院长朱光亚留了下来和彭桓武、邓稼先等一起探索氢弹原理。

首先从哪里抓起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就要解决研制出一个什么样氢弹的问题。在开始抓氢弹时，二机部党组提出了"两手准备，保证低水平的，争取高水平的"的方针。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先搞低水平的，再搞高水平的；另一种是，一开始就瞄准高水平。前者保证可以做出来，但是不能上导弹的弹头。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一致认为，低的方案虽然唾手可得，但不仅不能装上导弹头，形成真正的威慑力量，而且高低方案之间，无内在联系，实现了低的方案后，还得从头再去攻高的方案，这样既延误时间，又浪费人力、物力、财力。高的方案虽然需要我们花点时间去探索，但它是外国人已经实现了的东西，不存在什么还没有突破的科学技术问题，只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专家们坚信，外国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出来。正在这时，周总理又向我们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氢弹研制的指示。中央和中央专委的思想，核弹就是要上导弹头，我们都是知道的。于是大家一致下定决心，为我们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确定了一个目标，当量要达到和超过一百万吨梯恩梯，重量不得超过一吨，简称为一一〇〇。尽管在此期间，有的同志有些担心怕"欲速不达"，大家也毫不动摇。

目标定了，理论设计部的同志就从分析氢弹爆炸的内因，即热核爆炸的内部基理和外因，即热核爆炸的外部条件入手以寻找引起热核爆炸的途径。当时，我国有中国科学院自制的两台十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北京，一台在上海，上海那台运行比较稳定，用户也较少，可以给我们较多的计算时间。最近，理论部的同志告诉我，西方搞氢弹时，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计算机，这也是我国氢弹搞得快的一个原因。我们兵分两路，由于敏带了些同志到上海，这样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攻关，通过专用的保密电话，互通信息，共同探讨。开始提出的两个设想，上计算机计算后都否

定了，随后北京、上海都酝酿着新的设想。于敏等在上海先走一步，按新的设想提出了具体方案，邓稼先也到了上海，他们一道把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上计算机计算。

1965年底，我在草原，接到邓稼先从上海打去的电话，说他们的理论设计方案在计算机上已经验证可行，要求立即付诸实施。我表示同意。在征得在北京的刘杰的同意后，即请九院领导召集全院有关专家和领导的会议，讨论实施方案。会上除个别同志有疑虑外，都表示赞成。对实施中的技术难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作出了具体的产品设计方案；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是由在草原的实验部的同志解决的。为实现这一方案，决定组织三次核试验：第一次是检查热核材料性能，验证我们对热核材料性能的理论计算是否与实际符合；第二次是验证理论设计是否可行，即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了氢弹原理，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氢弹试验，只是热核材料装料少，当量小而已；第三次则是全当量的氢弹试验。为了实现这三次实验，我们调整了组织，在"221"，即九院在青海的基地组织了一支跨九院下属各部门，以陈长仪为组长的精干的突击力量。

三次试验都按预定计划成功地实现了。进行这些试验时，我已经离开二机部当了周总理的联络员。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晚上周总理把刘杰和我找到西花厅，还备了饭菜和酒表示祝贺。二机部造反派到了国务院西门，扬言要打倒刘杰和我，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讯拿起酒杯风趣地说："他们（指造反派）要打倒我，我引为光荣。"随即吟起了毛主席的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以鼓励我们要经得起"风吹浪打"，随后又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我国仅仅用了两年七个月的时间就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跳到了爆炸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不但赶在法国前面爆炸了氢弹，而且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所用时间最短，水平提高最快，试验次数最少的国家，使

我们的热核爆炸试验一起步就比美苏起步时高一头，再一次迈出了迎头赶上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中央以尽可能少的试验，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的要求。

若说原子弹的研制，苏联专家"哑巴和尚"多少还起了点作用的话，那么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了。原子弹设计计算中有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周光召解决的。关于氢弹，后来不少参加过氢弹研制工作的同志见到我时，都说1965年当机立断很重要。美国人约翰·W·刘易斯、薛理泰来华时要见我，我没有见。在他们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上，写了一句："在他（指我）的领导下，氢弹计划取得了迅速发展。"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看见后打电话告诉我的。这大概是九院或国防科委的一些同志讲出去的。至于他在文中引用的一些有关氢弹研究的话，都是从我应核工业部之邀，为纪念核工业部成立三十周年登在1985年11月3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录的。因此，我要在这里说说我之所以能当机立断的原因：我多少懂得点科学，而且原子弹的成功，使我增强了信心，我对热核聚变原理不是一无所知，加之，在理论设计部攻氢弹期间，我又经常去他们那里，听他们讨论（那时我坐的是一辆坐了18年的红"奔驰"，理论设计部的同志们一见那车就知道我去了）。所以我对理论设计部的攻关情况心中有数，否则，哪能一接电话就下决心呢！还是毛泽东说得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氢弹研制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快的进展，还是应该归功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专家同志们的努力。

1965年冬，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视察了在青海的核弹研制基地221和在甘肃玉门的404厂。去前通知我们不要搞欢迎场面，那时我在221，两处都是我陪同视察。考虑到那里的职工长期奋战在高原、戈壁，中央领导同志去了，不让他们见见，不好交代；因此，两处都组织了夹道欢迎。为了不打扰这些单位，小平

等都是在火车上吃饭；上午听汇报，下午看，然后我们送他们上火车，在火车中吃顿便饭，饭后下车，等火车开动后，我们再回去。在221小平还高兴地题了词，薄一波见到221的车间中贴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标语后说：这样的车间应该贴“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标语，我们觉得这话很对，就改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有的造反派说成是反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从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在青海221先后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那里海拔3200米，由于空气稀薄缺氧，晚上睡觉，似睡非睡；开始时没有高压锅，米饭馒头都是夹生的，为了开胃，我每次去，都要带两瓶最辣的小辣椒。可是那里的职工，包括王淦昌、朱光亚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却长年隐姓埋名地在那里披肝沥胆、艰苦奋斗；山重水复总有路，“无声”岁岁把峰攀。他们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歌颂，永远是一切有报国之志的青年学习的榜样。

事后方知时间贵。如果不是1964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底就突破了氢弹原理并紧锣密鼓地实现三步曲，“文化大革命”到来，何时可以爆炸氢弹，就很难设想了。

（选自《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

秦晓鹰

红卫兵出世记

我们曾像早晨的朝霞那样璀璨、磅礴。然而，人毕竟不是朝霞和朝阳。准确地说，我们只是一批清晨时分上路的旅人，伴着热情，伴着凉爽的风，也伴着一系列长长的、飘逸的、灰色的身影。唔，我们似乎至今才明白：早晨与黄昏的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有某种感伤的朦胧，都有能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的光。当这身影延伸到最长的时候，那光的热量也到了最弱的时候……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当我把上面这段"著名"大字报上的话，原原本本念给他听的时候，这位四十岁男子的脸上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诧异、惊奇、疑感、喜悦、慨叹、怅惘。这是一种在不以为然的掩饰下的关注，是一种说不出痛苦的痛苦。反正，复杂极了！那双注满风

雨的中年人大眼睛里，好像蓦然吹去了岁月的云，一眨一眨，跳出不少青春的光。我懂得：这光，不，这记忆的串珠马上就会从他的嘴里滚动出来。他一定不会再像几天前通电话时那样，委婉又坚决地拒绝我的采访请求。果然，他开口了。在这间不大的经理办公室里，回荡着他略带鼻音的男中音。

讲到20多年前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往事，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活得累，再去腾出空儿想那些，就更累了。行，看在咱们是同辈人的份儿上，就不罗嗦了。可不是吗，回忆、讲点什么还都要看谈话对象是不是具有与我大体相似的思维模式。我是直流电，你是交流电，根本就不匹配，那不等于是对牛弹琴吗？前几年，团中央几个年轻人写《当代中国青年》时找过我，我口干舌焦扯了半天，他们也忙活了好些日子，结果还不是全付之东流了？不过，还是有人写。最典型的莫过于《“文化革命”十年史》了。挺有名的，可那是什么？是信史吗？是一大堆文革小报、传单、小道消息和个人情感的混合物。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净是些搞错搞混的地方……却堂而皇之地问世了。真叫人啼笑皆非、莫衷一是。言归正传，还是谈谈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衰、沉浮吧！你知道吗，冯雪峰曾经立下死誓，要写一本太平天国的历史小说。老先生写下这么两句诗：“曾经云龙风虎斗，但解天朝始末题。”就是讲以史为镜的意思。我今天讲怎么搞起红卫兵，怎么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后来又怎么历史性地覆亡，当然也有这层涵义。你说，对吗？

干巴巴的序曲

理性主义者认为：历史是山峰，人，只有靠不懈地攀援才能登及峰顶；浪漫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动荡摇曳的海洋，人，只有具有了鱼的柔曼，才能弄潮。前者是我们迈出理性

的步伐，后者几乎全倚仗着感觉。

红卫兵运动，这出有浪漫色彩、活泼泼的历史剧，却是从干巴巴的现世剧开始的。

——他说

1965年，对我个人来说，头件大事就是加入了梦寐以求的共青团。最初，学校的培养对象并不是我，而是一位学习好又听话、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同学。消息传来，我们班的几个不是“头”的“头”忿忿不平，觉得我思想活跃、能力强，学习也不错。而且，而且有一种“天然”的优点：出身好。真所谓根正苗红。怎么，像咱这样儿的不第一个发展，想干啥？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受到阶级斗争观念的“启蒙”了。且不说看的书（《红岩》、《革命烈士诗抄》等）、电影、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这些社会影响，就是在学校、同学中，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气氛也是浓烈的。记得我在听穆青做焦裕禄事迹报告时，都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在底下，同学当中，还传阅着宋养初的儿子宋心鲁的信、柯庆施（人称“柯老”）的遗嘱，特别是毛主席对王海蓉、毛远新的“新春讲话”。有一回，学校领导，大概是万邦如校长吧，专门把我们高中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和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召去，意味深长地讲了一番“殷切期望”：“你们，与其他同学又一样又不一样。你们与党有着特殊感情，党也与你们格外亲近。所以，你们要比别人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准备去接老一辈革命者的班，决不能让印把子在你们手中丢掉！”

明白吗？这就是革命的“童子功”——“政治”、“接班”、“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红色江山”、“修正主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革命干部子弟”、“九评”、“粪土当年万户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青年时笔名）”、“美帝”、“世界上三分之二

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阶级斗争”、“讲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上课可以打瞌睡”、“教育革命”、“印尼共产党被屠杀”、“疏枝立寒窗”、“庐山仙人洞”、“毛主席语录”、“用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邢燕子”、“彭加木”、“董加耕”等等等等，这些词汇、观念、概念、理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和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主席教我们练就的这套“童子功”，锻造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少年的筋骨。当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就不仅仅再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年人的道德标准。

对我能不能发展入团，经过一些同学（旷涛生、骆小海等）幼稚而执拗的抗争，终于使学校同意了。于是，我便作为高中二年级发展的第一个团员，在全年级大会亮了相。之后不久，我们就开始了与校方当局的第一次较量。说实话，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以及往后的一连串连锁反应，竟成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的契机！

导火索是 1965 年 9 月高中各预科班改选班委会。所谓预科班，是当时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升学率采取的特殊措施：把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以便加快教学进度，争取尽快向清华大学各系输送人材。我、旷涛生和骆小海被分到新组成的“预科 65 级第一班”（简称：预 65（1）班）。校方十分关心高中二年级的干部改选。原因是高三年级正在紧张准备大学考试，对学校中的一切活动无暇过问，全指望高二年级的协助。如果选不好干部，岂不连累贻误了全校的工作。所以，学校就在我们当中挑来捡去，最后被“内定”的人全部是听话的乖孩子——不少是当过好几年的老班干部了。

校方真是低估了我们。顺带说一下，古今中外，哪朝哪代，甚至连“治”个小家庭都算了，“低估”常常是老年人对青年的能量

进行错误判断的根源。而“高估”则往往是青年自己无法遏制冲动的根源。一个低，一个高，得，又是一个“电压不匹配”，非“短路”不可。这不，我、小海和涛生就在背后嘀咕开了。

“这怎么行。事先圈定名单，能代表学生？”

“学生干部也要讲阶级路线。”

“只讲听话，只讲学习，那不成了白专道路了吗？”

“真邪乎，有的干了好几年班‘头’了，干么不让大家都锻炼锻炼？”

“他们不是说让咱们学生自己决定吗？我看，干脆先来个大讨论，把班干部标准弄清楚，再选举？”

你说，这件事情要放在个宏观范围看，比如放在北京市来看，简直比芝麻粒儿也大不了多少。可是我们那份认真，就跟毛泽东在开遵义会议前夕那么忙活、那么紧张。至于说事情怎么会发展成后来那个样子，我看让谁来分析分析，都有点费解。

于是，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在《接班人》的墙报上贴出了小字报。顿时，犹如投石击水，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分析、辩解、攻击、揭露，沸沸扬扬。班主任老师是个年轻人，思想很开通。他见我们写得有理，也就不坚持，顺水推舟表示了同意。最后新班委成立，当选的人与我们设想的大体一致。预65（1）班这点屁事儿，本不足以形成气候，校方却偏偏要大惊小怪，认为对这种自发失控的选举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和警觉”。其他班的同学听说学校的态度，顿时生出偌大的逆反心理，不但没按学校领导的意见办，反而纷纷来取经、来仿效。一时间，各年级的改选都成了“竞选”。多年来在清华附中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动荡了。从来就有追求新奇心理的青少年，好像都在这小小的校园波澜当中感到了点什么，嗅出了点什么……

狂风初起时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这是毛主席下令射向中国上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我们立即组织了大讨论。有的学生认为不能全盘否认“清官”，而多数人主张要看这出戏的政治背景。紧接着不久，又开始了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批判。这一下，就真热闹了，预 65（1）班的《接班人》墙报火药味越来越浓。什么办预科班是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啦，什么不要死读书追求分数啦。骆小海是个爱动脑筋又有文彩的笔杆子。他的文章颇具新意，引起小读者刮目相视。有人说他的观点虽然对，但态度“狂妄”、“太偏激”。一来二去，随着社会上报纸上的政治调子日益增高，特别是到了 5 月份开始声讨笔伐《燕山夜话》，我们墙报上的小字报就转向了“学校有没有阶级斗争”的争论。

1966 年 5 月 2 日，我们年级 16 个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女）一块儿到北京西郊的潭拓寺去玩。潭拓寺，宝刹联联、古柏参天，确是一处幽深清雅所在。明清两代不少闲人野鹤常在此处吟诗作赋，更给这里点缀了浓浓的书卷气。我们虽说是来“玩”，却没有玩的心思。中心话题还是不辍的“阶级斗争”。从学校扯到社会、从海瑞罢官、彭德怀庐山发难到教育革命，从文化部搞文艺整风的失败到主席批评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更叫大伙震惊的是，听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出了大事，毛泽东说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呵！圆圆的鹅卵石铺成的山间小路，树影婆娑。听着松涛阵阵，我们心里的涛声更是如海似潮。我觉得此时自已身上就像附着了许许多多革命家的灵魂：有赞颂革命的邹容、有蹈海赴死的陈天华、有握着“投枪匕首”的鲁迅、有喀山大学时的列宁、有在爱晚亭放言的毛泽东，甚至还有俄国十二月党人……理想、幻想、狂想、臆想，都在脑子里打

着漩。看得出来，在场的16个人，一个个都感到了暴风骤雨的来临，都渴望搏击与渲泄，都希望做冲向乌云和雷电的海燕。回校之际，我们站在山上齐声朗诵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首诗——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这诗中的献身豪情和斩虎截鹰的气势，引出了我们的泪水。一泓纯情、百种庄严、恍如回到了“五四”时代。

5月8日，预65（1）班的团员请校团委书记来听取大家对清华附中教育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看法和意见。可是，谁想这位仁兄是个火气颇盛的年轻人。刚听了两个人的发言，就沉不住气了。我当时为了显得有理有据，说明学校歧视工农出身的学生，常常要引经据典，特别爱引毛主席的话。这位书记脸色铁青，一下打断了我的发言：“不要搬这些话，别用报纸套实际，这是唬人战术。”他脱口而出，却万万想不到立即被抓住把柄，我们更是不依不饶。事后，我们几个人立即找到清华大学党委反映情况。

附中的万校长似乎这时才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校方仓促“应战”，一面到我们班听取意见，一面又向各年级的主管教师布置对策。其中一条就是造舆论，说我们是“别有用心”。甚至把我、旷涛生、骆小海的学历卡片调到校长办公室审查，准备搞组织处理（开除学籍？团里处分？）。高三年级的王铭、张晓宾听到消息，纷纷来找，表示无保留地支持。高一年级、初三年级的学生们也愈来愈频繁地与我们接触。事情仅仅过了两天，报纸上对《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即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公开点名批判就开始了。这似乎更加证明了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完全正确。学校当局到此时仍是采取僵硬、简单、草率的做法。他们迟钝异常，不作疏导，甚至要把王铭打成坏人，说他的父亲是罗瑞卿的秘书，是我们这次“闹事”的黑后台；还说我们攻击“蒋（南翔）校长”是造了“南翔同志的谣”云云。初次交手就与学生处在对立面，以

后的事儿就不好办了。要知道，我们岂止只代表几个人，而是反映了几百学生的呼声。结果是，你越要大家警惕坏人，无形的“反叛者”的舆论中心就越坚硬；你越是压，小字报就越多，各高年级甚至初中生都贴出了小字报。

此时，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即将发生震动世界的政治大爆炸。红卫兵在石破天惊中，也将“金猴出世”！

自5月22日以后，学校的气氛呈紧张状。各班的班主任每晚必向校领导汇报，而各班学生则三三两两、七七八八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两天以后，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分子中也有学生。这次声色俱厉的“宣布”同时还伴以严格规定：每日下晚自习后，不许串联聚会，立即回宿舍。外出者晚九时前必须返校，否则为学校纪律所不容。5月25日晚九时整，学校派“校卫队”，把学生宿舍强行锁住，不许任何人进出。同时用碎砖烂瓦、废暖气管堵住了与外界的通道。我还记得，那些校卫队员个个如临大敌，准备“抓”一儆百。郑义，就是后来写了《老井》的那位作者。当时是校方宠儿，也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这些突如其来的恫吓，莫名其妙的威胁，把我们激怒了——

“什么‘反党’，看将来谁是反党？！”

“拿着没理当理说，做贼心虚。”

“让那帮出身坏的当校卫队，这不是要专无产阶级政吗？”

“咱们要给华北局、团中央，对，党中央写信。告这帮家伙！”

5月29日下了晚自习，我、王铭、骆小海、旷涛生、陶正、张晓宾、张承志等七八个人来到圆明园旧址。在这片象征着旧中国屈辱与沉沦的土地上，在这块记录着清朝政府昏愦腐败的废墟里，我们充当了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揭幕人。虽然当时，谁也没想这么多，谁也没意识到这也构成一场政治大灾难的一部分。要

不，那天大伙儿谁还有闲心去摘野樱桃、边吃边聊呢？

在一座小土坡上，周围是几株野樱桃树，我们席地而坐，像往常一样先“兜兜”情况。越谈，大家的心收得越紧。怎么办？真的要坐以待毙吗？如果学校宣布我们是反党分子就不好办了。虽然，大家从心底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左派，但……。我们感到缺少力量，而力量，只有靠团结起来，用同一个声音来抗击“压迫”才能获得。

“嘿，伙计们，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我出了这个主意。

“对对对，让学校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有多少人。而且这么一搞，就铺天盖地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小海兴奋了。

“现在学校的那些小字报上的笔名可多啦，什么‘向阳’、‘华锋’、‘卫东’、‘海峰’、‘红心向党’，也不知用哪个好？”

记不清是谁倡议，提出张承志用过的笔名最好。对了，先交代一句，这个张承志就是后来写《黑骏马》、《北方的河》成名的作家。这家伙，在我们这些曾醉心搞理工科的同学中，独树一帜要搞“文”，也算个稀罕物。不过，那时他就有支画龙点睛之笔——“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他在写小字报用的落款。

“红卫兵？好呵！太棒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

“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红色江山的光荣卫兵。嘿！真是怎么叫怎么顺，就叫‘红卫兵’！”

……　……

第二天，一批用“红卫兵”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6月2日、3日，海淀区、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都闻讯赶到了我们学校，纷纷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这些大字报几乎每张的下首，都洒洒脱脱、歪七扭八、龙飞凤舞、磕磕绊绊地签着

"红卫兵"的大名。比如"四中红卫兵薄西成薄西勇"、"三十五中红卫兵纪军"、"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这三个凝结着那个时代青少年特色的名字，这个首先由我们学校的激进学生自由组合的秘密团体，就这样，作为一种新的社会集团力量，仗着那身革命童子功，风风火火地闯入中国的政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工厂、学校、街道、乡村、公园、墙上、树上、马路上，甚至不少四合院门前的石头狮子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的帽子在飞，越来越多的棍子在舞。

三论"造反"

"失控"可能是某些政治家需要的，有过那么一瞬间，我们觉得和这些政治家的心灵感应是相同的。否则，为什么会事事通、路路通？

——他说

文化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我去也不成，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一位中央领导人说

6月8日，中央团校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他们一来就承认"红卫兵"是个好组织，还让我们几个发起人参加了"革命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按理说，我们应该满足了。"反动学生"的乌云一旦驱散，头上便是朗朗晴空。上级的承认，就是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嘛。

嘿，哪有那么容易！不久，我们就听说，全北京市只有清华

附中一家红卫兵组织被认为是好的。其他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仍旧被冠之为“非法”。更严重的是，派到有些中学里的工作组，为否定所在学校的学生组织，竟干脆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呀，别看现在被市里承认了，究竟怎么样，将来还要看发展。哼，等着瞧好戏吧。早早晚晚，他们也自身难保。”好家伙，这弦外之音无非是说，我们也是非法、反动至少是错误的?!联想到工作组进校这段时间，那种不冷不热，动辄就指责我们片面、过激、狂傲的老爷态度，更感到压抑和别扭。也真巧，恰在此时，《中国青年报》摆出一副“十万禁军教头”的腔调，发表了一篇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通篇在训导青年学生要克服弱点缺点。妈的，简直是把我们看成受了招安的宋江、宋景诗。现在想起来，团中央机关报丝毫也没有错误，可在当时就是觉得那么刺耳。指责，指责，指责，一连串的指责，够了。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受的窝囊气还少吗？现在，党中央的精神与我们的造反行动完全一致，凭什么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轻蔑和歧视？我虽然不赞成那幅极其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咱毕竟是出身好，根正苗红吧。一分优越感、两分“贵族”气、八分不能阻拗的倔犟、十分阶级斗争的警惕，混合在一起，便要发酵、便要膨胀。我们几个商量要用一颗最沉最重的精神炸弹投向工作组。

6月23日，我和小海、王铭、晓宾在学校办公楼二楼议论这件事。我随手翻着桌上的报纸。真是天助我也！在6月5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国际问题评论《汉佛莱的哀叹》。文章里面居然有一段从未见过的黑体字（那就是毛主席语录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短评末尾还注明，此语引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高兴地大喊起来：“快来看看，我发现了宝贝！”

同学们围拢上来，一瞧这话，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如果

我讲迷信，一定要说，红卫兵确是吸天地之灵气、万物之精华孕化而成的，是谁人也阻止不了的出世金猴。可是，话又说回来，把自己的命运系于一条语录，这不就是一种高层次的现代迷信吗？

骆小海思忖片刻，兴奋的目光闪出狡狯的光："我看，咱和工作组也得斗智斗勇。我们的大字报先不用这段话，只根据主席语录的精神写，赞扬造反精神。我估计，工作组看了一定会跳出来批判咱们。到那会儿，再把这条语录原原本本抄出来，他们就傻眼了，干着急没办法。"

"这就叫'请君入瓮'！"

"然后再'瓮中捉鳖'！"

"干吧，冲咱们有这么高水平的'智多星'，工作组非垮不行。"

我们对这小小的战术、计谋得意极了。工作组也像附中原领导一样，再次低估了学生。他们老以为我们是"幼儿园大班"，殊不知周恩来在这个年龄都已经组织了天津的觉悟社了，成了"五四"宿将。

6 月 24 日，一张具名"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赫然贴在学校最醒目的地方，标题尤其刺眼"抓"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章极富煽动性，当然，也带着执笔人骆小海特有的犀利风格——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反对造反的人，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

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不知道是这张大字报真有那么大的威力，还是工作组的呼风唤雨，一批又一批骂造反精神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工作组得意地说：“这下子红卫兵的反动面目暴露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大学生们也涌进了附中，要看看造反“奇文”。总之，一片叫骂、斥责。工作组自从进驻这里后还从来没有得到像今天这样广泛的支持，他们高兴极了，认为红卫兵在群众中彻底孤立，不久就可以取缔制裁了。

几天的辩论中，我们蓄而不发，故意让工作组表演得充分一些。就在他们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我们又以同样署名写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大字报一开头，我们就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写这些，无非是昭告反对我们的人，“造反精神”的发明权是毛主席，你还敢说三道四吗？次之，是要说在社会主义时期也要有造反精神，主

席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根据这个道理，就干社会主义吗？

别说，这第二张大字报的火力就更加凶猛不留情面了——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

今天，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

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能不万岁吗？

……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这么“理直气壮”，这么杀气腾腾，现在读来都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更不用说那个时

期那个气氛了。工作组长刘静急慌慌地找到我们，问毛主席这段话出自何处。我当然不能直告引自《人民日报》。您不是总为难我们吗？这回呀，咱也治治您，“在延安时讲的，纪念斯大林诞辰会上说的。”他揩着热汗走了，派了好些人去查延安的报纸，跑遍了北京图书馆、党史资料馆、档案馆，等等，最后，自然是找到了。可这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只好又去请示团中央、请示胡克实。胡曰：“像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一些人，看来不简单，有一定水平。即使如此，你们也不能纵容。要在他们当中抓住坏的。”他授意工作组调查王铭，因为胡知道王铭的父亲曾是罗瑞卿的秘书。抓出个王铭，带出个后台，清华附中红卫兵就能不攻自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哎，现在想起来，有多可笑，胡克实同志本人与工作组组长、王铭的父亲以及从来没有任何干系的罗瑞卿大将，不都是在十年文革中历尽劫难九死一生的人物吗？可惜，那个时候的我们和他们，群众和领导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虽然在具体事儿上有分歧，但互相攻斗的方式以及思维模式却是一样，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被歪曲了的阶级观点，都是株连政策不教而诛，都要打语录仗，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可见，在现代迷信的祭坛前，我们大家既是膜拜者，又是可怜的供品。

这不，就在这种思维行为轨道上，工作组要与我们“摊牌”了：不许红卫兵再搞“非组织”活动，揪出红卫兵中的坏人。一天晚上，我们五六个人与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叶组员和张组员泾渭分明、两军对垒地争论起来，吵得正酣之际，刘静到隔壁给团中央的胡克实打电话：“喂，喂喂，克实同志，事情很不好办，坏人要不要今天晚上就点名。”

“……”

“好，还是要点出名字，是揪出一个还是两个？”

“……”

“那么好吧，我一定相机行事，看来不这样就不足以使这些年

轻人头脑清醒。好、好的，我明天再向您汇报。”“嗒”的一声，电话挂了。

刘静回来，先小声向每个工作组成员咬了咬耳朵，然后正襟危坐，脸上常挂的三分笑容也收敛了许多。其他人的面孔也板结起来，陡然平添了一股肃杀神色。

“别再强词夺理，你们里头就是有人心怀叵测。革命委员会很快将成立，红卫兵再存在就是非法组织。”姓张的组员是涉世不深的愣头青。他的话刚出口，就激起我们一片愤怒驳斥。

“你们说话算不算数，以前承认我们，现在为什么变卦？”

“说清楚，谁心怀叵测？”

“坏人在哪儿，指出来！”

我因为早探到风声，知道他们想点王铭的名字，故意喊道：“你们口口声声团结大多数，对个把家庭有问题的人，如果我们红卫兵除了人家的名，那不是没有政策、不会团结人了吗？”

对方的声音黯哑了。刘静同志到底也没有按照胡克实同志的指示最后摊牌交底。通过短兵相接的舌战，我们已经十分明白：要么是工作组完蛋，要么是红卫兵垮台，两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

7 月 27 日，由王铭执笔，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 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革命的大造反；
>
> 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只要有矛盾存在就要造反，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
>
> 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第三论”出来后的第二天，7 月 28 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同时撤了区工作组

组长周杰的职。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进行控诉。我们学校的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同时，他们还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

“他们说这几份大字报是反动的，请转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好的，哎哎，我一定给你们带到。”

7月30日，团中央来电话，说胡耀邦等领导同志要接见中学生代表，听取对工作组的意见。一到场，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的红卫兵就带头开始“控诉”。我看见坐在后排的胡启立难过得直抹眼泪。等我们刚讲完，就从外边走进来两个人。当时，全体在场的头头脑脑都齐唰唰站起来。我直纳闷，胡耀邦他们几个，有的是中央委员、有的是部长级干部，怎么对来人这么重视呀？进来的人当中有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坐在我旁边的沙发里。他歪过头问我姓什名谁，哪个学校。我都一一回答后，很不客气地问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他低声讷讷：“我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我、我叫张春桥。”从那会儿起，我才知道有这么个张春桥。

红司令批准红卫兵

8月1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2日晚上，矿业学院附中的杨继平（杨勇上将之子）忽然打电话给我，透露了一条消息：

“XX，我听父亲讲，毛主席对清华附中的大字报有个批示，是支持你们的！”

“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喜讯。

“我给你念念吧。”言罢，他便一字不漏地念起了毛主席的批示。当时的我呵，激动得直冒汗，手似乎都在颤抖。总算记完了，就像跑了一场三千米下来，气喘吁吁。斗争的复杂，使我多少学

得谨慎了。虽说办事算不上老道，但贸然把这消息传出去，万一不准确或者漏一句话少写一个字，也会授人以柄、给他们可乘之隙，而就要变高兴为难受了。可是，这巨大的喜悦又怎么按捺得住呢？王铭、小海、涛生、晓宾、陶正还有好几个人都看出我有些异样，我只好又神密又严肃地把杨继平的话转告了。就在这消息马上会不胫而走的当口，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我们。

“小将们，欢迎你们，请坐吧。”任重同志亲热地把我们和王铭让到会客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同学们，正式通知你们个好消息，毛主席支持红卫兵。”

这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这确有其事又唯恐是谣传的消息，使我们一时语塞。王任重把文件递过来。我们一眼就看到：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主席的信是这样写的：

> 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
> …… ……
>
>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
> …… ……

“王任重叔叔，这份文件能让我们带回去吗？”王铭问。

"不行，"任重同志笑笑："开了会，这封信不知主席还要不要修改，所以还不能给你们。"

"那、那怎么办？"我们脑子再好用，也背不完全呀。对了，我想出主意了。

立即接通了附中红卫兵办公室电话，晓宾他们都在。"喂，你把继平昨天讲的慢慢念一遍，我这儿有份正式的，对一下。"

结果，记录稿只有两处文字上的小笔误。正式文件还给了王任重。临别时，他搂着我和王铭的肩膀："中央派我负责联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这四所学校。今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我，打电话、写信，自己跑来，都行。"

下面的事就用不着我多说了。你是经过"文革"的人，当然明白这种特殊的最高的荣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时，就连主席送几个水果都不得了，何况是一封真真切切的支持的信呢。我们都被这巨大的喜悦熏醉了。欢呼、跳跃、泪水、歌唱、鼻涕、蹦高、拥抱、打滚，全校、全市，很快是全国都传遍了毛主席给我们的信，给全体红卫兵的信。记得那几天晚上，我们清华附中的各个教室楼道都听得见这样的歌声：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
身上都洒满了你的阳光——"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吧，红卫兵以其特有的狂热，在尔后相当一段时间，“主宰”了中国，在神州大地大显“神”通。

当然，这神其实是毛泽东。

强弩之末

1966年8月18日早7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列队登上天安门。八时零五分，骆小海、宋柏林、韩军他们几个实在耐不住好奇和激动，居然穿过人墙挤进了城楼会客厅去找毛主席！等他们闯进去，真见到主席时，竟手足无措，只是傻乎乎地喊“万岁”。周总理、汪东兴看到这种情况，也都有点出乎意料。毛泽东缓缓站起来，笑着和这三个小鬼握了握手。

大家怯生生地说：“毛主席您好，祝您万寿无疆！”

“好、好、好。”

“主席，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哪一个？”浓重的湖南口音。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海他们大声重复。

“唔唔，就是这些娃娃？”主席回头看看总理，用眼睛在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他笑了，“我坚决支持你们！”

九时四十五分。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记得那么准。我有手表呵，而且从小就在军人家庭里养成了遵守时间的习惯。主席，还有林彪、周总理从会客厅踱出来，和一群群的红卫兵握手。他在我们面前站了有五分钟，嘴唇有时动一动。可惜，那时分简直闹翻了天，什么也听不清。说老实话，我在高兴时心中却不知怎么搞的，竟滑过一丝酸楚的阴影：毛主席多么苍老呵！花白的头发、黄白无色的皮肤，而且好像耳聋得厉害，听别人讲话，都要吃力地把头低下来。第二天，看到照片上把主席像修饰得满面红光，头发漆黑，就曾想：这修底片的技术真够绝的！

著名的8月18日，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记得这一天，各国的编年史也少不了这一天。可对我来说，好像并不十分激动。是因为看到真实苍老的毛泽东，产生了某种孩子式的心理压抑吗？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也许，离权力核心越近，越会有某种遥远感吧。

“八·一八”之后，全北京陷入了“破四旧”的狂潮，抄家、打人“蔚然”成风。一天，我睡懒觉睡到十点来钟（因为天天晚上要熬夜），出来一看，学校的大操场上仨一群五一伙地在那儿蹲着拔草，周围是哇哇乱骂的红卫兵。只见一个初三学生抡着一把东洋指挥刀，威风凛凛地喊：“革命的师生们，阶级敌人妄想复辟变天。这是我们抄出来的日本战刀。这个——”他又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叠纸：“这是他妈的‘变天帐’。我们就是要教训教训这群混蛋、狗崽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就要坚决地镇压！”原来，拔草的全是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我走近一看，数郑义被打得最惨。红卫兵为了报一箭之仇，把他抽得脖梗上血肉模糊，衬衣上血迹斑斑。还有几个人也被连剃带揪搞成了“阴阳头”，人鬼难辨，惨不忍睹。

“你他妈干什么，谁让你这么干的?!”我怒了，冲着挥舞军刀的小子大吼。这时，到王任重处去汇报工作的骆小海、王铭、张晓宾都回来了。大家一合计，决定立刻让这些“牛鬼蛇神”回教师办公室。这么闹下去，红卫兵不成了嗜血动物了吗？大家一不作二不休，决定给那个初三学生以处分，责令其检查。如再不改，就从组织里除他的名。他很不服气，摔桌子打板凳地走了。

是的，他怎么能不委屈呢？打人、斗人、体罚，难道仅仅是几个人的神经出了毛病吗？当天晚上，我和晓宾坐着三轮摩托到了刚刚改名的“东风市场”（原名“东安市场”）。一间间曲里拐弯的小房子里面，差不多每间里头都关押着“人犯”。呻吟、哀嚎、惨叫、喝斥，不绝于耳。杀气腾腾的红卫兵守着每所房子。我们

以极不赞同的口吻与在场的头头们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以极不服气的口气回驳我们的责问。双方相持不下，我们就扭头出来，到了市场附近的帅府园中学。结果发现里面也关着四五十人。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见到我们这些“元老”很客气，搬了几把椅子小坐，还请我们来“审问”。你猜，这批“阶级敌人”都是什么问题。有的说“我欺负了班上的女生”；有的说“我偷了人家五毛钱和一支钢笔”；有的交代“我父母是房主，罪大恶极”；还有的坦白“我骂了红卫兵”，等等。听到这里，我和晓宾气得直瞪眼，这算什么反革命？反修防修，就反这些人吗？太可笑了！难道叉着腰、抡皮带就能抡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吗?红卫兵不是草寇、不是草莽英雄。我“啪”的一声狠狠拍着桌子，当即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在押的人都可以回家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那些被折磨得有气无力的男女老少，仰着被汗水、血水、泥水、浆糊、墨汁、唾沫弄得丑陋不堪的脸，充满着求生的欲望，两眼滚着泪花，颤颤抖抖地喊：“毛主席万岁！”“红卫兵万岁！”

帅府园中学的红卫兵头头疑惑地问我们：“大哥哥，”对了，忘了说，这个学校只有初中。“大哥哥，怎么都把他们放了？”

“本来就不该抓！”我没好气地回答。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毕竟牌子硬、名气大。那个小头头也就不敢再吱声了。越来越多、越演越烈的打砸抢事件，使我们这些年龄稍大，多少带点儒学精神，脑袋里还有几分政策观念的人，心急如焚。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写出了《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首先作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的主张。这虽然对运动有些缓冲作用，但对大局于事无补。说老实话，作为学运的头头，我们是在竭力控制已经失控的局面，是在徒劳地做着劳而无功的努力，可这一切都注定要付之东流，因为“魔鬼”已经从潘朵拉的匣子里跑出来了。我们所首创的早期红卫兵组织，或者套用人们习惯的称呼“老红卫兵”，正在迅速站到一批更激进、更张狂的新左派的对立面，正

在成为中央文革要打倒多数老干部，从根本上搞垮我们党的巨大障碍。

这，是在不知不觉中变化的。刚开始大串联时，我也不知为什么，自己无论到江西、湖北，总是与当地“群众”对立；弄不懂为什么中央“十六条”说的95％的干部是好的，却变成实际上95％的干部是坏的。秋末回到北京，形势骤变，一种被中央文革抛弃冷落的感觉陡然而生。那会儿，我们还没觉悟到那种程度：认为被中央文革冷落是好事。所以，还是希望能与中央文革的成员当面谈谈，看看出了什么误会。我们再做点斗私批修、自我批评，就可以消灾免祸。

12月23日，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人见到中央文革中那个红得发紫的人物戚本禹，告诉他在26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要举行大会。戚某人当场表示，一定到会，中央文革其他同志也会出席。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对话的机会，所以不敢怠慢，对这次会做了精心准备。第一方案是：由我做主题发言，内容：斗私批修；第二方案是：如果中央文革真如传言那样怠慢诸位革命小将，红卫兵便毫不客气，最后亮出旗帜——与中央文革决一死战！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26日，就在毛主席的诞辰日，数千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集会。起始，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可是，会程过半，还不见中央文革的人露面。我们那篇斗私批修的发言全都讲过去了，才到了位《解放军报》的记者。我们质问他，为什么戚本禹言而无信。他悻悻而退至后台打电话，结果是十分尴尬地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因为太忙不能脱身，决定不出席大会了。显然这是遁词推脱，是哄三岁的毛孩子。昔日，你们把红卫兵视为小太阳，奉为座上宾；今天，却自食其言，相约不到。消息传出，井然有序的会场顿时炸了窝。上当的羞辱使全场黑鸦鸦的人群再也不能忍耐。几个月来对文革小组的意见，特别是对江

青、戚本禹、王力、关锋，还有谢富治这些人的反感，就像大坝决口突然喷涌出来。根本不用我们安排什么“第二方案”，矿业学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工业学院附中的苏振生等人飞身跳上讲台，抓起话筒高呼：“拥护中央军委四个副主席（指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的领导！”“不许迫害革命领导干部！”“不许迫害革命小将！”“打倒戚本禹！炮轰江青！火烧谢富治！”……整个北京展览馆剧场沸腾了。那天是黑夜，在黑漆漆的动乱的中国，在寒凝大地的当时，《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召开的斗私批修大会，居然敢于率全国之先，喊出这些口号，确是一曲狂飚，犹如石破天惊，令人好不痛快，真是胆大包天到了极点！大会最后是放映两部电影。第一部是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彩色纪录片。当银幕出现毛主席、周总理，特别是出现那些久违的元帅、国家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音容笑貌时，全场迸发出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含着哭腔的欢呼“老帅万岁！”“革命前辈万岁！”第二部电影是苏联的故事片《区委书记》。当演到红军游击队员举手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观众席上的我们也同时高叫“以血还血、以命抵命”。谁都清楚，与中央文革为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拼死一搏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尽管后来有了北京红卫兵六冲公安部的“壮举”，但对我们这些头头来说，内心里还是期待能通过与中央文革的对话，化干戈为玉帛。真的，你不要见笑。在我看来，在任何学生运动中，学生领袖都有保守的特点，当局只要能及时把握住就会把运动引向有利自己的一方。可惜，中央文革没有任何人出来，就是不出来……。积怨愈深、愈要失控。1967 年 1 月初，航空学院的“红旗”、清华大学的“井岗山”，这两个由“五大学生领袖”（指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领导的“左”派组织，悍然抓走了几个红卫兵，还施以拳脚。这几个小孩里还有我弟弟的

一个同学。这还了得，不但不见面，还要指使“亲兵”们抓人?!

1月5日深夜十二点，王力、戚本禹突然来到清华附中。他们先召集我们的“对立面”开会，等把口径、对策都协调好了，才把我和张晓宾等在校的人召去。一见面，我们就毫无顾忌地控诉蒯大富、韩爱晶这帮中央文革的“爱将”殴打红卫兵，公安部还非法捕人监禁。戚本禹微微一笑说道：“那么你们在学校，不是也打过人吗?”

“这是去年8月份的事情，当天就做了处理，事后还写了反对武斗、逼供信的文章、大字报。”

“这么说来你们是反对打人喽。嗯，那么干嘛还要贴‘绞死蒯大富’的标语呢?”

“因为他非法抓人，非法审讯。”

“再问你们个问题，你们这些人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过从甚密，总是错误吧。”

“没错误！那是工作关系。他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并且受委托与清华附中联系。”

“不对，王任重不是中央文革的，是反革命、托派。你们还为他说话，说明你们是受反革命控制了的。”

“真是岂有此理。我说他当时是副组长，没有说今天，这跟辩护没关系。”

戚本禹气哼哼：“哼！你们还不如《水浒传》里的李逵。李逵犯了错误，还知道负荆请罪，你们还不如古人。”

“与王任重的关系，王力同志都清楚。去年10月我们向他和陈伯达做过汇报。王力同志，你在场，你可以作证吧。”我瞪着他。

王力缓缓地摆摆头，只是干笑几声，就是不吱声！我后脊梁有一股凉气窜上来：搞政治斗争，难道真要像王力这样卑鄙吗?戚本禹此时“腾”地站起来，拂袖而去。我们喝道：“你站住，你这是分清是非的善良态度吗?”他仍旧不睬，推门而出，走了。

这次谈话以后，北京市到处流传，说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训斥了戚本禹，内容是：“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十九级干部吗。我爹我妈的级别加起来，还没有你那个数呢！”其实，这纯粹是造谣，而且作为手段，很可能是戚本禹惯用的。从戈培尔起，反动的家伙就懂得用谣言杀人，这是反动政客的铁律。戚本禹算是精通此道，让人佩服。1月25日早晨，数百名手持木棒、铁矛的学生包围了我住的宿舍楼。立刻，就在楼道、阶梯、各个房间展开了一场厮杀。骂声、低沉的呻吟、硬器打在肌肉上的声音、助战的广播喇叭，混成一首变调大合奏。看着那些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同学，我知道，再这样下去，终究寡不敌众，非出人命不行。于是，索性走了出来，向造反派喝道：“我是卜大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抓联动，你是联动头头。”

“第一，联动从来没有封过官；第二，我可以跟你们走，但不许再打人、砸东西。”我走了，先是到了清华大学井岗山总部。蒯大富摆出审判长的架势，我愤恨不已，真想一拳向这张小人得势的丑脸打去。这当然不可能，我只能把他臭骂一顿。这个名声赫赫的什么“司令”，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嘴巴张了几次都没吭气。我感到诧异：怎么回事，都说他心狠手毒，又很有辩才，今天为什么这样克制。后来才弄明白，根本不是他不想回击。而是那天，正有阿尔巴尼亚客人在他那个楼访问。对中国的最伟大最忠诚的外国朋友，这尊地中海的灯塔、亚的里亚海上的雄鹰、海角内的知己、天涯内的毗邻，当时谁都毕恭毕敬。霍查几乎成了第二个毛泽东，除了能看到这二百万人小国的电影外，什么也没得看。现在正好有阿国的第二把手、国防部长巴鲁库来访，若从这里传出打人叫骂声，不是要坏中央的大事、破坏中阿友谊吗？

外宾走了，他们把我押送进了公安部，在那里戴上了手铐，接着又送到了北京半步桥监狱。预审员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当时怒火中烧，大吼：“什么要求？你们立刻放我出去！我没有任何罪行，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立刻放？告诉你，这是幻想。”

预审员还真没有说错。我确实是太幼稚了。第二天，我写了一大堆条子，要求他们交给毛主席、总理、江青和好多其他人，要求他们下令释放我。当然，什么回音也没有，以后的整整六十天居然没有人再搭理我。被人蔑视比被人给点压力还难受，生命可以承受压力却不能承受“轻蔑”！好在这咫尺天涯里我又结识了不少好人，比如苏静的儿子苏小前、李井泉的儿子李立峰和科技大学、航空学院那些写过《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大字报的老大哥们。

4 月 22 日晚上，公安监管人员忽然跑到各个牢房点名，点完一个出来一个。不大功夫，院子里就满了人，足足上百名。担任监狱领导的军代表开始训话：“同志们——”同志？我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三个月，没有人叫过我们“同志”。有人小声喃喃：“别看说得好，什么‘同志’，还不是要判刑、批斗、送死。”我的心“咯噔”一下，虽然在狱里不知多少次想过挨批斗的滋味，但如果真给斗死了，我还是会遗憾的，才只有十八岁的年华呀，太年轻太年轻了。真要蹉跎岁月铩羽而去了吗？

几辆大型轿车把我们载到目的地，一看，竟是人民大会堂南门。哇，门前聚集着密密匝匝的人群，“打倒联动”、“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这场景似乎在印证我们来前的预测：斗争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批判大会。八年前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日子，我曾经在这里听过陆海空三百将军豪壮的大合唱；三年前，我戴着红领巾看过周总理亲自组织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不到一年前，我还在这里见过伟大的毛泽东。今非昔比，身陷囹圄……望着熟悉的廊柱、熟悉的金瓦、熟

悉的华灯，我咬着嘴唇，抱着赴难的决死心情，进入了右首第一厅的会议室。大家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毯上，满不在乎的神情里隐含着紧张。

忽然，会议厅的大门敞开了。一行人鱼贯而入，为首的竟是周恩来总理！后面跟着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不知是他们中的哪一位，让工作人员给坐在地上的"难友"搬来椅子。奇了？看来一个小时前军代表那声"同志们"还真的没有恶意与嘲弄。

正当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当会场一片可疑的肃静和等待时，江青以她独有的嗲声嗲气开口了："同志们呀，今天晚上，我已经吃了安眠药了。嗯，还是来了。他们，"她顿了顿，用眼睛扫扫左右，"要我先讲讲话。有个北京大学附中的女孩子写了信，要救她的战友牛皖平。牛皖平，你在哪儿？好、好、看见了，你到前边来坐吧。她总是说要救你们——"江青摘下玳瑁眼镜，擦擦又戴上，"委屈你们啦，同志们。"

我听到这里，感到眼睛在发湿发涩。朦胧中，看见周总理亲切的身影在晃动。

"还有清华附中的同学也被抓了，"总理发言了："卜大华、熊刚，你们站起来。好好，坐下吧。你们这里我还认识个叫小斌的小姑娘。抓人的事，我是在广州时知道的。我们不能不教而诛呵。孔丹、董良翮，我是解放前在西柏坡就认识你们了，还抱过你们，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

座位上已经有轻轻的抽泣声。总理接着说："我回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抓人的办法不好，不能解决问题。今后你们出去了，还是要干革命的。"这时江青插话，"对，还要给他们配办公室、配电话。"总理又讲："昨天我已经与那些造反派的同志打了招呼，说要放你们出去。他们不同意。你们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今天，我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话音未落，全场已经是掌声一片，哭声一片。一个永远让人感觉陌生的福建口音响起来，喔，是陈伯达："有些人，有些红卫兵搞颓废，你们在里面，他们就在外面搞哭坟、搞打砸抢。砸，这个字，我以前不认得，后来是查了字典才找到。你们出去，要做他们的工作。"什么哭坟，明明是清明节给烈士扫墓，连造谣都不会。"砸"字还查字典，这位人称党内的"老夫子"还真有点迂。

康生也操着浓浓的山东话开始"训导"："老百姓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当中虽然很多人出身不好（指我们中不少人的父母被打成了'黑帮'、'走资派'），那也不要紧。我还是赞成江青同志的话：'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背叛了以后还可以当接班人嘛。哈哈哈——"他干笑着。最后，江青表示："今后我们还要单独地好好谈，还要把你们的父母都请来。今天，只是见见面。"她咧开厚厚的嘴唇，尽力表现出一个女性政治家的柔情："孩子们，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今天晚上是回学习班（就是监狱）休息呢，还是现在就回家？已经很晚了，是不是明天再回家更安全些？"

"不不，不——"几乎所有人都喊起来："现、在、就、回、家！"铁窗生活能早结束一天都是好的，谁还留意那个什么鬼"学习班"。在大家的哄闹中，中央首长们认可地点点头……

我自由了！一百多天困兽犹斗的窘迫难熬刷地松弛、消失了。心里从没有这么轻松过。人不经过这样巨大的生活反差，永远也不会懂得自由的幸福、可贵。在这百多天里，我们想过人生苦短，想过满腔热血不知何处抛洒，想过爸爸妈妈，想过应该不应该有个异性朋友，想过吃，想过一切好的东西，一切平常不知好后来才知道是好的事物。当然，也想过大骂、大哭，想过愤怒地撕打，想过寻短。刚刚三个多月，我和我的狱友们，就似乎成熟、深沉了许许多多。

又一个轮回

出狱后，我们就一直等着江青说的那个“单独地谈谈”。可是左等也不见，右等也不来，真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个把月过去了，我无心再在学校傻等，就收拾行李回到了南苑的家里。

一天，忽然接到旷涛生的电话，说中央文革要接见。我虽然估计可能是江青要兑现诺言，但早已失去了原先那种期盼的热情和兴趣。不过，总不能不去，这是态度、立场问题。当天下午我和涛生来到北京卫戍区报到，然后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一到会场，不禁大失所望。接见我们的既不是总理也不是江青，而是戚本禹和谢富治。但这失望中又颇有些诧异。原来接见的目的根本不是给我们介绍几个月来的全国形势，而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小将们征求一个意见：要不要恢复已经瘫痪的共青团”。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而且是曾支持过红卫兵造反（也包括造共青团的反）的毛主席的发问，我百感交集，一时语塞。还是由于戚本禹点了名，我才开口。

戚说：“给大家介绍介绍，这就是有名的老红卫兵，清华附中的卜大华。”

我腾地站起来，并不想过分掩饰对这种造作虚伪的反感：“我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说过自己是什么老红卫兵。”“好啦，好啦”，谢富治摆摆手打着圆场：“大华同志，你对能不能恢复共青团有什么意见？”思忖片刻，我很肯定地说：“我赞成恢复共青团。”看着周围人有些吃惊的表情，我陈述着：“红卫兵组织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发展到目前已经难以保持先进性。一是它没有丝毫的年龄限制；二是没有严格明确的政治标准。弄得现在人员过杂、鱼目混珠。所以我再说一遍，赞成恢复团组织，请向毛主席报告。”

我坐下了，脑子里一片茫然，别人在说什么我都没有听见。只觉得心中总有块垒难平。从建立红卫兵也就是取消共青团，从摘下团徽戴上五分钱一个的小小的毛主席像徽，直到今天重新从自己嘴里肯定共青团否定红卫兵，这是多么巨大的转折呀！而这转折偏偏又发生在我们这些红卫兵创始人身上，它就具有了辛辣的讽刺意味。我还记得少共国际师的师长肖华同志曾经深情地说过一句话："共青团，我的母亲。"今天，我们能这样说吗？这究竟是历史的无情嘲弄，还是我们对历史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呢？

年轻的朋友们，那些整过我们也挨过我们整的同代人，虽然在那个迷狂的岁月我们都没有驶达彼岸，眼前仍然是森然的冰山冰水，但我们毕竟奔驰过，毕竟赢得了奔驰时两侧变幻的风光景色。现在，我们都不怎么潇洒地与那场运动不辞而别，将来还会满不在乎地投身于别处吗？

结束了，是元气耗尽的结束，还是积蓄新生的结束？

我没有想清楚，我还在思索。

（选自《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8 月初版）

李　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纪实

1967 年 1 月的中国是个大漩涡，漩涡中心在上海。

文化大革命开展了才半年，天下已经大乱。两股相反运动的潮流疯狂地碰撞着，形成吞噬一切的大漩涡。一股经济主义风潮，是群众中日趋泛滥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运动，几乎使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完全瘫痪。另一股夺权风潮，从《文汇报》夺权开始也越刮越猛。

这两股相反运动的力量其实互为因果。经济主义风潮是造反派接管权力的借口，而造反引起的混乱和夺权造成的权力更迭时期的真空又加剧了经济主义泛滥。这个大漩涡搅起的拍天巨浪使一切文化大革命的弄潮儿惊恐万状。

唯有毛泽东是善于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舵手。愈是滔天的巨浪愈是激发他的豪情。他要以自己的巨手力挽狂涛，推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可能，毛泽东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甚至比遵义会议更重要。他发动这场革命时就已经决心打碎这个他在遵义会议上挽救的党和亲手创建的共和国。现在，到了真正付诸实行的最重要关头了。

权力的更迭是一场革命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一场动乱最危险

的陷阱。权力的更迭不是使整个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便是走向崩溃和毁灭。

这场灾难性的大崩溃是从1967年1月开始的。

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来的电话

新年的钟声敲了二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案头的电话铃声响了。

这是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周恩来急切地想了解上海的情况。几天前，上海康平路上发生了全国另一次大规模武斗，十万造反派血洗了在康平路请愿的赤卫队员，接着又在昆山摆开了战场。上海全市工业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沪宁沪杭铁路已经中断了26个小时，由此引出的连锁反应将造成怎样的局面很难预料。

周恩来要求陈丕显出来工作，跟造反派商量，解决好昆山事件，迅速恢复铁路交通。

在这之前半小时，张春桥也给陈丕显打过电话，吞吞吐吐地讲了这个意思。陈丕显觉得他来意不善，正费猜疑，周恩来的电话使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事先与中央文革小组和张春桥打过招呼。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一直关注着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形势。安亭事件后，上海形势日益恶化。上海市长曹荻秋已无法正常工作，而陈丕显这半年多来一直在休养中，没有公开与造反派发生过冲突。为了缓和矛盾，周恩来指示陈丕显抱病出来接替曹荻秋的工作。周恩来要他与造反派共同商量行事，是为了减少造反派方面的阻力，尽快掌握上海的局面。周恩来的安排既是保护陈丕显，又防止上海的权力落在极左派手中。

张春桥是看透周恩来意图的。他到北京后已经看出中央文革与国务院一直在暗中较量，但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较量。

周恩来的指示，张春桥表面上不得不执行。他也给陈丕显打了电话，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同时，他在背后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使得陈丕显即使站出来也无法工作。

张春桥给陈丕显打过电话之后，立即又给徐景贤打电话。徐景贤的笔记本上记录的时间是："1月1日凌晨1点半，春桥同志来电"：

> "中央文革经过讨论，认为现在沪宁、沪杭路交通中断，旅客纷纷打电报给中央，有人在路上生病，情况比较严重。这个情况的造成，原因就在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为了从国家利益考虑，希望转达各个左派，及早恢复铁路交通。市委及工人赤卫队的一小撮人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
>
> 告诉各造反派组织：这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是，支持陈丕显，我们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陈丕显的帐，以后要算的。
>
> 革命造反派的斗争矛头主要针对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个电话比周恩来给陈丕显还早半小时。张春桥是向上海的造反派交底。这时的主动权在张春桥手里。

陈丕显一方面派出副市长在昆山做调解工作，一方面命秘书于宝年连夜通知各大造反组织头头到东湖招待所开会，商讨当前形势。他自己立即赶到铁路局去研究疏通铁路交通问题。

于宝年打电话给当时影响最大的学生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委托他们通知各造反派组织。当时市委机关已经运转不灵。

东湖招待所是市委机关招待所，在挨近繁华的淮海路的一条

小马路上。自从康平路市委大院引人注目之后，陈丕显就把这儿作为临时办公处。

一张谁也不会料到它身价的传单

凌晨三时许，陈丕显从铁路局赶回东湖招待所。

各大造反派组织头头已经陆续赶到了。陈丕显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总理要他出来工作的指示。造反派们将信将疑。一个红卫兵头头把陈丕显的传达记录整理成文，然后跟陈丕显秘书于宝年一起用保密红机子与北京总理办公室核对过，证实准确无误。这些红卫兵头头才肯相信周恩来确有指示。

但是，王洪文等人还是不信，认为陈丕显伪造周恩来指示。王洪文说陈丕显召开这个会是个阴谋，恢复铁路运输是为转移斗争大方向，包庇赤卫队过关。王洪文这些人刚刚从康平路撤出来，还陶醉在武斗的胜利中，哪里有心思来讨论周恩来这些温和的指示。

徐景贤已经从张春桥处了解背景，但他不动声色，来个移花接木，说："我们造反派听总理的，不是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解决"。

"工总司"一个头头叶昌明后来回忆：王洪文一听开这个会，就往靠墙的座位上一坐，打起呼噜来了。直到天亮，王洪文一觉醒来，问了一下会议情况，说："这种会有啥开头，没有一个名堂，走！我们回去！"

王洪文中途退出会场，以示抗议。退出会场后，他立即打电话给北京的张春桥，想摸中央文革的底，但没有找到张春桥。后来王洪文了解到徐景贤得风气之先，还对他卖"关子"，很不高兴，对此耿耿于怀。

会上，决定成立"火线指挥部"，一方面组织队伍去昆山劝导赤卫队，另方面起草一个告全市人民的传单。

撰写这篇传单是陈丕显的主意。他认为在当时各级领导机构已经半瘫痪的形势下，要让中央精神尽快地直接与群众见面，只有通过传单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最为群众接受的形式。传单内容主要是要求工人返回生产岗位，停止武斗，实际是贯彻周恩来电话指示的精神。

参加会议的红卫兵头头都表示同意。他们也开始担心上海工厂的混乱局面继续下去，会影响国计民生。

陈丕显正与一群红卫兵草拟那张传单，才写了半张报告纸，门外涌进一帮人，是“二兵团”的造反队员。他们来“抢”陈丕显。

“二兵团”头头耿金章是将陈丕显作为人质扣押。1966 年底到 1967 年初，各级当权派都很吃香，有的找他们签字要经费，有的揪他们去批斗以提高批判会的规格。在“康平路”事件之后，耿金章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他决定抢一个上海最大的当权派在自己手里，抬高“二兵团”的身份，显示“二兵团”的力量。

第二天，红卫兵头头向在招等所的各造反组织代表宣读传单初稿，大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并报了各组织的名称，作为签名单位。由交大“反到底”的杨根据这些意见修改后，找陈丕显签字。

长期以来，这份传单被说成是“一月革命”的先声，是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关键性文件，是造反派的伟大功绩。今天看来，这份传单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但毕竟是上海市委负责干部在非常形势下作出的非常努力。粉碎“四人帮”后，这份传单的底稿在上海博物馆找到，最后一页上留着陈丕显的亲笔签字：

文汇报社：

即印 20 万份

不得延误

陈丕显 1 月 4 日

在这份传单上签字的有 12 个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名列第一。但这与王洪文完全没关系。王洪文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不见人影，其实他是飞到北京去找张春桥了。工总司常委范左车代工总司签了字。王洪文返沪后还为此训斥他一顿。

徐景贤对这张传单也不感兴趣。他自以为得张春桥的密旨，根本不想为陈丕显添些许功劳。因此，“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榜上无名。

“红卫军”开始签了字，但后来这个组织被中央点名指令解散，所以签名被拉掉，只剩 11 个造反派组织。

当时各种各样的“通令”、“宣言”、“声明”、“勒令”多如牛毛，谁也不会料到这张传单以后的身价。

《文汇报》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先声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没到上海，上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1 月 4 日凌晨，上海市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的是一张面目陌生的《文汇报》。

这张创办于 1938 年 1 月 25 日的报纸，原来以老书法家谭泽闿的题字作报头，沿用近 30 年。这一天报头突然改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使人兀然。在头版头条位置，又重新发表了毛泽东 1957 年 7 月 1 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那篇著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意味着对这张报纸过去的彻底否定。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实际是一篇“夺权宣言”。

《文汇报》夺权成为上海以后一系列夺权事件的先声。

1 月 4 日晚上，红卫兵头头杨拿着陈丕显签过字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到文汇报社，与刚刚夺了权的造反派头头商量能否在第

二天的报纸上发表。

报社造反派头头后来承认：

> “我们也觉得这张大字报很重要，但不十分理解，更不知道是十分重要的文件。我们只知道这是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发言，是真正造反派的声音，我们的报纸必须让他们发言。”

但是，在公开发行的“官办”报纸上发表群众组织的传单在当时尚无先例。为了谨慎起见，他们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派联络站，拟通过他们将传单送给刚刚到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审阅。姚文元听了汇报之后，很冷淡地说：“我们刚回来，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也没法发表意见，登不登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姚文元也没想到这份传单以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便随意地放过了。

姚文元这个态度又和张春桥对夺权后第一天出版的《文汇报》的评价有关。姚文元始终都看张春桥的眼色行事。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听到了《文汇报》夺权的消息，看到了夺权第一天出版的《文汇报》，很不高兴。当时在场的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头头朱后来回忆：

> “张春桥在武康路2号市委写作班看到夺权后第一天出版的《文汇报》，对于重新刊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大为不满，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五七年反右时写的，那时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同现在都不一样。他针对报社造反派发表的《告读者书》说：文汇报早就造反了，批判《海瑞罢官》就是造刘、邓的反，现在说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是资产阶级方向，就是自己否定自己。他又说，

《文汇报》假如要表示替造反派说话，可以写一篇很有分量的社论，题目就叫《永远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旗帜》。”

张春桥对1月4日《文汇报》采取的两个大动作都横加指责，可见张春桥对《文汇报》的夺权并不热心，也没有估量出它的意义。这时的张春桥已经完全把上海看作他的地盘，任何没有经过他点头的大动作，他都不会支持。只是后来毛泽东热情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文汇报》的夺权，他才转过脸来。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表态，《文汇报》还是在第二天刊登了《急告全市人民书》。

《文汇报》这个突破常规的举动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

但是，《文汇报》的夺权马上波及了《解放日报》。1月5日，《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也宣布夺权。从此，上海最主要的舆论阵地，两张大报的领导权落入造反派之手。

《文汇报》夺权揭开了全国夺权斗争的序幕。

张春桥回上海摘桃子

张春桥与姚文元回上海领导运动，是毛泽东的意图。

一个月前，张春桥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使工人造反派作为主力军登上文化大革命舞台，为进退维谷的文化大革命找到了转机。现在，毛泽东要张春桥再回上海领导运动，让上海再次为全国作出榜样。

江青也同意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虽说走了张春桥，身边少了一个军师，但上海对于中央文革派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张春桥曾对王洪文等人说过：“这次是江青、陈伯达批准我和姚文元回来的。”朱永嘉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中，张春桥曾

补写了一段说明："江青同志说，张、姚回去可以成为一个凝聚点，免得群龙无首。"

张春桥以什么身份回上海，颇费了一番心机。现在马上取代陈丕显、曹荻秋，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张春桥可没那么傻。他再三提醒造反派"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拉"，"还是应该把担子压在走资派身上"，他自己当然更不会把绳子往脖子上套了。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特派员的身份回上海。这样，他们既可保留对上海局势的控制权，又避免对上海日常工作应负的责任。局势的发展如为毛泽东首肯，那将是他们的功劳；如果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毛泽东的许可范围，他们又不必负责；上海市委面临的大量矛盾，他们无需处理，但又保留着批评权和否决权。他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可以裁决一切，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1 月 4 日，张春桥上飞机前，特地要姚文元给徐景贤挂个电话，告诉他上午 11 点到上海，住在华山路 1245 号，要徐景贤当天下午召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主要骨干，他们要和大家见面。

1 月 4 日，傍晚。张春桥与陈丕显见面。

张春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去了北京，第一次回上海是为了处理"安亭事件"，这是第二次回上海。两次只相隔一个多月，但是，张春桥和陈丕显这两位政治对手的心境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陈丕显不得不强抑下内心对张春桥的厌恶和卑视去见这位旧日的下属，而张春桥已经看清了陈丕显必然倒台的命运故意摆足了架势爱理不理。

这次谈话的双方都小心谨慎，虚与周旋。

第二天，张春桥对徐景贤说起这件事，给徐景贤的印象是：

"他把陈丕显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谈过话，因为中央的意见是希望陈丕显站出来工作，但是，张春桥说在谈话时陈丕显表示站出来有困难。张春桥的最后结论是：看来这个人也确实难以工作

了。”

张春桥的意图，徐景贤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张春桥碍于周恩来的指示，不得不找陈丕显谈谈话，作个姿态。实际上却要制造种种障碍使陈丕显无法工作，说明他不能再胜任上海市的领导，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制造既定的理由。

周恩来与张春桥，谈的都只是解决铁路问题，让陈丕显接替曹荻秋处理眼前的混乱局面。但是，周恩来与张春桥心里都明白，问题的实质是将上海的大权交给哪一方。陈丕显出来工作，意味着上海市委没有被打倒。张春桥卡住陈丕显，就是卡住上海市委的脖子。“康平路事件”已经给曹荻秋加上了足够的罪名，使得他根本不能再主持工作。现在卡住陈丕显，不让他接替曹荻秋，就可以造成上海市委已经瘫痪的现实，逼迫中央把上海的大权交给张春桥和造反派。

老练的周恩来终于没能战胜狡猾的张春桥。因为周恩来在非常时期仍然沿用正常的手段，他的意图只能按照组织原则，通过集体讨论，经过有关部门贯彻执行。这样的领导方法在正常年代才行之有效。而张春桥一反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传统，无视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在幕后操纵和运动群众造成既成事实，又以群众的要求和名义向中央施加压力。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却能得到一向鄙视常规的毛泽东的赞赏，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非常手段发动起来的。

当文化大革命以非常手段发动之后，也只能依靠非常手段来推进了。

形势在危急中!

当造反派夺权的乌云正在上海的天空聚积，当整个社会生活开始偏离正常轨道时，经济规律第一次向人们发出黄牌警告。

上海的经济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

工厂停产，上钢三厂六个炉停了三个；

铁路瘫痪，上海站按计划每天开出货车 23 列，实际只开出 3 列；

全市七个电厂的存煤量平均只够用三天，最严重的望亭电厂存煤量只有一天半，十一只炉子停了五只；

没电就没水，自来水供应告急；

工业生产原料库存急剧下降，许多行业即将停产。

……

经济形势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问题的自发要求。开始，这是一股在地下涌动的潜流，到一月初迅速蔓延成吞噬一切的风潮。

而在这股风潮最前面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经济主义组织。

这些造反组织的名称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主义性质：

“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住房问题；

“常住临时户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户口问题；

“革命单身职工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职工家属调回上海问题；

“回乡职工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返回上海重新进厂工作；

“支疆青年家长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子女调回上海问题。

在这些经济主义造反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她当时是国棉十七厂与一家印刷厂合办的托儿所临时工。

这类组织在 1967 年初竟然多达 354 个，这个数字还仅仅是到当时市委革命委员会某机构去登记注册的，不登记注册的更多。

这些造反派们争先恐后地把局长、处长、科长和厂长们抢来抢去，强迫他们批各种经济要求的条子。什么补发奖金、加班费、

营养费、交通费、洗澡费等等，五花八门。总之，想出各种借口捞钱。

顿时，银行柜台前挤满了人，几百个单位竞相提款。据一份资料统计：

△“从1月1日到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及所属各区办，七天中以补发工资、福利费、营养费、奖金、劳动保护用品费、串联费等形形色色名目发出的现金，共达2800万元。”

△“市场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高档商品。例如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中百一店1月1日至8日销售总额比上月同期增长25.1%，比去年同期增长36.3%，许多商品脱销。例如，8日一开门，一下子300多人冲向地下室商场购买缝纫机，有100多人冲向自行车柜台，手表更是紧张，往常不大有人买的400—500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抢销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出售量更是成倍增加。”

△“有些用户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郊区及市中心都接连出现脱销现象。”

△由经济风又引出大量人口倒流返城。“长兴岛各农场下乡知识青年一万多人，跑得只剩100人，造成牛羊大量死亡。支内职工倒流现象也很严重。仅仪表、化工、机电一局三个局近两年支内的26000多名职工中，目前回沪的已近2万人。”“三线许多重要企业停产，如西安变压器电镀厂，全厂职工1500人，都是上海工厂调去的，现全部返沪；贵阳永阳电表厂也都是上海职工，现在走得只剩下厂长、党委书记各一人。”

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

形势在危急中。

经济主义风潮中的各种人物

最早站出来抵制经济风的，除了宁愿挨斗不肯签字的干部外，就是银行职工。

那些日子，银行成为矛盾的焦点，每天清晨银行还没营业，门口就挤满了人，直到晚上关门人群还不散去。各单位的大宗提款影响了市民的信心，个人存款户也争先恐后地挤兑提款，造成了经济恐慌心理。

1967 年 1 月 6 日，上海市人民银行小东门分理处部分职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出特急电报，对形势忧心如焚，请求毛泽东采取措施。

各区分理处职工也像小东门分理处职工一样焦虑不安，他们纷纷向市分行和市财政局告急，希望上级机关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这股风潮。有些银行职工走出柜台，向提款的人们做说服工作。有的分理处则采取拖延的办法，宣布现金提完了，明天再来。

红卫兵们眼见经济主义风潮来势汹涌，银行库房有被提空的危险，纷纷赶到银行门口，向挤在那里等待提款的人群做宣传。

在这个关键时刻，红卫兵又一次显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纯真可爱的一面。他们是学生，书生意气，没有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和经济的压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大都出于理想的诱惑、政治的动机或表现自己的心理，几乎没有经济的考虑，这使他们敏锐地发现问题，最早出现在银行门口，并以他们为主体成立了“反经济主义联络总部”。

另外，还有一些机关干部，他们从大局出发意识到形势的危险性，便以机关造反派名义上街散发传单，宣传抵制经济主义，只

是他们没有红卫兵这样大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影响。

在这股狂潮面前，王洪文却无动于衷。

有人去问王洪文怎么办？王洪文不置可否。

当时的工总司组织组长曾回忆：

“临时工外包工成立跨行业组织，来到工总司找王洪文要求得到支持，当时王洪文满口答应，表示支持，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当时我也曾接待过他们，但我实在管不了。王洪文妻子和戴立清都是临时工，所以王洪文全力支持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王洪文所以不表态还有另一层顾虑。工总司本身是个松散的联合体，下面的造反队员到底在干什么，总部并不清楚，更管不着。王洪文知道下面许多造反队在逼迫当权派签字补发工资奖金，如果他出面去干涉，触犯了这些人的切身利益，会把这些人都推出工总司，让对手拉过去。王洪文现在耽心的不仅是造反派的对立面，而且是造反派内部的对立面。耿金章的二兵团日益壮大，正是他的心腹之患。

有人去问耿金章怎么办？耿金章觉得自己应当有所动作。

1月8日，耿金章去兴国路招待所找张春桥：“春桥同志，外面在刮经济风，您知道吗？”

张春桥：“知道了，这都是陈丕显、曹荻秋他们搞的嘛！”他一下子便把责任推给政治对手。

耿金章：“那你看怎么办？”

张春桥吐了一句永远正确的空话：“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有问问群众，看怎么办？”

耿金章更没办法，说：“是否开个会，研究一下？”

张春桥漫不经心地说：“你有办法，就开吧……”

张春桥对越来越糟的经济形势一点都不担心，他可以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上海市委。因此他对耿金章的建议毫无兴趣。

于是，耿金章又去衡山饭店，闯进被自己扣押在手的陈丕显的屋子，劈头就问："你这个当权派还坐在这里，外面都在刮经济风，你乱签字是嘛?"

陈丕显说："我不知道。"

耿金章火了："你不知道?! 外面为啥发下那么多钱? 你不知道? 谁知道! 根子就在你们身上!"

陈丕显还是镇静地说："我确实不知道。我同外面已失去联系，又调不动什么人，我怎么会到处乱签字呢?"

耿金章想想陈丕显说的也是实情，便问："那你看怎么办?"

陈丕显说："是否你们召开会议研究一下。我是不同意这样搞的。你们开个会，将这股风煞一煞!"

与前几天组织撰写《急告全市人民书》一样，陈丕显完全明白，这场经济风是造反派刮起来的，已经失去行动自由的陈丕显还能做什么呢?

张春桥与王洪文再次失算

耿金章回到永福路二兵团总部，与几个头头商量后决定，召集一些造反派组织开个会，批判市委领导人。

在耿金章们看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只要"大批判开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当权派们揪来狠狠批一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除此之外，耿金章也拿不出其他办法。

因为形势紧急，他们决定 1 月 8 日当天下午就在锦江饭店开会。

耿金章先给张春桥去了个电话，希望张春桥和姚文元能参加这个会议。

接电话的是张春桥的秘书。秘书表示：张姚还是不参加会议为好，你们自己开吧。

会议在锦江饭店北楼小餐厅召开，列会的有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

王洪文没来参加会议。耿金章让人打电话通知他，他不愿参加，说这是把矛头对准造反派。他派戴立清来参加会议。

徐景贤也没有参加会议。他听说王洪文不肯出席，便觉得自己也不出席为好，免得得罪工总司，但为了掌握方向，他临时派了朱永嘉去参加会议。但特别关照朱永嘉，他只是作为观察员。

耿金章把能够揪到的一些主要工业局的领导干部也揪到会场。他对这次会议根本没什么打算，只准备批斗一番干部。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陈丕显要求大家讨论形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造反派们根本不让他讲话，而耿金章逼着他撤局长们的职，他认为只要把那些干部撤职就可以刹住经济风。

一位与会者后来这样形容会议的情景：

"耿金章把当时主要局的头头也都叫来了。耿金章硬逼陈丕显宣布撤他们的职。陈丕显同志坚持原则，不肯宣布，说：'我个人没有权力来宣布，对有的人任免也要通过中央的。"总之，陈丕显同志不肯办。耿金章就当场批陈丕显同志。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兜来兜去谈这些。

"当时会议由陈丕显、耿金章二人在前面主持。我们坐在下面参加。耿金章一会儿要陈丕显撤这个人的职，一会儿要把谁拉起来，宣布撤职。陈丕显就是不肯。这些被揪出来的老干部就站在旁边，低着头，有好几个小时。"

陈丕显坚决不同意将刮经济风的罪名推到各级干部身上，不

同意撤干部的职。他建议再写一份传单，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办了。

会议决定起草一份传单，由到会的“红革会”、“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和朱永嘉负责起草，定名为《紧急通告》。起草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红革会”红卫兵吴。朱永嘉起草的前半部分被人全部重写了。

《紧急通知》写成后，当场宣读。“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个组织，本身就是经济主义性质的。自然不同意写这份传单，不肯签字，被赶出会场。

王洪文自己没来开会，他派来的戴立清在会上大吵大闹，说：“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是批陈曹，反经济主义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大阴谋！”

在《紧急通告》签字时，工总司组织组长丁记得曾有人请示过王洪文：

“我记得有人打电话到工总司向王洪文汇报情况，王洪文表态反对签字，说这是把矛头指向群众，‘你们不能这样干，你们这样干，我们组织就要垮台了。’”

结果，是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接着耿金章又签上了二兵团的大名，作为一个独立的造反组织名列工总司之后为第二。

最后，耿金章还曾派人去国棉十七厂找王洪文补签字。王洪文说：“既然是你们搞的，那你们自己签字。”

当晚，参加会议的造反派将《紧急通告》的底稿，由朱永嘉交徐景贤，送《文汇报》发表，刊登在1月9日《文汇报》第三版上。

毛泽东对两张传单作出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1967 年 1 月以来的上海形势瞬息万变。老谋深算而又自作聪明的张春桥回到上海之后还没有摸到头绪。而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已经抓到了上海的脉搏。

1 月 8 日晚，中央文革小组从北京给张春桥打电话，告诉他：毛泽东看了《文汇报》夺权后三天的报纸，很赞赏《急告全市人民书》。毛泽东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要《人民日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毛泽东在 8 日的谈话中，还对文汇报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

1 月 9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 1 月 8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被写进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因此，使编者按的语气显得更有权威性。

这种前所未有的声势使全国震动了！

就在 1 月 9 日这天，《文汇报》第三版上刊登了《紧急通告》，也加了编者按。自然，它完全被头版头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所左右。

陈丕显看到报纸后，特地打电话给张春桥。这个电话是由张春桥秘书何秀文记录下来的：

"报上登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我最近还没做什么事，就是搞这两份东西。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

局的负责人参加，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共同搞出来的。”

张春桥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他有点意外。他见到当天《文汇报》又刊登了《紧急通告》，更是恼火。张春桥与王洪文一样，对反经济主义十分敏感，于是，朝着徐景贤大发脾气。

“五号刚刚发过《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怎么又来一个通告？”

“你为什么让朱永嘉去参加这个会议？”

徐景贤听后十分紧张，回到武康路 2 号把朱永嘉狠狠批了一顿，骂他不该擅自代表”机关造反联络站”在通告上签字。

王洪文知道张春桥的态度后十分恼火，在工总司总部里，与黄金海等人围攻耿金章，质问耿金章有什么资格代表工总司签字，宣布耿金章签字无效。

张春桥再次失算。

他没有想到，《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毛泽东做出了一系列的决策，对这份普普通通的传单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1 月 11 日中午，中央文革小组给张春桥和姚文元打来电话，告诉他们：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机构的名义给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一个贺电，高度评价《紧急通告》。贺电已送毛泽东处，正由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也已写好。贺电和社论今天晚上广播，明天见报。

张春桥接到这个电话再也不感到意外了。他马上领会了毛泽东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意识到目前上海形势对毛泽东的文化大

革命全局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张春桥立即命令徐景贤通知召集工总司等40多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头头，到原上海市委党校开会。他要抢在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新闻联播节目之前，向上海的造反派宣布这个消息。

张春桥一反前几天自己对《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毫无兴趣的态度，似乎自己一开始就是这两份传单的支持者和倡导者。

张春桥大言不惭地说："我和姚文元到上海才一个星期，上海的形势已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两次肯定了上海的形势。"他又说："除去上海刚刚解放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给上海人民发过贺电，以中央名义给群众组织发贺电，而不是给上海市委，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机构联名发贺电也是第一次。这是对上海各革命造反组织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给了我们最大的责任。"

张春桥俨然以群众代表自居："我已给中央回电，请中央放心。"并说现在召集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办？张春桥建议马上筹备召开一个庆祝大会。他要借中央贺电的东风，向上海市委发起总攻。

张春桥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他不仅贪人之功为己有，还要倒打一耙，置人于死地。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央贺电和《紧急通告》之后，张春桥又把《文汇报》的造反派头头叫来谈话，故意表白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有些思想，我们在北京时曾经讲过，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言下之意，这两个文件都是按照他的思想搞的。

张春桥深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个文件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将占有的地位，总想把这个功劳归于自己，以

后，他曾多次说过："陈丕显说这两个文件是他搞的，真可笑！功劳怎么到他的身上去了。"

他又多次表扬朱永嘉，说这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斗争第一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是他派去的。

朱永嘉心领神会，投桃报李，在《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这位历史学家篡改历史，硬在1967年1月9日这一天的内容上加了"《紧急通告》发表前，张春桥、姚文元审阅"这句话。

王洪文也和张春桥一样厚颜无耻，他不止一次地对耿金章暗示："那个《紧急通告》是我要你搞的，不是吗？"

在党中央贺电发来之后，他更是以这个贺电是中央打给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组织的，口口声声说："这是中央对我们工总司的关怀和支持"，"工总司是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

十年后，当"四人帮"粉碎，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人们找到了那份被冷落多年的有陈丕显亲笔签字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的原件。那位历史学家朱永嘉不得不承认那段历史事实：

> "8日的那次会议以及《紧急通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预闻过。如果说有关的话，陈丕显却是有一点因缘关系，他在那里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按历史事实，陈丕显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中，是有一点功劳的。"

第一次流产的夺权

毛泽东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上海造反派发出的《贺电》造成了戏剧性的高潮。

"夺权！"顿时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夺权风即刻席卷上海滩。

那几天的形势瞬息万变，许多领导机关今天被这派组织宣布接管，明天又被那派组织宣布夺权；一会儿一大群陌生人闯进来夺权，一会儿夺了权的造反组织又发生分裂，宣布夺权无效，再重新夺权。到1月中旬，夺权风愈演愈烈，许多单位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公共财产遭到极大破坏，生产的瘫痪半瘫痪仍在继续。

在这股夺权风中，有些干部以国家利益为重，为了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砥柱中流。

1月12日下午，当造反派前往上海铁路局夺权时，铁道部副部长兼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马上贴出《郑重声明》：

“我是铁路局局长，仍在执行自己的职务！”

他拒不交出大印，坚决不向造反派交权。第二天，他又让人给铁道部部长打电话：“就说我邵光华讲的，为了不中断工作，请铁道部迅速派个局长来，或者派军队来接管，否则会造成群众斗群众。”

邵光华因此被造反派视作“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眼中钉。造反派立即开大会批斗他，将他拉到全局各站各段去游斗，以后终于将他迫害致死。

但是，能够像邵光华这样硬顶的干部并不多，大多数干部在中央贺电的压力之下已经开始“转弯子”，强迫自己“跟上形势”，“重新站队”。

第一次全市性夺权是“二兵团”与“上三司”的联合夺权。

“上三司”（即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原是“红三司”的一部分。1966年12月底，因为观点分歧发生分裂，而从“红三司”中拉出来另立山头，以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赵全国为头头。

1月初，“上三司”总部连日召开会议，分析上海夺权形势，雄

心勃勃的赵全国提议建立群众性的“督管会”，把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夺过来。赵全国明白夺全市的权单凭红卫兵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工人造反派。他在工总司和“二兵团”之间选择了“二兵团”。一则因为“二兵团”在镇压赤卫队时显示了实力；二则因为耿金章比王洪文好打交道。

1 月 5 日，赵全国去“二兵团”总部见耿金章，要求“二兵团”参加联合夺权。耿金章一口答应。

不几天，“二兵团”与“上三司”便成立了工人学生联合夺权机构。

1 月 14 日，这个联合夺权机构召开第一次会议。赵全国主持会议。作出三项决定：

1. 由耿金章向张春桥汇报，我们为什么夺权。

2. 赵全国等人分头与工人和学生造反组织联络，扩大联合夺权。

3. 决定进驻上海市委、市人委夺权。

赵全国还建议，让张春桥担任夺权后的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请耿金章向张春桥试探一下，看他是否同意。

耿金章当场打电话给张春桥，直截了当地报告了夺权的打算。

张春桥答：“很好，我同意。等我请示中央以后再给你们答复。”

耿金章放下电话，转达了张春桥的话。

赵全国说：“不管他，先斩后奏，先夺权再说。”

耿金章还有些犹豫：“光我们夺权，人家会有看法。”

赵全国退了一步：“那先派人占领外滩、延安路和康平路的办公楼。”

耿金章不明白：“占领这些房子干什么？”

赵全国解释说："等上面批准了，答应我们了，这些房子就可以用起来了。"

耿金章以为有理，同意了。

1月15日凌晨3时半，耿金章要"二兵团"头头孙玉喜调1500多人，与"上三司"200多红卫兵，占领了外滩市人委办公大楼，延安西路市委和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大院插上了造反队和红卫兵的大旗。

耿金章宣布了由红卫兵起草的"接管上海市委第一号至第四号'通令'"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他们又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大红喜报，散发传单，庆祝夺权胜利。

耿金章的心里不踏实，同赵全国商量，光这几个组织夺权不行，还要再联合一些组织，声势更大一些。于是，他们找了三十二个造反组织来商量如何进一步夺权。

耿金章还是心虚，问赵全国："如果张春桥不同意怎么办？"

赵全国自信地说："他没有理由不同意。"

耿金章："我们用什么名义夺权呢？"

赵全国想了想："当然是张春桥、姚文元。"

这第一次夺权名义上是"二兵团"耿金章领衔，实际上是赵全国在指挥。

张春桥当即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表示自己的意见："暂不宣布，等时机成熟以后再说。"同时马上召见耿金章。

凌晨7点，耿金章夺权不到四小时，就接到了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的电话，要耿金章立即去兴国路招待所。

耿金章赶到兴国路招待所，徐景贤已经在那儿了。就是他向张春桥通报了情况。

张春桥不客气地问耿金章："你占领这些空房子干什么？你占

领这些空房子根本没有用。市委这些领导照样可以办公。不能占，你马上给我撤！”

耿金章被张春桥训得莫名其妙，连忙为自己辩解。

张春桥不耐烦地说：“我已经对你说了，时机不成熟，何时夺权，我再对你讲。你回去要对赵全国做工作，对他们讲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准备向中央汇报。”

耿金章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时机不成熟。但是，他被张春桥的气势镇住了。

随后，张春桥又温和地说：自己的心与“二兵团”是相通的，说“二兵团”是工人造反组织，不要与“上三司”这帮自以为是的学生组织搅在一起，要“二兵团”马上撤出来。

张春桥软硬兼施，徐景贤则在一边帮腔，说得耿金章终于同意了。

耿金章回到“二兵团”总部，立即向三个被占领的机关打电话，要“二兵团”人员撤出来。从占领到撤出，前后只相隔几个小时，所有人都莫名其妙。

毛泽东提出群众接管政权的思想

1月15日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张春桥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 今天政治局开会，毛主席要我打电话给张春桥，要春桥告诉第二兵团的群众组织，赞成他们推选张春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两个人我知道。还应当有一个更多人的名单。也同意张春桥的意见，暂不宣布，做一做工作，多搞几个回合，再宣布。原则上是自己解放自己。告诉第二兵团等接管组织，让他们知道党中央

和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

毛主席说："上海这个办法好，群众接管这个办法好，比改组北京市委办法好。"

毛主席说："我们过去的革命，是军队打江山，农村包围城市，进城以后，组织原封不动，自下而上派人接管，旧人员包下来，解放战争发展很快，老党员进了城，有些人变了质，主观得很。现在这个办法，群众起来夺权，上海这个办法好。看起来，上海11月上旬，革命力量小，只有千多人。两个月，上百万，群众的力量不可抗拒。"

毛泽东对二兵团夺权的高度评价出乎张春桥的意外。但毛泽东对他未来地位的安排又使他高兴，尽管他反对通过夺权行动，但他在毛泽东面前又得了一分。

1月16日凌晨2点，张春桥让秘书打电话通知耿金章立刻来见他。

张春桥见了耿金章，说："现在我告诉你，毛主席看了你们发出的电报，很赞成这种自下而上提名当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办法，还要我和文元考虑一份委员的名单。"说着张春桥拿出刚才王力来电的记录给耿金章看了一遍。

张春桥又说："因为你是这几个夺权的组织最主要的组织者，所以，我向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希望你去找其他几个组织一起谈一下。"

耿金章看到电话记录上毛泽东提到了"二兵团"，肯定了他们的夺权，非常激动，于是连连点头。

但是，张春桥又说："你们这次夺权，大方向是对的，提的建议也是好的，但是因为只有几个组织夺权，还有很多组织没有参加，所以我考虑还是联合夺权。你们几个组织是不是从康平路撤

出来?”

既然中央已经肯定了这次夺权，为什么还要撤呢?耿金章不明白张春桥的用意:“我们这个委员会已经有32个组织，主任是你，再加一些老干部，不就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了吗?”

张春桥说:“我已对你讲了，时机不成熟，何时成立，我再对你们讲。”

张春桥的语气要比昨天温和多了。因为毕竟毛泽东肯定了这次夺权行动。

耿金章见张春桥作了许诺，终于同意撤出。他说他去劝赵全国，如果他们不撤，我们带头撤。

张春桥听了很满意。问题总算顺利解决，耿金章毕竟大老粗，头脑简单，私心重，容易镇服，比学生好对付。所以他不找赵全国而找耿金章。

耿金章回到衡山饭店，对赵全国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赵全国不服，请耿金章转告张春桥，要求面谈。张春桥不愿见赵全国，赵全国派人分头去堵张春桥，张春桥还是不见。秘书何秀文说:“春桥要说的都已说了，你们去找老耿吧。”

耿金章在张春桥软硬兼施之下，已经背叛了他的同盟者。“二兵团”是这次夺权中实力最强的组织，二兵团撤出，意味着夺权的流产。

赵全国气愤已极。他觉得既然毛泽东肯定这次夺权，便决定赴京向毛泽东告状。

1月17日下午，赵全国等两人飞赴北京。

第二次流产的夺权

1月22日上午。在张春桥再三催促下，“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红革会”等几十个造反组织总算坐到一起来商量

成立“联络总站”。

有个红卫兵提出，联络站这个名字不响亮，容易混同一般造反组织。华师大红卫兵提出：我们学校有个“新师大公社”，一个工人造反派头头马上接嘴说：毛主席最喜欢巴黎公社，我们就叫上海公社吧！一位北京红卫兵又提出再加一个“新”字，就这样七嘴八舌，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

王洪文决定：“就这样，新权力机构叫‘新上海公社’。”

会上仍推举工总司为临时召集人，会同各造反组织代表商议成立公社的具体事宜。

会后，王洪文和徐景贤等人去张春桥处汇报。

张春桥正在高兴头上，却传来一个扫兴的消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康平路大院又被占领了，这第二次夺权的发起者还是“上三司”的赵全国。

原来，赵全国联合耿金章夺权被张春桥否定之后，立即赴北京告状，到京后听说《人民日报》将发社论支持夺权，更认为自己大方向正确，马上又飞回上海，联络了五个造反派小组织共200多人，在22日这天上午，以一辆宣传车开路，五、六辆小汽车和十多辆彩车随后，沿着南京路等几条大马路游行，声势比第一次大为逊色。中午，1时半，这一伙人冲进康平路大院，宣布成立“接管委员会”——“上海市工农兵造反委员会。”

赵全国占领了康平路大院后，立即召集参加夺权的另外四个组织头头开会，说他在北京告状，周恩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并有四点指示。这是他夺权的依据。他在讲话中还发泄了对张春桥的不满：“张春桥到上海后，就被几个群众组织控制了，不下来跟群众见面，不把上海情况向总理、伯达和江青汇报。”赵全国还宣布：“我们是真正的造反派、‘工总司’是保字号的。”

张春桥得到“上三司”夺权的报告，一面让秘书打电话去北

京核实是否真有“周恩来四点指示”，一面让徐景贤打电话找赵全国，要他来张春桥处，说张春桥正在接见造反派。

赵全国接到电话，有些犹豫，问左右要不要去？有人说电话是徐景贤打的，张春桥为什么不叫秘书打，还是不去为好。于是赵全国挂断了电话。

一会儿，王力回电话，否认有什么“周恩来四点指示”，当时的电话记录是这样的：

> “总理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这样的意见。
>
> “昨天，主席谈军队，积极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要求部队支持援助，都应支持，不介入是假的。不许当防空洞是一面，还要积极支持左派。干部不要吃老本。陈丕显，红小鬼，动员人家保自己，走到彻底垮台。
>
> 江渭清、谭启龙、江华、张平化，是否可以一批二保？你们保，就垮。
>
> 要一点旧的人，黎元洪也好。”

王力回电不仅否认了“周恩来四点指示”，还透露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精神。就像历来毛泽东讲话一样，他总是讲面。毛泽东以前多次讲过要保江渭清等一批省委书记，现在讲“一批二保”，另一面毛泽东又讲夺权后要一点旧的人，哪怕黎元洪也好，可见毛泽东并不想把老当权派全部打倒。但是，毛泽东却对陈丕显下了“彻底垮台”的定论，这使张春桥最后吃准了毛泽东对上海的部署。

张春桥看过电话记录，对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宣布，赵全国那“四点指示”是伪造的。

王洪文明白张春桥的心意。从张春桥住处出来，王洪文和徐

景贤带一些人到康平路大院阻止赵全国夺权。他们找到赵全国，借口与他辩论，把他扭送进公安局。

赵全国这次夺权，前后不到十二小时，又流产了。

赵全国是这场造反派内部权力再分配斗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他付出的代价是在上海监狱里坐七年牢！

但是，赵全国不是唯一的牺牲品，他的被捕使造反派的内部矛盾白热化了。

第三次流产的夺权

在权力再分配的圆桌边，一点火星就会引出一场“战争”。

1月24日的筹备会议，重组了公社文件起草小组，选出的代表中没有“红革会”成员，一个代表名额之争引出了“一月风暴”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红革会”头头认为自己是上海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是文件起草小组的当然代表，现在这样做，是有人故意将他们排斥在“领导核心”之外。“红革会”头头在发言中感情冲动，失去控制，竟然点名攻击了到会的三十多个组织。

结果，会议只得决定，上海各学生组织一个也不参加起草小组，而由工总司、“机关造反联络站”、“新革会”、清华大学的“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等八个单位组成。

“红革会”在会上陷于孤立，他们恼羞成怒，提出“最最强烈抗议”，退出了会场。

“红革会”退出会场，王洪文不动声色。“红革会”在“安亭事件”时为工总司出过力，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与工总司并肩战斗，在镇压赤卫队时又与工总司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的友谊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是用鲜血凝成的。”但是，张春桥一再的告诫使他对上海这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也早有戒心，知道他

们迟早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最近几天有消息传来，“红革会”正在搜集张春桥的“黑材料”，不知会有什么动作。在对待张春桥的态度上，王洪文毫不动摇，这是他的一条“政治原则”。

因此，“红革会”退出，王洪文没有理会，冷冷地说：“继续开会！”

王洪文如此镇静自若，反使到会者感到意外。

一团阴云出现在所有人的心头。

“红革会”退出“新上海公社”筹委会的当天，总部在上海展览馆召开紧急会议，开了整整一天。认为全市出现了一股“反红革会逆流”。他们决定在“新上海公社”成立之前，组织一次全市性的夺权行动。

晚上，他们打电话找到潘国平。潘国平刚从北京回来。他赶到上海展览馆大厅，见到“红革会”头头马立新、李功佐和劳元一。“红革会”头头都能说会道，向潘国平分析了上海的夺权形势。说不能让那些没有影响的中小组织参加夺权，应由影响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主宰上海的大局。他们拟定四大组织的名单，即“工总司”、“红革会”、“机关造反联络站”和“农革司”（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这四大组织代表了工、农、学和干部四大社会力量。

“红革会”希望工总司领头。潘国平表示要与王洪文商量商量。他打电话去找王洪文，整整二三个小时也没找到。于是，他就作为工总司的全权代表参加了这次夺权。

潘国平与李功佐一起坐着小轿车到市委办公厅收缴了二颗铜印，“红革会”总部的其他常委们分头带人坐车到十个区委人委去缴印，一夜之间收缴了 33 颗大印。

就在潘国平打电话找王洪文的同时，“红革会”头头也在打电话找徐景贤，他们天真的以为徐景贤是在他们支持下造反的，与

他们有“战斗友谊”。因此，要“机关造反联络站”一起参加夺权。徐景贤认为事关重大，没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点头绝对不能参加。他态度的坚决使“红革会”头头恼羞成怒。

“机关造反派联络站”不参加，“红革会”骑虎难下，但还是夺了大印。那些大学生们十分幼稚以为占了办公大楼就是夺了权。他们派人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要求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刊登他们的夺权通告，两报都没同意。这又一次出乎“红革会”头头的意外。

于是，他们以工总司、“农革司”和“红革会”三大组织的名义印制《特大号外》宣布夺权。这是上海的第二次夺权。

“红革会”的夺权行动，实际上是对自己地位日益下降的恐惧。看似气壮如牛，实则色厉内荏。

1967 年 1 月，红卫兵运动看似达到顶峰，其实已呈颓势。中央权威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已不见 1966 年下半年那种《向我们红卫兵致敬》或《工农兵要坚决支持学生！》这样热情洋溢的社论；相反，却是“向工人阶级学习”、“与工农相结合”的教诲。红卫兵们本能地感到被冷落了。

在上海，“红革会”、“红三司”和“炮司”三大学生组织曾经鼎足而立，掀起一阵又一阵的运动高潮，甚至为“工总司”的成立与发展出过大力。至今工总司的各级机构中，还有大量的红卫兵，尤其是“红革会”的红卫兵在协助工作。尽管红卫兵能说会道，活动能量大，实际上操纵工人活动。但是，中国一向标榜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向工人阶级学习。因此，在名义上，工总司一点一点壮大和成熟起来之后，更占了天时地利的优势。“红革会”已感到无法与之匹敌。而且，“红革会”敏感地觉察到工总司是张春桥亲手扶植起来的，他们对张春桥言听计从；张春桥则凡事都让工总司领头，处处用工人来制约学生；工总司仗着张春桥撑腰，翅膀渐硬，也想摆脱学生的控制。在许多

大事情上，他们不再与学生组织商量，而是直接听从张春桥的指挥。

“红革会”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征兆：红卫兵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些文化大革命急先锋冲锋陷阵的角色已经完成了，建立功勋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些狂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年轻人不甘心被冷落和被动所取代，他们想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来显示他们存在的价值。

张春桥得到“红革会”夺权的消息非常恼火，马上要秘书通知徐景贤和王承龙前往阻止。

潘国平与李功佐缴了两颗铜印回到展览馆，就有人叫他去接电话，原来是姚文元打来的。

姚文元说：“这样大的事情你们总该和春桥和我商量一下吧！你们夺了印就以为夺了权了吗？我看你们工总司还是不参加为好！你好好考虑考虑。”他还告诉潘国平，张春桥已派徐景贤和王承龙来处理这件事。

姚文元电话刚挂断，徐景贤和王承龙就到了。他们把潘国平拉到一边做工作，“红革会”夺权不攻自破。

三个人谈到下半夜，徐景贤和王承龙还是说服不了潘国平。徐景贤只好打电话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点名要潘国平接电话，张春桥在电话里口气十分严厉地批评潘国平，潘国平听出张春桥真的动火了，便不敢再坚持。

张春桥又要“红革会”头头接电话，他严厉批评他们这样干是“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的“分裂行为”，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潘国平退出夺权，这次由“红革会”发起的夺权又不了了之。

三次夺权都流产了。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越来越剧烈，红卫兵对张春桥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公社成立的前夕的一场政治危机越来越逼近了。

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动机触发点

在革命的名义下开展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因为打着革命的旗帜而变得高尚纯洁，权力斗争同样是肮脏的。

正当张春桥和王洪文在庆祝自己的胜利，准备宣布新上海公社成立的前夕，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一次真正的危机，上海的红卫兵掀起了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浪潮。

如果说，在北京已经多次掀起过炮打江青、炮打康生、炮打中央文革的浪潮。那么，在上海，向当然的革命左派、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张春桥挑战还是第一次。

最早酝酿炮打张春桥的是“‘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红卫兵们。

1月14日和15日，“炮司”的核心组织“孙悟空”战斗队两次开会分析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怀疑一切”的信条使他们认为张春桥同样可以怀疑。

在炮打上海市委，欢呼夺权胜利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的海洋里，这几条大标语特别引人瞩目，这是第一声和谐的呐喊！

第二天，复旦“红革会”开会，准备撰写《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表面上针对写作组，实际指责张春桥，“红革会”总部派人赴京搜集炮打张春桥的材料。

同一天，复旦“红三司”也召开勤务组扩大会议，研究对张春桥的态度，他们一致意见：“我们不保”。

因此，复旦校园里反张大字报剧增，调子也越来越高。

文化大革命以来，复旦大学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上海全局的神经，复旦大学的风吹草动都会在上海各处掀起轩然大波。因此，人们形象地说：“复旦伤风，上海感冒”。

这几天，来复旦大学看大字报的外校学生和市民络绎不绝，越

来越多，直至把复旦大学的大字报区挤得水泄不通，通向该地的3路有轨电车也被挤得无法正常运行。

这是地震的先兆。张春桥坐立不安了。

1月25日，徐景贤出面召集各大学红卫兵头头在上海大厦开会，劝说那些激昂的年轻人。但是会议不欢而散。

冲锋陷阵了半年的红卫兵们一听到发现了新的富有刺激性的斗争目标之后，每根神经都膨胀了起来。他们唯恐落后，变成新的保皇派；谁都不甘落后，让别人抢了头功。所以，虽然他们手中并没有过硬的材料，有的只是本能的反感和猜测；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有的只是狂热和义愤。但是，只要有人打出第一炮，立即蜂拥而起，一个比一个调门高，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

炮打张春桥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张春桥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无疑火上加油

1月28日凌晨，炮打拉开了序幕。

复旦大学"红革会"头头摩托车队开到"机关造反联络站"住处找徐景贤，徐景贤见红卫兵们气势汹汹便躲了起来，由郭仁杰出面应付。但徐景贤终于没能躲掉，红卫兵们不由分说，连拖带拉，把他塞进一辆吉普车，直奔复旦大学而去。

前两天，"红革会"总部连续开会分析形势，研究炮打的步骤，他们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提出了"抓住了材料袋，考验张春桥"的策略，并决定市"红革会"总部暂不见面，由复旦"红革会"进行"火力侦察"。当他们得知"炮司"和"红三司"也要搞徐景贤时，便决定提前行动。

1966年1月28日就这样成为惊心动魄的一天。

红卫兵们没有料到，看似文弱书生的徐景贤要比他们老练得多，他怎么会在这些毛头小伙子面前轻易就范，他被绑架到复旦

大学之后，开始拒不回答红卫兵的发问，后来，避重就轻，虚与周旋。他还乘红卫兵们不注意，撕掉了随身带着的笔记本。

这时，“红革会”总部派到北京去打听消息、搜集材料的红卫兵打来长途电话，说据了解毛泽东没有讲过“张春桥、姚文元要做书记兼市长”与“这两个同志我们信得过”这些话。

这些据说的小道消息，尽管不确切，但也像强心针似地使红卫兵们兴奋。

郭仁杰随后赶到复旦大学，也被“红革会”扣了起来。

“红革会”这一拳，打到了张春桥的痛处。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也惊慌失措了。如果徐景贤有个闪失，将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他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抢出徐景贤。

张春桥马上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下令调部队去复旦解救徐景贤，同时也是对谋划炮打张春桥的人实施武力警告。

警备区问：“部队是徒手，还是全副武装？”

张春桥听后不满意地答道：“那还用问，没有武装还算什么军队？如果不带武器，我就不用派兵了，当然要全副武装！”

张春桥是师出有名的。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文件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援助，都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

张春桥下令四十分钟后，解放军某师出动全副武装的吉普车两辆，三人摩托车18辆，冲进复旦大学，要用武力抢出徐景贤和郭仁杰。

但是，部队刚刚冲进校门就被红卫兵堵住了。红卫兵逼问徐海涛，谁派你们来的？徐海涛谨慎地避而不答。后来他实在逼得无法，只得打电话请示张春桥如何回答。

张春桥听了秘书的汇报，知道事情不妙，心虚地说：“岂有此理，这个问题我不回答，随他怎么办。”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军队。

徐海涛在学生面前没有供出张春桥来，此事深得张春桥赏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张春桥任命他为文教办公室头头。他又为张春桥清算“炮打”之仇卖了力气，张春桥当上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立即调徐海涛到总政去当保卫部长，徐海涛成为张春桥在部队中少数几个亲信之一。而他们的初交就是这1967年的“1・28”。

张春桥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无疑是火上加油。

复旦大学正在打内战的三大红卫兵组织，原先在炮打张春桥问题上还是各自为战，各打各的。现在高压之下迅速结成了“反张同盟”。

除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之外，其他院校的红卫兵组织也迅速卷入炮打，就连“投机出名”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头头陈敢峰也坐不住了。主动给安文江打电话说：“我正式通知你，也请转告红革会头头，我们将参加你们的革命行动，若有声明宣言请签上我们的名！”

1月28日晚上，全市各院校的“红革会”头头聚集在工业展览馆咖啡厅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整整围攻了六个小时，文化革命以来，张春桥和姚文元以左派自居，到处受到欢迎和敬礼，如此直接面对反对自己的群众，这还是第一次。

红卫兵围攻了张春桥、姚文元六个小时。

这令张春桥感到耻辱的六个小时，使他永远不宽恕这些红卫兵。而这些年轻的红卫兵们将为这痛快淋漓的六个小时付出整个青春的代价。

凌晨1时，张春桥和姚文元才得脱身。张春桥去《解放日报》社，姚文元先回招待所。

姚文元回到招待所，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见他脸色灰白，一进门就颓然倒在沙发上，好一会才对李文静说：“你给我挂个北京

电话，找王力。”

电话接通后，姚文元向王力报告徐景贤被绑架，自己和张春桥被围攻之事，王力要他写了报告。

1小时后，张春桥从报社回到招待所，听妻子形容了姚文元刚才那副颓丧的样子，摇摇头说：“这位真没用！”

清晨，兴国路招待所墙外传来高音喇叭的嘶叫声：“炮轰张春桥！”“张春桥不代表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

“红革会”的宣传车开到张春桥鼻子底下来了。

工人造反派调兵遣将保卫张春桥

红卫兵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冲着张春桥住处的窗口吼叫，一副不会善罢甘休的架势。张春桥表面镇静，心里紧张，坐立不安。

张春桥深知这种“炮打”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上海的形势会不可收拾，他好不容易在毛泽东面前塑造起来的形象会毁于一旦，他就有可能被抛出来做牺牲品的危险，这半年多的运动已造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无风起浪，三人成虎，捕风捉影，张春桥还见得少吗？张春桥心里也明白被他自己打倒的对象到底有多少错误，还不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党内比他地位高得多的重要得多的领导人都一个一个被打倒了。他张春桥又算得了什么？即使当时被算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左派领导人，也一个一个被揪出来，说不准现在就轮到他张春桥了呢？就是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里，名字排在他之前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都倒了，名字排在他之后的谢忠、尹达、穆欣也都倒了，张春桥不能不战战兢兢，这半年多来，中央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如走马灯似的转眼即变，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已成罪人；昨天还是座上客，今天已成阶下囚，生死存亡完全由一个人定夺，而在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旁边，还有一个喜怒无常的女人，这使本来就瞬息万变的政局变得

更加不可捉摸。不要说基层干部和平民百姓惶惶不安，就是高层领导人也人人自危。

张春桥对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他能不心虚吗？

作为权术家，张春桥喜欢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他这两手对工人造反派很管用。对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却失效了。他硬的一手派军队警告，软的一手单刀赴会说服，都告失败。

这时，他想起了工总司，这是他亲手扶植起来的队伍，是他手里最后的一张王牌。

他急令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与耿金章，但都没有找到。

此刻，王洪文与耿金章正在大打出手。

王洪文在“新上海公社”筹备会上取消了“二兵团”等参加公社的资格，耿金章还蒙在鼓里不知道，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中唯一能对抗王洪文的力量，王洪文不敢等闲视之。

1月27日下午，“二兵团”常委方去“二兵团”南市区联络，不料，一去不回。耿金章得到报告，立即与“二兵团”常委孙等人商量，感到王洪文欺人太甚，决定与王洪文“干一场”！常委们都同意耿金章的决定，耿金章又去找“一兵团”、“三兵团”和“工三司”头头来商量，这些组织平时也受王洪文排挤，自然同意“给王洪文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耿金章在地处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的“野战兵团”设立指挥部，耿金章和“一兵团”头头戴祖祥任总指挥，在纸上画了“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的地形草图，几个组织调集了上万人马，当晚便把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砸了，双方均有人受伤，斜桥地区交通因此堵塞了一天一夜。

王洪文得到消息，也不示弱，第二天（28日）派人带了大批人马也把“二兵团”南市区联络站砸了。

王洪文与耿金章的矛盾公开化了。

工总司与“二兵团”拉开了火并的架势，正要大干一场，却赶上了“1·28”炮打的浪潮。

王洪文直到29日中午才得到消息，赶到兴国路招待所去见张春桥。待到耿金章赶去，天色已晚。

耿金章进客厅，见张春桥正与王洪文谈话。耿金章以为王洪文恶人先告状，是来说与“二兵团”的龃龉，于是想为自己辩护。

张春桥根本不要听，打断耿金章的话头，厉声说：“你们都在干什么？是不是想让人家看我们的笑话？”

耿金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偷眼看王洪文，见他也是一脸尴尬相，低着头不敢作声。

张春桥站起身，一把推开窗子：“你们听，人家正在炮打我呢！”

窗外，高音喇叭里传来清晰的口号声。

张春桥关上窗户，坐在沙发上，要王洪文和耿金章各坐一边。张春桥说：“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工总司中最早造反的共产党员就你们两个人。你们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你们这样是让人看笑话！”

张春桥将28日这一天发生的炮打事件告诉了王洪文和耿金章。他尽量把话讲得冠冕堂皇，但王洪文和耿金章完全听得出，张春桥是希望他们出面保驾。

正在这时，徐景贤打来电话。徐景贤此时也被扣留在复旦大学，红卫兵们都去大礼堂开会了，徐景贤找个机会溜出房间，打电话向张春桥报告：复旦大学礼堂正在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大批本市和外地的大中学生涌来开会，“红革会”、“红三司”和“炮司”在一片炮打声中联合起来，准备成立“新复旦公社”，并决定第二天，即1月30日上午在市区举行数万人大游行，下午到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会，把徐景贤拉出去批斗。几千学生已经连夜出动，上街刷标语，贴海报，一夜之间

要刷遍全上海。

徐景贤还乘机表白：红卫兵把我当成材料袋，要收集你的材料，我把随身带的笔记本撕了。

张春桥要徐景贤继续留在复旦大学，注意“红革会”的动态。

张春桥放下电话，将徐景贤报告的情况告诉了王洪文和耿金章，他期待地看着这两位工人造反派领袖。

耿金章当即表态，“我们不打内战了！”他抓起电话，接通“二兵团”总部，下令道：“给我把南市现场的人都撤下来，撤到淮海路、武康路一带，保护张春桥的住处。如果红革会的人胆敢来冲，就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

王洪文也表示要一致对外，他通知工总司总部立即将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等人召到张春桥住处来。

张春桥对他们的表态很满意，这是他意料之中的。

一会儿，陈阿大等人一起来了，同来的还有包炮。他一向是工总司头头们的高参，参与一切机密。

张春桥见工总司的几员大将差不多全来了，就把刚才对王洪文、耿金章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然后说：“现在上海出现这样好的形势，是由于毛主席的支持，也归功于广大工人造反派。上海的局势靠工人阶级去控制。但是，我们打了大胜仗时，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我和你们工人造反派在安亭事件中共同战斗过，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对这次炮打，采取什么措施，你们研究一下。”

王洪文心领神会，接过张春桥的话：“这次炮打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春桥同志在关键时刻支持过我们，现在春桥同志有困难，我们要全力支持他。”

工总司的另外几个头头都随声附和，表示坚决支持张春桥。

只有包炮，一直不开口，不附和。在这种场合，不开口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众人将目光投向包炮，包炮是帮助创建工总司的有功之臣，王洪文至今许多事情都听包炮的。张春桥对此很不满，多次提醒王洪文注意。

现在包炮不能不开口了。作为一个满怀理想的红卫兵，没有工人造反派那么多世故和杂念，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与上海红卫兵有着天然的感情纽带。他郑重地说："我反对冲红革会，我想不通。即使红卫兵犯错误，为什么用枪口对付他们？"

张春桥见有人反对，连忙改口："我没有意思叫大家砸红革会。我只是同大家谈谈，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王洪文这回没听包炮的。他在包炮和张春桥两者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春桥。他想起了张春桥对他的警告，开始对包炮持有戒心。第二天，他还叮嘱陈阿大等人不要受包炮影响。

王洪文下令要大家分头打电话进行布置：各区各工厂的造反队调人封锁全市交通要道；工总司杨浦区分部把守外滩一带，不许人进入人民广场，康平路和兴国路附近，除耿金章派"二兵团"把守外，再派工总司徐汇区分部加强守备；要求各造反队迅速组织人员上街复盖或撕掉炮打的标语。

看着王洪文调兵遣将，张春桥心里暗暗高兴，但又假惺惺地关照："你们可要注意方式方法，我怕红卫兵犯错误，才同意你们去的，你们只要让他们有认识就行了，不要跟他们冲突……"

其实，张春桥也怕事情闹大，反而不好收拾。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笔帐，总有清算的机会。心胸狭隘，报复心理极强的张春桥决不会等十年的。

从张春桥住处出来，王洪文要大家跟他驱车前往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到那儿已是半夜，王洪文跟着这行人转了个圈子，也没看到什么动静，这才放心了些，不料走出校门，却发现停在门外的那辆汽车车身上，赫然贴上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

打倒张春桥!

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使形势急转直下

王洪文和工总司头头们的态度给张春桥吃了定心丸。但是，张春桥明白，要给予这股“炮打”势力摧毁性的打击，还必须借用中央的权威。

这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每天几次与王力通电话，汇报事件进展，要求陈伯达、江青出面采取措施。这时的张春桥还不能直接与毛泽东对话，因此只能求助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王力要张春桥、姚文元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名义，给中央文革写个报告，这样，中央文革就可以表态。

张春桥让王承龙等人起草一份电报稿，汇报“1·28事件”经过。29日晚，王承龙将电报稿交市委办公厅拍发。办公厅干部认为电报内容不符事实，拒绝拍发，并在电报稿上加了“按语”，指出：

> “市委机关联络站的电报，是欺骗中央、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黑电报，‘1·28’事件实际是一次调动武装部队，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为保徐景贤，竟把枪口对准赤手空拳的革命学生，张春桥、姚文元错误地和联络站站在一起，保徐景贤保自己。”

发报时间被延缓，张春桥十分焦急，1月30日凌晨，张春桥再次催促王承龙：“中央文革的来电稿已到我手里，可你们的电报怎么还没有发出？要去催促，快发！”

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电报还没有发出，中央文革的特急电

报倒已经来了。原来，王力等不及了，就根据张春桥、姚文元这几天电话汇报的情况和事件处理的意见，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经陈伯达、江青和康生同意，于 30 日凌晨用电话逐字逐句传给了张春桥。并告诉张春桥，这份电报发不发，何时发，授权张春桥决定。张春桥听完电话后，将收报时间改为 1 月 29 日，随后在一份誊清稿上批了“印八开 20 万份”几个字。

事后，张春桥曾得意地对人说：“这份电报稿是我搞的，只是到北京转了一下。”

几个小时以后，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提着浆糊筒到处张贴《特急电报》，工总司的宣传车到处散发油印传单。几小时之前，声势浩大的“炮打”标语口号统统被覆盖，海报墨迹未干，已成一纸废文。人们到处看到的都是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一）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2）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3）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4）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

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5) 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种事件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 年 1 月 29 日

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央文革小组发给红卫兵的唯一的特急电报。当时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和电文所用的严厉的措辞把年轻的红卫兵打懵了。

"红革会"头头们得知工总司已调动人马，封锁了各交通要道和人民广场，于是，只得取消原定召开的全市炮打大会和示威游行。

随着释放徐景贤和郭仁杰的轿车离开复旦校门，十几辆宣传车开进复旦园，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尖叫：

"复旦的战友们，醒醒吧！"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一批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拎着墨汁桶要去涂改炮打的大标语，复旦的红卫兵们手拉手组成护卫大字报的人墙，腰圆膀粗的工人们向前冲撞踢打……

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造反派第一次发生了冲突。

红卫兵发动的"炮打"虽然其势汹汹，但哪里是人数庞大的工人造反派的对手。

"炮打"流产了。

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分道扬镳

"1·28"炮打终于平息了。

炮打事件对张春桥是一场不大不小的虚惊。工总司在关键时刻帮了他的大忙，张春桥不止一次地说："工总司能控制上海的局势。""在炮打中，只有工总司的表现是最坚定的。"

炮打事件也给王洪文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借口来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王洪文把这次炮打事件作为对每一个工总司成员的考验，凡是在炮打事件中表现动摇，态度暧昧的人，绝不许重用，即使是最初一起出来的"老造反"也不例外。用黄金海的话说，"这几乎成了一条'原则'。"王洪文早期的秘书徐就因为同情红卫兵，不同意采取镇压行动而遭到王洪文的关押和清洗。王洪文这样做是杀鸡儆猴。

王洪文此时羽毛已丰，工总司已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上海举足轻重，控制大局，无需再借助于红卫兵。王洪文正苦于找不到借口来摆脱红卫兵的影响。"1·28"事件是个机会。王洪文对叶昌明说："工总司是坚决跟张春桥的，不能让红卫兵来控制利用工总司反对张春桥。"

王洪文下令把参加炮打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从工总司总部和各级组织中赶了出去，即使对那些曾经帮助筹建工总司和长期协助工总司工作的红卫兵也毫不留情，无一例外，王洪文还要各区局联络站清理队伍，不准参加炮打的红卫兵到工厂去串联活动。

同时，在筹建"新上海公社"过程中，王洪文又下令把参加炮打的红卫兵组织统统赶出去，取消了他们分享权力再分配的资格。

王洪文翻脸不认人，把事情做得很绝。

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从此分道扬镳。这是公社成立前最严重的一场危机。

王洪文这样做正是张春桥所期望的。

炮打风波平息后，张春桥多次在公开场合讲，不要追究“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的责任，表现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气派。背地里，却指使人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迫害。张春桥对于炮打事件耿耿于怀，这才是他的性格。

2月1日，张春桥在接见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代表时，就给“1·28”事件扣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罪名，又说：“红革会这个组织的幕后是什么人？可以考虑”，“头头是什么性质，值得考虑。”“要彻底肃清（红革会）少数头头对这次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

在张春桥授意下，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发表了联合声明《告上海人民书》，在全市掀起“反逆流”活动。

《告上海人民书》说：

> “目前上海地区出现的（以红革会某些头头为代表的）一股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毛主席的反革命逆流，必须予以痛击，坚决镇压，揪出幕后策划者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王洪文说出了张春桥想说的话。

所谓“反逆流”，实际上是反异己，是张春桥第一次对造反派内部的异己力量开刀，是对红卫兵的一场“白色恐怖”。

据初步统计，全市因“1·28”炮打而受到迫害的（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达2500人，其中隔离审查200多人，被办“学习班”440人。审查中，严刑拷打，肆意摧残，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致残，这场骇人听闻的迫害延续了几年之久。

但是，这种下了复仇的种子。一年以后，上海又掀起第二次声势更大的炮打张春桥的浪潮。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夕再次面临分裂危机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日期越来越迫近，不料，平地又起波澜。

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筹建，耿金章一直蒙在鼓里，不知有其事。“1・28”事件后，耿金章想起张春桥要他和王洪文不要搞分裂的话，于2月1日去党校找王洪文谈判。

耿金章走进党校，只见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歌声连天，一派节日气氛。耿金章楼上楼下找了一遍，不见王洪文的影子，正准备出门，碰上“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的头头。这些造反派组织与“二兵团”一样都被王洪文排斥在公社之外。他们问耿金章，你知不知道正在筹建上海人民公社？耿金章听了莫名其妙。

于是，众人把耿金章拉到二楼，告诉他王洪文正在秘密筹建夺权机构的经过。耿金章不由怒火中烧：当初我们要夺权，他们不允许；现在他们倒偷偷地要成立公社。而且，29日那天，他在张春桥那里见到王洪文，王洪文一句口风也不露，这欺人太甚！

众人说：“他们成立人民公社不打招呼，我们自己也成立第二个人民公社！”

耿金章立即给张春桥挂电话，接电话的是何秀文。

耿金章问：“你和春桥同志是否知道王洪文成立人民公社的事？”

何秀文答：“知道的”。

耿金章一听火了：“你为啥不告诉我？还把那么多组织排斥在外？”

耿金章以为，如果张春桥知道这件事，不会不跟他耿金章打招呼。

何秀文连忙解释："我们事先找过你，但没找到你，所以没跟你商量。"

耿金章听了火气更大，你们用得着我时，我躲在什么地方，都能打电话找到我；用不着我时，又推说找不到。他对着话筒气呼呼地吼道："好！你们成立人民公社，不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权力成立第二个人民公社！"说完，扔下了话筒。

耿金章把通话内容告诉等在旁边的头头们，他们都很气愤。造反是一起造的，凭什么成立新的权力机构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批老造反们决定成立第二个人民公社，和王洪文对着干。他们也要张春桥和姚文元当头，但是，他们不知道，王洪文的人民公社实际操纵者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是一批没有政治头脑，有勇无谋的老造反，根本不是王洪文的对手。

2 月 1 日，当王承龙去新华社上海分社召开会议的同时，耿金章也在党校召开会议，通宵达旦，商议成立第二夺权机构。第二天，他们又在上海大厦继续开会，最后也凑了 36 个群众组织。

他们把这个夺权机构的名称定为"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二兵团"耿金章为召集人。会议决定，"大联委"要发布宣言和通令，宣布夺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他们还起草一份给中央文革的"紧急电报"，控告工总司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搞分裂"，"排斥老造反"。

会议开到下午三点钟，张春桥得到了消息，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派人到上海大厦找耿金章，要他来兴国路招待所面谈。

耿金章一进会客室，见张春桥已等在那里。

张春桥劈面就说："耿金章，你为啥这样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你们的做法是和中央唱对台戏，是向中央施加压力！"

耿金章还在赌气："你们成立公社，为什么不跟我讲？"

张春桥也像何秀文一样回答他："找不到你呀！"

耿金章说："谁叫你们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自己成立一个公社！"

张春桥软硬兼施地说："这个公社不是我搞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公社成立是中央同意的，毛主席批准的。我和文元已经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们要另外搞一个什么'大联委'，只能跟上海人民公社对立，就可能在关键时刻犯大错误！"

耿金章泄了气，只是像个可怜的孩子向大人乞求赐舍一样，反反复复地对张春桥说为啥不告诉我，为啥不通个气。在耿金章心目中，张春桥是很器重他的，凡是关键时刻都找他和王洪文去谈话，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次张春桥不通知自己，他觉得委屈，他对张春桥还抱着幻想。

张春桥掌握耿金章的心理弱点，也知道他根本没有政治主张，只是要求分享权力而已，便像哄小孩似地说："你马上回去做工作，公社成立以后，你们都是公社里的人嘛，你快叫大家各自回去。"

耿金章没作声。

张春桥又对他许愿："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时，让你也上主席台，将来担任公社的常委。"

耿金章心动了。他明白没有张春桥的支持，即使夺了权也没用，况且，他拉起"大联委"本意也只是向王洪文示威。现在张春桥答应他进公社任常委，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不再坚持。但他也是讲义气的人，感到有些对不起"大联委"的其他组织，于是，又要求张春桥将他们"大联委"的 36 个组织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

张春桥早已想好了对策，说："我正在考虑把组成单位改为发起单位，将来可允许更多的组织逐步参加。"

谈话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耿金章见张春桥同意自己任公

社常委，又同意以后让其他组织也进公社，便答应回去解散“大联委”。

这个握有重兵又不会运用自己权力的造反司令，这个没有头脑又私心很重的鲁莽汉，失去了最后一次对抗王洪文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有勇无谋的草包根本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他的权力就将化为乌有，等待着他的只是寂寞的牢房。

反对派的行动再次瓦解

2月3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上海人民公社筹备工作会议。张春桥从后台走到前台来，亲自主持会议。

张春桥在会上宣布：中央文革决定他和姚文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这个会，耿金章也被通知参加，他坐在下面听着张春桥讲话。

会上主要讨论公社的体制问题，为了体现公社的革命性和群众性，公社临时委员会采取集体委员制，除张春桥、姚文元之外，其他人都不以个人名义而以群众组织代表身份参加公社领导。经过协商，分配了代表名额：工总司3名，农民2名，学生1名，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名，委员会下设7个组的负责人各1名。另外，还有驻沪三军的负责人。

公社临时委员会声称要打破过去那套庞大重叠的官僚主义机构，只设8组一室，即：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组织组、政治宣传组、联络组、调查组、接待组、后勤组和办公室。

这8组1室表面上是砸烂了旧体制后建立起来的新体制，是新的政权形式，实际上是各派造反组织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结果，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工总司和机关造反联络站占据了最重要的几个组室，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其他几个听话的造反组织也分享了一部分权力，而把大多数造反组织排斥在外，特别是把红

卫兵排斥在外，同时，他们也把所有的原来的党政机关干部排斥在外。用张春桥的话说，这是"改朝换代"。

眼看一切准备就绪，公社成立在即，却不料又传来消息："大联委"非但没有解散，而且还改名为"新上海人民公社"。

原来耿金章与张春桥谈话后，回去向其他组织传达，那些头头们不买账，他们不相信张春桥的话，索性将"大联委"改名为"新上海人民公社"，对台戏唱到底。

张春桥十分恼火，2月4日凌晨，再次把耿金章找来谈话。

张春桥要耿金章立刻解散"大联委"。他威胁说："如果你们执意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那我和姚文元、驻沪三军宣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看大家拥护哪个公社。"

张春桥摊牌了。

耿金章深知与张春桥对抗的后果，况且他也无意与张春桥对抗，他只是骑虎难下，被其他人逼着干的。

当天上午，耿金章召集36个组织开会，宣布解散"大联委"。

事后，张春桥曾多次自吹过："那次找耿金章，我们也是最后一着了，因为名单已上报，5号就开大会了，一下乱起来开不成会，这个影响有多大？那将来你就毫无办法。开始，我们跟他左说右说，但总是不行，说不通。最后，我们只有借着毛主席的名义，凭着毛主席的威望，把他说服了。"

张春桥扫清了夺权道路上的最后一道障碍。

公社成立前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接二连三的冲击，接二连三的斗争，使张春桥不得不小心从事。

在4日晚上最后一次筹备会议上，张春桥提出三条建议：

1. 将38个组成单位改称发起单位，给其他组织以今后可能逐步加入的希望，避免再引出对立的组织。

2. 发起单位一律不登报，不署名，避免各组织之间争名

次排座位的纠纷。

3. 开庆祝成立大会时，不是发起单位的组织也可有代表上主席台。这个例外是为耿金章开的。

张春桥此举确实棋高一着，稳住了一些心怀不满分子。张春桥既将那些不听指挥的组织在成立公社时排斥在外，丢丢他们的面子，让他们知道对抗自己的滋味，又留有余地，给他们以希望：只要肯听话，今后还是有机会的。

这就是张春桥的手腕。

有一些人被张春桥降服了，有一些人还是不买他的账。

就在张春桥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议的同时，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筹备处所在的市体委大楼遭到冲击。

"工三司"、"红卫军"、"战到底"等造反组织认为自己被耿金章出卖了，他挤进了公社，捞到了席位，却解散了"大联委"。这些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头头们扬言："不准我们参加公社，我们也不让你们太平！""我们要调动10万人冲会场！"

其实，"二兵团"撤出之后，这些造反组织已没有多大实力。他们听说筹备处在市体委大楼，就带着一些人去冲击，但扑了个空。

深夜，这批人又赶到人民广场，占据了离主席台最近的位置，打算开会时起哄闹事。不一会儿，这批人就被工总司的纠察队赶走了。

从半夜起，一队一队的造反队员就陆续进入人民广场，一队一队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广场四周巡逻警戒。

在朱永嘉以后为张春桥树碑立传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描绘："驻沪三军严阵以待，游行路线两旁大楼上架起了机枪，黄浦江中巡逻着炮艇，空军部队严密警戒天空，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捣乱的内部阶级敌人！"

如此“盛大的节日”，却如临大敌。

造反派夺权的胜利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1967年2月5日，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一千万人关注，一百万人集会，11个月的天翻地覆终于达到了喜剧性的高潮：一个新的政权宣告成立。

造反派们以当时特有的形式庆祝他们的胜利。

2月6日的《文汇报》头版以通栏大标题发布消息：“上海人民公社如一轮旭日在东方升起，百万革命军民集会游行欢庆公社成立宣判旧市长死刑。”

这篇通讯这样描述：“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庆祝大会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举行。从凌晨开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等各条战线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和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便高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手持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从全市各个角落汇集到人民广场。广场上，红旗如海，锣鼓喧天，广场上空的八个大红气球下悬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上海人民公社万岁！”等巨幅标语。

会前，全场革命群众，不断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下午两时，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当大会主席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时，全场欢声雷动，鞭炮、锣鼓齐鸣，无数个彩色汽球冉冉升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欢呼声，震动了全上海、全中

国、全世界！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时刻将永远载入史册。

接着，大会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砸烂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大会执行主席是潘国平。

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胜利者的姿态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王洪文代表上海人民公社发布了第一号通令。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一百万人像洪水般泻向人民广场周围的所有大街。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走在一支游行队伍的前面，簇拥着一辆彩车，彩车上架着一块"上海人民公社"的大木牌。游行队伍从广场出发，经过南京路，到达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狭长的外滩顿时人头密密匝匝，红旗重重叠叠，锣鼓震耳欲聋。

几个造反队员从市府大厦门前摘下了高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浇上汽油，燃起一团火光。然后，把披着红绸的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的木牌挂在市府大厦门前。

这时，庆祝集会游行达到了高潮。人群中发出狂热的欢呼。持续了一天的群众激情达到了沸点。

处在狂热中的人们天真地以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

20 天后，遵照毛泽东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一百万人集会，又是狂热的欢呼。谁也不计较这两个名称语义上和实际上的巨大差别。

从上海开始的"一月风暴"，开了夺权的先例，迅速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

从 1967 年 1 月上海夺权起，至 1968 年 9 月，全国经历了整整 20 个月的动荡与混乱，除台湾省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夺权斗争，并不在毛泽东预先的构想中，毛泽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并没有提到夺权。但是，夺权斗争又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从上海开始的这场夺权斗争既为处在停滞状态的文化大革命找到了出路，又把文化大革命引进了死胡同。

这场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起先为毛泽东所赞扬；但是后来旷日持久地延续二十个月，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却使毛泽东无可奈何，欲罢不能。

毛泽东伟大的洞察力使他很快就发现“全面夺权必然会引出全面大乱”，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毛泽东以为大乱只是乱了他假想中的敌人，也无法洞察这事实所蕴含的可怕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所期望的“由大乱才能大治”，一直没能实现。

从上海开始的夺权斗争在混乱中建立的只是一个权力机构，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慢慢发现，这个以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新的权力机构并没有真正代表革命、代表人民。

夺权斗争夺的只是“权”。

造反派夺权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权力对他们的危险。

他们的胜利实际上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原载 1992 年《芙蓉》第五期）

杨匡满　郭宝臣

命　运

大悲大喜的1976年长存在中国的历史上，也长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

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运动可说是1976年这出威武雄壮的活剧的一个高潮，也是转换的关节。北京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目睹或参与这一伟大事件，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都同这个事件的命运联结了起来，尽管它是以千百人的流血和被监禁作为悲剧结局的，但它确确实实又是当今中国一场历史性伟剧的真正的开端。

当我们今天和读者一起来回顾这一段难忘的岁月时，我们却必须先上溯到上一个秋天。这同样也是一个难忘的秋天……

一、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

1976年的元旦在一种沉郁的气氛中来临。《人民日报》用了冠冕堂皇的题目：《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登攀什么？“蓬间雀”指的又是谁？人们关在家里，亲人之间，知心朋友之间，喝

着闷酒，提着疑问。

“选一部分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是总理在主席面前提的，这怎么也批了？”

“陆定一当年是拿了家里的钱资助革命，这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照此逻辑，恩格斯办过商业事务所，从那里不断寄钱支援马克思，那恩格斯也是阶级异己分子了！

……

稍有良心的人们，从正面、反面，或则单刀直入，或则旁敲侧击，谈着历史，说着怪话，发着牢骚。好在这一个元旦的供应倒还可以，有东西可吃。笔者见过的南京市的一个业余文艺作者，那时正举行婚礼。他采购了显然是过量的糖果点心，大声地招呼着他的客人们：“大家快吃吧！要是邓小平下台了，就没得吃了！”

总不完全是乌云遮天吧？总还有一线阳光吧？人们这样祈望着。总理的病经过治疗，总会好的，全国有的是名医。有朝一日，总理又会见报，他会给我们说话的……

同人们的希望相反，无可挽回的事实给了一个民族劈头盖脑的一击。

1 月 8 日上午 9 时 57 分，昼夜不停的心电图示波器上的波纹，变成了一条水平的线，一颗为人民劳累了 78 年的伟大的心脏永远休息了。

政治局的成员们赶来了。邓小平同志默默地肃立在总理的床前，一句话都没有说。江青进来，看都不看总理一眼，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尖着嗓子喊：“小超呢？”“小超”是周总理对邓颖超同志的称呼。医务人员听到江青的叫唤，心中暗骂：“你有什么资格喊小超？”

最初的哀乐和讣告，是 9 日零时广播的。中国大多数的人，从天亮时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这一噩耗。人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总理那种过人的精力，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姿态，

不就在眼前吗！新华社搞错了吧？广播电台搞错了吧？不少人打电话去问。工人、干部、售货员、学生……照例冒着零下10度的寒冷，挤上公共汽车去上班、上学。车上，往日常有的嘈杂声忽然消失了，仿佛一夜之间，人们的道德水准、文明水准都提高了。相识不相识，都默默地相让着。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和哀乐，不停地传到车里来，捶击着人们的心。看来，消息是真的了！渐渐地，大滴大滴的泪，从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的眼眶里涌出来，妇女们抽泣着。

整个中国在哀乐中震颤！整个世界在哀乐中震颤！

总理的遗体，被移至北京医院后院一间普通的停尸房里。大约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总理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下的空间就只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子。门外可以用来停车的空地，不过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从这里绕到东单公园西侧的马路。

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数，由原定的6万减至4万。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的天数，由原定的三天减至两天。

北京医院的围墙外，从东单到东交民巷，从凌晨到深夜，聚满了人群。哭声和要求最后见一见总理的喊声传到院内来。北京医院整个住院部的窗帘都不许拉开，说是不让病员受这样的刺激。有的重病人因过度伤感突然病情恶化了。

1月9日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花圈。花圈越来越多，几天过后，碑座上的已经拥挤不下，放到了广场上。南边的松墙上，缀满了一朵朵小白花。成千成万的人，无论是集体前来，或是独自前来，都面对纪念碑脱帽默哀，宣誓之声，哀恸之音，彻夜不绝。

隆冬的气流冷得像已经冻结。在这冻结的气流之中，渐渐响起了《国际歌》。无数粗大的嗓子、稚嫩的嗓子、嘶哑的嗓子、嘹

亮的嗓子在唱着，此伏彼起，一阵接一阵，一片接一片。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不相识的人，自动加入了集体的合唱。不相识的人，在这严寒笼罩的广场上，可以凭着国际歌声找到自己无数的知音。

1 月 11 日下午，天空像人们的心情一样阴沉得不见一丝阳光。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扶老携幼，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总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当晚，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附近公社的社员，蜂拥到火化处，不让火化总理的遗体，争执持续到深夜。无数的电报和书信寄到中央，要求保存总理的遗体。人民对周总理感情之深，任何言辞都无法表达。

从 1 月 9 日到 1 月 15 日这一周，大概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最悲痛、也是最难熬的一周。听一遍哀乐掉一次泪，听一遍《国际歌》掉一次泪。

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怀念总理的诗文不准发表。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大意是：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然而，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这些禁令。在北京，除了"两校"之外，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群众都戴了黑纱。

至于人们的嘴，那更是封不住的。人们议论着电视屏幕上王、

张、江、姚的表演，挖苦着，怒骂着，抗议着。

当时，有些善良人，希望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把刚刚开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冲它个烟消云散，甚至希望对那帮人有所触动而使之不得不收敛一下。然而事实却是，王、张、江、姚一伙等不及总理的追悼会，竟于1月14日就在《人民日报》抛出了那篇关于“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臭名昭彰的报道。

此文一开头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民意，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人们拿起1月14日那张载有所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纸，抗议着，撕扯着，把撕碎的报纸寄还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一天之中收到了不下300个抗议电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接电话的人想记下一点线索。

“我是你爷爷!”抗议的人不傻，“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自然，人们更关心的是，谁致悼词？谁当总理？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每家每户的老人孩子和柴米油盐。然而，议论也好，猜测也好，都不过只是心里的自由罢了。不仅如此，连这种心里的自由也正受着干预和威胁。

当时，人们心中最大的希望，是千万不要让张春桥当总理。这个老是阴着脸的“第二副总理”，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心毒手辣的家伙。江青已经臭了，料她也争不上。王洪文和姚文元都乳臭未干。对于邓小平，人们抱有极大的好感和同情。但电台报纸天天在含沙射影地批。不用说，连周总理都在蒙冤受屈，邓小平还保得住吗？

人们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1月15日这一天。希望它到来，似乎更怕它到来。

二、一月十五日

1月15日，北京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但温度低到零下10度，

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502 所的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包括当时还戴着“特务”帽子的六十多岁的一位研究员、老所长，一清早，就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公共汽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外边的街上。许多人没有来得及吃早点，只带了点干粮。几天前，也就是 1 月 9 日，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献了花圈。今天，他们又来了，集合了更多的人。他们准备在这里等上整整一天，只希望看一看总理的灵车，载有周总理的骨灰盒的灵车，那辆蓝白相间、饰着黄黑两色挽幛的灵车。

大家事先估计到，追悼会既然下午 3 时开，大约会在中午 12 时戒严。所以，他们要远远赶在戒严之前到天安门。果然是人同此心，广场上至少已有几万人等候在那里了。人们不顾不让去天安门的禁令，任朔风吹着，任眼泪流着，望着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10 点刚过，广场上出现了人数众多的警察和民兵。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要把人群往北压。这是要“清场”了。人们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 50 来岁的高个子，嘶哑着嗓子指挥着警察和民兵：“动员他们走，快！两个架一个，把人动员走……”人群被驱赶着，像波浪一样，一会儿进一会儿退。

开始了辩论，开始了抗争。只听一个人说：“为什么要赶我们走，悼念总理，你们是什么心情？”

一个民兵答道：“我和你们心情一样，让你走你就走，别罗嗦。”

几个人上前抗议：“不一样！我们戴黑纱，你戴的可是红袖章。”

在警察和民兵之中，有的人噙着泪劝说人们离开，有的却粗暴地推搡着，吼叫着，好像人群的辩论和抗争，太无法无天了。

几万人的人流，渐渐被压到长安街北边红墙根下的白杨树林之中。不同单位的人，不相识的人，男同志，女同志，不分你我，互相照应着，鼓励着，互相探询着：“他们会抓人吗？他们敢抓人吗？”

抗议在继续，争执在继续，冲突在继续。

从天津赶来的刚下夜班的两个工人哭喊着："我们为悼念总理才赶来北京，你们为什么撵我们？"

三个哭喊着要见周总理的女孩子，被架走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像发了疯似地非要冲过去不可。他的眼睛里冒着火，简直是要拚了。几个民兵开始向他围来。502所的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上去，拽开那几个民兵，把这个过于激动的青年抢了过来，拉进自己的队伍里。人们含着眼泪劝他："他们是不让我们说理的！"只是这句话，使这个青年清醒过来。他忽然扶住一个女同志的肩头，嚎啕大哭起来。

有一部分人，被压挤到厕所里，不准出来。更多的人则无法上厕所。第28中学就在附近，可以去28中上厕所，可是人群被严密地围困住，不准动。

3点到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辩的嘈杂声一下子突然消失了！整个广场上静得连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好像有一个无声的具有神奇力量的命令，可以使一切声音戛然而止。

红旗牌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却不见灵车的到来。人们踮着脚尖，睁大眼睛，望着，等待着。累了，就在冰冷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一会儿；饿了，就啃一点干馒头。老所长默默地把自己买的糕点分给大家。树林子里，不管相识不相识，馒头、点心大家匀着吃，水分着喝。就这样，一直等到天黑，等到晚8点。终于，警察走了，民兵撤了，人们可以走向广场，走向纪念碑了。广场是黑暗的，没有一盏灯。但总算是自由了，眼泪要流就让它尽情地流吧！想放声大哭就尽情地哭吧！

因为戒严而沉寂了一个白天的纪念碑周围，重又响起了《国际歌》。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这一天，人们积压了太多的悲痛和愤怒。这种被强压下去的悲愤就像地下的岩浆一样，在奔腾着，在吼叫着，在选择着一个时间、一个突破口冲出来。既没有人串联，更没有人号召，就像那能跨越一切障碍的风一样吹过了每家每户，人们交换着这样三个字：

“清明节。”

就在1月15日的这一天，上午9时57分，也就是周总理1月8日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个时刻，上海港许许多多大小船舶先后自发地拉响汽笛，向总理致哀。悲愤的汽笛声持续了37分钟。外滩，这个平时热闹非凡的地方，此时仿佛冷冻了一般。从来车辆人流如梭的马路，顿时凝固了：红灯止车，警察和行人肃立。空前庄严肃穆的气氛统治了一切。中午1时左右，又有一批船只拉响汽笛。下午3时正，在北京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时刻，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上，又汽笛轰鸣。江上停泊的，或正在行驶的船只和几乎所有的外轮同时鸣笛致哀。

率先拉响汽笛的是“友谊号”游艇，当年周总理曾经乘坐它视察过黄浦江。此时，全体船员在笛声中列队甲板，面朝北方。

在“沪监引2号”轮的航海日志上，工工整整地记载着：“上午10时，拉回声20分钟，向周总理致哀。”

在海运局的供水2号船上，船员们干脆把拉笛的绳拴在舵轮上，汽笛直对着中共上海市委大楼长鸣30多分钟。

盘踞上海的马天水之流，被这一片汽笛声吓坏了。上海港务局、上海海运局离市委大楼不过一箭之地。刚过10时，追查鸣笛事件的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市委工交组、外事办公室和公安局打

来。马天水亲自出马，给航运局连打三个电话，气势汹汹地嚎叫："你们拉汽笛违反上级规定"，"影响了水上治安……"还派出联络员，指令要严加追查。

几乎是与鸣笛同时，工人、居民、学生、机关干部，一队一队簇拥着花圈，从各个路口向外滩马路上涌来，又涌向市革委大楼。不知是哪个人命令，说革委会大楼不准进花圈。紧闭的大门像一道大闸，想挡住这花圈的洪流。可是，人越来越多，无法阻挡。又不知是谁下了命令，让出一间地下室来。群众说：这叫什么？一不设灵堂，二不放哀乐，等于是个存放花圈的仓库。

紧挨着市革委大楼的上海港务监督和长航职工医院里，一批机关干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们把高音喇叭对准市革委，把唱机安装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会议室里，反锁了门，门里又堵上乒乓球桌。于是，摧人肝肠的哀乐，应和着千艇万轮的汽笛，在黄浦江边交响。送花圈的群众听到这哀乐，都不约而同地仰望市革委旁边的这座大楼，向它致以深深的敬意。

接连不断的哀乐声又照例吓坏了马天水之流。马天水立即抓起笔来，在纸上写下命令，让"文攻武卫"们捏在手里去追查放哀乐的人。"停下！停下！"他们在这座楼里上下吼叫，不仅没有能制止，喇叭的音量反而调得更大了。后来，小会议室终于被发现了，"文攻武卫"们拿出马天水的手令，但这手令变成了一张废纸，遭到干部们的严厉拒绝。他们找到一个团支部书记，要她做团员的工作，她的回答是："我做不了！"他们又缠住一个共产党员不放，要他出面干预，不然要动一动他的党籍，这位党员同样严辞反驳："悼念总理如果有罪，我愿意坐牢！"

黄浦江边的哀乐，一直播放到深夜。汽笛和哀乐，倾吐了人们心中的哀伤和不平，但人们的哀伤太深了，不平太大了！一系列的追查不但没有把人们吓退，相反，人们在时刻寻找着新的形式和新的机会进行斗争。

是夜，周总理的骨灰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短暂停留。16日的凌晨，北京空军某部的一处机场，一架夜航机奉命升空。没有仪式，飞行员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紧急任务。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周总理关于遗体处理的遗嘱，许多省市的干部群众，都等着迎接总理的骨灰，希望举行一个仪式，再一次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有谁知道，总理的骨灰就这样悄悄地撒了。飞机仅仅来回飞了一个多小时。

可是，一个小道消息在暗中传开。人们传说有人在凌晨3时左右，看到邓小平同志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默立，并且同周围的人交谈……

三、《文汇报》成了导火线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人们悬着的心落下了一些。他严肃的面容，有力的音调，打动着每一个人，很少有人不落泪的。可没有几天，人们的心又更高地悬了起来，因为王、张、江、姚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在直线上升。

2月2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无疑对张春桥是个严重打击，对张春桥等人的篡权，是一个新的障碍。2月3日，张春桥咬恨吞仇，写下“有感”，叫嚣要“新桃换旧符”，准备进行更阴险的篡权活动。

在此之前，上海的街头曾经出现过“坚持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张春桥对此不免有些愠怒。因为这过早地泄露了他的隐私，无异于是给他帮倒忙。张春桥当即下令：马上刷掉！尽管这样，民间的口头文学家们还是不放过这个素材，他们把标语中几个字的位置变更了一下，这就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继2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二期抛出了两校大批判组的第

二发重炮《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之后，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梁效的文章，率先提出所谓“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问题。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的记者述评，提出所谓“左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并点出“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3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三期，抛出署名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文章。王、张、江、姚篡党夺权的纲领公开亮出了。报纸、电台还连篇累牍地制造舆论，要求所有的干部和群众“转弯子”，同他们一起“批邓”。

邓小平是当时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敌手，但打倒一个邓小平，毕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要彻底打倒邓小平以及在世的老一辈革命家，就要砍倒周总理这棵大树。十年来，这棵大树庇护了多少老将老帅，成了王、张、江、姚这些野心家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如今，总理去世了，但他的树荫还在。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仍在给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以鼓舞和力量。从1月的哀思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的力量，使王、张、江、姚心寒胆怯。他们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鞭尸。

早在周总理逝世前后的几天之内，王、张、江、姚在上海执掌宣教大权的余党，就在为报纸删改稿件时亲自作了“示范”：

“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删掉；

“以周总理为榜样”，删掉；

“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删掉。张春桥说：“三次武装起义剩下的好人不多了。”

报社送了几份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指示是：“不发！”

下面这段文字，是3月5日《文汇报》发表3月4日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的删改：

……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

运动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

文中的黑体字是被《文汇报》删去的，其中"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的题词。

再看3月25日《文汇报》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其中借用了上海市某局一个党委副书记的话，曰：

"……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当时已家喻户晓，是加在邓小平同志头上的专用名词，那么，扶他上台的"党内那个走资派"是谁呢？这段干瘪枯燥的文字，没有滑过读者的眼睛。"批林批孔"以来，骂孔丘、骂大儒、骂宰相的文字连篇累牍，连普通的工人、农民，都知道它们的矛头所向。

谢谢《文汇报》，给人民提供了这样一个突破口，人民在保卫周总理的旗帜下，可以挺身出来说话了！

成百上千封抗议、责问、声讨的信件、电报，飞向《文汇报》社；抗议的短途、长途电话，从清早到深夜，打到《文汇报》社。群众强烈要求《文汇报》的后台站出来，作出交代。有

的信中，还公开点了张春桥的名。

“四人帮”在《文汇报》的爪牙惶惶不可终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组来对付群众的愤怒。老奸巨滑的马天水也不得不亲自出马，与同伙拟订了一个不成文件的文件，逐字逐句往下灌，以此来稳定上海的阵脚：

> 现在有人利用《文汇报》“三五”、“三二五”报道大做文章，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 这个意见，全部告诉了各条战线。

《文汇报》迫于群众的压力，还起草了一份千把字的所谓“初步检查”。4 月 1 日，这份打印件送到了“康办”（“四人帮”在上海的首脑人物设在康平路上的办公地点）。在一张特大的办公桌前，主管宣教的那个“四人帮”余党躬着背，眯缝着双眼，扫了一遍，又扫第二遍，然后捏起一杆粗粗的“首长铅笔”。他操着上海官话，自言自语：“何必自做惊弓之鸟，让江青、春桥说我们胆小如鼠？”他凝思片刻，挥笔把“初步检查”字样勾掉，改为以上海市委名义给中央的“情况报告”。随即又大加批改，在打印件旁边的空白处，写下“首长铅笔”的字迹：

> ……据他们回忆，当时删节的指导思想是因邓小平攻击说：“雷锋叔叔不在了”，所以就把报道上一些雷锋式的战士的具体先进事迹尽量作了保留，而把这一段评价雷锋的话删去了。……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删节不妥。后来，陆续有读者来电询问我们为什么作这样的删节，也有少数人说我们反总

理，甚至要揪后台，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说明有人就是要干扰毛主席重要指示的落实，转移批邓的大方向。

这个自作聪明的"四人帮"余党就是这样制造了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抛向写抗议信、打抗议电话的人民群众。这还不够，他当夜又驱车前往《文汇报》，在该报的党委扩大会上给他的爪牙们撑腰打气："你们夜班工作很辛苦，经受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也就是这个"四人帮"余党，4月20日又对他们在江苏的一个帮兄弟说："你们（省）要揪《文汇报》的后台，后台就是我，群众写了许多信，你们要看，我们可以给。"为镇压群众提供炮弹。

尽管他们可以玩弄各种花招，但这只不过是用纸扑火，火上浇油。人民群众愤怒的火焰，正以更猛的气势蔓延开来。

在全国，几乎到处都在冒烟。每个城市、每个乡村以及每一个家庭，时时在迸发出愤怒的火星。就连"四人帮"散发的大量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也起到了与散发者愿望相反的作用。七机部的一位同志说："不看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胡耀邦、周荣鑫他们有那么多好主张。"这真是极妙之言。使"四人帮"更为恼火的是，1975年夏季的那些"政治谣言"、"政治笑话"有增无已，越禁越多。幽默似乎并非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但此时中国人民的幽默却达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这是肆无忌惮的高压和英勇无畏的反抗相互冲击产生的火花。笔者特抄录一则"政治笑话"以飨读者：

王洪文跃升副主席，想讨好一下朱老总，碰到朱老总，他就直呼其名。朱老总不理他，举起拐棍，指指天，又指指地，

转身就走了。

王洪文不解其意，去问邓小平。邓小平说："那还不明白，这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小不忍则乱大煤，王洪文第二次去了。朱老总说："你接班，可以。只要你把这个鸡蛋给我立起来。"

王洪文回去之后，冥思苦想了几天，又同小兄弟们横竖摆弄了几天，结果，一个个都瞠目结舌。

没辙，他只好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这还不容易。"说着就拿起鸡蛋往桌上一磕。王洪文惊叫起来："啊呀，你怎么把它磕破了。"邓小平说："不破不立嘛，你看它不是立住了？"

王洪文懊丧了些日子。过春节的时候，他又想："我去给那老家伙拜年，看他怎么样。"

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朱老总这次不仅接待了他，还让人端出一碗汤圆来款待他。

王洪文高高兴兴吃完了汤圆，回到汽车里。忽然又直着眼睛纳闷起来。

司机问："朱老总又没有理你吧？"

王洪文说："不不不，他请我吃汤圆呢！"

司机说："那就是说，让你滚蛋！"

在无数的"政治谣言"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大概要推"周总理遗言"了。这份"遗言"，版本众多，虽有出入，但大同小异，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仅安徽一省，共查出 6 935 份，收缴了 3 028 份，足见其传播之广了。我们在此不妨将它节录下来：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

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1975年12月29日

这份“遗言”的确是假的。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笔者曾经访问过总理身边的两位医生，他们以摇头一笑作为回答。1975年12月下旬，总理已基本上处于整日昏迷的状态，根本不可能立下这样长、这样完整的遗嘱。

有人曾经猜测，造出这个“遗言”的一定是个“老家伙”。其实不然！“遗言”的作者，竟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名叫李君旭。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同他的青年伙伴们谈论着国家的兴亡，谈论着群众的情绪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

息”、甚至准备如果江青、张春桥那伙人上台，就一起去“落草”。他想到，要写出点什么，和“他们”唱反调，而且要有大影响才好；他想到，“若是总理活着，总理是不会同意打倒邓小平的，总理是会出来说话的。有些话可能已经说了，但是被‘他们’封锁了。我偏要使人们记住，总理是不赞成他们这样搞的！”于是，在二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决意不告诉任何人，一个人躲在单身宿舍里，一挥而就写出了这份“遗言”。自己读着读着，也忍不住落了泪。他没有想到，这份“遗言”会在一两个月内传遍大半个中国；自然，他也没有想到，这还会株连到自己的父亲、同学、同学的姐姐、同学的父母等等，共十余人被捕入狱。

今天，或许有人仍会对这个青年人的做法提出批评，然而，恰恰是这份假造的“遗言”，在1976年那些悲愤交加的日子里，曾经使千千万万人感动得掉泪。它的原因何在呢？

笔者认为，这份“遗言”的真正的作者，可以说便是广大人民群众。“遗言”中所表现的周总理在弥留之际，还缅怀先烈，还为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感到难过的心情，总理那种为党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那种对同志、对战友的极其真挚的情意，是感人至深的，也是符合总理的思想的，这是“遗言”打动人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遗言”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的巨大成绩，明确地要小平同志承担更重的压力和担子。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符合当时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愿望。

“遗言”的传播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因为这对于逐步升级的“批邓反右”是极为不利的。

“遗言”作为“政治谣言”，成了“四人帮”压制民意的重要把柄。然而，与此同时，《文汇报》的白纸黑字，也成了人民反击“四人帮”的重要依据。

四、石头城里

断断续续的细雨，像白纱一样笼罩着江南。清明节，似乎提前来到了南京城。

3 月下旬最初的两天里，雨花台烈士陵园出现了南京新医学院献给周总理的花圈。缎带被一个摄影者取下了。消息辗转相传，人们出于对“上海帮”的反感，这消息传成了上海派的人取走了缎带。于是，南京新医学院于 3 月 24 日在南京闹市区的新街口银行，贴出了“誓死捍卫周总理”的大标语。这无异于在石头城的上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大学政治、中文、历史三个系的学员，联名写信给《文汇报》编辑部，责问他们 3 月 5 日删去总理题词是何用心。

3 月的南京大学校园，春雨洗过的冬青树正在抽长鲜嫩的新叶。一位播火者一次又一次地召集着公开的、半公开的会议。他就是数学系的青年教师、团总支书记李西宁。

他激昂慷慨地宣传着自己的政治观点，冷静缜密地筹划着自己的行动方案。他和他的同伴们，决定要利用那帮坏蛋还不敢公开反总理这一弱点，大张旗鼓地号召悼念总理，而且要快。他们觉得，曲高和寡，调门可以先低一些，为的是发动更多的人。他们作了周到细致的部署，并得到了学校党委两位书记的支持。

3 月 28 日，不准去梅园新村，不准去雨花台的禁令透露出来，事不宜迟了。李西宁说：“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果然地决定，抢在禁令尚未传达之前，连夜刷出海报，第二天一早就动身。

29 日，几位学生干部领着南大 400 名师生，高举周总理的巨幅画像，抬着大花圈，列成了几路纵队。高大的梧桐树下，“光辉永照后来人”的大横幅，作为这支队伍的先导。他们绕道闹市区

新街口，庄严地向梅园新村进发。交通警为他们开放绿灯，车辆或者停驶或者绕道，各路口水泄不通。成千成万的南京市民，伫立街边，用泪眼注视着这支肃穆的队伍。这支队伍，使人民被压制着的悲伤和愤怒重又涌动起来了！

同日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及对面，贴出了两幅振聋发聩的大标语："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革命先辈用鲜血打下的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次日，宣传栏上又贴出了《文汇报》给南大三个系学生的复信，上边是"看一看，想一想"六个大字，同时贴出三个系学员的题为《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的大字报。

南京起火了！火热迅猛，从校园向全市扩展，连续性的爆炸震动了整座石头城！

29日晚7时，数学系计算机专业一年级的一行人，手拿排笔、墨汁，腋下夹着纸卷，疾步奔向南京火车站。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车站工人问道。

"我们来刷大标语，让那些小丑知道，反对周总理，人民不答应！"几十名学生争着回答。

"好，好极了！快进，快！……"

出口处的铁门打开了，候车大厅的门开了，行李房的门开了，学生们一拥而入。

站台上正停着一列开往成都的三十二次车。同学们闪向车厢两侧，刷的刷，贴的贴，短短几分钟，几条醒目的标语就出现在一节节车皮上。

"《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

"《文汇报》向何处去？"

"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旅客们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外观看，向学生们拍手叫好。

11点，学生们又在车站工人的协助下，在开往上海的405次

列车上刷上了同样的标语。

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们用电话向镇江询问情况，镇江站回答：405 次车一到镇江就被扣下了，正在冲洗标语。

人们更加震怒了。第二天，当南大学生再次来到车站的时候，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汽轮电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单位的同志也赶到了车站，而车站的职工则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水氯松、油漆和柏油。

看看那帮家伙再怎么冲洗！

在南来北往的一列列客车上，刷上了这样的标语：

“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此时，学生们，车站工人们，旅客们，已经融为一体，情绪达到了沸点。人们哄笑着，无所顾忌地嘲骂着张春桥和江青。

第三天，一个左臂缠着黑纱，右手持半导体话筒的青年人，带着他的几个同伴，又一次来到南京车站。他们是邮电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刷完标语，呼完口号，走进了旅客候车室。一个人站到椅子上，放开喉咙，慷慨陈词。他历数几年来《文汇报》猖狂反对周总理的罪状，断言这些家伙的阴谋决不会得逞。他预言着：再过两三天，全国人民就都会行动起来。他又来到商店、饭馆、售票处、车站广场，向更多的群众广播。店员、交通警、旅客、过路的行人们，停下了自己的工作和脚步，秩序井然地听他讲演。最后，他又回到了站台，端起话筒直接对着列车广播。旅客们又惊又喜，每个窗口都挤满了探身出来看他讲演的人，有更多的人则干脆跳下车厢将他团团围住。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种战斗的兴奋之中。站台上报告列车即将启动的铃声响了，旅客们与学生们挥手告别，称赞着这一群好样的青年。学生们大声叮嘱着：“同志们，请把我们的标语口号带到北京去！把南京的信息带到祖国各地去！”

南京的信息，一夜之间，通过南来北往的列车，公共汽车，就传到了全省和全国各地。

还是在学生们用水氯松往列车上刷出标语的当天，常州站的铁路工人就给他们写来了声援信。

北京天安门广场，潮水一样涨起的花圈的海洋上，托出了一条新的标语："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首都人民以兴奋的心情谈论着从南京传来的消息。

此时在上海，则有另一番风光。一队又一队身披粗蓝布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执一头磨尖了的钢筋的上海市"文攻武卫"的好汉们，奉主子之命出动了。"四人帮"的一员女干将给民兵指挥部下令："标语不准进入上海！""文攻武卫"们立即前往江苏省与上海交界处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及各个交通要道，以"武卫"来镇压来自南京方面的"文攻"。

五、怒火初燃

天色灰蒙蒙的首都，乍暖还寒。往年到这个节令，人们已经换上了春装。可这一年，由于寒流的时时侵袭，大部分人都还穿着棉衣。街上除了车辆的噪音，听不见畅怀的笑声和毫无顾忌的说话声。树木，伸着没有叶子的枝条。高楼，耸入寒风翻卷的天空。……除了高速运转的宣传机器之外，似乎一切都处在沉寂、凝滞之中。但一些事情却在发生着，冲击着人们的耳膜：蔬菜又紧张了，铁路又晚点了……人们寄予希望的邓小平，又靠边站了。总理逝世而引起的悲痛仍在延续着、撕揪着人们的心……

3月下旬的一天，一队小学生由老师带领着，向英雄纪念碑走去，队伍前面有一个不大的花圈。

贺龙元帅的大女儿贺捷生，是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党史工作者。她从历史博物馆的窗口看见了这队小学生和这一只花圈，立即从

博物馆的西门走了出来。

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动作却很敏捷，很快走到小学生队伍的旁边。她想参加这支悼念总理的队伍。

“你们是清明节扫墓?”她问一位带队的老师。

“是。”

“这么早?”

“想总理啊!”

她看见那位老师警惕的目光，停步了。

她对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她生下刚二十来天，就躺在母亲背上的箩筐里，跟随红军长征。红二方面军在保安和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她才一岁多。周恩来副主席把她抱了起来，亲着她的小脸蛋儿说：“红二方面军吃苦了，你也是长征小英雄啊!”周副主席问起她的名字，母亲答说：“叫捷生，是打胜仗时生的。”周副主席说：“这名字很好，胜利老是跟着你。你看，我们现在又胜利会师了。”1975年6月9日，父亲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起先通知：会议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道，不宣传……她忍着眼泪，慷慨陈词，上书毛主席，并请邓妈妈转信给病中的周总理。总理读罢她的信，立即提笔给毛主席写信。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用毛笔写字了，这一次握笔，手都不停地颤抖。毛主席圈阅了。于是，决定由叶剑英同志致悼词。没想到，总理拖着病重的身体，突然从医院赶来了。总理太瘦了，衣服显得很不合身，领子都耷拉下来。总理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握住她的手，向她说着深表关切的几句话……

此刻，贺捷生望着那队小学生把花圈放在纪念碑下，眼眶里的泪水再也忍禁不住了……

这是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第一个花圈。但据公安部门说，第一个花圈是安徽省濉溪县一位普通干部送的。

3月22日下午，这位同志到了符离集车站。他一连三个月没

有休息，节省下十来天假期；他领了一个月剩下的23元工资；他贴了一锅窝窝头当干粮……可他买不到上北京去的车票，只能买短途，一段一段地走。到了天津，被卡住了。他对车站的人说：他1953年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负了伤，住在雅安医院，周总理去看望他们……他说：他看见电影上总理接见外宾，步履艰难，面容憔悴，能不揪心吗？他说：他在西藏时，用两年的工资买的两个麝香还有一个，用小瓶、木盒装好寄给了周总理。他说：他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车站的人感动了，同意卖给他一张到北京的车票。3月23日上午，他到了北京，找到"北京绢花厂"，掏出还剩下的10元钱买了一个花圈，又请人在挽联上写上"敬献给敬爱的周总理"，落款处写了他的名字。他一个人拿着花圈向天安门走去。半道上，一辆小轿车在他身旁停下，一位他不认识的老干部请他上了车，把他和花圈直送到纪念碑下……

究竟哪一个花圈是第一个？现在已很难断定。当时想做和正在做花圈的人，岂止成千成万啊！

不几天，纪念碑下的花圈就多了起来。到3月30日，花圈已经遮盖住纪念碑的底座了。白色的花圈沐浴在早晨的霞光里，变成了一团红色的火，由纪念碑用手掌将它高高地托起。人们看见了火，火越来越旺；人们欢呼着，火焰越来越高；人们奔走相告，也想把自己变成火……

30日凌晨6时许，一队解放军同志走进了广场。他们在穿着灰色、蓝色、黑色衣服的人群中行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人们看见解放军来送花圈，心头特别振奋。人们急切想知道这是哪一个单位的。当花圈放在纪念碑西北侧的浮雕下时，人们看见挽联上醒目地写着：第二炮兵后勤部。后边是24个人的名字。这是从军队里送来的第一个花圈。

一天以后，这个花圈的制作者之一、管理员小李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惦念着他们的花圈，想看看它还在不在。他们的

花圈，是像交党费那样凑齐了钱做的；他们那么早去送花圈，是为了让它在广场上多放一些时间。他们已经知道，每天晚上都有人受“上级”指使，把花圈偷走。

仅仅是一天多的时间，纪念碑的碑座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方型的花坛。

小李走到西北侧。原来，他们想把中心的位置让给群众，所以有意没有往中间放。可是，花圈不见了。被弄到哪里去了呢？忽然，他看到不知是谁，把他们的花圈移到纪念碑碑座的中间去了，也不知是谁，用粗铁丝把一个个花圈连了起来，并牢牢绑在汉白玉栏杆上。显然是防止有人再来偷。

小李从人群里挤到前面，发现在他们花圈的白绸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凑近了一些，见上面有钢笔的、圆珠笔的、铅笔的许多签名。小李心里骤然涌起一股热浪：“群众的心，和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呵！”

他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开始记这些名字，这些陌生的战友的名字。

突然，小李被人扭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两个身体魁梧的解放军战士，脸色严峻，眼睛里喷着愤怒的火：

“你要干什么？要去打小报告吗？”

“你要秋后算帐吗？把笔记本交出来！……”

顿时，四周的人涌了过来，一下子把小李团团围住。

“交出来！”

“交出来！”

“问他对总理什么态度！”

“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小李急忙争辩着：“同志们！误会，这是误会……”

“什么误会！把笔记本交出来！”

小李等一阵声浪过去，大声说：“同志们，是误会，这花圈就

是我们送的，不信，我有工作证……”

那两位陌生的解放军战士接过了小李的证件，又看看他那着急的诚挚的面孔。

“这花圈是你们送的？”

“是的，你看，这上面有我的名字……”

两个战士在挽带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又核对了工作证，脸上严峻的神色才和缓下来。

“那你抄名字干什么？”

“我见群众这样支持，想抄回去给同志们看，让大家也知道群众和我们在一起……”

两位战士笑了，转身向人们说：

“同志们！他就是二炮的，这花圈就是他们送的，他抄名字是为了回去向同志们讲群众支持他们！他是好样的，二炮是好样的！……”

周围的群众顿时欢呼起来，有的还鼓起掌来：

“他是好样的！二炮是好样的！……”

“把他举起来，让我们看看！……”

于是，两个陌生的战士向小李道了歉，又一人抱着小李一条腿，把他举了起来……

当笔者于两年后访问二炮的时候，二炮的同志说，至今没有查出那两位陌生战士的真实姓名和所在部队。但是当时，这个来自军营的第一个花圈的消息，以及部队首长派战士日夜守卫花圈的传闻，一下子传开了，极大地振奋了全北京城。这个花圈宣告：我们的解放军是和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的！

驻在北京郊区的第二炮兵某处，周副政委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命令他赶快去追回一个花圈。这个花圈是他所在的单位送的。而估计此时驮花圈的平板三轮车已经快走到首都体育馆了。

周副政委放下话筒。心想：“这怎么去追呵！”花圈送走的时

候，他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上面的命令。但他装作不知道。可是上面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他又不好直接对抗命令。

他沉思了片刻，又拿起话筒。今天这个话筒居然比哑铃还要沉重。他用另一只手，不紧不慢地拨着号码，给司机班打电话要车。拨一回错了，再拨一回，又错了！第三回占线，第四回又错了！居然拨了半个小时才拨通。

下楼的时候，他拿定了主意，心情才平稳下来。

司机一边发动车，一边问：

“副政委，去干什么？”

“追，去追花圈。”

“追花圈？”司机一愣，他看见副政委的脸色不好。

“嗯！你慢慢开，今天路上送花圈的一定多，千万要注意安全，你慢慢开……”

司机明白了副政委的意思，挂上最慢的一挡，车子缓缓地开出了大门。

副政委坐在车上眯缝着眼睛养神，心里则在盘算着路程。想着三轮平板车该走到什么地方了。司机稳稳地驾驶着，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而且尽量不走捷径。

吉普车终于开到了天安门广场。副政委远远望见自己单位的那辆三轮平板车停在马克思像下面。一群人正抬着花圈往广场中心走。于是，他对司机说：“绕场一周……”

司机转动方向盘。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前南去，再拐到东交民巷巷口……

当这辆北京吉普回到广场北侧的时候，战士们举行的悼念仪式已经结束了。副政委此时才从车上下来，去看花圈。

战士们看见了副政委，都很吃惊：

“副政委，你怎么来了？”

副政委苦笑了一下：“来追你们！”

“来追我们?”

“是的，来追你们！你们完成了任务，我也完成了任务。”

4月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已经放到了离纪念碑好远的旗杆以北，许多花圈旁边还站着守护花圈的人。许多灯柱上也挂了不少的花圈，白色的挽带在阴冷的天空中飘动着。

六、清明节

清明节。清晨，在东单十字路口。买菜的、过路的、都注视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这些工人的眼睛红红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刚下夜班，没有回家休息就到这里来了。他们站在便道上，围着一个个花圈。马路并没有因为人突然增加而阻塞，相反，似乎比往日还更有秩序些。人们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有人正躲在暗地，睁大眼睛在监视着，他们不能给这些家伙以可乘之机。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清冷的风中，隐隐约约传来行人的交谈：

“是曙光电机厂的……是的……”

曙光电机厂，在北京东北郊区，离东单很远。他们选择了东单作为集合地点。8时许，3000多名工人自动排成了长长的八路纵队，34个花圈由小到大，依次排列，镶在队伍中间。队伍前面，这个厂的党委委员元海章，正以山西口音向工人们讲话。他中等个儿，50多岁，一张平平常常的憨厚的脸。

“同志们！我们各个车间、科室去送花圈，去悼念总理，这是严肃的事情。为了防止出事，防止坏人捣乱，我讲三点意见，请大家注意：一，到了广场，不要乱，因为人很多。二，要遵守纪律，不是咱厂的工人，不要让他穿行或插入队伍。三，在广场我们举行一个简单仪式。只要大家做到这三条，出了事，我负责……”

队伍以一块诗碑为前导，簇拥着望不到头的花圈，沿着长安街的北侧向西行进。王府井、南长街十字路口的警察，都开了绿灯。他们顺利地进了天安门广场，然后，由人民大会堂前面，绕向松林，又绕向历史博物馆前面，最后在纪念碑和天安门之间站定。

这是几天来到广场送花圈的最大的一支队伍，也是花圈最多的一支队伍。群众为他们让路、向他们投以赞许的目光。

面向纪念碑，34个花圈由小至大、从西至东排成一线。工人们在花圈后面整齐地列成方阵。周围的群众自动地手挽着手，在这个队伍的四周排成一道人墙，为的是使悼念仪式进行得更加庄严，不致使零散的行人插进队伍中。放哀乐的时候，别的单位的群众拿来自己的扩大器，让曙光厂的同志用。增大了几十倍音量的哀乐，在天安门前，在纪念碑周围回荡着……

当太阳转到东南侧上空的时候，广场已经到了饱和状态，从天安门城楼到纪念碑之间，旗杆上，华灯下，到处都是花圈。有的花圈上镶着周总理的遗像，有的贴着诗词。一层一层的花圈就像波浪一样向纪念碑涌去，纪念碑成了花海上的山峰，伸向高阔的天空……

雄壮的《国际歌》在广场上空回荡。一队队少先队员在广场过队日，一队队共青团员在广场举行宣誓仪式。一张张诗传单贴在纪念碑上，贴在花圈上；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朗诵声在人们耳边轰响。歌声、朗诵声、哭泣声、口号声，交织着、翻腾着，仿佛人间所有的爱和恨，所有的喜怒哀乐，都集中到了这里，由声音的洪流卷向历史博物馆，卷向人民大会堂，又翻卷回来，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顶端，向着高高的天空呼啸而上……

人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倦。通向广场的各个路口，带着朋友、扶着老人、拉着孩子的人们，像无数溪流向往着大海，源源不断地向广场走来。

有两个小孩，大的不过六七岁，小的只有三五岁，擎着一个花圈。花圈是他们自己做的，不过一尺方圆，上面也只有两三朵花，几枝柏条。他们严肃地向纪念碑走去……

两个梳短辫的姑娘，可能是中学生，在纪念碑前足足站了半个小时。她俩面前的地上铺着一块洁白的手织，手绢上放着几个苹果，苹果后面是总理的像……

一个年老的妇女，枯瘦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她让人搀扶着，艰难地抬起手，颤抖得十分厉害，把一朵小白花放到松墙上。事后人们得知，她是妇产医院的住院病人，癌症早已扩散。她换了一套衣服，瞒过了医生护士，乘车来到了广场。几天之后，这位老共产党员就与世长辞了……

数以十万计的自行车，无人看管，放在广场的四周，整整齐齐，没听说丢过一辆。一把不知什么人遗失了的车钥匙放在汉白玉栏杆上，也没有人拿。有个小偷还在栏杆上贴上这样的纸条："从今以后，我不再偷了……"

全世界有多少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常常为了社会的和国家的秩序问题而苦恼？如果他们想找到一个富有启示性的例证的话，这就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这种空前的现象，值得人们研究和思考。

大约在下午4点来钟，一个高大的铁花圈进了天安门广场。人们都向它涌去。群众自动地胳膊挽着胳膊给铁花圈闪出一条路来。铁花圈的后面，也跟着成百上千的人，夹杂着不断的呼喊声：

"让他们砸！"

"让他们烧！"

"工人阶级是好样的！……"

这铁花圈的做成，可是不易呵！前一两天，北京重型电机厂的工人们很着急，都想做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去，以表示对总理

的怀念之情。可是做花圈的纸买不到，商店的售货员说："上面有指示，这种纸不卖了。"住在城里的工人，上下班路过天安门广场，发现白天送的花圈，晚上就不见了。听说是被拉走烧掉了，工人们由着急变成了气愤。

郭师傅等几个工人，得知叶片车间做了一个铁花圈，跑去看了，受到启发，这铁花圈烧不掉、搬不走，正合大家的心意。可是叶片车间做的这个花圈太小，他们想做一个大的。车间300多工人听了他们的建议，都表示赞同。

从4月3日早晨7点开始做，夜里也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干了18个小时，铁花圈做成了。高7．5米，重一吨左右。最外一圈是7朵白铁花，每一朵直径60公分，意思是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往里一层，是用紫铁皮做的二十九朵花，代表二十九个省市。再里一层，是三十朵用玻璃丝布做的花，代表全世界30亿人民，这些材料，都是耐火的。

他们是在车间里一块空地上做的。因架子太高，有的工人就站在铁屑箱里，用天车吊起，往花上喷漆。车间六、七个女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用铁剪剪着花瓣儿，有的虎口都流出了血。

3日晚上8时，工人们正在加紧制作的时候，厂里一位副书记来了。

"赶快停下！谁叫你们做？上面已经有命令不让做，你们为什么还做？嗯？还用铁做！你们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工人们把他围了起来："你看我们这里面谁是阶级敌人？你说……"

工人们是知道这人的来路的。他20来岁，不知凭着什么本领，一下子当了团市委的副书记，在重型电机厂兼任厂党委副书记，盛气凌人。

工人们不听他这一套，他也只好走了。

郭师傅非常生气，一不小心，袄袖上蹭了一大块红漆。正好

党支部书记走来，支书说："老郭，小心点，漆都蹭到身上啦！"老郭正在气头上，见是支书，就说："这点漆，不擦了，留下纪念吧！只是咱的这位副书记，老是这样蛮横！"支书说："也不要为他生气，犯不着，你们干你们的，他要再来，让他找我。"支书的话，给了郭师傅很大鼓励，他心头的怒气，顿时消去一半，微微一笑说："咱车间几位副主任都支持我们做。厂党委书记是个红军干部，对总理感情深，我们知道他决不会阻拦我们。这位副书记要再来，你可接着。"

郭师傅又把怎样送花圈的安排，对支书说了，支书说："好，就这样吧！不过，谁带头呢？我是支书，不好出头露面。你明天就带个头吧！可不要莽撞。你知道，上面已有通知，不准送。党委书记不得已，找我们支书念了通知。要是出了事，也会给他造成被动。你可千万小心……"

4 月 4 日凌晨，工人们早早就从芦沟桥赶到工厂。7 点多钟，铁花圈出了厂门口，向着天安门广场进发了。重型电机厂离天安门广场少说也有 30 多里地。用人抬，是吃不消的。工人们想了办法，用铁管做了一个三角形的底座，一个角在前，两个角在后。前角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后面用 8 个推车的轱辘，把铁花圈托起。铁花圈后面，又安了一个 5 米多长的铁管，30 多个人推着。

走到五棵松时，有个警察喊："靠边走！靠边走！"这个警察见工人们不听，就上来扭车把。过路的群众很气愤，揪住了警察，把他的墨镜、帽子都拉扯掉了。这儿正是一个医院的门口，站满了穿着住院服的病人，他们向警察大声呼喊斥责……

临近礼士路大桥口，一辆吉姆牌小轿车停在旁边。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他立正向着铁花圈行了个军礼，并哽咽着向北重的工人们说："谢谢工人同志们！……"

时间还不到下午两点。郭师傅让大家停下休息休息，抓紧时间吃点东西。当他从一个小饭馆里出来时，正碰上了车间支部书

记和几个副主任。

郭师傅说："你们可不要前去，在后面跟着就行了。"

支书说："你也要小心，礼士路桥头，有好几个人在等着，里面有市机械局的，可能是要阻止你们送。咱厂那位副书记早就向局里汇报了。"

到了礼士路桥口，果然有一个人把他们叫住了。

郭师傅问："干什么？"

"你来一下，有事和你商量。"

他跟着这个人，到了桥下，见好几个人已在这里，有的人他认识，有的他不认识。厂党委书记也在这里。

机械局一位领导对他说："你去劝说一下，让工人们把花圈拉到这桥下，花圈不要送了。"

他问："为什么？"

"你不知道有通知，清明节是鬼节，不要送花圈。"

他急了："怎么？悼念总理有罪么？难道你们对总理没有感情？"

"我们和你的心情一样，只是上面有命令……"这位机械局的领导又示意让党委书记劝说，党委书记把手一摊："我也谈不通。"

正在这时，铁花圈又在向礼士路口桥上移动了。人们看见那位机械局领导的脸色变得铁青……

铁花圈就这样，终于冲破阻拦，走进了天安门广场，耸立在花圈的山峦之中。它无疑是一种意志和信念的象征，它给广场上的人海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这一天，在北京某医院的一间有8张病床的拥挤的病房里，诗人贺敬之正躺在床上。两三年前，周总理在一次会上问起了他："贺敬之现在在哪里？他写的《雷锋之歌》很好嘛！"不久，张、江、姚、三人亲自"批示"，并由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亲自执行，将贺敬之同志"立即调离《人民日报》，长期劳动改造"。诗人到了首钢。他在首钢结识了许多工人朋友，得到了工人群众的

信任和保护。

病房的门开了，一下子拥进十来个青年工人，他们排成一堵人墙将诗人同别的床隔了开来，有的人还故意高声地说着什么。然后，其中的一个小伙子，掏出他们这几天在天安门广场抄的诗，交到了诗人手里……

这一天，从 301 医院驶出来一辆红旗牌轿车。车上坐着独臂将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几天前他要往天安门送花圈，秘书怕他目标太大，为了保护他，再三地劝阻了。今天是清明，他无论如何要到广场看一看，秘书拗不过，只好答应。但秘书给司机作了交代：一是不要开得太慢，不要在广场停车，以免被人记下彭副总长的车号；二是不要开得太快，不然副总长看不清广场上的情况。

红旗牌轿车进了广场，紧贴着花圈之海的边缘在广场上绕着……

清明这一天，在全国各地，难以数计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花圈之多，诗词之烈，声势之壮，是难以描绘的。西子湖畔，松花江岸，西安古城的钟楼，郑州的二七广场……到处都是人如潮，花如云，泪如雨。整个国家沉浸在旷古未有的悲愤之中。人民以各种各样巧妙的有力的方式，寄托着自己的哀思，表达着自己的意志，显示着自己的力量……

夜幕降临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切，笼罩在浓浓的夜色之中。人们没有离去。他们仍然在这里看着、听着、唱着、想着。泪花与纸花交相辉映，心里的血与火在燃烧……

七、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位见证人

历史博物馆巨大的玻璃窗，不分昼夜地把广场上发生的一切映照得清清楚楚。对这一段历史，没有比这些玻璃窗更权威的见

证者了。

4 月 5 日清晨，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像往日一样，又缓缓地走出了博物馆的西大门。他中等个子，穿着对襟的中式蓝棉袄，戴着一条米黄色的围巾。

这人就是青年画家范曾。他是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美术专门家，同时还是个书法家。他在 1962 年跨出了美术学院的大门，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当着整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的时候，他同许多人一样，常常不能不离开画面构思，而去思索祖国和人民的命运。1975 年夏天，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曾秘密搜集江青一伙在文学界、美术界、电影界倒行逆施的情况，并写成了材料，通过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呈报周总理和邓小平，供他们参考。范曾也是其中之一。

今天，范曾跟往日一样，顺着博物馆长长的石级向广场走来。他的浓眉锁紧了。怎么回事？广场好像一片潮水退落后的沙滩，安静了许多，人，也没有昨天那样多了。纪念碑清清楚楚地耸立在眼前，昨天那如山似海的花圈，一夜之间不见了。只看见满地的被撕碎的纸屑和水迹。范曾问一个过路人：

"这花圈哪里去了？"

"哪里去了？拉走啦！"

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有上百辆卡车拉走的。好些总理像都给撕坏了……"

"我们厂看守花圈的一个同志被打伤后抓走了，昨夜被抓的有十来个人。"

他默默地扫视着纪念碑。一个女孩子，正哭着趴在纪念碑的栏杆上，嘴里还在说："我的花圈，还我的花圈……"

人越来越多了，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广场。一群青年人拉起手来冲过了警戒线，新的花圈重新出现

在纪念碑旁。人们在纷纷议论："妈的，和他们算帐！""他们对总理什么感情……"

8点多钟，在纪念碑西侧，爆发出一阵喊声：

"揪住他！揪住他！"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许多人闻声朝那个方向奔去。空气像是要炸裂，人们的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只听有人说：

"这个小子胆敢骂总理是走资派，真他妈的狗胆包天！"

"这小子是哪个单位的？一定要追他的后台！"

"没后台，他不敢这样明目张胆……"

人们踮起脚想看清那人的脸，但前面人头攒动，根本无法看清。忽然，那个坏蛋夺路向人民大会堂跑，人群呼拉一下向大会堂涌去。

"别让他跑了！"

"别让他跑了！"

人群冲过警戒线，翻过铁栅栏的短墙，一直追到大会堂门口，上了台阶。那小子想往里跑。几百个解放军突然出现在大会堂门口，排成几路。但人流就像海洋里的波浪一样，涌上来，又翻上来。有人喊："那家伙藏在地下室了！"人们就涌过去敲地下室的门。有人喊："在上面！"人们又往台阶上跑。

终于，抓住了一个留着平头的獐头鼠目的家伙。人们扭住他的胳膊，抓着他的衣领，数不清的拳头从四面八方向他伸来。人们看清了那人的脸，跟着怒喊起来："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有人叫着："不要打他，让他向周总理请罪！"

"把他举起来，让我们看看他长的什么德性！"

人们有秩序地聚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喊着、看着，同出来干预的警卫队长辩论着。此时，人们除了愤怒，还夹杂着几分高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第一次走到离大会堂这样近的地方。因为

这几年来，大会堂渐渐变成了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场所。而今天，他们登上台阶了，触到大理石圆柱了。有的人抚摸着漆得发亮的高大的门框，感叹着。是啊！如果人民都不能走近自己建造和自己行使权力的会堂，这里边行使的权力还能代表人民吗？

正当大会堂门口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广场上，愤怒的人群又围住了一辆乳白色的广播车。

原来，早上8时许，“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代理人就派出了两辆广播车，气势汹汹地到广场上转圈。他们居然向人们嚷嚷：“现在宣布，清明悼念活动到此结束！同志们，赶快离开广场，不要在广场停留……”

尖细的女高音在广场上空飞旋，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被激怒了的人们把两辆车团团围住。第一辆车上的人经过群众的斥责和教育，表示了忏悔。并通过高音喇叭喊了“周总理万岁”的口号，然后开走了。第二辆车却悍然不顾群众的抗议。人们在喊：

“停止广播！停止广播！”

“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广场？”

“还我们花圈！”

“天安门广场是人民集会的地方……”

广播车的窗户和门紧闭着。尖细的声音并没有停止。

“停止！停止”

“停止！停止”

人群更加愤怒了。不知是谁打破了车门的玻璃，“哐啷”一声，玻璃片飞了一地。

“把她揪出来！”

“问她对周总理什么感情！”

尖细的声音仍然响着……

人们向车顶上砸去，四方形的喇叭筒被砸瘪了，声音停止了

一个穿公安服装的男子走了出来：“同志们，同志们……”

群众不听他的，继续大声呼喊：

“让她说，她对总理什么态度？”

“为什么还要广播？”

女广播员坐在车里仍然不动。于是，她被愤怒的群众打了……

临近中午时分，一大批民兵被派到大会堂前，和群众发生了冲突。群众愤怒地质问他们：“你们对得起总理吗？”“你们不要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有的民兵当场表示受了蒙蔽，马上撤走了。其他民兵怕被群众打，都悄悄地把袖章摘了下来。这时，自发而起的群众在大会堂前一致通过决议，到广场东南角灰楼的民兵指挥部去谈判，要求还回花圈，立即释放被捕群众。随后，成千成万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一路高呼：“还我战友，还我花圈。”向东挺进！

壮怀激烈的《国际歌》，复又升上广场的天空。

两个小时之后，围在“指挥部”灰楼前的群众已经推举了五名代表。代表们在几个战士的帮助下，从解放军组成的人墙上翻过，进楼去找负责人谈判。十五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五名代表不见返回。显然，不仅谈判毫无结果，可能代表也被扣押了。而且，人们看得明明白白，一些民兵、警察在继续往这里开来，分数层排列在楼前跟群众对峙。广场四周也出现了更多的民兵和警察，对广场渐渐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代表出来了，谈判毫无结果。群众提的合情合理的要求，被粗暴地予以断然拒绝。

12时45分，一辆民兵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小轿车被推出了50米远，随即车子被掀翻，油箱起了火。3时左右，又有三辆公安局和民兵指挥部的车相继着火。

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人们还是在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从小灰楼内，走出来一个，左手叉腰，右手胡乱比划着叫道：

“我这里没有花圈，你们快走吧！”

几个小青年爬上了小楼西侧一间厕所的顶上，明明看到院子里放着好多花圈，就高声喊了起来：“你胡说！”

群众被民兵指挥部的蛮横无理再度激怒了，呼喊着向楼内冲去。楼内拖出来一条水龙带，假意灭火，向人们浇来，有的人当即被冲倒在地。

经过几次冲击，一部分群众终于冲进了小灰楼。不一会儿，人们抬着五、六个大花圈，从楼里气昂昂地走出来，大家热烈鼓掌，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勇士一样给抬花圈的人开路。花圈很快又被安放到纪念碑上。

这时，不知是谁，抓起一块石头向小楼砸去。于是，人们纷纷从地上拣着碎砖乱石，像雨点般地朝灰楼砸去。随着接连的“哐啷”声，灰楼的窗户一个挨一个被击碎了。堵在门口的民兵和警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散了。然后，有人从一楼的窗口越墙冲了进去，把里边的杂物抛出来。外边，喊声一片。

一个留小平头的小伙子，一边挥着手，一边用手提喇叭向人们呼喊，维持着秩序。

这时大约是 5 点 30 分，小灰楼前起火了，一个人用长棍子将着火的物件从窗口抛进了楼上。“指挥部”燃烧起来了！

一团团巨大的烟雾从窗户和门口卷了出来。接着，火苗也蹿了出来。烟雾升上无风的广场上空，慢慢飘散开来。

暮色渐渐降临了。许多人开始散去。没有散去的人，有的还围在楼前，有的站在广场上，有的坐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西天像一张湛蓝湛蓝的巨大的帷幕，东天则是一团桔红色的火光。

晚上 8 点来钟，范曾又到天安门广场来了。而且还带来了黄永玉的儿子。他临走时，黄永玉对他说：“我就这一个儿子，今晚交给你了。我让他看看天安门的场面，你要让他完好地回来！”

广场四周已经戒严了。警察和民兵的队伍封锁了各条路口。他们两人绕来绕去，才从一条小胡同进了广场。广场上人已不如白天多了，只是在纪念碑周围，仍然像往日一样，手电光闪来闪去，有看今天新送的花圈的，有念新贴出的诗词、悼词的，有抄写的。这时，从日常开大会才用的扩音箱里，播出了一项命令："广场上的群众赶快离开，9点钟以前离开！……"

范曾产生了一种复杂的预感，他拉住黄永玉的儿子。匆匆朝场外走去。

预料中的血腥镇压果然开始了！广场上突然亮如白昼，所有灯柱上的灯一下子打开了。没有来得及离开广场的群众被包围了，被一圈圈地往里压缩。纪念碑下传来撕打声、呼喊声、惨叫声……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们，有的被抓到历史博物馆前跪着，有的被拖到松林里反铐着，有的被驱赶到中山公园里扣押着，有的则立时被推上了警车。

当广场在无数棍棒的突袭下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管理局的洒水车和清扫车开进来冲刷血迹……

八、在历史画页的另一面

广场上的花圈是怎么拉走的呢？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看看另一面的几个镜头。

4月5日半夜零点刚过，一辆红旗牌轿车悄悄地驶进广场，在历史博物馆南侧的三层小楼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在森严的戒备之下，匆忙地走进了小灰楼。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他来了不久，上百辆大卡车、清洁车和吊车，就驶进广场，把成千个花圈洗劫一空。

凌晨5时，王洪文穿着军大衣从小楼里走出来，钻进了轿车，

走了。

可以想见，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副科长，这个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提携而飞黄腾达的人物，就是这样偷偷地干着反革命勾当。

在这座三层小楼的东南方向不远，便是北京市公安局。

4月2日那天，公安局会议室里坐满了人，都是科级、处级以上的干部，大家只是抽烟，不说话。屋子里烟雾腾腾。

不一会儿，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进来了，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此人个子不高，模样却颇精悍，走路敏捷，动作迅速。窄长的脸上，不大的眼睛灵活而狡黠。这时他的表情极其严肃，不像往常那样喜欢先来几句不疼不痒的俏皮话。他喝了一口水，说话了：

“今天开个紧急会议，研究一下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你们也看见了，很多人到天安门送花圈。他们哪里是送花圈，而是给中央施加压力，把矛头指向中央首长。上级已经通知，清明节是四旧，不准送花圈。上级对南京事件也定了性，是反革命事件。我们北京，不能让它再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处在第一线，大家要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他的右手习惯地在额前挥动，以加重语气。

从3月31日起，他就派出了不少便衣人员，混在群众队伍里，在广场摸情况，找破案线索。4月2日，他连续召集三次紧急会议，决定增调力量，并催促大家动作要果断迅速。结果，4月3日、4日两天，公安局的便衣人员就逮捕了二十六名群众。为了及时审讯，刘传新还向谢静宜借人，让北大法律系的工农兵学员参加预审。他还从各分局调上一部分人，由市局统一指挥。

这位刘传新局长，本是无锡驻军的一个副政委，虽然官位不低，可他却不甘于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要他女儿利用到北京串联的机会，给江青送材料。他女儿果真找到机会，当面把材料送给了江青。这一手果有奇效，这个地方驻军的副政委马

上得到了江青的青睐。江青尖声尖气的问："你爸爸叫刘传新？"

"是的。"

"是无锡驻军的副政委？"

"是的。"

"他怎么不来北京工作啊？"

"他想来。"

"噢，想来，那好哇！"

"……"

刘传新得到江青的恩宠，抓耳挠腮，夜不能寐，想着青云直上的那一天。从此，他不断地给江青送材料，告黑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刘传新被调到了北京，担任市公安局局长的重要职务。他对江青感恩戴德，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刘传新志骄气满，想在这清明时节大显身手。但他的高压对一些公安人员来说，并没有起多少作用。有的人借口病假，不来上班；有的人到天安门广场后，隐在一个去处，看诗词；有的人把黑纱戴在里边的衣服上，外边再穿上公安人员的服装；还有的在火柴盒里抄上诗，回去转抄给其他同志。有一个同志装病三天之后，不得不去上班，邻居一个小孩问他："叔叔，你干什么去？"他哭丧着脸回答："镇压群众去！"同情群众悼念总理的公安人员不在少数，然而，在"四人帮"和刘传新一伙的高压和欺骗之下，确也有不少公安人员去镇压了无辜的群众。

有一个青年，刚刚贴完诗词，没有走多远，一个公安人员就喊："抓流氓！抓流氓！"这个青年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抓走了。

有一个工人，在纪念碑南侧念"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有人汇报给刘传新，刘传新马上汇报给江青。江青一听点了自己的名字，马上下令抓。60 多个便衣便闯开群众，把那个工人抓走。

在刘传新及其主子们的操纵下，不光是历史博物馆成了一座兵营。4 月 5 日入夜，一辆辆卡车从长安街呼啸而过，钻进了中山

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于是，这两个公园门口当即挂出牌子禁止游人入内。在红檐绿瓦和楼阁之间，在青松翠柏之下，坐满了手持木棍的民兵。他们有的刚下班就被一声“紧急命令”驱赶来的；有的一两个小时前还在场抄诗词；有的是从远郊调来的，起初还以为进城看什么演出呢。至于成千上万根木棍，都是木材厂赶制出来的。木棍不够，锹把也用上了。连天安门附近的28中的桌椅板凳都被拆毁作了凶器。

人民憩息的公园，顷刻之间，成为拘捕人民的牢房。

武装镇压，不过是“四人帮”一伙的一种手段。对这帮政治流氓来说，他们更拿手的是制造舆论，欺骗世人。仅仅在血洗广场两天之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以所谓“工农兵通讯员”署名的臭名昭著的报道，就出笼了。

4月3日姚文元看见专门为“四人帮”提供情报的一期《情况汇报》中写着，纪念碑北侧的汉白玉栏杆上，贴着不署名的标语：“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顿时犹如芒刺在背一般，他捋捋横过前额的仅有的几根头发，批道：“这同外地的煽动性的反动口号一样。”

有一张悼念总理的小字报，这样写道：“历史将无情地宣判那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损毁磨灭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人不得人心。这些人民的败类，社会的渣滓，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千古罪人和公敌。”姚文元批道：“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

对于科学院109厂的四块诗牌，姚文元在“碧血再开革命花”旁边批：“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靠打棍子搞文艺批评起家的姚文元，原来还有魔术师一般的想象力。

4月5日，《情况汇报》里写道：“今天清晨7点多钟，有人看

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聚众抗议。”姚文元挥笔改为：“一小撮坏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煽动一伙人抗议。”《情况汇报》里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姚文元把恶毒攻击周总理的这句话删掉了，于是群众成了无故行凶的罪犯。《情况汇报》里说：“现场黑烟冲天，一股橡皮气味……”“现场指挥部楼前都是青年人”。姚文元把它改写成：“一片反革命喧嚣声”，“参加这次反革命事件打先锋的，大都是一些青年人”。

4 月 7 日上午 7 时左右，王、张、江、姚纠集了编写《情况汇报》有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工农兵通讯员”，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说：“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江青还煞有介事地安慰说：“你们挨打了没有呀？”

王洪文敬酒之后，江青也举起酒杯，身子欠了欠说：“对，都干一杯！”

祝贺之后，各人坐定。张春桥仰在椅子上，咽下一口红烧鲤鱼，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赶忙接着说：“对，这一下子抓住了要害。有的坏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酒足饭饱之后，这群被封为“工农兵通讯员”的人，按照这个调子，去把几期《情况汇报》改写成一篇公开的报道。姚文元还不放心，一再授意说：“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上去。还要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

些话引进去，这样更有力量。”

东大厅里死一样的静。除了几个人嘁嘁嚓嚓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大门外，广场戒备森严。27 年来，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大白天没有一个行人。

傍晚，当王、张、江、姚坐着轿车离开人民大会堂，驶向他们豪华住处的时候，当他们坐在沙发上喝着浓茶的时候，《人民日报》印刷厂的轮转机正在高速转动；中央台的播音室，已经在开始发出这篇篡改历史的报道了。

四天之后，一封署名“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信，寄到了《人民日报》。总编辑一看到这封信，脸色唰地变了。因为这封信的正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而背面却写着“戈培尔编辑收”。

信里装着 4 月 8 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寄信人在旁边批写道：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与（予）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指向毛主席！

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锁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

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日改为：“法西斯党机

关报”。

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九、这是什么颜色的恐怖

反革命搜捕的魔抓伸向了全国各地。元海章、李西宁、徐同新、康育义、王运德、李君旭等等相继被捕，贺捷生、范曾朝不保夕。大规模的恐怖！打着“无产阶级专政”幌子的恐怖！不知究竟叫什么颜色的恐怖！社会主义，这一人民心中神圣的庄严的名词，被“四人帮”的法西斯兽蹄践踏着。

4月7日之后，在北京，凡前些日子到过天安门的人，哪天哪时，都要登记、交代；凡抄过诗词的，也要登记、交出来。那几天去过天安门的，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取消“五一”游园的资格。为了对付成千成万持“不同政见”的人民群众，什么宪法，什么言论自由，统统被“四人帮”踩在了脚下。一封信，一句话，都可以构成逮捕的罪名。刘传新杀气腾腾地说：“首长都有指示，我的理解是敞开干！”他们竟然声称：“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在北京市公安局系统，因同情人民群众、拒绝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而受到拘捕、隔离的就有15人，受到各种追查的多达600余人。更有甚者，刘传新一伙早就派出大批便衣，监视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宅。清明期间，埋伏在国务院某宿舍附近的公安人员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只要王震的儿子一出门，立即以参与天安门事件为理由加以拘捕。甚至王震同志本人去看望叶帅，都要提防遭到“四人帮”的窃听。

天安门的行动，使得“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这个“堡垒”也失去了安全感。4月10日，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头头给马天水等写了一封信：

根据市委领导指示，我们草拟了《关于防止反革命暴乱的实施方案》，方案中的兵力等均已初步落实。

下面就是这个方案的原件，又名《反击一二三方案和康办周围地域保卫工作预案》：

第一批战备机动兵力为每天一万零三百人，二百辆机动车辆，由江南、上钢三厂等十个单位落实，各区、师掌握机动力量计有一万五千。

“反击一号”方案：使用兵力六万一千七百，在出事地域设三道包围圈。

“反击二号”方案：在反击一号方案兵力部署基础上迅速调动第二批机动力量。

“反击三号”方案：市指挥部掌握五个师（约五万人）的机动兵力为骨干，同时动员全市民兵，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康办保卫预案：使用兵力八千余人，分两个梯队，封锁路口。

请看看，这就是名噪四海的上海第二武装。为了制订和试验这个方案，“小兄弟”们连续开会。4 月 7 日晚，出动了一个师的民兵和武装警察，以及 200 辆摩托车，进行第一次演习。“四人帮”的一个余党亲临人民广场观看，并得意洋洋地说：“威风威风也好嘛！”

天安门事件之后，在全国各地公安部门备案的各种所谓“反革命案件”急剧增加。笔者曾经到过一个省的公安局，据称：仅这一省，1976 年 4 月一个月内发生的所谓“反革命案件”计有：反革命传单 14 起，反动标语 41 起，反革命信件 6 起，反革命口号

2起，谣言60起，反革命言论38起，参与天安门事件3起。

追查与迫害愈演愈烈，远远超出所谓天安门事件的范围。中国，你这多难的土地，不知平添了多少冤魂！请看七机部某所张玛娅同志于5月14日写的一份绝命书。她是著名老作家茅盾同志的侄女，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红军老干部张琴秋同志的女儿。

我感觉到为难的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也无法用虚伪的检查去保自己的名声和家里的安定，党性不容许我做这样的交易。

那么，我的观点是什么？

1. 我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他是坚信不移的。

2. 那么我到底怀疑谁？不相信谁？反对谁呢？这就是江、张两个人。我反对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搞私活，搞极左。

他们两个人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勾结起来整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材料，就是他们两个反对周总理，就是他们两个阴谋策划了大《参考》和《文汇报》的反总理事件。又是他们两个当然去庇护了吧。

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勇气活着说出自己的这些观点，因为在同志们面前第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现这是最难受不过的了。活着的没有勇气讲，死了的起码应有这个勇气讲吧！反正这样坚持真理而死比虚伪地活着为好。

……

我死后我的名声扫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组织能恢复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誉。

我的家，我的孩子无罪，希望加以保护。

张玛娅的冤魂在昆明湖边徘徊。但她非但没有得到安宁，反而被“四人帮”的走卒正式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并呈报公安部。

镇压与反镇压、清查与反清查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人心是压服不了的。一个中学生这样写道：“率兵打下九州，神将自有邓刘，忠心耿耿革命，安定团结有功，开国元勋之臣，今日却成抔土，无故被人打倒，我们心中不服。”经过十年动乱的人民，早已不是愚不可及。几年前他们还分成这派那派，如今在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他们互相保护着。去过天安门吗？去过，是回家路过的；听过谣言吗？听过，在电车上、在澡堂里听到的。许多干部对清查工作明抓暗抗，主动出来保护群众：“我们单位没有一个人去过天安门。”许多群众挺身出来保护干部：“我们自己去的天安门，与领导无关。”还有的领导借口“我们自己来处理好了”，来保护公安局准备拘留逮捕的对象。大多数有良心的中国人，再也不信那一套“亲不亲，线上分”的假革命的高调，去搞揭发自己同志的那种不得人心的事。他们倒是在共同的痛苦与忧患之中，增长了自己与恶势力周旋的智慧，也更懂得了亲人之间、同志之间、朋友之间的高尚的情感。

4 月 9 日晨，往太原方向的 135 次列车一声长啸开出了北京站。在靠窗口的一个座位上，一位沉默寡言的青年旅客，以深邃的目光，透过眼镜射向广漠的原野。他就是那篇著名的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作者王立山。

4 月 6 日清晨，小王又到过天安门广场，只见十几辆清洁车在广场来回冲洗。他咬着牙关，愤愤地说：“洗吧，洗吧，洗得掉广场上的血迹，洗不掉你们手上的鲜血，洗不掉人民心中的仇恨！”

他又去到医院看望正住院的爸爸，他爸爸听了气得发抖：“他们这样对待几十万、几百万群众，简直是法西斯！立山，他们还要镇压的，不会就此罢休。”

果然，第二天晚上，王立山一家人正吃晚饭，广播里宣布了所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那吞咽下去的饭团，都像压到了心头。突然，他听到了引用的所谓“反革命”诗句里就有自己的“扬眉剑出鞘”。事情严重了，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全家人的心都压紧了。

谁能想到，妈妈当年搞地下工作的经验竟能适用于今天。

妈妈问清有没有人跟踪或照相之后，告诉他：第一，必须尽快离开北京去太原；第二，从现在起尽量少上街少露面；第三，要化妆一下，马上去配眼镜；第四，以后不再用毛笔写字，不要随便发议论，以免引起别人注意。

《扬眉剑出鞘》被北京市公安局列为“〇〇一”号反革命案件，严令追查破案。

小王到了太原，在铁三局建筑处机械厂的工棚里，默默地干着活。他的哥哥用巧妙的方法同他通着音讯。既然逼到了这一步，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他横下一条心，准备像爸爸妈妈以前搞地下工作那样，长期坚持下去，直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日子来临。

在这段日子里，他只去过石家庄一次。为了不致牵连他的女友，他要把她的赠物当面还给她，这样，一切的危险和痛苦，便可由自己一人来承担了。

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了女友，可以说是以性命相托。在最初的惊愕与震动之后，他的女友平静了下来。她出生在一个烈士的家庭，清明节那天，她特地赶到北京，参加了广场上的斗争，还献了小白花。此刻，她热恋中的人已成为被公安局搜捕的“要犯”，但她仍然爱他，更加爱他。泪水模糊了这对年轻恋人的眼睛，他们挽着臂膀朝前走着，不管命运将给他们安排什么。这种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斗争为基础的爱情是生死不渝的，是任何刀剑劈不开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科学院109厂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关

着一位姓张的青年工人。他是109厂送的花圈的图案设计人，是集队去天安门的所谓“预谋会”的参与者，是四块所谓“反动诗牌”的制作者，又是推翻广播车的参与者。

“罪恶”可谓不小了，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可靠”的人来看守他。有的人干脆说：“我没这认识水平，我不去！”拒绝这项象征着一种“政治待遇”的“光荣”的工作。后来，总算选了两个比较可以信任的人，而由一个在清明节反对去天安门，自然是最最忠实可靠的“英雄”充当“看守所所长”。

小张的肠胃不好，面容日渐消瘦。看守的人给他熬了大米粥，没想到被“所长”看见了。

“干什么？”

“给他熬了点粥，他肚子不好！”

“不行！他肚子不好，他去天安门挂牌子怎么有那么大劲？”

简直快成了虐待狂！一切书报都要经他“亲自”检查，又阴又湿的小屋，天冷时还不让生火。但是，“所长”没有想到，即使这两个他还比较信任的看守人，也是曾经到过天安门广场，跟小张这个“罪犯”心息相通的。“所长”为了赢得“四人帮”在科学院的那个死党的青睐，看管可谓严矣。可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社会上的情况，专案进展的情况，在押的小张了如指掌。秘诀就在于，两个看守人都以巧妙的方式告诉了他。有时，他们在门外说话时故意放大些声音，为的是让小张听见；有时，小张的爱人来探望，“所长”不准，他们就帮着传递纸条。“所长”要来文的，他们就跟他软磨；“所长”要来武的，他们也有两只拳头。

秋天的一个晚上，两个看守人带着小张出去“放风”，他们先在厂院里散步，然后就出了厂门。

“不行吧！你们俩要承担责任的。”小张为看守人担心。

“不要紧，‘看守所长’已经回家了。”

苍茫的夜色渐渐笼罩大地。他们的“放风”，越放越远，居然

走了好几公里，到新街口了。

小张的家在西四，离新街口只有三站路，看守的人略略环顾了一下四周，就对小张说："你快回家去看看，别叫你爱人着急。她几次来看你，'所长'不准。你抓紧时间，我们在22路汽车站等你，两个小时以后……"

小张回到家里，一家人悲喜交加。他们感激这两位看守的同志，不禁掉下泪来。这两个看守人，正是当时千千万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普通中国人民的代表。小张在家呆了一个小时，为了不致牵连那两个好心的同志，他必须赶回22路汽车站了。

1976年，中国的"反革命"何其多！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任何强暴无法摧毁的万里长城。

十、戴上手铐以后

雷雨到来之前的暴风扫过黄浦江畔、石头城下、天安门前，扫过祖国广大的土地。它把我们民族的一批优秀分子、一些有头脑的勇敢的工人、学生、战士……推进另一个世界，开始了他们一生中尽管短暂，却是不自由的生活。"四人帮"肆无忌惮地践踏社会主义的法制，对这些"政治犯"威胁、恐吓、虐待，把他们同刑事犯关在一起，让刑事犯监督他们，甚至进行惨无人道的"棍棒教育"。"四人帮"的爪牙气势汹汹地斥责审讯人员"思想右倾"，命令他们对抓的人一律按反革命对待。刘传新还公然说："对这些人要狠，不能手软！"在"四人帮"的欺骗和高压下，一些公安人员大打出手，再现了人类野蛮时代的一些特征。另有一部分公安人员，违心地执行着命令，他们的良心同这类"政治犯"一起受着鞭笞。还有一些人则利用自己的特殊岗位，同"四人帮"展开特殊的斗争。

戴上手铐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在上海……

徐汇区服务公司的青年电工小黄被带进了预审室。

4月8日清晨，他把一面白色绢纺绸做的旗帜，升到了人民广场三四层楼高的中心旗杆顶端。旗帜上，是八寸的总理像，衬着硬纸，用塑料口袋保护着。这面象征着总理一生清白的旗帜，迎风招展。旗上八个大字："沉痛悼念恩来总理"。小黄把旗绳往旗杆上绕了几圈捆牢。但是，他没有走。他觉得，自己是光明磊落的，为什么要走呢？他掏出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向越围越多的群众宣读。后来，他被两个民兵模样的青年人摘掉了帽子，打掉了眼镜。一阵拳打之后，又被人脱去外衣，包住了他的头，不让他喊，塞进了吉普车。他的手被反铐着，头被几个人按着，前额几乎触到了脚尖。

此时，小黄的衣服已被剥光，换上了囚犯的黑袄黑裤。不用说，他的衣物又被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

"你叫什么名字？"

"悼恩来。"

"家住在什么地方？"

"上海滩。"

"做什么工作？"

"造社会主义大厦。"

严厉的审问，得到的是冷静的回答。预审员恼怒了。小黄被按头，被推搡，被打着耳光……

"你们不能打人！"

"我们不打好人！你是反革命……"

小黄也愤怒了。他挺直了高高的身子，争辩着：

"悼念总理有什么罪？人民爱戴的，你们不爱么？……"

回答他的是又一记耳光。他被带到了第一看守所。马天水在关于小黄升旗的报告上批道："要从严，不能放过，一定要从严惩

办！”“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爪牙亲自审讯。

已经凌晨5点了。不时传为黄浦江上沉闷的汽笛声。那个爪牙，急着要向马天水报功，命令二十几个人展开车轮战，一定要攻垮小黄。

“你还敢去南京路走一次吗？”

“我敢，你们放我出去我就敢！”

小黄以绝食来抗议对他的法西斯暴行，5天没有吃饭。本来就瘦长的个子，简直只剩下一把骨头。有个看管他的人，显然很同情他，再三劝告他吃饭，小黄说：“我是清白的人，我不是罪犯，为什么要吃监狱的饭？！”

小黄是个知里知面的青年。他平时做了好事，是根本不愿意讲的。可现在，他不能不讲了，他要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上进的革命的青年，决不是一个罪犯……

在南京……

因演讲被抓进监狱的康育义，躺在一间又黑又潮的小屋里。他在这与外面隔绝的小笼子里，已经住了近一个月了。他想着进来后的一次又一次审讯。经常提审他的预审员，是一个中年人。开始的几次，对他的态度是严厉的，间或还有些训斥。可他明显地感到，这位预审员的态度，在慢慢转变。温和的问话，没有逼供。他似乎觉得，他在新街口演讲时见过这张友善的面孔。他随即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这种幻觉。但即使在这里，也有正直的、与自己心息相通的人，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了。审讯虽然紧张，起初使人怒不可遏，还要像留声机一样回答一个个重复的提问。但他可以借此慷慨陈词，以排解一些心中的闷气。可一停止审讯，这几天的寂寞，反而使他难受了。一整天一整天面对四壁，没有人说话……

康老师正在闭着眼睛思忖，听到门响，赶忙坐了起来。

进来的是这个看守所的一位老所长，后面跟着那位预审员。

“你叫康育义？”

“是。”

“管理员把腰带给你了？”

“给了。”

“你站起来我看看……”

所长的语气是温和的。康老师站了起来，不解其意。两个人对视着，康老师感到对方的眼光跟他的语气一样。所长在他腰间轻轻摸了摸，说：“好吧，你坐下吧。”

康老师坐下后，所长又说：“你有什么事，说清楚，争取从宽处理……”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没有犯罪，我那不是反革命演说，我只是在新街口街上说了自己的看法，说了大家的真心话。”

老所长没再吭声，先走了。预审员过来说：“过会儿要带你出去，你态度好些，有什么意见，当时别讲，回来跟我们讲。”康老师顺从地点点头。

预审员走后，又进来一个管理员，拿着一副手铐说：“这儿的规定，出去要戴手铐。”

康老师说：“戴吧！”

戴上以后，管理员问：“怎么样？紧不紧？手腕能活动不？”

康老师活动了一下手腕，说：“可以了。”

临走，监狱的医生给了他止痛药。那位管理员还叮嘱说：“开大会时，你不要弯腰，只要低头就行了。不然像你这样瘦弱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这一天是5月28日。康育义同王运德、徐同新等六个人一起，被押到了五台山体育场批斗。在南京，连刚上学的小孩子都知道，凡是重大罪犯的会审大会，都在这里召开。

这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滑稽的批斗会。前五个被批斗的对象都是共产党员。每当台上宣布某某人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几万观

众中就爆发出一阵嘲弄批斗会的哄笑。5月底的南京，天气已经十分闷热，几万人，说着话，走动着，用草帽扇着风，谁也不去听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发言。大会开了一半，听众只剩了三分之一。

果然，批判大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康老师虚弱的身体支持不住了。他额头渗出虚汗，腿也发软，他觉得自己要栽倒下去。幸好，两边押着他的解放军战士，一人搀住他的一只胳膊。康老师感到，这两位年青的战士，在有意地支持他，使劲地托着他。他还听见其中的一个俯在他耳边小声说："快了，快结束了，再坚持一下……"

在这样的大会上，这个小战士敢冒风险在他耳边说这样的话，使他非常感动。他觉得，人民的心，战士的心，是和他相通的。这几句话声音极小，可在他听来，却有着千钧的力量，他觉得，自己应当努力振作起精神……

徐同新在五台山的大会上，是排在头一个的。他自己很清楚，他在办案者的心目中，"罪行"是最大的一个。如果要杀头的话，他是第一个被杀的。他在贴小字报时，已经作好了进监狱的准备。但他没有想到，他会受到如此"重视"。"四人帮"在江苏省的一个爪牙亲自参加了对小徐的审讯。

"你在南京，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用'火箭炮'把南京轰得一塌糊涂。'火箭炮'是什么意思？"

"过去用小米加步枪，现在用'火箭炮'。"

"你怎么比特务还要顽固？"

"我没有罪！"

"你为什么拥护邓小平，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就是邓小平在南京的代理人……"

"我只是说我的心里话，我认为邓小平没错。把我和老一辈革命家连在一起，我感到光荣。"

"你就等着杀头吧！你不要不进棺材不掉泪！"

"我学习周总理的精神，我连骨灰也不要了……"

小徐意识到，办案者所以对他如此重视，一定有更高的人说了话。当然，那时他不可能知道，在他的传单贴出之后仅仅两个小时，一个驻南京的记者，就向王洪文、张春桥打了电话，张春桥回答："坚决镇压！"

他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这小屋长不过三米。而且还有两个刑事犯看着他。他的手铐，是白天黑夜戴着的，吃饭、睡觉都要戴着。他吃没法吃，睡没法睡。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在北京……

铁窗里关着更多的人。这些与"四人帮"斗争的英勇的正直的人，他们有手，却不能去开机器，写论文、握枪杆。他们有的正被拳头殴打着，有的正借着暗淡的灯光学着数理化和外文，有的正背靠着墙默默的唱着《国际歌》……就是他们，遭受了非人待遇。有的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吃喝睡觉还被"苏秦背剑"式地铐着。有的人的头被皮鞋踢破，脊梁被狼牙棒式的铁钉木棍抽打得血肉模糊，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几次昏厥过去……他们现在只有大脑没有被禁锢，只有眼睛还在注视着铁窗外风云的变幻……

又一个撕裂人心的噩耗传来：中国人民敬爱的老英雄朱总司令去世了。他们冲到门口，扶着冰冷的铁门，但眼前只有灰暗的灯光。朱老总不久前还在接见外宾，怎么一下子就永远离开了呢？永远离开了党和人民，祖国的大地和天空？说不定也是那帮坏家伙害死的！朱总司令的追悼会怎么开呢？天安门广场有没有纪念活动？自己单位的同志有没有去送花圈？他们心里想的很多，也很难过。他们不能到天安门去送花圈了，只有任大颗的泪珠滴落。

这真是一个多难的年头。半个月之后，强烈的地震摧毁了唐山，威胁着首都。"政治犯"们的牢房也和大地一起摇晃。要是强

地震能把“四人帮”那伙贼子砸死，那真是苍天有眼！他们自己被砸死也毫不遗憾。可他们毕竟知道，即使再有成千成万的群众死难，江青和她的同伙照样能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多么希望能为灾区的人民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呵！在押的一位第二炮兵的解放军干部，摘下自己的手表，对监狱管理员说：“我不能参加抗震救灾，我交上这块表支援灾区。”但是，他居然遭到了训斥：“你是反革命，人民不用你的！”

9月9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代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傍晚时分，首都市民从低矮的抗震棚里走上街头，静听着空中传来的哀乐。因为人们对清明的镇压记忆犹新，天安门广场上，从纪念碑到金水桥，人群既不稀疏也不密集。行人的脸上看不出表情。

曙光电机厂的元海章，从自己囚衣上扯下一块黑布来，同几个难友一起做了黑纱。他不顾管理员骂他“你没资格”，照样戴到自己的左臂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资格悼念自己的领袖。”他被几个“政治犯”推做代表，要求狱方准许他们收听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终于获得了准许。他们在冰冷的地面上，静坐了五个小时，表示自己的悼念……

戴上手铐的人，是最敏感的。因为他的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都在紧张地抖动，审度着这每日每夜，审度着他在这狭小天地里所能见到的一切。

老元在受审过程中，发现那位伏案记录的女公安人员的目光，似乎包含着同情在注视他。

果然，他的感觉不错。在这铁窗之下，他有与他心心相通的人。这一天，这位记录员把他叫到一间办公室里，打开灯，让他给家里写封信，而且搬了一条凳子叫他坐下。老元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情。但他观察到这位记录员确实是诚恳的，这才简单地写了两句话。

记录员小声说："多写几句，写完了，我给你带去。我在这儿不能叫你同志，因为有规定，但你的问题会解决的。"

她还说："你年纪大了，吃不了这个苦头，你要注意身体……这里面很复杂，杀人犯都有，你要少说话，书报也要少看，光线太暗，眼睛要坏的。"

感激的热泪，在元海章的眼睛里旋转着。几个月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他当人当同志看待呵！他想跟这位记录员握手，但又不敢，只是说："我一辈子感谢你……"

他戴上手铐以后，没完没了的审讯和训斥，加上粗劣的伙食，污秽的空气，使他难以忍受。如今，这位女记录员的态度，使他已经冰冷的心，感到了春风的温暖。

临离开时，女记录员说："你放心，我一定送到。告诉我你家的地址……"

戴上手铐的人，生活是严酷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会更感到同情者的可贵与不易。元海章似乎觉得，他在太行山当八路军的时候，还没有处于这样极端残酷的环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感到阶级情谊的无比珍贵。的确，这是怎样的环境呵！

手铐的力量是可怕的，但决定历史命运的决不是手铐，而是正义！

此刻，在北京城内某处的一个被禁锢的院落里，邓小平在伏案沉思。人们曾经传说，他被送回四川老家了，很多老百姓去找他；还传说，他被送到东北的某个地方……还传说，有的青年骑着自行车，从邓小平家灰色大门前飞过，并高声呼喊："老邓，我们跟你打游击去！"还传说，在重庆街头有一个从邓小平老家来的要饭的农民，有人对他说："只要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就给你饭吃。"这个农民扭头便走了。在这禁锢的院落里，虽然没有镣铐，却也没有自由；虽然没有厉声的训斥，却有的是令人窒息的宁静。只是有时，两个一、二岁的外孙被允许送到这里来，和邓

小平作伴一两个小时。两个孺子，天真无邪，有时坐在膝上，有时扑在怀中，他们不知道，此刻，只有他们能给老人带来人间的安慰和欢乐……

十一、在十月的阳光下

在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失去了太多的亲人之后，时间把人们带进了 1976 年的 10 月。

北海和景山的大门照例紧闭着，门前是一块积满尘土的“内部修缮”的牌子。只有冷冷清清的秋风在门口盘旋，卷着地上的落叶。

假如此时你正走过团城旁的石桥，隔着早已升高的铁栏杆，眺望中南海里影影绰绰的绿树红墙，你想过什么呢？你期待过什么呢？

10 月 6 日下午，天空似阴似晴，灰蒙蒙的阳光照着冷落不堪的景山公园。在几株苹果树下，江青正左右摆弄着姿势，让摄影师为她拍照。与往常不同的是，江青这一天似乎出奇的严肃。来公园之前，她命令手下的人跟她一起念了几条毛主席语录，而后就歇斯底里地大骂“邓小平是反革命，万里是坏人”；又讲到“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规定的排列，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不能反对，反对他们就是反毛主席”。接着，江青就带着一帮子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一向穿戴妖里妖气、又是怕光又是怕风的江青，此时摘掉了帽子，一没围围巾二没挎小白皮包，倒是换上了中山服，接连照了十七张半身像。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想到：江青一本正经地拍那么多半身像干什么？据新华社摄影部一份材料记载：四天之前，即 10 月 2 日，王洪文一下子叫摄影师为他拍摄了穿便服、穿军服的标准像和办公像，多达 114 张。王洪文从 27 张 8 英寸样片中亲自选定了他满

意的标准像，指令按周总理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修版。两天之前，姚文元指令《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弹升上了天空。那么，今天江青的意图，自然也是明明白白的了。

拍完之后，江青垂下恩典，将两个苹果赐给摄影师。

景山公园苹果树下的活动当然不是一次女皇的秋游，当然也不是一次“历史性事件”，只不过是江青覆灭前的最后一幕表演罢了。当摄影师奉命连夜赶制出江青的照片，于次日晨10时送往江青住处的时候，可见想见，照片的主人已经永远欣赏不到自己昨日的尊容了。

就在江青装模作样摘苹果之后仅仅过了不到十个小时，在宁静的中南海里，终于发生了人民期待已久的、惊天动地的事变。几天之内，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北京城的千家万户。

笔者不想在这里追记许多曾经在家家户户流传加工的关于“四人帮”被捕时的民间传说，但不妨记叙一下大名鼎鼎的“梁效”的覆灭经过：

10月10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按照迟群给“梁效”定的“铁的纪律”，笔杆子们傍晚就乖乖地回到朗润园湖边的楼里了。嚼过了大鱼大肉，又享受过了美味的夜宵，一个个先后上了床。刚过12点，也就是11日零点，楼前突然响起了摩托车声。一队解放军战士神速地包围了这座灰楼。

“梁效”的笔杆子们，有的刚想脱衣服，有的从睡梦中惊醒了。通知他们到一楼的会客室集中。

“说不定是首长来接见！”有的秀才这么猜着。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中国人早就开始吃三公一母成一串的螃蟹了。

会客室里，一个陌生的北京卫戍区的军官向他们宣布：

“中央决定，‘梁效’的材料封存上交。现在大家就收拾一下自己的用具，回家去，明天到校党委集中学习。但主要负责人不

能走……”

至此，“梁效”的戏，也就跟它的主子一样，全部唱完了。

整个北京在狂欢，整个国家在狂欢。这种狂欢的声音，铁窗是隔不断的，何况是在同一个天空之下，上海、南京、北京各地的监狱或是形形色色的“隔离审查室”，那些关押新政治犯的阴暗小屋，刹那之间照进了明媚的阳光。

生死之局，这样微妙，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南京大学的康老师，刚吃完监狱里的一个冷窝头，就听见了铁窗外的口号声：

“打倒王洪文！”

“打倒张春桥！”

“打倒江青！”

“打倒姚文元！”

他听清了，实实在在听清了。他控制不住自己，也跟着举起手臂高呼起来。

欢呼声从各个牢房里传出来，震荡着通道。

一个看守的法警也大声呼喊，想使犯人们安静下来。但他的声音根本听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预审员来了。康老师已经冷静下来，他问：“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预审员脸上带着笑。

“那我要求党和政府向我传达。我要求无条件释放，形势不允许再关押我们！”

又过了好多天，预审员找康老师说：“省委已经批了，这两天就放你们，你有什么意见？”

康老师说：“当初抓我们就是错的！”

预审员一摆手，似乎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上级有话，放你是对的，抓你也是对的！南京事件的性质没有变，这是中央

领导定的。有人保邓，有人指向现在在台上的领导，这个案翻不了。要你们不要再弄出新事情来！你们干扰了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反对王、张、江、姚的斗争提前了，还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

康老师像被陡然泼上了一盆冰水，禁不住浑身抖动起来。

在女牢里，王医生几乎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形。她听到广播后，就对一个预审员说：“我是反张春桥进来的，让我出去！”

预审员回答：“你出去？得写个检讨。你还有错误，你不听中央的话，你破坏了批邓……毛主席早就批了‘四人帮’了，还要你们反吗？你们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到处贴大标语，乱打一气。你要好好接受经验教训……”

请听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和理论！在有些人的信条里，人民永远只能是跟少数天才意志转的群氓，而不能有一点点首创精神，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他们根本不懂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惜的是，持这种“天才”信条的同志至今还有不少。

康育义和王运德先后被释放了。出狱的时候，公安局给他们所在厂校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再造反；二、不准平反；三、不准欢迎。但是，制泵厂的工人群众，自己掏钱买了鞭炮来迎接自己的英雄。

徐同新的遭遇，比起他的难友们要惨得多。他早已听到了广播。他大声地读着报，因为报纸已经替自己说话了。可是，他的手铐反而铐得更紧了，都扣进了肉里。

一个所长说：“你高兴什么？你出来！”

小徐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被人拉到了小柜台，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小徐大喊道：“粉碎了‘四人帮’，你们还这样……”

“你这是自找苦吃。”

又有人去掐他的脖子，不让他喊。还有个人用一头白一头红的棍子，打他的头。小徐被推到暗处，拳打脚踢，甚至吊起来吃

"鸡爪子"。

打他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感到苗头不对，这才把他放下来。小徐被"苏秦背剑"式地铐着推进了牢房，他一下子栽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血从他手腕上流下来，染红了衣衫。这样一直铐了他四天。

11月17日，小徐被释放了。耐人寻味的是，他被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而且，尽管把领章帽徽还给了他，但仍然有两个战士一直看着他，连他给父母写信都还要审查。更不能容忍的是，居然向他宣布："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也是头上长角，跟张铁生一样呢！"

简直是混帐逻辑！小徐忍无可忍，不得不给军区政委，给《解放军报》，给邓副主席写了信……

因在纪念碑上悬挂四块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而被捕的中国科学院109厂的青年工人小宋，出狱的那天，却费了一番周折。

109厂的工人、干部，得知小宋等人要出狱，几十个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坐上卡车，带上锣鼓去迎接他。汽车开到监狱门口刚停下，大家就把锣鼓敲响，还放起了鞭炮。这在监狱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大铁门立即关上了。

工厂保卫处的三个同志先进去领人，他们已经到了预审处，进来一个人接待了他们。

"我们是来领人的。"

"那你们在门口敲锣打鼓干什么？"

"大家高兴。"

"这样接人不行！从来没有见过。还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影响多不好？"

"那是群众自发来的，不是我们组织的，跟我们没关系。"

"那也不行，你们去劝他们离开，不然不放人！"

三个人出去了一会儿，又回到这间预审室。锣鼓声反而更响了。

“怎么还没有走？”

“群众不听，我们说不动。”

“人不走，就不放人！这是市局首长的命令。”

这个“市局首长”，便是当时还在台上的“四人帮”的干将刘传新。争吵反复地进行着，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保卫处的三个同志，无可奈何，只好又去劝说：“大家先退200米，把人接出来要紧，不然，他们不放人……”

等在卡车上的七八十名群众，只好强按下心中的怒火，司机把车倒出200米远，停在马路上。

小宋终于出来了。人们争着同他握手，搀扶着他。只见他面色苍白，浑身无力，像得了一场重病似的。一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半年多没见，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了。

当晚，已经等候了几个小时的109厂的群众，开了欢迎会，给小宋披红戴花，夹道欢迎。大家真想把他抬起来啊！但是，小宋被折磨得太虚弱了。于是，就让小宋站到凳子上，让大家见见面。随后，给小宋做了一碗热面条，又让他洗一个澡。赶紧把他送回家里……

手铐要从人民的手腕上取下来，换戴到“四人帮”及他们死党的手上，这才是历史的公正的判决！

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清明节的人民运动，是十月胜利的当之无愧的奠基石。十月的阳光开始照耀我们广袤的国土。尽管仍然有一部分无辜者被铁窗和高墙同复苏的大地隔了开来，继续关押三个月、五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辟。推倒“四人帮”设置的重重障碍之山，根除“四人帮”造成的痼疾，固然还需要时间，历史毕竟是不可阻拦地向前推进了，人民毕竟觉醒了。

事实将证明：10 月 6 日深夜的伟大的一小时，可以补偿我们国家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的缺陷。党中央的有力一击，把我们党和国家从危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并且揭开了历史的崭新一页。

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原载 1979 年《当代》第二期，辑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钱 钢

唐山大地震

关于我和我的唐山

不久前，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世界历史上的今天》。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几乎是下意识地，随手翻到了那一页。

是的，那是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

七月二十八日

…………

1794年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朱斯特被处死

1914年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

1937年 日本占领中国北平

1973年 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1976年 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

唐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这些年，每当7月28日凌晨到来的时候，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着。悄寂无声中，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老年人的，中年人的；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

我儿×××收

爱女×××收

父母大人收

晨曦中，淡黄色纸钱化作的烟，由絮絮缕缕渐渐融会成一片，如白色的雾，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纸灰在雾中飘浮着，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飞得很高，又缓缓飘落。落在路旁草丛中，落在伫立街头的老太太的银色鬓角上。她们没有拍去它，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不，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老人的嘴唇颤动着，在喃喃诉说着什么。

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书，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

死亡　242769人

重伤　164851人

每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的心便会一阵阵发紧。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8.2级大地震的情景是极为可怖的，强震引起的次生灾害——大火几乎焚毁了半个东京，死亡计10万人。

1960年5月22日智利8.5级大地震，引起了横扫太平洋的海啸，巨浪直驱日本，将大渔船掀上陆地的房顶。这次地震的死亡者，总数近7000人。

还有美国1964年3月28日阿拉斯加8.4级大地震，冰崩，山崩，海啸，泥喷，总共使178人丧生。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2.4倍，智利大地震的3.5倍，阿拉斯加大地震的1300多倍！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背后人的悲惨命运。人们尽可以用数十亿美元、数百亿美元来计算物质财产的损失，可是又能用什么来计算人的损失呢？活生生的人是无价的。

1200人中有400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是我这次去唐山的住处。医院有一个小灵堂，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当我走进那间点着昏黄小灯的屋子时，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紧了，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那一双双眼睛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

一个扎小辫的女护士，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戴着一顶有檐帽，胸前还有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切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只有她那楚楚动人的笑容是超越时间的，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说她曾把什么照片送给自己的恋人，那一定就是这一张。

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极可爱的大眼睛男孩，我简直不忍心正视他。他的骨灰盒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挽带上写着：

韩治安息。你的爸爸妈妈

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圈，上面是同样的字迹：

韩松安息。你的爸爸妈妈

他的弟弟，一个更小也更讨人喜欢的男孩。失去了这样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很难想像他们的父母是在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感情。

失去的是太多了。在小灵堂里，我不仅看到了一行行泪写的字，而且清清楚楚听到了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凄婉而不绝的呼唤。

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有一包剥开锡纸的巧克力，巧克力都化了。可怜的孩子！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

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它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我无法想像，孩子们的父亲在亲手制作这只骨灰盒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孩子们都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去了，独独扔下了孤寂的他；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还是活着的人更不幸呢？

灵堂外是一座小山。那是震后清理废墟时，用整个医院的断墙、残壁、碎砖、乱瓦堆成的。"山"上有石阶，有凉亭，有嬉戏的孩子——是那些未经过灾难的震后出生的孩子。石缝间，偶尔伸出的一截截锈蚀的钢筋，那是十年前折弯、拧断了的水管、暖气管；站在它们旁边，我仿佛置身一片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倾听着极深极深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种种属于人的微弱的信号。24万活生生的灵魂，他们诅咒、叫喊、哀求和呻吟；他们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尚未来得及去思、去想、去躲、去避，就被活活地剥离开了那个光明的世界，成了这地心深处的终生禁囚。我又想起了灵堂中那些无辜的天真的孩子，也许因为他们的存在，致使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

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来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

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如此惊人的灾变，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思维；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那些亲切得令人肠断的东西，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包容了。

这就是我的唐山。

蒙难日“7. 28”

3时42分53. 8秒……

历史将永远铭记地球的这一个座标：东经118. 2°，北纬39. 6°。

人类将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一个时刻：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时间三时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

三时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如有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然爆炸！

唐山上空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大地上狂风呼啸。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顷刻间夷为平地。

整个华北大地在剧烈震颤。

天津市发生一片房倒屋塌的巨响。正在该市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被惊醒了，他所居住的宾馆已出现了可怖的裂缝。

北京市摇晃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颤动，砖木结构的天安门城楼上，粗大的梁柱发出仿佛就要断裂的“嘎嘎”的响声。

在华夏大地，北至哈尔滨市，南至安徽蚌埠、江苏靖江一线，西至内蒙磴口、宁夏吴忠一线，东至渤海湾岛屿和东北国境线，这一广大地区的人们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而强大的地震波早已以人们感觉不到的速度和方式传遍整个地球。

美国阿拉斯加帕默天文台骤然响起扣人心弦的警钟声。按规定住在离天文台只有五分钟路程范围内的四名地震学家和两名技

术人员，急急忙忙地赶来观察仪器。他们发现在警钟敲响的时候，阿拉斯加州上下跳动了大约八分之一英寸。阿拉斯加州的居民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震？中国大地震？美国是否也会有大震？

全世界的地震台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力。虽然没有得到关于震中的确切情报，可是所有的地震学家都能感觉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全世界的各大通讯社当日便公布了各地震台的记录结果——

美国全国地震情报中心称：中国北京东南一百英里发生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所称：北京东南约一百英里，北纬 39. 6°、东经 188. 1°，在天津附近，发生 8. 2 级地震。

日本气象厅称：中国发生 7. 5 级至 8. 2 级之间的地震，震中在内蒙古，即北纬 43°，东经 115°。

日本长野地震台称：中国发生 7. 5 级地震。

瑞典乌普萨拉地震研究所称：中国发生 8. 2 级地震。

里氏震级发明者里克特（美）宣布：中国发生 8. 2 级地震。

香港的英国皇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发生的地震为 8 级左右，震中：东经 118. 1°、北纬 39. 6°，距唐山极近。

中国台北“中央气象局”称：阳明山鞍部的地震仪测到大陆北部的强烈地震，规模为 8 级。震中在北平东部 135 公里附近。台北记录到的总震动时间约 1 小时 32 分钟。

……

一道道电波，接连不断地穿越太空。

然而，当时谁也想象不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惨景：中国唐山，一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已经在地球局部的震动中夷为平地！

中国新华通讯社于 7 月 28 日向全世界播发如下消息：

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讯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

几天后，中国再次公布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Ms7．8级。

谜一般的灾难。

谜一般的3时42分。

然而，这一切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大自然警告过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

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突变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得那些于灾难发生之后重新回忆起、搜集起它们的地震学者们，毛骨悚然并深思。

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恐怖极了的鱼

·唐山市赵各庄煤矿陈玉成——

7月24日，他家里的两只鱼缸中的金鱼，争着跳离水面，跃出缸外。把跳出来的鱼又放回去，金鱼居然尖叫不止。

·唐山柏各庄农场四分场养鱼场霍善华——

7月25日，鱼塘中一片哗哗水响，草鱼成群跳跃，有的跳离水面一尺多高。更有奇者，有的鱼尾朝上头朝下，倒立水面，竟似陀螺一般飞快地打转。

失去“理智”的飞虫和鸟类

·唐山以南天津大沽口海面，“长湖”号油轮船员——

据船员们目睹：7月25日，油轮四周海面上的空气嗞嗞地响，一大群深绿色翅膀的蜻蜓飞来，栖在船窗、桅杆、灯和船舷上，密匝匝一片，一动不动，任凭人去捕捉驱赶，一只也不飞起。不久，油轮上出现了更大的骚动，一大群五彩缤纷的蝴蝶、土色的蝗虫、黑色的蝉，以及许许多多蝼蛄、麻雀和不知名的小鸟也飞来了。仿佛是不期而遇的一次避难的团聚会，最后飞来的是一只色彩斑斓的虎皮鹦鹉，它傻了似地立于船尾，一动不动。

·河北矿冶学院教师李印溥——

7月27日，他正在唐山市郊郑庄子公社参加夏收，看见小戴庄大队的民兵营长手拎一串蝙蝠，约有十几只，用绳子拴着。他说：“这是益鸟，放了吧。”民兵营长说：“怪了，大白天，蝙蝠满院子飞。”

·唐山地区迁安县平村镇张友——

7月27日，家中屋檐下的老燕衔着小燕飞走了。

(同时，唐山以南宁河县潘庄公社西塘坨大队一户社员家，屋檐下的老燕也带着两只剩余的小燕飞走了；据说，自7月25日起，这只老燕就像发了疯，每天要将一只小燕从巢里抛出，主人将小燕捡起送回，随即又被老燕扔出来。)

·宁河县板桥王石庄社员——

7月27日，在棉花地里干活的社员反映，大群密集的蜻蜓组成了一个约三十平方米的方阵，自南向北飞行。

动物界的逃亡大迁徙

·唐山地区滦南县倴城公社王东庄王盖山——

7月27日，他亲眼看见棉花地里成群的老鼠在仓皇奔窜，大老鼠带着小老鼠跑，小老鼠则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有人感到好奇，追着打，好心人劝阻说：“别打啦，怕要发水，耗子怕灌

了洞。”

·抚宁县坟坨公社徐庄徐春祥等人——

7月25日上午，他们看见一百多只黄鼠狼，大的背着小的或是叼着小的，挤挤挨挨地钻出一个古墙洞，向村外大转移。天黑时分，有十多只在一棵核桃树下乱转，当场被打死五只，其余的则在不停地哀嚎，有面临死期时的恐慌感。26、27两日，这群黄鼠狼继续向村外转移，一片惊惧气氛。

敏感的飞鸟、鸟类及大大小小的动物，比人类早早地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然而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毁灭生灵的巨大灾难已经迫近了。

不可捉摸的信息

大自然确实是在警告人类。

唐山东南的海岸线上，海涛在发出动人心魄的喧响。7月下旬起，北戴河一带的渔民就感到疑惑：原来一向露出海面的礁石，怎么被海水吞没了呢？海滩上过去能晒三张渔网的地方，怎么如今只能晒一张渔网了呢？海滨浴场淋浴用房子进了海水。常年捕鱼的海区，也比过去深了。距唐山较近的蔡家堡至大神堂海域，渔民们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从来是碧澄澄的海水，为什么变得一片浑黄？在不平静的海的深处，就像有一条传说中的龙尾在摆动，在搅动着海底深处的泥土。

据当时在秦皇岛附近的海水里的一位潜泳者说，他看见了一条色彩绚丽的光带，就像一条金鱼的火龙，转瞬即逝。

水！水也在向人类发出警告。

唐山地区丰润县杨官林公社一口深约50多米的机井，从中旬起，水泥盖板上的小孔“嗤嗤”地向外冒气。7月25日至26日，喷气达到高潮，二十米外能听见响声，气孔上方，小石块都能在空气中悬浮。

在唐山地区滦县高坎公社也有一口神秘的井。这口井并不深，

平时用扁担就可以提水，可是在27日这天，有人忽然发现扁担挂着的桶已够不到水面，他转身回家取来井绳，谁知下降的井水又猛然回升了，不但用不着扁担，而且直接提着水桶就能打满水！那几天，唐山附近的一些村子里，有的地方，池塘的水忽然莫名其妙地干了，有的池塘却又腾起了济南趵突泉那样的水柱。水！忽降忽升的水！它是在向人类传递大自然的什么信息啊?!

人类有时也收到了大自然的信息，可这些信息是那样的不可捉摸。

距唐山200多公里，海拔1350米的延庆县佛爷顶山上，有一台测雨雷达，附近还有一台空军的警戒雷达，26日、27日，都连续收到来自京、津、唐上空的一种奇异的扇形指状回波，这种回波和海浪干扰、晴空湍流、飞鸟等引起的回波都不相同，使监测人员十分惶惑。京、津、唐一带，什么时候出现了如此奇特的一个磁场呢？

人们就在那样一个强大的磁场中毫无知觉地穿行着。

7月27日，唐山北部一个军营里，几个士兵惊叫起来。他们发现地下的一堆钢筋，莫名其妙地迸发出闪亮的火花，仿佛有一个隐身人正在那里烧电焊。

在北京、唐山，半夜，不少人家中关闭了的日光灯依然奇怪地亮着。

在通县，有人发现一支卸下的20瓦灯管在闪闪发光。

7月27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日子。

在唐山林西矿矿区，飘来了一股淡黄色的雾，这是一股散发着硫磺味的“臭雾”，它障人眼目，令人迷茫。人们被那股异味熏糊涂了，他们已经看不清这世界的面目，更弄不清大自然正在酝酿着一场什么样的悲剧。

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及时地被搜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遗

憾的是机会丧失了！人们眨着大惑不解的眼睛，迷迷蒙蒙地，已不知不觉走到了7月27日深夜。

大毁灭前的“7. 27”深夜

・唐山栗园公社芳草营大队王财——

深夜12点钟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出门前总赶不进院子的四只鸭子，依然站在门外，一见主人，它们齐声叫起来，伸长脖子、张开翅膀，挓挲着羽毛，摇摇晃晃地扑上前。王财走到哪儿，它们追到哪儿，拚命用嘴拧着他的裤腿。

・滦南县东大户大队张保贵——

7月27日深夜久久睡不着，老听见猫叫。他以为猫饿了，起来给它喂食，猫不吃，依然叫声不绝，并乱窜乱跑。

那一夜，唐山周围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人们都听见了长时间的尖厉的犬吠。

・唐山殷各庄公社大安各庄李孝生——

他养的那条狼狗，那一夜死活不让人睡觉。李孝生睡觉时敞着门，狗叫不起他，便在他腿上猛咬了一口，疼得他跳起来，追打这条忠实的狼狗。

・香河县周元大队苏玉敏——

苏家的母狗，把7月21日生的三只小狗从窝里一个个地叼到空场地上，它甚至还刨了一个坑，把它们安放其中。

夜越来越深了。这是一个充满喧嚣的夜。7月28日就在这不安的气氛中来临了。

1时30分，抚宁县大山头养貂场张春柱被一阵“吱吱”的叫声惊醒，全场415只貂，像“炸营”似的，在铁笼里乱蹦乱撞，惊恐万状。

与此同时，丰润县白官屯公社苏官屯大队养鸡场也出现了一片混乱：一千只鸡来回乱窜，上窗台嘎嘎怪叫。工作人员给它们喂食，它们毫无食欲，愈来愈慌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追逐它们，

有一二百只鸡在鸡舍内扇翅惊飞!

与此同时，丰润县左家湖公社扬谷塔大队饲养员陈富刚，在一个马车店里正起来喂料。他发现骡马在乱咬乱踢乱蹦，怎么吆喝也不管用。3点多钟，六十辆马车的一百多匹马全部挣断了缰绳，大声怪叫着，争先恐后跃出马厩，在大路上撒蹄狂奔!

与此同时，唐山地区昌黎县虹桥公社马铁庄大队李会成亲眼看见：邻居家的二百多只鸽子突然倾巢而出，飞入房顶上空，盘旋着，冲撞着，久久不肯下落!

离那个恐怖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滦县安各庄的几个社员，惊叫着从一个水池里跳上来。那池子的水是从近旁一口热水井里汲取的，平时水温四十八至四十九度。这天凌晨他们几个出夜工的小伙子跳进池子洗澡，水竟已烫得无法忍受。他们纳闷，他们骂娘，他们独独没有想到，大地的震颤就在眼前!

就在眼前了。昌黎县有几个看瓜的社员，看到距离他们200多米远的上空忽然明亮起来，照得地面发白，西瓜地中的瓜叶、瓜蔓都清晰可辨。“怎么，天亮了?”丰润县一位中学生，揉着惺松的睡眼，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他见窗外十分明亮，连黄瓜架上的叶子都泛着白光，但一看表，才3点多钟。正奇怪，天色又变暗了，屋外又如墨染一般。

那一刻，大地正沉浸于一片毁灭之前的宁静之中。

显然，在唐山地震前，许多人都接收到了大自然的警告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具有“不唯一性”——天气闷热也会使鸡犬不宁，连日多雨也会使井水突涨，人们也正是用最寻常的经验解释了那些“异常”。

1978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出版的《地震情报通报》中，刊印了一张幽默照片：一只闭眼张口、惊恐惨叫的黑猩猩。照片上方写着：“为什么我能预报地震而地震学家们不能?”

这是人类的自责。然而人们常常忘了：人是社会的动物，即使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也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当人各自为战的时候，并不比动物有更多的优越性。仅仅依赖本能，人甚至远不及动物。在地震这样重大而又神秘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没有形成一个防范的整体，没有相应的通讯渠道和手段对自然界的异常信息进行及时的收集和处理，他们怎能不被突降的恶魔各个击破？

永远记住大自然的警告吧！

目击者言

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史料，我一次又一次寻找他们。是的，灾难突发于万籁俱寂的夜间，亲眼看见地震发生全过程的人十分罕见。笔者仅将九位被采访者的录音整理成文，录以备考。

李洪义（二五五医院原传染科护士）：

那天晚上，我值后半夜班。上半夜又闷又热，人根本就没睡着。十二点接班后，困得不行，在病房里守到三点半光景，我就跑到屋外乘凉。我记得我是坐在一棵大树下，一个平常下棋用的小石桌旁边。

四周围特别安静。我好奇怪，平时这会儿，到处都有小虫子叫，青蛙叫，闹嚷嚷的；可眼下是怎么了？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静得反常，静得叫人发怵。

突然间，我听见一个古怪的声音，“吱——”从头顶飞过去。像风？不。也不像什么动物的叫声。说不清像什么，没法打比方，平时就没听见过这种怪声音。那声音尖细尖细，像一把刀子从天

上划过去。我打了个哆嗦，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抬头看天，阴沉沉的，有一片奇形怪状的云彩，说红不红，说紫不紫，天幕特别的昏。我心想："是不是要下雨啊？"起身就往屋里走。

可是人莫名其妙地直发慌。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像有人随时会从身后追过来，要抓我。我平时胆子挺大，太平间里也敢一个人站，可那时却害怕得要命，心怦怦乱跳，走着走着就跑起来，可穿双拖鞋又跑不快。

我回了一下头，见西北方的天特别亮，好像失火了，又听不见人喊。到处像死了一样。我越发紧张，赶快跳进屋子，一把拧亮电灯，又把门插上。

这时我就听见了"呜——呜"的巨响，像百八十台汽车在同时发动。"糟了！"邢台地震时我在沧州听见过这种声音的。我立刻想到：是地震。

说话间房子猛烈摇晃起来。桌上的暖瓶栽下地，炸了个粉碎。我用力打开门，只开了一小半，冲出房子，冲向那棵大树。

我紧紧抱住大树。黑暗中，只觉得大地晃晃悠悠，我和大树都在往一个万丈深渊里落、落、落。周围还是没声音，房子倒塌的声音我根本没听见。只看见宿舍楼的影子，刚才还在，一会儿就没了。

我伸出手在眼前晃，可什么也看不清。

我吓傻了，拼尽全身力气吼了一声：

"噢……"

田玉安（唐山郊区稻地大队农民）：

嗨，那一宿，真吓人。

地震时我还在外边打场。咋干得这么晚？那些天连着下雨，天又热，麦子都快焐坏了。没法子，只得加班加点。

一直到3点多才完事。别人拾掇工具回村去，我和两个人留下扫场子。

猛然间，像当头挨了一个炸雷，“轰隆隆——”地动山摇！我像让一个扫堂腿扫倒在地，往左调了个个儿，又往后打了个滚，怎么也撑不起身子，场上的电灯一下子灭了。

一扭头，妈呀，吓死人！一个大火球从地底下钻出来，通红刺眼，噼啪乱响，飞到半空才灭。

天亮以后，我看见火球窜出的地方有一道裂缝，两边的土都烧焦了。

姜殿威（开滦印刷厂老工人）：

地震时，我正在凤凰山公园门口打太极拳。

我血压高，呆病假，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学了一套“二十四式”，那人天天三点钟起早，我这当徒弟的也得一样。7月28日早上，我们三点半来钟就在公园门口碰头了，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个姓唐的。

我们闲聊了几句，刚刚摆开架式想打拳，就听见“呜——呜——”的声响，像刮大风，又像旧社会矿上的“响汽”。那时我面冲西南，老头儿脸朝东北，就听他大喝一声：“不好！失火了！”我一扭头，见东北边火红一片！

人还没反应过来，地就颠上了。起先是没命的颠，跟着是狠狠地晃。那姓唐的紧紧扒住公园的铁栏杆，我和老头儿就叉开双腿，死死抱在一块儿。一开始我们俩还说话，我说：“地动山摇，花子摞瓣，明年准是好收成！”老头说：“不，是失火！”我说：“不，是地震！”

争没两句，就觉一阵子“墥松”——人像搁在一个大筛子上一样，被没完没了筛着！

“哗啦啦——”公园的墙倒了。紧接着，对面一个大楼也倒了。

眨眼的工夫！只听砖头瓦块哗哗地响，满天尘土，乌烟瘴气。“可坏了！”我说：“快家去抠人要紧！”

我家离得不远，就在铁路边上。可我跑到了铁路，就傻眼了，怎么也找不着家——我们家周围那整个一片房子都平了！

杨松亭（煤气公司基建科干部）：

地震发生前，闷热闷热，有雾气沼沼的感觉。那年我十六，初中毕业后没工作，在路北区公安分局刑警队防范组临时帮忙，抓小偷、“流窜犯”。7 月 27 日晚上，我们在长途汽车站那块巡逻值班，因为那儿人特别多，特别乱。28 日 3 点多钟，没啥事了，我们哥儿几个在汽车站旅馆前头坐着聊天，突然，屁股底下猛力颤动起来，耳边像有老牛吼叫，又像是人立在大风口上听到的声响，吓得我们跳起来就往马路当中跑。路挺窄，我们又怕房子倒下来压着，又怕路灯掉下来砸着，可路灯一下灭了！

我和一个叫王国庆的抱在一块儿，可是撑不住，像有双手硬把我们撕扯开，我们都摔倒了。强站起来，又来一人，三个人撑在一起，还是撑不住。人像站在浪尖甲板上，你也晃我也晃，我们就蹲下来，互相死死扒住。地在狠劲地颠，脚都颠麻了。

这时候，就听见了“嘭！嘭！嘭！”房倒屋塌的巨响，就闻到了一股子呛人的灰土味儿。成群的人涌到了路上，可谁也跑不快，摇摇晃晃，一步一个跟头。我看见三个卖烟酒糖块的女人逃出了售货棚子，可是车站饭店那个正在做豆腐脑的女人却没逃出来，不知是叫啥家伙砸中了，她一脑袋扎在了滚开的锅里。

宋宝根（唐山火车站调车员）：

那一震，我差点从车皮上掉下来摔死。

我是调车员。地震发生前，我正在专用线上挂车皮，对了，是一车皮的毛竹，堆得特高，我就坐在高高的毛竹顶上摇灯。那时

车头已经挂上了，我给了司机一个“顶进”信号，司机拉了一声笛，正要开动，只听“咣!!!”一声巨响，车皮就猛地晃动起来。我第一个念头：“糟！脱轨!”立刻打了个“停车”信号，谁知灯还没摇起来，人就栽倒了。晃得真凶啊！我从毛竹顶上被掀下来，几个滚儿滚到帮上。“完了!”我不顾一切地扒住捆毛竹的铁丝，哪怕铁丝勒进肉里，不扒住就得摔死！这时候又一阵摇晃，幸亏不是左右横着晃，而是前后直着晃，我头发直发毛，要左右晃，车非翻了不行！

那摇晃刚停，我就从车上滑下来。这时候车头大灯还亮，往前一看，天呐！溜直的铁道，都拧成了麻花，曲里拐弯像大长虫。我这才明白是地震，只听有人喊：

“地要漏下去了，快扒住铁道呀!”

我一下子扑倒在地，紧紧抓住铁轨不放，人都吓傻了……

张克英（唐山火车站服务员）：

地震时那一声巨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真吓死人拉。

那天我两点多钟起来值班，在问讯处卖站台票。三点多光景，听见有人喊：“要下雨啦，要下雨啦。”我赶紧跑出去搬我的新自行车，只见天色昏红昏红，好像有什么地方打闪。站前广场上的人都往候车室里涌，想找个躲雨的地儿。

这时候，候车室里有二百多人，接站的，上车的，下车后等早班公共汽车的，闹嚷嚷一片。我还记得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要找我买站台票，接北京来的车，我就：“这会儿没车，五点以后再买吧。”他俩也不走，就在窗口等着，谁想到就这么等来了大地震！

地震来以前，我正隔着玻璃窗和陈师傅说话，商量买夜餐的事，我让他带俩包子来，话还没说完，就听：“咣!!!”那声响啊！把人都震懵了。我觉得是两个高速行驶的车头对撞了！没等喊出

声，整个候车室灭了灯，一片漆黑。房子摇晃起来，候车室乱作一团。喊爹的，叫妈的，人踩人的，东西碰东西的，什么声音都有。先是听见“扑通！扑通”吊灯和吊扇落下来砸在人脑袋上的声音，被砸中的大人孩子一声接一声地惨叫。不一会儿，“轰隆隆”一声，整个儿车站大厅落了架，二百多口子人哪，差不离全给砸在了里面！

多亏房门斜倒在“小件寄存”货架上，把我夹在中间，没伤着要命的地方。我听见离我很近的两声惨叫：

“哎呀——”

“妈呀——”

我听得出，是那等站台票的一男一女。他们只喊了这一下，再没有第二下……

刘勋（唐山第一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7月28日凌晨3时30分，我睡得正香，就听有人敲我家门：“刘大夫！刘大夫！”声音特别焦急。开门一看，是郊区医院的王开志，他说：“前两天咱们一块儿做手术的那个病人，情况够呛，你是不是辛苦一趟去看看？车已经开来了……”

这次出夜诊实在是太碰巧了。

我穿上衣服，刚和王开志迈出门坎，地震就来了！先是晃，天旋地转，晃得人站不住，又挪不开。再就是颠，脚底像过电似的。紧接着，房上的砖瓦就开始飞下来，也怪，“噼里啪啦”地砸在身上，一点也不觉得疼，只觉得慌。那“呜呜”的地声太瘆人了。我看过一部火山爆发的纪录片，火山口像有一锅铁水在咕嘟。地震那一刻，我觉得比站在火山口上还害怕，人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心跳的节律完全乱了。四周一片漆黑，烟气腾腾……房倒屋塌！

不一会儿，人忽然可以跑起来。我自己也都不知道我是怎样跑起来的。可是才跑了三四步，就觉得脚下不对劲，一看，呀！我

怎么已经上了房顶！

张俊清（唐山发电厂工人）：

地震时，我正在锅炉控制室值班。突然房子摇起来，所有仪表的读数都出现异常。刹那间，整套设备自动掉闸，全厂一片漆黑！

我一屁股摔倒了。控制室里，椅子翻了，水瓶砸了，挂在墙上的安全帽、工具包、手电棒噼啪落地。我抓住一个电棒，立即做水汽隔绝处理。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电网发生了最怕人的事故，得赶紧恢复！

冲出控制室，楼房嘎嘎地响，砖头乱砸，只见灭了火的八号和九号锅炉，煤烟倒流，从锅炉底部呼呼地倒卷出来。我们全被滚烫滚烫的煤烟和粉尘包裹住了。只听黑烟中传来喊声：

"现在是地震！总值班长有命令，不准离开岗位，擅离职守的要负法律责任！"

全厂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房在倒，地在颤。蜂鸣报警器"嘟！嘟！嘟！"地响，还有电铃、小喇叭，都一齐发疯似地叫。最怕人的是几台锅炉发出的排气声。安全阀这阵儿起作用了。锅炉里的水蒸汽，以每平方厘米一百公斤的压力猛劲喷射出来，发出扎耳的尖声。所有的人都被这尖声惊呆了，它比几百台火车头一块喷汽的声音还要响，就像要把人的心切烂撕碎！

濒死的拂晓

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

它被漫天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了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弥漫着，飘拂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像缓缓地悬浮

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笼罩着这座空寂无声的城市。所有的声息都消失了。偶尔地，有几声孩子细细的哭声，也像是从遥远的地心深处传来，那般深幽，那般细长，像幻觉中一根飘飘欲断的白色的线。

一切音响都被窒息了，一切生命都被这死般的雾裹藏了。蒙蒙大雾中，已不见昔日的唐山。仅就笔者当年目睹及查阅资料所录唐山市几个角落的情景：

·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矿冶学院图书馆藏书楼，第一层楼面整个儿向西剪切滑动，原四层楼的建筑像被地壳吞没了一层，凭空矮了一截；

·火车站，东部铁轨成蛇行弯曲，俯瞰，像一只扁平的铁葫芦；

·开滦医院七层大楼，成了一座坟丘似的三角型斜塔，顶部仅剩两间病房大小的建筑，颤巍巍地斜搭在一堵随时可能塌落的残壁上。阳台全部震塌，三层楼的阳台，垂直地砸在二层楼的阳台上，欲落未落；

·市委宿舍楼的一扇墙面整个儿被推倒，三层楼的侧面，暴露出六块黑色的开放着的小空间，一切家庭所用的设备都还在，完整的桌子、床铺，甚至一盏小小的台灯；

·凤凰山脚下的外宾招待所，两层楼的餐厅仅剩下一个空空的框架，在没有塌尽的墙壁上，华丽的壁灯还依稀可见；

·第十中学那条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错位达一米之多；

·吉祥路两侧的树木，在大地震动的那一瞬间，似乎曾想躲而避之，有的树欲“逃”，并已跨离树行，却又被死死地扯住，错位的树与树行，相距一点五米；

……

更为惊心的是，在“7．28”地震地裂缝穿过的地方，唐山地

委党校、东新街小学、地区农研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都像被一双巨手抹去了似的不见了。可以想像，仿佛有一个黑色的妖魔在这里肆虐，是它踏平了街巷，折断了桥梁，掐灭了烟囱，将列车横推出轨。一场大自然的恶作剧使得唐山面目全非，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冰冷的机器残骸，斜矗着的电线杆，半截的水塔，东倒西歪，横躺竖倚，像万人坑里根根支棱着的白骨。

浓浓的雾气中，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只有机械的脚步声，沉重的喘吁声，来不及思索的匆匆对话，和路边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的尸体山！头颅被挤碎的，双脚被砸烂的，身体被压扁的……

一名女兵被一根水泥梁柱戳穿了胸膛……

一位临产的孕妇，人已断气，下身还在流血……

一个可爱的孩子，死去时，头上还压着一本掀开的小说《剑》，可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翻完这本书了……

这无疑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无辜的死难者，几乎都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被突如其来地推向死亡的。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在一刹那间。

惨淡的灰雾中，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的仅有一双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脚，整个人倒悬在半空。他们是遇难者中反应最敏捷的一群：已经在酣梦中惊醒，已经跳下床，已经奔到阳台或窗口，可是他们的退路被死神截断了。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便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抱着孩子，在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摇颤，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

一座城市毁于一旦，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惨例么？1556年陕西大地震，1920年甘肃大地震，都未曾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尽管如此，惨重的伤亡已令世代震惊。而今天，被7.8级

地震所击中的唐山，却是一座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

一片废墟。

在路南区小山街道，有一位幸免于难的老太太从瓦砾中挣扎着钻出来。眼前的一切，使她呆呆地翕动着嘴，说不出一句话。这条老街，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这条繁华一时的老街，就像她满头飘动的丝丝银发，它如今在哪里？“大世界”商场在哪里？听评戏的“唠子院”（剧场）在哪里？那些杂耍场呢？那些澡堂、药铺呢？那些布店、刻字店、“委托店”呢？那些出售“棋子烧饼”、“开平麻花”、“唐山熏鸡”的小铺子呢？还有她们——从前天天在一起拎菜篮上街的老姐妹们，她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片死寂。路都没有了，只有从一行歪歪倒倒的电线杆上，才能分辨出那是老街。因为它本来是那么窄小，两边的老楼坍下来，整个儿把它填平了。早起的清洁工、运粪的马车，都被埋葬在窄窄的老街上。更悲惨的是小巷两侧的平房区，就这样被恶魔一脚踩平，像踩碎了一堆蛋壳。此时，这里变成了空旷骇人的广场，阴风凄凄，只有些许人影，在僵死般伫立着。

唐山人伫立着。在那些被浓雾裹着的废墟上，在那些被浓雾裹着的大路边，他们呆呆地伫立着。许多人还在恶梦之中：是原子弹爆炸？是煤矿失事？他们不知道擦去脸上流着的血，不知该怎么抢救地狱中的亲人，连自己站在什么地方都忘了。有人不知为什么，手里攥着一只死鹅，怎样也不撒手；有人眼盯着放在脚盆里的死孩子，半天不动一动。许多人赤身裸体，那些只戴一个胸罩的姑娘，甚至忘了找件衣服遮身……

一位名叫陆实的唐山人，震后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他在那个拂晓见到的幸存者们：

……因为大都是光着身子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所以用什么遮体的都有。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分男女）都穿着宽袍大

袖、长及脚面的外国睡衣、我知道这是从服装厂弄出来的出口服装；几个小伙子身穿灰制服，头戴新四军帽，有两个居然戴着日本战斗帽，还有一个光着膀子穿着日本马裤，这一定是京剧团的戏装，因为这都是《沙家浜》里的东西。有个拄棍子的白胡子老头，光着干瘦的身子，下边却围了一条姑娘穿的花布裙。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搀扶一个中年人走过来，那人腿受伤，一拐一拐的。他右手搭在小孩肩膀上，左手却紧握着一把鱼皮鞘的宝剑，鲜艳的桔红色灯笼穗飘然地在他腿边荡来荡去。大概是祖传的吧！……

形形色色的人影，在灰雾中晃动着，惊魂未定，步履踉跄，活像一群梦游者，他们的一切都是麻木的：泪腺、声带、传导疼痛的神经。他们无暇思索，无暇感觉，甚至来不及为骨肉剥离而悲恸。

太阳出来了。它像一张圆圆的薄薄的淡色剪纸，在这片浓极了的濒死的雾中滑动。太阳那炽热的光使浓雾开始变薄，开始流动。昏迷中的唐山即将苏醒。当雾就要散尽的时候，惊恐着的人们，发现了两只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同样惊恐的狼。它们相依着，站在远处黑色的废墟上，孤独地睁着惊惧的眼睛，余悸未消地喘息着。突然，它们纵身一跳，仿佛重受惊吓似的又飞快地奔窜起来，它们跃过断墙，跃过倒塌了的屋顶，跃过那一堆堆暴露在旷野中的尸体，箭一般地在凤凰山脚下转着圈子，像是在寻找一条求生的路。茫然之中，它俩双双奔上凤凰山顶。断崖上，它们终于站住了，石雕一般。面对山下整个破碎的唐山，面对这样一片无边的废墟，面对这样一片灾难的海洋，它们发出了酷似人声的凄厉的嗥叫。

“7.28”的清晨，残雾以及这充满恐怖的狼嗥，久久不散，久

久不散。

我的面前，放着一叠震灾资料和一张从凤凰山上俯拍的唐山废墟照片：

作为这片废墟北界的万里长城，烽火台已经倒塌；

位于蓟县的辽代白塔，塔身震裂，塔尖落地；

位于遵化县的清东陵——那葬有包括慈禧在内的清代帝、后、妃、皇子、公主161人的陵寝，石人石兽被震翻……

仅仅几秒钟之内，凝结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代建筑，便受到了来自地壳之中的深刻的震撼。

我的耳边，我的眼前，又同时出现了“7．28”清晨的狼嗥和浓雾。我想，当时如果有一位历史学家，面对这样一片废墟，他会看到些什么？

作为一座城市，唐山的历史并不久远，明代，这里不过是个小小的集镇。然而，它地底丰富的资料，似乎使它注定会有车水马龙的日子。人们在这里挖煤，采石，制陶……村落渐密，商贾云集。1878年设唐山镇。“唐山”的名字，因镇北一座山上有唐太宗东征所筑的石城（又一说因有后唐将军姜兴之墓）而得。唐山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城市。我国历史上自行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和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字号）都诞生在这里。然而此时呢？历史悠久的唐山第一中学——这所建于戊戌维新后不久的老学堂，和50年代后兴办的那些中学、大学一起被毁于一旦。唐山陶瓷公司那个“五百年陶瓷制品陈列室”里，古老的缸、盆和现代的高级出口陶器——薄胎瓷、骨灰瓷的成套茶具、中西餐具、酒具、烟具、咖啡具，一起在塌落的楼板之下成为碎片。

纵观历史，辉煌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持续了约一千年，其中心正是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前后的地震高潮期开始衰落。如今，国外

有些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城市的衰亡，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发生的大地震和地震引起的水灾造成的。

公元前1600年，地中海上的希腊克里特岛曾发生过三次震中烈度为十度的地震，于是，史前的这一大文明区消失了，克里特文化毁灭了。

那么，今天的唐山呢？

如果当时有一位建筑学家就站在历史学家的身旁，那么，我想他的眼光一定不是悠远的，而是现实的。

他看到的烈度为十一度的极震区，就位于唐山市区——东起近郊越河公社，西至土产仓库、矿冶学院，南到女织寨公社，北到煤研所、二十一中一线，被震线成椭圆形，长轴11.5公里，短轴3.5至5.5公里，面积约为47平方公里。

十度区：东起古冶、大庄坨公社，西达兰高庄公社，南至丰南稻地镇、董各庄公社，北到傅家屯公社和王辇庄公社，面积约为320平方公里。

九度区：东起滦县霍庄一带，西至宁河岳龙庄、小张庄一带，南达丰南县小集、蜂坨、西葛庄一线，北到丰润县新庄子、李庄子一带，面积约1430平方公里。

八度区：东起卢龙县石门，西至宝坻县林亭口，北起丰润县北部的火石营，南到渤海边，面积约为5470平方公里（天津市的破坏已达八度）。

七度区：东起抚宁县麻姑营、枣园，西至大厂县的祁各庄、永清县的别古庄、静海县的大丰滩一线，南至黄骅县的歧口，北达三河、蓟县、遵化以北，面积约为26000平方公里。

在极震区内，工业厂房绝大部分倒塌毁坏，厂房屋盖大面积塌落，围护砖墙特别是外包砖墙，柱间支撑严重变形，钢筋混凝土的柱子开裂、挤酥，或折断。多层厂房的破坏尤为严重。而所

有民用住房——多层砖混结构房屋全部倒塌。许多新建筑的用砖质量低次，近似沙砖，震动中几乎全部碎成了拳头大的砖砾。房屋砖墙倾倒，预制板的屋盖、楼板散落，造成严重伤亡。

而农村房屋——绝大多数是砖石、土墙承重，上覆由炉渣和白灰混合的厚焦子顶重屋盖，此类房屋在烈度八九度区已破坏严重，十度区大量倒塌，在极震区更是荡然无存。倒塌原因主要是墙体强度低、屋盖重、连接不牢靠。

房屋，本是人类保护自己、抗风御雨的处所。人类在自己的发展史中，从穴居野处到学会建筑房屋，从建造草、木的房屋到营造砖、石、金属的房屋，他们的栖身之处在不断地改善着，进化着。然而在一场大地震中，人类却首先直接死于倒塌的建筑物！房屋，使灾难变本加厉，它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成了人类的坟墓。

在唐山的城乡总计 682267 间、10932272 平方米的民用建筑中，竟有 656136 间、10501056 平方米在地震中倒塌和遭到严重破坏！

这一切确实是令人震惊的。唐山是历史上不曾记录过破坏性地震的地区，在城市建筑上是一个不设防的六度区。可是偏偏在这里，发生了震级为 7. 8 级、烈度为 11 度的强震！

显然，建筑学家特有的目光还会注意到另一些房屋。在十度区，竟然有一座八层高楼完整的框架独立于废墟之上，这是尚未完全竣工的新华旅馆主楼。该楼原设计是内框架外墙承重结构，海城地震后，又在周边承重外墙中续加了 12 根构造柱，结果经受强震而未倒。还有一些形体简单、开门较小、高度较低、屋盖较轻的房屋，也幸免于难。

面对着几十万唐山人死伤于不坚固建筑的冷酷事实，那些“幸存”的房屋，会引起建筑学家多少痛心的思考和沉重的惋叹！

我又想到，如果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俯瞰唐山废墟，那么他看到的将会是一连串沉默着的却又是触目惊心的数字。

唐山，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面积约占全国的万分之一，人口约占全国的千分之一，而产值，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一！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它的煤种以炼焦配煤——肥煤为主，煤炭除供鞍钢、首钢、本钢、包钢以及京津沪地区生活用煤外，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唐山的电力工业也是举足轻重的。1976 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唐山陶瓷有着和景德镇陶瓷一比高下的竞争力，从全国解放至 1975 年，唐山陶瓷业的总产值超过十亿元。

还有冶金业，还有纺织业，还有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而此时，整个唐山——这座河北省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已经看不见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没有了流动着的血液。

只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

唐山经济在“7. 28”地震中的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

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

1835 年 3 月 4 日，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来到刚刚发生过强

烈地震的智利康塞普西翁市，面对一片废墟，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人类无数时间和劳动所建树的成绩，只在一分钟之内就被毁灭了；可是，我对受难者的同情，比另外一种感觉似乎要淡薄些，就是那种被这往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而现在一分钟就做到了的变动的情景所引起的惊愕的感觉……"

这也是无数中国人对唐山蒙难日——"7．28"的感觉。

我的结束语

唐山无疑已属于人类。

1985年3月，我开始写作《唐山大地震》，至9月，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发现我已与地震，而不仅仅是唐山，产生了无法解脱的感情维系。

3月4日至4月9日，智利圣地亚哥一带连续发生三次大于七级的地震。

5月和7月，两个7．1级地震又相继击中了新几内亚和巴基斯坦。

8月23日，一次7．4级地震，震撼了从中国新疆乌恰、疏附、喀什直到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大片区域。乌恰县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屋夷为平地，数十人蒙难。这是唐山大地震和四川松藩、平武地震后，相对平静达九年之久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危险信号。

9月19日，墨西哥发生了震级与唐山大地震相同的7．8级地震，两天后又发生了6．8级强余震，首都墨西哥城——这座世界著名的大城市，满目疮痍，数万人毙命……

墨西哥大地震发生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从晚间的电视节目中关注来自大洋彼岸的救灾新闻。那些倒塌的巨型建筑，那些在地震数天后仍然惊慌失措的市民，那些从废墟中被救出的伤员……无一不使我再次颤栗。无论是抢夺生命的救险队员，无论

是在人群中费力穿行的救护车，还是为防止抢劫而在街头巡逻的警察，这一切情景都是我所熟悉的。从那个在电视摄像机前叙述地震情景的伤员身上，我又看到了我的“目击者”，而从那个在担架上疼得手臂抽搐着的黑西哥孩子的眼睛里，我分明又看到了人类对于自己，对于生命的呼唤。

地震！

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地震！

全世界每年发生可记录的地震五百万次，其中有感地震五万次，造成破坏的近千次，而 7 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破坏的强震，每年平均要发生十余次！

更可怕的是，唐山的悲剧已经警告人类：地震危险正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密度的剧增——而成正比地不断升级。如果说，1923 年的东京大地震曾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巨大破坏，那么今天，一场发生在东京的破坏性地震将摧毁日本国三分之一的经济力量！同样，在当今，如果美国的圣安德烈斯断层的活动再次引起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地震（就像许多学者所预言的那样），那么，其损失也决不是八十年前的旧金山地震所能比拟的。

在写作《唐山大地震》的那些日子里，我面对案头上的那架地球仪——这个神秘的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蔚蓝色球体，我会时常陷于一种悲观。

当人类对宇宙开发的兴趣日益浓厚，各种行星探测器频频飞向太空，甚至正在准备把机器人送上金星和火星工作，把第一批“月球居民”送上月球生活的时候，人们对属于自己的星球又认识得如何呢？人们怎样看待脚下的大地？人们探明了多少地底的奥秘。有人说，人类有两大难题：癌与地震。现在，据说癌症的被攻克已经指日可待，可是地震呢？人们对于包括地震在内的种种奇异而又可怖的自然现象，究竟有多少了解和防范呢？

今天，人类的目光已经达到数百亿光年之外的遥远天体，然而，对于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才“深入”了不过十二公里——苏联科拉半岛摩尔曼斯克附近的一眼达一万二千米的地质钻孔，被认为是世界之最，这就是现实。

当我和那些未能战胜恶魔的“失败的搏斗者”——那些饮恨唐山的地震预报科学家们促膝长谈的时候，我心中常常翻腾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情绪。他们那痛苦的眼神，沉重的叹息，常常把我引入一个悠远的广漠的世界，一个人与自然间征战不息的古战场。

多少年了？从唐山地震算起，才十年；从人类有文字的历史看，数千年，而要是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算起呢？

如果我们今天一代代人生存、繁衍的七大洲，是二百多万年前一个“联合古陆”漂移或断裂而成，那么，就可以说，七大洲是在一系列强烈地震中诞生的！那时，猿刚刚开始向人转化——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远祖也是在山摇地动中降生的！

因此，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地震和洪水、飓风同样地不可思议。人们用想像描绘那个主宰世界的精灵或是怪物：日本人说，地底下躺着一条巨大的鲶鱼，它翻一下身，便会地震，平时，一位神举着石槌监视着它，可是神偶有松懈，鲶鱼就会乘机翻身。古希腊人说，海神波塞冬是“大地的震撼者”，他愤怒时，“使海洋和大地同时震动”，悬岩为之颤抖，海岸也在他的三叉戟的突击下崩裂……

“烨烨震电，不令不宁；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中国人在《诗经》中留下了如此壮阔的地震景观。

“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圣经》则这样记下了大自然奇异的突变。

人类认识地震，就像认识形形色色的大自然之谜一样，走过

了数千年曲曲弯弯的道路，付出了并仍在付出多少血的代价。人类似乎在和大自然进行着一场无始无终的搏斗，从洪荒时代，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为了生存和繁衍，为了牢牢地站立于大地之上，人类没有一天不在锻造打开自然奥秘之门的钥匙。在地球飞速的旋转中，神话的迷雾渐渐消散了。可是，大自然依然以它神秘的存在，成为当今一个最大的司芬克斯之谜。

真是可悲的吗？

在我写作《唐山大地震》的日子里，有五个孩子始终陪伴着我。一个是我心爱的儿子的照片，另外四个，则在一组外国画片上。有时，我会觉得，当他们瞪着一双天真的眼睛看着我时，他们似乎比我更能理解大自然，理解我的写作，理解唐山的废墟。

无论是登上海城辉煌的顶峰，还是落入唐山黑暗的深渊，无论这中间有着多大的偶然性，中国的地震科学家们毕竟摸到过大自然的脉搏。尤其，当我因为采访和寻找资料，常常出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办公大楼的时候，科学家们忙碌的身影，使我感受到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一种颇为深沉的人类固有的力度。

在云南，一个中美合作的试验场正在紧张工作，科学家们正从大量可记录的小震中探寻地震的规律；

在西北，华北，特殊记号标明的地震危险区域内，地震工作者们正枕戈待旦，警惕着中国大陆又一个地震高潮期的到来。

与此同时，国外的学者也在同步地为征服地震恶魔而努力工作。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已决定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附近的山前地带建立苏联第一座生物地震试验场。在那里，动物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共同工作，目标是解决地震的临震预报问题。据《科学画报》报道：为寻找导致大陆漂移，火山爆发，地震频繁的地幔热流，美国科学家用分析地震冲击波速度的方法，绘制出第一批地球深处一千八百英里处的三维地图。还有一条与

地震相距较远的消息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教授正主持建造一个实验场，准备进行庞大试验——模拟“我们的宇宙”的初始状态，宇宙大爆炸的一刹那，那一刹那，以研究此刻地质结构变化和物质间的相互作用……这似乎更属于一种质的探索！

1985 年 6 月 9 日，长期致力于地震预报研究的中国老科学家、石油部顾问翁文波，向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地震局发去一份电报，指出：8 月 20 日，在巴楚北东部，将发生 6．8 级地震。

8 月 23 日，巴楚以西三百公里的乌恰发生 7．4 级地震。是继海城之后的又一次偶然吗？

这或许算不上一条惊人的消息，可它却使我抑制不住的激动。十年了，唐山大地震以来，有多少人对地震预报失去了信心，有多少人在“人和自然”这一深奥而永恒的课题面前畏葸却步。事实却证明：希望之光并没有熄灭！

记得，在新疆乌恰发生地震的消息传来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北纬 39．4°！又是一个 40°线附近！我不止一次听地震工作者们说过，北纬 40°线，是一条神秘诡谲有如百慕大三角的恐怖线。正是在北纬 40°线以及邻近这一纬度的地区，发生过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大地震——

美国旧金山大地震；

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

意大利波察坦以南地区地震；

日本十胜近海地震；

中国海城地震；

中国唐山地震；

…………

颇有戏剧性的是，我写作这部作品时，双脚也正踩着这条“恐怖线”。北京，中国地震界设防的核心区域，也恰恰处在 40°线

上。

一个至今无人解释的谜。

不过，这仅是无数大地之谜中的一个。

在自然科学的浩瀚大海里，我们人类的哥伦布船队和麦哲伦船队才刚刚启航。从起点到终点是极其漫长的，但我们始终能看到那面昂然前行的风帆。

我相信，人类终究会查明：地幔热流和地震的关联，太阳黑子和地震的关联，以及千千万万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尚未把握的物质运动规律、和地震灾难的或远或近的关联……

我还相信，有一天，人类不仅将预报地震，还终将能“疏导”地震，究竟是像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所预言的，用沿断裂带打井注水的方法，诱发一些粘滑地震（小震），从而释放能量，避免大震（这似乎是一种奇想！），还是像我的一位朋友所预言的，将用小型地下核爆炸的方法，去达到同样的目的？也许还有许多更新更好的方法。不久的将来，那条躺卧在地底深处的大鲶鱼也将会躺在人类设置的解剖台上，成为人类战胜自己、战胜大自然的一个象征。

也许，我的一位朋友的想法倒是可取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最后“征服”，不在于力的征服，而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和谐相处的前提不是人类的退避，而是以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为基础。总之，这一切，在今天，是幻想，可在明天，它一定会是现实。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部报告文学的目的。

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为此：

我为明天祝福。

我为人类祝福。

我为我们虽然有限却具有永恒意义的星球祝福。

1985—1986

为纪念唐山地震十周年而作

（选自《爆炸！爆炸！》，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范　硕

十月风雷

10 月，惊心动魄的 10 月。

10 月，在中国是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间概念。这个月份常常带来电闪雷鸣，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

不信吗？请回溯一下每隔 10 年的 10 月的历史吧：

1926 年 10 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北伐军攻克武昌城；

1936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1946 年 10 月，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达到了高潮。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反击，在各个战场发生激战；

1956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一个新的起点；

1966 年 10 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这五十年间，还有许多个 10 月发生过包括“开国大典”那样的伟大事件。这难道完全是历史的巧合吗？有位诗人提出：“不知

是历史选择了10月，还是10月选择了历史?”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反思题目。

那末，1976年的10月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又是怎样的一个10月呢?

这是一个风雷激荡的10月、剑拔弩张的10月!

在这个月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

张春桥炮制的“怎样巩固政权”的“杀人”纲领，就要实施，按照他的黑话：“历史与现实”“革命与专政”，“批邓”与“镇反”“杀人”，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姚文元说过：“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王洪文叫嚷：“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上海精选十万民兵，每人发给四十发子弹。”

“四人帮”通过四条线把“帮精神”传到上海，与上海的余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几个月来，上海余党与王洪文、张春桥“热线联系”（通电话）达146次之多。

“四人帮”已准备了告人民书，政变后即通知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强大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争夺战的丑恶表演。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上帝要那些人死亡，必先使他们发狂!”即将覆灭的“四人帮”完全疯狂了!

10月1日。国庆节。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他要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像、办公像，洗印114张，

并从 27 张 8 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像，指令按照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修改。摄影记者问他过去为什么不照，而现在照？他说准备追悼会用。这是骗人的鬼话！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座次”名单，所以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像和“历史性”合影。

10 月 3 日。“四人帮”从 9 月底开始，阴谋策划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

这一天，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并且肯定地说：“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明目张胆地影射、攻击华国锋、叶剑英等是“修正主义”。

这一天，江青得意忘形，带着大小随从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她站在几株苹果树前，搔首弄姿，要摄影师拍照。这个一向穿着时髦、妖里妖气的“演员”，今天却甩掉围巾，换下洋装，穿上了中山装，一本正经地照了 17 张标准像。然后又兴致致地到北海仿膳用餐。一面吃，一面骂：“阶级敌人造我的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这一天深夜，迟群催促清华大学连夜“加快整理”有关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黑材料，匆匆而走。这是“四人帮”一伙制造的又一批“炮弹”，准备随时射向夺权的战场！

放下“四人帮”这一边，让我们把镜头移向玉泉山。

九号楼，灯光暗淡。

已经是子夜时分，年近八旬的叶剑英元帅依然正襟危坐在写

字台前。他在干什么呢？冷静的思索。这是一位统帅进行战役部署后的思索。平静而深远。他似乎一切都放心了，又似乎一切都放心不下。

连日来，元帅表面上深居简出，闲庭漫步，读书吟诗，沉静如常，但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笔下写着“眼前近似无聊赖”的诗句，并不能遮掩他的“心潮逐浪高”。他以百倍的警惕，留意山下的动静，提醒秘书加强值班，有闻必报，一事一报；提醒身边人员加强戒备，以防不测。白天，警卫参谋双枪在身，寸步不离。晚间，元帅亲自检查周围环境和门窗是否关闭上锁。他还规定除秘书一天两次送文件外，谢绝会客，包括子女在内，没事不上山，不要来打扰，以便集中精力读书思考。

夜深人静，没有人声鸟喧，没有电话铃响，耳旁只有山泉流水的淙淙细语，一切是这样的安静，然而，越是平静，元帅越是没有睡意。处理完山下送来的公文，他信手打开一部“玉泉诗钞”的手抄本，披阅起来。多年来，元帅看书读诗，养成一个习惯，喜欢边看边读，边读边批。每读一句，沿着书中的逗、顿、句，用红毛笔点一点；每看完一段，写眉批、边批；读完全书，又写尾批，注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读毕。如此，一本书中圈圈点点，淋漓满纸。黑红相映，倒也鲜艳成趣。他用的红色墨汁也很特别，既不是红墨水，也不是书法家们讲究的朱砂，而是自制“桃胶墨”。他平日告诉身边人员到山上采来桃胶，再买来普通的红墨水，搅拌一起，用一个小锅细心煮熬。开始，他不放心，还要亲自手把手教给“小鬼”们如何看火候，如何看稠度，熬成了备用。到玉泉山来，他就命小张熬了几次“桃胶”，因为整天关起门来读写，还有点“入不敷出”呢！

元帅聚精会神地读着诗稿，忽然停下朱笔，肃然起敬。

“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

这是李大钊在1913年11月1日写的《咏玉泉》诗。这首七言绝句，诗人还有一段引言：“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闻通三海禁城等处，皆溯流于此。”

叶帅从引言中猜度李大钊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时，可能一次路过颐和园墙根，并未进过玉泉山。然而他以愤怒的笔触，无情地揭露慈禧太后骄奢淫逸，“耗尽民膏”，有甚于秦始皇的阿房宫！

叶帅想到这里，不禁敬佩老一代革命家愤世妒恶的伟大胸怀和战斗豪情。同时，也更加愤恨慈禧太后昏庸腐败和卖国行径。由死去的慈禧很自然地联想到当代这个活着的“慈禧”。绝不能让历史重演，要赶快结束这段历史！

叶帅拿起朱笔，工工整整地把李大钊这首诗抄录在一张宣纸上，又吟诵一遍。“耗尽民膏是此声”？元帅拍案而起，“此声”将变，“此声”即变！“于无声处闻惊雷”！

元帅舒展双臂，躺在床上，笑了。笑得那样自信。

一觉醒来，红日高照。

元帅睁开眼后的第一件事，就问山下有消息来吗？

小张摇摇头：“暂时还没有。”

元帅起身走出室外。围绕庭院踱步散心。他偶尔停下脚步，重新打量这座高级别墅式的灰白色建筑，思忖着：解决“四人帮”以后的政治局会议是不是要在这里召开呢？他好像既熟悉又陌生起来，似乎有什么新发现。是的，这个九号楼比起西山十五号楼，气势更加雄伟。它屹立在山、水、亭、塔之间，隐藏在绿树花丛之中，不仅在外观上前廊顶檐，栏柱玉立，显得优美秀丽，而且在“楼”里面，房间也更多更大，尤其那间大会议室更有气派，庄严典雅，宽敞明亮。当年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会见来宾，商讨政务。

想不到再过几天，在这宽阔的大厅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将再一次决定国务大事呢。

叶帅走进室内，小张正在欣赏写字台上那首玉泉诗。

叶帅见这个年轻人酷爱诗词，便讲起李大钊的道德文章如何之好，他为党的事业如何忠心耿耿，讲到他壮烈牺牲时，叶帅非常激动，竟然声泪俱下。

“浪写风怀浪赋诗，
吟成尽坐断肠时。
国愁家恨填胸臆，
哪有闲情哭古人!”

元帅擦干眼泪，反复念着这首七绝。

小张受到很大感动，赶紧抄下来，也跟着背诵起来。

“首长这首诗出自谁的手笔?”

“南社诗人……”

叶帅刚想讲下去，山下的几位秘书来了。他们像往常一样，每天都来轮流向首长汇报情况、送文件。

这是当今第一要事。还有什么事能比了解山下的动态更紧急呢!

在许多消息和情报中，叶剑英元帅非常关心有关“四人帮”调动部队的传闻。他让办公室转告作战部，一定要查清楚。一旦发现任何人有非法调动部队的动向，立即坚决制止。

只要“四人帮”指挥不了解放军部队，他们就成不了气候，没有什么可怕的。他相信毛泽东生前揭露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阴谋时说过的话：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这是真理，一条铁的定律。只要人民解放军性质不改变，就不会造反，“四人帮”就指挥不动。叶帅在玉泉山

之所以临危不惧，临战不慌，“悠然向南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点，不只中国人，外国人中有识之士也是这样认为的。如《邓小平》一书的作者就这样写道：“国防部长叶剑英，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汪东兴，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华国锋把部队调到首都周围，使激进派得不到任何军事支持。”

至于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当时究竟作了如何调动部署，“四人帮”最后搞了哪些小动作，又如何被制止的。这纯属军事机密范围，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巍然不动，严守纪律，始终听从叶帅及其他军委领导人的调动和指挥。这对“四人帮”是个最大的威慑力量，也是赖以粉碎“四人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这一天，一阵雷雨过去，10月的阳光变得更加灿烂绚丽。这阳光饱和着巨大的热能，凝聚着真理和正义，温暖着亿万人民的心。

叶剑英元帅中午小憩之后，神采奕奕，兴致特别高。医生护士为他量过血压，劝首长出外散散心，老是在室内看书，会闷出病来的。叶帅接受“医嘱”，在几个随员的陪同下信步来到苹果园。他望着那沉甸甸的满树硕果，春华秋实，感到一种充实感和丰收的喜悦。

“首长和我们一起照个相吧！”不知哪个“小鬼”提出这个建议。

“好！”叶剑英和几个同志照了个合影。不过，这决不是“标准像”，至今那“小鬼”手里仍然珍藏着这个宝贵镜头。

走出苹果园，穿过桃林，元帅来到九号楼前的“九号湖”边。

一阵秋风扫过，水面荡起一片涟漪。有几条鱼游了过来，似乎在向元帅点首报到，然后又摆尾游去了。

元帅在水边石凳上坐下来。又不知是哪个“小鬼”悄悄把鱼杆递过来。

钓了一会儿，竟毫无所获，随员们有点急了。

“当年姜子牙垂钓渭水边，就不急，愿者上钩嘛！只要耐心等到一定时候，总会有几条大鱼上钩的！”元帅说完发问道：

“你们知道，这里的鱼为什么不愿上钩呢？”

随员们各说各的理。

“不对！因为这里的水太甜太好了，它不但养鱼，还养人呢！”说到这里，元帅又问他们说：“你们天天喝玉泉水，可知道这水的可贵吗？”

年轻人当然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只好摇摇头，又非常想知道。

于是，“老渔翁”又信口讲起古来：我国古时候，人们衡量水质好不好常以水的轻重为标准，轻者优，重者劣。清朝皇帝乾隆下令内务府作了个银斗，称量天下有名的泉水，发现玉泉水最轻。从此玉泉水定为清宫专用御水，乾隆亲笔赋诗一首：“功德无双水，名称第一泉”。后来，直到西太后，还用毛驴子从玉泉山往紫金城拉水喝呢！民国以后皇帝不再拉水了，“玉泉流入百姓家”。相传20～30年代“双合盛”的五星啤酒就是用的玉泉水，还标着“天下第一泉水”的商标呢……

10月的天气并不总是风和日丽的，也会骤然间阴霾密布，西风萧瑟，卷起阵阵黄沙。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从9月16日，抛出用黑体字印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后，第二天，9月17日，新华社在发给全国的《内部参考》上就定了调：“‘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从这一天开始，姚文元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或口头指示新华社，强调反复宣传"不要怕重复"，规定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于是各种报刊像连珠炮似地发表文章，大吹大擂，至9月30日止，只六种主要报刊不完全统计就登载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种专文236篇，占全部发表悼念毛主席的报导和文章的59%。许多报纸把"按既定方针办"用作通栏大标题，有的把它当作毛泽东语录登在报头上，有的为此登了大幅宣传画……使人读不胜读。为了让人读懂，报刊上用醒目标题加以大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就是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就是"要坚持学习，深入批邓"……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文革"的方针办，就是按"四人帮"的"总纲领"办。

华国锋很快察觉了"四人帮"的这一阴谋，于10月2日，在乔冠华9月30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特意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不料，这一"删"，却激怒了"四人帮"。他们经过紧急筹划，由张春桥出面阻止传达华国锋的批示，他公然在文件上批："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亲自出马找迟群、谢静宜，面授机宜，从经典里找根据，胡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而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更滑稽的是，她还要人写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如何坚持了刘邦的"既定方针"。果然，10月4日，"梁效"文痞们按照张春桥、江青的旨意，炮制出了上述《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

这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

奇文共欣赏，不妨摘录几段如下：

“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一切修正主义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

“‘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请看，这个“宣言书”真是极尽颠倒黑白、造谣诬陷之能事！明明是他们把毛泽东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

针办”，却硬说别人“篡改”了他们强加给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究竟是谁“篡改”谁呢？这个“篡改”的官司有什么打头呢？乍看起来：“照过去方针办”与“按既定方针办”，只三字之差，而意思又差不多，似乎只是提法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不，这里边还是大有学问的：第一，他们凭空制造了一个“既定方针”，说这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从根本上否认了毛泽东病中抄给华国锋的“三点指示”；第二，既然“临终嘱咐”是给“四人帮”的，那末，他们就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统”，而华国锋则是非正统、非法的；第三，更有甚者，华国锋胆敢篡改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而篡改就是“背叛”，就是“修正主义头子”。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华国锋罪大恶极，就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

因此，就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同这个中国现代最大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头子”斗争到底。

这就是“宣言书”的要害所在。

叶剑英一眼就看出了这篇社论的“背后动机”，如此露骨，如此恶毒！这不是一般的“社论”，不是一般的“黑文”，而是“四人帮”给大小喽罗们，“第二武装”的士卒们、效忠“女皇”的臣民们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一个紧急进军号令。他们打响了第一枪！我们怎么办？

这篇“檄文”使华国锋震惊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那里面说的“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要准备“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又是斗谁？……他越发觉得这场斗争就在眼前，是不可避免了！

叶帅驻地的几部电话机，红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响个不

停，秘书、参谋和随员们应接不暇。这些多半来自党政高级领导和老同志的电话，几乎是一个声音：

“叶帅看到今天的社论了吗？”

“首长审查过这篇社论吗？”

“叶副主席对今天社论有什么看法？”

……

这些电话最后总忘不了说一句：“祝愿叶帅健康长寿！”

有一个电话来自海军司令部。

这个电话数次打来，只有一个要求：速见叶帅！

警卫参谋再一次报告首长，叶帅最后说：“这个司令真是急先锋！好！答复他，请他在小翔风等候！”

说罢，叶帅乘车下山，走迂回路线迅速赶回家里。

等候在客厅里的不是别人，而是海军大将肖劲光。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军，是中国现代军事家、人民解放军海军创建人之一。早在1920年在长沙参加“俄罗斯研究会”，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先后两次赴苏联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毕业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回国后，在中国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军政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率部转战闽赣地区，与叶剑英并肩战斗。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们虽然各在一方，但仍然互相关心，保持着战斗友谊。建国后，肖劲光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以后，与叶帅的交往增多，特别是在“文革”中，更是相互激励，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不懈的斗争。1973年叶帅出席海军的一次重要会议，应肖劲光之请，赠诗一首：“沧溟列舰耸层楼，王濬年高雪满头，应向青年寻后继，不拘一格莫嫌仇。”在毛泽东病危期间，肖劲光预料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毛主席身后会有动作，借领袖名义干不可告人的篡权勾当，便冒着风险到叶帅那里建议，请叶帅下命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

方法，解决“四人帮”。这次读了“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黑文，感到事态严重，立刻要求来见叶帅。

“等急了吧?”叶帅同将军亲切握手。

“什么时候了？急死人了！”

肖劲光来不及更多的问候，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严肃地建议说：“叶副主席，事不宜迟，再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了！”

“我们正在商量采取措施”。

叶帅请将军坐下，从“社论”谈到形势，一再叮嘱，要加强战备，听候命令。

老将军此刻虽然尚不知对付“四人帮”的全部战略部署，但心里总算有了底，高兴地笑了。

“请叶副主席放心，千万保重身体！”说罢就要告辞。

“急什么呢?”叶帅留他吃午饭再走，又关切地问了问苏振华的情况，请代向他“吹吹风”，要提高警惕！

老将军带着嘱托，迎着满天风云，离开了后海。

《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像一股瘴天雾地的龙卷风，刮遍华夏大地。饱经十年浩劫的善良人们，又一次遭到了恐怖的袭击。

老一辈革命家和落难的“老家伙”们，焦心积虑，加紧酝酿着应变良策。

素有政治头脑和文化素养的千百万干部和群众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中国大地在颤抖！

“四人帮”在狂笑！

江青穿起黑“龙袍”，脱掉“连衣裙”，准备“登基”了。当代的“武则天”到处抛头露面，发表演说，大讲“相公堂子”和“女皇帝”。

姚文元关起门来，同他的文痞们加紧炮制各种“诏文”。

张春桥、王洪文躲起来摇着电话机，忙着发号施令，调兵遣将。

“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第二武装”开始行动了。

“四人帮”放风，社会上传闻：10月8、9、10日有“特大喜讯”。

余党们蛊惑人心，要“准备庆祝”。上海一些商店里，鞭炮、红纸被抢购一空。

好一派热闹景象！

只可怜，空欢喜，好梦不长！

“四人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以为控制了舆论工具，掌握了“第二武装”，文武齐全，做好一切准备，包括暗杀在内的一切手段和措施，就可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欲望。他们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叶剑英等“老家伙”们，也过低地估计了他们要取而代之的华国锋。

“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在“四人帮”的一片夺权的大合唱中，叶剑英紧盯着他们一场场丑剧的表演，冷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变化发展。从已经察觉的种种迹象表明，疯狂的“四人帮”就要动手，一场反革命政变正迫在眉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若再推迟下去，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马头！今天晚上提前吃饭，准备车子！”

这天下午叶帅给警卫参谋下了命令。

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去？警卫参谋摸到了首长的脾气，现在是“非常时期”，不便问，也不必问，听招呼就是了。

黄昏。晚霞飘动。叶帅坐进红旗轿车，向后望望西山落日，小

声说道："我们要来个'夸父追日'！"叮嘱司机加大油门，要和落日赛跑，抄近路开往东郊民巷。

大红旗飞速急驶。在夕阳西下前，到达目的地附近，故意转了几个圈子，进到新八号院。

这是华国锋的新居，曾是西哈努克的豪华旧居。

华国锋在宽大的客厅里来回踱步，正为国庆后"四人帮"发动的"逼宫"攻势大伤脑筋，尤其10月4日"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使他坐立不安，心烦意乱。

叶剑英的突然到来，赶走了满室的闷气，室主人顿时神情为之一振。

"看到他们发出的信号了吗？"

宾主落坐以后，几乎同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话题由此说起。叶剑英把这几天的所闻所见以及从各个渠道掌握的可靠情报，和盘托出。

华国锋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点头，插话，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老帅，彼此交换着意见。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军事家最忌讳的是贻误战机。现在要根据情况改变原来的部署，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叶剑英怕对方未听清楚，又重复着说："要快打慢，快打慢！"

很显然，这是粉碎"四人帮"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叶剑英在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时间要往前赶。

华国锋脸上出现严肃的表情，沉思片刻，说："叶帅，你看哪一天动手好？请你决定！"

"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我想至迟后天动手，你看怎样？"

"那就这样吧，"华国锋仍然不太放心，他想起不久前与汪东

兴交谈的情形，说："只是不知道东兴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不知能不能来得及？"

正说间，秘书来报告，苏振华就要来见。

叶帅听罢起身："我这就准备到东兴那里去。"

华国锋送叶帅上车，并嘱咐叶帅多保重身体。

"大事不糊涂，小事更周到。"这是肖克将军对叶帅的一个评语。的确如此，叶剑英这位身经百战，惯于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像对待革命战争年代的重大战役一样，来对待这次与"四人帮"斗争的最后一役。这一役虽然只解决几个人的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比大兵团作战，还要难一些。这因为情况不同，战法不同，又没有先例。在"临战"前夕，有许多特殊问题需要精细缜密地研究解决。诸如，那几个人都能按时到会吗？他们住地又不在一起，会同一时间来怀仁堂吗？会顺从地接受"审查"吗？要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对江青是否需要"特殊照顾"？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选物色得怎么样？可靠程度如何？会议定在晚间还是深夜恰当？参加"会议"的人员和内容什么时候发通知？怀仁堂的场地怎么样？警卫要不要加强？甚至连怀仁堂有几道岗、正厅有几道门，开哪个，关哪个，进哪个，出哪个，他都想到了。再者，除了"四人帮"之外，还有哪几个人非要解决不可？自然是人数越少越好。是同一时间解决还是放后一步？这些人解决之后，安置在什么地方进行"隔离审查"？如何依法处置，如何向政治局报告，如何向人民群众交待？还有，对一些重要机关和机要部门要不要采取紧急措施？……

这一系列问题，看来很小很细，未免有点烦琐，但正如列宁说过的那样，是整个"链条"中的若干个"环节"，直接关系着这场斗争的全局，都需要认真去安排和解决，稍有疏忽，一着不慎，则全盘皆输。

为了取得决战全胜，叶剑英又一次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里，倾听他汇报最后一切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对遇到的难题摆开来一一解决，使行动计划更臻于完善，更为可行。

汪东兴又将进一步落实的情况，及时报告华国锋、叶剑英。最后经过紧急磋商，确定提前到10月6日晚8时采取行动。“会议”事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主要有两个议题：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按照规定，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怎么办？为了让他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在城里的住处属北京卫戍区管辖范围。为防万一，作两手准备，先通知他来怀仁堂开会，把这条鳄鱼调到中南海，万一来不成，再临时通知卫戍区领导负责就地解决。对于江青这个特殊人物以及另外的几个死党分子也提出了可靠的处置方案。

“谋成为秘，败于泄”。叶剑英作为一个谙熟历史又有丰富斗争阅历的军事家，深知历史上有许多“谋成泄败”的先例，而且有切身体验。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炮轰总统府，他那时跟随孙中山，组织反击，不料海军司令温树德会后告密，使革命舰队遭到损失；1927年，广州起义中也有内奸几次捣鬼，险些误了大事；最严重的是1935年长征路上，张国焘制造“密电”事件，经过党中央紧急果断处置，才化险为夷。前车之鉴，不可不慎。叶剑英一再叮嘱汪东兴，这次对“四人帮”采取紧急的重大政治行动，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须虑之周详，妥善安排，严密组织，实际做起来，人不能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守口如瓶。万一走漏风声，就会打乱一盘棋，招致失败。他和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措施，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慎重敲定，再由汪东兴负责主办，检查落实。

中南海。

红墙绿水，金碧辉煌，庄严典雅，气势宏伟。

这个金元以来的宫苑胜地，明清以后列为“禁苑”。民国初年曾在此设总统府，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就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数百年来，这个“圣地”，虽几经朝代更迭，宫廷政变，刀光剑影，但依然保存得金瓯无缺，在占地1500余亩宽阔园林的湖面周围，分布着丰泽园、崇雅殿、瀛台胜境，西南两岸陈列着怀仁堂、紫光阁、武成殿和宝月楼……殿台楼阁布局有序，建筑风格变化万千。它们依山就势，掩映错落，纵横擘划，曲折有致，真是“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呈现出一派幽静和平的景象。

然而，谁能料到，就在这古老的“宫廷”里，如今有一个地方并不“和平”，正在悄悄地酝酿着一场特殊的“战争”。这个地方不是别处，又恰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里，气氛有点异常，人们进进出出，神情紧张。连日来，汪东兴根据华国锋、叶剑英的指示，有秩序地进行着“战前准备”和“战斗动员”。这位当年曾被毛泽东称为“有办法挡江青”的第一线指挥员，分别召集负有特殊使命的行动组，逐个部署“战斗”任务。小组成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精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党忠诚，立场坚定，身体健壮，具有长期革命斗争和警卫工作经验。根据“隔离审查”的对象，分别编成几个小组，每个组有三四名组员。汪东兴逐个找小组负责人和组员谈话，交代任务，征求意见。这些“无名英雄”领受这项重大政治任务时，知道是叶帅亲自交代的，心情十分激动，表示愿意保卫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为民除害，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一个人提出疑义和反对的。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各个小组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各自行动方案，并严守纪律，绝对保密。

数十名整装待发的战士，如刀出鞘，箭上弦，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呼唤，投入一场“无声”的战斗。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将领和记者称为“游击战争战略家”的叶剑英，居然在1976年秋天，又打起游击战来。

尤其这几天，他更是不断地变换战略阵地。为此，司机赵师傅车上的油箱总是灌得满满的，医护人员的药箱也整理得好好的，随时准备“开路”。

为了指挥解决“四人帮”的最后“战役”，为了保证这次“战役”大获全胜，万无一失，叶帅今天又上了西山。

这里，王洪文正忙着照标准像，早已离去。

这里，地下战备设施更为严密。

这里，峰峦叠嶂，云雾缭绕，比玉泉山更为深沉。

在这里，元帅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告诉他最近同华国锋总理等商谈过，国内局势有点紧张，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同时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梁必业这个“红小鬼”，早在中央苏区就熟悉叶“参座”，在红一军团，尤其在四野政治部工作期间，经常见到叶帅，听取指示。今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又一次当面聆听教诲，接受任务。他现在实际上主持总政工作，受够了“空头”主任张春桥的“闷棍”和欺压，恨不得一下子除掉“四人帮”。听叶帅一说，便领会了意图，感到责任非常重大，当即表示全力以赴，坚决贯彻执行。

在这里，元帅又一次请来了杨成武。

他首先关心地问了问聂帅的情况，然后说：“你可以告诉聂总，已经商量好了，请他放心。”

杨成武还想再探听一下详情，未等开口，叶帅又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现在总参机关怎么样？”

“军队战备怎样？”

“没有问题”。杨成武满有把握。

“你要同可靠的同志个别商量一下，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像接受战斗命令一样，站起来：“请叶帅放心，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在这里，元帅又拿起电话机，亲自给有关可靠的老部下通话。

一位空军的领导人深夜在卧室里突然接到叶帅的电话，听到他亲切的声音，坚决表示：提高警惕，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10月6日，星期三。阴天多云。风力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八度。风向北转南。

这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天。

然而历史选择了这个普通的一天。

这一天一切正常。

玉泉山九号楼的主人，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一切有秩序地进行着。

上午10时，秘书们上山来依次汇报，送批文件。

中央的、军委的、各总部的。国际国内动态和各种简报……

叶剑英元帅非常关注军事动态，认真听取，细心批阅。

中午，轮到“Teacher”汇报国际动态，元帅一边吃饭一边听。饭后，照样请他教英语。

文件处理完了，外语学过了，似乎无事了。不，元帅心里装着一件事，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在等待电话通知。可是，桌子上的红机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毫无动静。一小时过去了，二小时过去了……

3时30分。电话突然响了。

“晚8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小时到怀仁堂。”

“马头”接到电话，立即报告叶帅。

“好，作好准备！”叶帅下令说。

整个下午，元帅守候在九号楼，心情极不平静，但又显得平静异常。这是“决战”前的那种平静。他早已得到汪东兴的报告，一切都按照部署正常进行。结果如何？只须等待。他想起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战场上见分晓。是啊，再过几个小时便见分晓。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将对付的虽然只有几个人，可是牵连着亿万人民，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啊！每念及此，这位叶帅，一颗悬着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

6时15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服，带着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出发。

黑色的大红旗，向着西山落日相反的方向，直奔中南海。

晚霞满天，金风送爽。大红旗箭一般飞驰。

在车上，元帅神态严肃，提醒警卫参谋，作好应急准备。

“马头”立即握好枪，觉察到今晚有点异常，心情有点紧张，但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一路上，你们要留心，看看有什么动静！”

元帅双目直视车外，提醒警卫参谋和司机老赵。

车子临到西郊机场附近，元帅又叮嘱：“马头，看看机场上飞机有什么变化？”

老赵故意放慢车速，开到跟前，警卫参谋一架一架数过，报告：“十九架都在，原来是二十架，最近摔坏一架。”

大红旗全速行驶，路过五棵松。又听元帅问道：“有什么变化没有？前面到木樨地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木樨地？“马头”和老赵有点纳闷。

“未发现异常。”

元帅伸长脖颈，两眼一直盯着北边。来到木樨地路口，又叮嘱道：“仔细看看，北边过来车没有？”

"没有看见。"

元帅松了一口气："好，我们赶在前边了！"

原来他说的"北边"是钓鱼台，关心的是张春桥、王洪文的车子是否跟上来或超过自己。

大红旗走上西长安街，稍微放慢速度，继续观察未发现异常。到达六部口向北直插中南海西门。

"马头，怀仁堂你不是很熟悉吗？最近有变化没有？"

"马头"是从中央警卫局调来的。对怀仁堂非常熟悉。不久前，他还去过，没有什么新发现，便简要地作了汇报，但不知首长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说话间，车子驶进了中南海。

夜色很美，天遂人愿。中南海的秋夜胜似春光。半弯弦月穿透乌云，将一片皎洁洒向人间。

这样美好的时刻，庄严的"圣地"，将要发生一场特殊的"战斗"吗？千真万确。当年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叶老帅，今晚却又一次亲临前线。不过他没有带来千军万马，也没有准备消灭万千敌军，只是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来到战场。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战场。这里，没有堑壕，没有炮声，没有两军对垒。肃穆安谧，灯光闪烁。在隐隐的月光下，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一切是那样和谐、平静、正常。

晚7时，叶帅乘坐的大红旗停在怀仁堂门前。

这个始建于1888年的宫殿，原名"仪鸾殿"，曾与"勤政殿"、"瀛台"等齐名。它作为"引对臣，总理机务，宴赉王公卿士"的重要场所，后为八国联军所毁，慈禧太后又耗用巨资重建，改名"怀仁堂"。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以后一直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堂。而今天这里将成为惩治奸凶的神圣法庭。

叶帅走下大红旗，向随员打招呼说："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他望着幽静庄严的怀仁堂，疾步来到门前，那恭立在两旁的石狮，依然那样威风凛凛，栩栩如生。

这时，警卫人员走过来向元帅敬礼，并拦住"马头"不准入内。这时随员们才感到情况有些不"正常"了。"太液池"平静的水面上泛起微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按常规，警卫参谋拿着文件包，是要送首长到会议室后再出来的。这既是为首长安全，也是为文件安全，"马头"拎着黑色的文件包，继续紧跟首长往里走。突然警卫科长又来"挡驾"了，说什么也不让跟进去，"马头"无奈，只好赶紧把文件包送给首长。正在拉拉扯扯，叶帅急了，怕耽误时间，甩开文件包，独自进去了。警卫科长一看文件包落地，才让"马头"拾起来，快步跟上，并小声告诉他，送到正厅立即出来，这是纪律。

叶帅穿过高大的影壁，径直向院内走去。怀仁堂内，古雅富丽的殿台楼阁，披上了一层轻轻夜幕，静静地立在那里。面对"怀仁堂"匾额，左侧走廊下高悬四个楷体大字"绮兰晨露"，右侧走廊下的行书横幅"光绚春华"，依稀可辨。只是让人感到"晨露""春华"与今晚的紧张气氛不大相称。叶帅以多年养成的精细习惯，用敏锐的眼光扫视精美的戏台、庄严的厅堂和东西两廊，不见有人走动，才放心地直奔正厅而去。

在夜幕笼罩下，厅堂屋檐上雕刻的各式精美图案已经模糊不清。宽敞的大厅内却被莲花吊灯照得如同白昼。

叶剑英走进正厅，守候在东门口的4名警卫向尊敬的老帅行注目礼。"马头"放下黑皮包，听从指挥，立即退到门口的值班室待命。

叶帅从前熟悉的正厅，现在完全变了样。原先所有的桌椅，都不翼而飞。宽阔的殿堂，显得空荡荡。中间摆放一扇屏风，将大厅一分为二，隔成两半。对着正门的这一半前厅里，在厚厚的红

色地毯上，只留下两张罩着白色套衣的高背沙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似乎在等待主人来临。

今宵的主人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而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却已守候在大厅左右。他们碰了面，以目示意，尽在不言中。此刻叶剑英稳坐在沙发椅上，神态坦然，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示意汪东兴找个椅子坐下，汪谦让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再说我另有任务。"叶帅小声说："噢，你要'埋伏'哟！"于是按照事先安排，汪带上警卫躲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

整个怀仁堂安静极了，静得可怕。警卫人员停止了走动，一个个停立在那里，凝神注视，血管绷紧，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而远方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秋虫唧唧，显得格外响亮。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沙发椅上，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

人们不停地看表，而时间又好像故意放慢脚步，每一秒钟都使人感到难熬。

时针指向 7 时 55 分。

院内传来了脚步声。第一个出现在正厅门口的，将会是哪一个呢？警卫们屏住呼吸，在揣度着。

命运之神好像作错了安排。最先露面的竟是张春桥。这个"神机妙算"的"军师"，可能昨夜太兴奋、太麻痹了，以至算错了"八卦"。他接到电话通知之后，原以为今天的会议讨论完规定项目之后，还有时间提出解决他梦寐以求的"人事安排"问题，故而带上材料，提前从钓鱼台出发，准时到会。他自我感觉良好，下了卧车，夹起黑皮包，迈着四方步，摇头晃脑走进了怀仁堂。突然间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才嗅出一点异味，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嘴里不停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未弄清发生了

什么事，只见行动组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鼓起一双鼠眼，环视厅内，大概还想寻找自己的位置吧。一看那里已经没有他的座位，正襟危坐的叶剑英目光严峻，冷冷地逼视着他，巍然直立的华国锋，满脸怒气，正等待发作。

张春桥彻底明白了，自己已作了“阶下囚”。他正想鼓起如簧之舌来声辩，只见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

这位“军师”此时丢掉了装满阴谋诡计的黑皮包，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双腿打颤，变成一堆泥。他没有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被监护人员拉出正厅北门到一个候审的地方。

张春桥这个“鬼火似”的人物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早在30年代初期，他在济南就充当了国民党特务，后来到了上海，继续从事特务活动，两面三刀，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隐瞒了反革命历史，混入党内。“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鬼火意志”恶性发展，成为“四人帮”的灵魂和主宰。他出谋划策，煽风点火，制造暴乱，眼看就要“新桃换旧符”，没有料到一刹时梦惊黄粱，原形毕露，落入法网。

正厅里的人们以蔑视的目光，看着这只“老鼠”的狼狈相，他从怀仁堂出来，被请上一辆卧车，出中南海东门，一直被送到宫园的地下室。

正厅里的“会议”继续进行。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这个“文武全才”的大人物从怀仁堂外边走下高级轿车，两手插在怀里，趾高气扬地跨进门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行动组的另一位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横刺里走过来。这个政治流氓一看势头不对，立即端出党中央副主席的架

子，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使出造反派司令的浑身解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是他的武斗看家本领毕竟有限，很快便被制服了。这一次，上海的"第二武装"和小兄弟们一点也没帮上"司令"的忙，实在是可惜！警卫人员带他走向正厅。从几米远的地方，他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预感到末日来临，两眼射出复仇的火焰，像一头发怒的野兽猛扑过去。警卫人员将他推倒在地。待他爬起来的时候，大概是从青云直上的梦境中"清醒"了，威风扫地，只好乖乖的立在那里，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

对于这个无赖"小儿"、政治扒手，叶剑英只能投以十分厌恶的眼光，还能说什么呢！

然而，直到此时，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服气。王洪文只后悔一件事，那就是"动手"晚了，如果早一步，今天怀仁堂这场正剧的表演就该颠倒过来了，坐在那里扮演主角的该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就在他被带去候审、离开正厅的时候，警卫人员听到他轻声地发出这样叹息："没想到有这样快！"可惜，到了这个地步，快也好，慢也好，这对于他已无济于事了，这只能反过来证明一条真理，那就是对付他们采取"以快打慢"的战略方针，该是何等适时，何等正确！

送走张春桥、王洪文，时针已指向 8 时 15 分。

姚文元还不见来。这条"鳄鱼"为何未上钩？等待正厅的人们有点发急了。是不是由卫戍区解决了？还是其他方面出了"故障"？事不宜迟，临时决定重新打电话通知姚文元本人，"请"他速来怀仁堂出席政治局常委会……

其实，姚文元早就想来中央开会了。"四人帮"的这位大笔杆子已是手痒多时。自从 10 月 4 日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杰作"之后，他得意洋洋，在另一篇经过他三次审改的更重要的黑文上"批示"："10 月 8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

报”。今天是6日了，他正等待别人欣赏这另一篇“杰作”，再炮制新的产品呢！今天迟到究竟是哪里出了“故障”，也不必追究。他接到电话，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搞什么鬼？这么长时间不开会，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嘴里如是说，心里更是急。他这个“秃头”，平时外出，总要戴帽子，可是今天听说请他开会，一时发急，竟忘了戴帽子，忘了叫警卫，只夹上皮包，跳进汽车，匆匆赶到了中南海。

谢天谢地！这个自称“文元”的“无冕之王”终于出现在怀仁堂。不知道是因为他迟到被“处罚”，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对他的处置竟降了格：第一，没有让他进正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第二，没有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经过请示，由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宣布的。待到姚文元听到“决定”，弄清怎么一回事之后，这个“金棍子”立刻软了下来，像一条断了脊梁的赖皮狗一样，瘫倒在地。无奈，行动小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位卫士只好扶他起来，将他送到该去的地方。

这个混迹中国文坛的文痞，不愧是叛徒、特务姚蓬子的亲儿子和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曾经长期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效劳，是反革命舆论的炮制者和组织者。他在日记中曾向江青表过功，要用他的“棍子”“参战十年”，横扫一切！这个一贯用“软刀子”杀人的凶手，毕竟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的“电子计算机”脑袋也满灵验：十年一到，寿终正寝！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一个执行同样任务的行动小组，来到了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个小组里特意安排了两名女警卫。

居住在这座豪华殿堂中的“女皇”，这几天为筹备“登基”大典，实在是太忙碌、太亢奋，也太疲倦了。此刻，她穿着绸子睡衣正仰靠在法兰绒的长沙发里，一边看着进口的录相片，一边翻着今天送来的一叠厚厚的情况“清样”，得意洋洋，沉浸在美妙的

女皇梦中。

突然，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

“女皇”斜睨一下门口，打量几个来客，厉声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不过，此刻她的神威已经不灵了。

行动组的负责人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和另一位干部带几名警卫已经跨进室内，向她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还未等读完，“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蓦地站起来高声斥道：“你们快出去！”接着连连呼叫：“来人啊！来人啊！你们在哪里？”

然而，这个作威作福的孤家寡人早已众叛亲离，所有“201”的工作人员再也不理睬她了。

“女皇”脸色发青，一下子躺在地板上，声泪俱下：“主席尸骨未寒……”

行动组人员实在无心欣赏这场“龙床惊梦”的闹剧，还是请她快点收场，换一个地方。“女皇”不得不离开“宝座”，跟随警卫人员去到她应该去的地方。平时受够“妖婆”窝囊气的服务员们，此刻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又吐口水，又扔纸团，送走了瘟神！

关于这位瘟神的“秘史”，中外已有几部专著，均是长篇大论，自不赘述。“四五”运动以来，倒是有些无名诗人的词，如《三宠三哭》、《赠某女士》、《秃儿想掘坟》、《气死你》等等，写得满有趣味，脍炙人口，尤其那首《终身误》，据说是出自名家赵朴初之手，当时争相传抄，广为流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光彩。可惜洋洋洒洒数百言，这里只好割爱了。还有一首也为人广为传诵的，那便是广东省文史馆胡希明先生写的七绝：

“银幕华灯迹未残，山呼万岁梦江南。

当年庆寿人如在，记得儿家旧姓蓝。”

这首七绝妙在揭露了30年代蓝苹女士混迹十里洋场，为蒋介石庆寿的丑事。这是江青一大心病，为此她曾将知情者王莹、郑君里等老电影工作者置于死地。此诗首句以蒙太奇的手法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灯红酒绿的旧上海之夜，末句模仿江青的口气，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

闲话少叙，再说10月6日晚8时后发生在中南海这场“特殊战斗”的另外一幕。

地点：怡年堂后院。

这里原是毛泽东接见厅，小小院落，几间宽敞明亮的房子，花草树木，幽雅宜人。现在的屋主就是那位曾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毛远新。此刻这位“联络员”已经无事可以“联络”，外间纷纷传言他已回了老家沈阳。其实，他并没有走。一来“母后”不让走；二来，他自己也觉得重任在身，走不开。他的妻子远在辽宁，身边只有一个原来给江青女儿看过孩子的老保姆侍候。晚间，孤零零的一个人埋头在电视机的荧光屏上，看得入神。

突然，李连庆出现在门口。

李连庆是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卫士。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常来常往。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联络员”开始并没有在意。后来，仔细一打量，看到老熟人今天脱掉往常的便衣，换上了整齐的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觉得有点异样。

“老李，有什么事吗?”“联络员”有点坐不住了。

“准备给你另外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老熟人慢慢地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还要带点东西。”

“不要了，什么也别带，现在就走!”

直到此时，“联络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啊，你来抓我？"他霍地站起身来，瞪大眼睛，质问老熟人。

老熟人开始不客气了，只好实话实说："你说得不完全对，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奉命来向你传达一件事情。"于是把中央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复述了一遍。

"联络员"还算懂事，没有任何抗拒。接着，军人们搜出了他的手枪，然后将他带上汽车，送到候审的地方。

解决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正厅。

焦急等待在那里的叶剑英元帅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他和华国锋、汪东兴及全部参加这次特殊"会议"的警卫人员，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遥望太空，乌云退去，银河迢迢，星光闪闪，这是多么喜人的夜晚啊！

这样的胜利是人们所期望，但却是始料不及的。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过去了；从1974年起毛泽东就说要解决的"四人帮"，两年时间又过去了。谁能料到今天10月6日晚8时至9时，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这个反党集团，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是历史的偶然吗？不！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智慧战胜愚顽、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胜利，也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坚持与"四人帮"长期斗争的结果。

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和华国锋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一道，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在关键时刻，再一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永远载入史册。

关于对"四人帮"采取紧急措施，实行"隔离审查"依法处置的问题，中外的一些史学工作者和传记作者，在论著和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记叙和评述。有说是叶帅下令"逮捕"的；有说是传讯"扣押"的；有说是"软禁"的。至于最后解决"四人帮"的

地点，更是五花八门。或说是在西山“军委作战室”，或说在钓鱼台，或说是分头在办公室或家里抓的，等等。如严家其夫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写道：“六日凌晨，汪东兴到钓鱼台，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这自然是靠他们天才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来的。

还有一本名为《七十八天》自称是《“二月逆流”纪实》的小册子，先是刊登在《中国》杂志上，后又由湖南某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流传甚广。这本书竟这样写道：

“10月6日。

在这个宁静而温和的星期三的午夜，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同时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命令：

立即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立即接管公安部。

立即接管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钓鱼台某号楼（梁效写作组所在地）。

中央警卫团赵营长听到汪东兴传达这个命令后，十分镇定，立即赶回营区，下令紧急‘集合’。

部队全副武装拉出营房，在操场上列队待命。……”

“7日凌晨2时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几辆军车驶出营区大门。赵营长荷枪坐在指挥车上，戴着耳机，无线电天线在挡风玻璃前摇曳。车队行驶十分钟后，已接近中南海。”

……

由于篇幅有限，恕不再引下去。这位作者在后面接着写的这个曾是朱德卫士的“赵营长”，如何一个一个向王、张、江、姚宣读“逮捕令”，实行武装逮捕的。

对于这个显然失实的“纪实”，许多知情的读者和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1986年第四期《文献与研究》上，曾发表陈一非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应当尊重历史真实》的文章，批评这篇作品中的“开篇”写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有不少虚构和失实的地方，未免太过分了，希望创作党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作家，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创作。文章最后写道：“如果随心所欲地虚构重大历史事实，或者很不严肃地把捕风捉影得来的‘内幕新闻’甚至西方记者的不实报道都拿来当作事实来写，并且宣布这是‘纪实’，那就可能事与愿违，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羊城晚报》和其他的报刊也相继刊登了类似的批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事过三年，时至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记叙邓小平在十年动乱的“纪实文学传记”，在最后写到粉碎“四人帮”的情节中，几乎全文照抄上述《七十八天》一书的有关内容，并在“后记”中对该书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就未免有点同历史开玩笑了。

（选自《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月版）

于光远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作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发出这条新闻，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和操作的。我只是投了一张赞成票，是此事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由于此事的真实经过至今社会上仍不清楚，而且我见到有关文献的记载与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前夕，我认为应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并且希望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补充修正。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

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 1977 年 3 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报纸到了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兴。上午 8 点多我去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在等正式开会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这件事太好了。这时候，纪登奎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他这么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当然风险并不很大，因为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前三天，即 11 月 12 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讲得明白、尖锐、有力。曾涛发出这条新闻后，受到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们的普遍欢迎。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我记得一次有江西来的白栋材，一次有新疆来的汪锋，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6 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稚兰（他是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发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说：“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11 月 17 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 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两

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亲身的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正式批准。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作了一番文献考证。

197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会议的这一段话，写于 1977 年 3 月 14 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二十个月之后。华的讲话中直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是：“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

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 1976 年 12 月 5 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 1978 年 11 月北京市委的那段话与 1977 年 3 月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比较：

(1)〔1977 年华〕仍然肯定 1976 年 4 月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 年北京市委〕不再说这是反革命事件。

(2)〔1977 年华〕明确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 年北京市委〕不再说有制造了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

(3)〔1977 年华〕把 1976 年天安门广场群众反对毛主席 1975 年作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戴上一个“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的帽子，并视作乘机进行的一种反革命活动；〔1978 年北京市委〕不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4)〔1977 年华〕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1978 年北京市委〕在“群众”两字前加上“广大”两字，并认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5)〔1977 年华〕在上引的那一段话外，还说“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点上，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同一次讲话也说了“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一句话。而广大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

对毛泽东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8 年北京市委〕不讲、也就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6)〔1977 年华〕认为应昭雪的人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也就是不包括被认为“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1978 年北京市委〕不再设定这样的限制，而宣布“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对两个文件这样进行对照之后，我们看到，1977 年 3 月华国锋的那次讲话，虽然由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能完全重唱 1976 年 4 月党中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的调子，但仍然重申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行动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而 197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日报》上披露的北京市委的决定，实质上是否定 1976 年 4 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只是那时还不敢在中央未作出决定前明白地反对 1977 年华国锋讲话中的提法，而是顺着华讲话中说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那句话的方向，把广大群众的行动确定为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因此，说它实质上是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是恰当的。而估量北京市委这么做是经过华同意的，也可以说华那时已实质上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改变了 1977 年 3 月时的立场。

不过，1978 年 11 月《北京日报》报道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确没有把这个实质挑明，不但文字一字未提“天安门事件”，在该报七行通栏标题中连“天安门”这三个字也没有。是 11 月 15 日新华社的新闻稿和 1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上，才把这个实质披露出来，起了一个“拔高”的作用，明朗化的作用。

对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作出的努力这件事，我本来没有想写什么回忆文章，事情一过我也就放在脑后了。引起我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是，1993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

长巢峰赠送我他主编的、由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在这本书的附录《“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看到这样一条：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见该书第478—479页）这引起我的思考。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告诉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写个材料给他，以便他找人去进行核对，于是我就动手写了一点。再一想，这件事应该由曾涛和胡绩伟来做（杨西光逝世后，当事人只有他们两个了）。我曾对他们提出建议，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又建设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去专门采访曾、胡两位，他们表示这个建设很好，准备去做。可是他们也忙，还没有来得及去采访曾涛，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下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最近又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之前，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这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该词典删去，“敬爱的周总理”被改为“周恩来”，其余完全一样。很明显《大事记》是《词典》的依据。而在199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党的文献》编辑组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见该书第44页）也是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文字（见该书第165页）。对这些书所写，我曾想，究竟是我对当时发

生的情况“有所不知”，还是他们“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记载，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这个讲话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看了这段文字后，我认为事情有各种可能，也有可能是北京市委在作出决定之前曾经向他汇报过，他同意市委的那些提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有什么明确的表态，否则《北京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不会回避“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那篇报道有一个七行通栏标题：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市人民紧张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对揭批查运动作了部署/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十七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这个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北京日报》——也就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异常的谨慎态度，我认为只有用中央对天

安门事件还没有很鲜明的态度来说明。而鲜明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行动，是曾涛等同志鼓足勇气在11月15日新闻稿和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版面上采取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那就是邓小平11月5日至14日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14日晚才回国，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前几天(11月10日到14日)，邓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在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说，"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的时候开会解决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既然真理标准问题要等小平回国后开会解决，那么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问题也应该等小平回国来讨论吧。因此，对"11月14日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说法我有怀疑。

事情究竟如何，希望党史研究部门进一步研究清楚。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历史务必说得很清楚才好。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还有好几位健在。我希望对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同志和其他我点不出名字的知情人作一点访问。也还可以查一查文献档案，作一番分析。我这一篇也可以算是对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资料。

戴　煌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一

“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80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含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

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但是不管怎样，耀邦总算从“敌我”分界线上救回一位好同志。而且他还针对上述四条处分，来了个四条保护措施——在1958年8月举行的团中央三届三中全会时，当面对张黎群说：“你的‘政治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处分决定不登报；保留党的‘八大’代表资格；不当常委可仍是团中央委员；不是一般的‘下放’干部，而是真正有职有权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到了那里要认

真研究如何改变老根据地的贫穷面貌。这是新担子、重担子啊，务必得挑好！”

张黎群临离北京时特向耀邦告别。耀邦又叮嘱他说：“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你看在延安办轻骑队的许立群，那时有人说他犯了大错误，而今还不是被起用了、重用了？你可千万不要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相！而应该昂首挺胸，回到老区米脂县立新功！”

然而耀邦痛感遗憾的是，他虽然也作了种种努力，结果未能把《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钟沛璋、陈模等同志和团中央其他被扣上“右”帽的同志，从“敌我”线上救回来。但是他对这些同志从不歧视冷落。有人登门求见，只要有空，他都亲切接待。

当这七十多位同志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他又把他们请到团中央二楼会议室，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对于第一点，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而对第二点，却似清泉滔滔地讲了许多。他说在党号召整风时说了几句过头话，并不能表明是反党。《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大学，而且是参加过地下工作、学生运动的优秀分子，或是地方团委及地方青年报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他们都对党深有感情、工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比较活跃。

最后，耀邦对这些同志说：“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耀邦的这番真挚动情的讲话，对这些被推到“敌我”线上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激励，不少人听得直掉泪：“耀邦还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的呀！……”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功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

“反右派”斗争结束，耀邦把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一个一个地请到自己家里或办公室谈心：“你们哪是什么‘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虑而已”；“‘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切不可灰心丧志，自暴自弃。”

他深切关怀的当然不仅仅只是“右派”。

1956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一次扩大会议上，书记处书记项南、梁步庭等同志，强调共青团要充分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并提出了一个包括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的“十点建议”。对这个建议，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和团委，请他们参照执行。

1958年夏，党中央某些同志以检查党的领导为由，先把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打成“反党分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接着又要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们实在抓不住胡耀邦的辫子，就把他曾同意的项南、梁步庭的“十点建议”作为“毒草”来大批特批，连续召开了七十三天的批判会，终于给“十点建议”定了性，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攻击党的领导”，“篡改青年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会议定项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村劳动；梁步庭也受了处分。

其后多少年，耀邦一直为没能保护好这些敢于直言的好同志而深感内疚。他决心要为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

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他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

> 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

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

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

为使这一讲话更有力，杨士杰特地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当然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完全同意杨士杰和中组部其他同志的意见，而另一个特大的新闻单位的记者则认为杨士杰等人是“两面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不过在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论。王泽民、付真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

表示对仍然被“左”的色彩迷花了眼的人们的主张，不能仅仅“保留意见”，而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

接着，在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成员袁任远家里，陈文炜与王泽民碰了面。他们知道许多老同志都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并当即谈妥，由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一个书面反映。陈文炜回到中组部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了烟台会议主要牵头者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员看了这份材料，一再询问中组部送材料的同志：这是杨士杰的个人观点，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送信人回来向陈文炜转述了统战部人员的询问，陈文炜说：“杨士杰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不代表中组部还能代表谁？”但为慎重起见，陈文炜与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夺。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错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也没去青岛、北戴河、大连、哈尔滨等凉快地儿，而就在西单以西三百米的民族饭店，又省时间又省钱。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

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在会上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

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很坦率的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炜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炜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 1978 年 9 月 17 日以当年“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

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有些省市负责人似乎感到太突然，纷纷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探问这是咋回事。胡绩伟一一回答说：专政机关和中央党校的“右派”都平了，别处的“右派”更该平。因此，《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曾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四十五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又有人说：“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一个工业部的政治部，非要把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总工

程师留做“样板”不可。杨士杰闻讯，批评这个政治部的负责人说：“难道你们也想唱一台‘样板戏’?!”

这样，这位总工程师才被解救了出来。

这一次大解救，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

笔者本人，也是在这场大解救中被解救出来的一个。

我是1957年“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后，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座谈会上，着重提出反对“神化和特权”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曾为此发了长篇报道，刊于全国各大报。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时作了转播，港台一些报纸更大肆渲染，台湾新闻界还发了广播，“欢迎”本人到台湾去。

1978年元旦前后，当胡耀邦把抢救“右派”当作重大战略举措即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年整半百的我还是公安部门严管下的一名“二劳改”，在山西太原东南郊狄（仁杰）村附近四周拉满了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飞车猛推烧砖土。

突然，左车轮被一根脱位的车辐条卡住，随着右车轮的继续飞滚，小车把儿向右猛拐而“打”断了我的左肋骨。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断左肋骨。轻轻地说话或咳嗽都钻心地疼。

当然，在从北大荒到北京郊区的四处监狱，从天津唐山间的茶淀劳改农场到山西太原的劳改建筑工程队，这长达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这种痛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压伤过小腿，被木炭窑中的烟火熏得晕死过。在常年饥饿的难友们不时倒毙于田间、路边、工地的时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条裤衩的净重196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92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电锯、斧头、刨刀伤过手指头，血流如注。

正当又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时候，接到北京来信：我的妻

子潘雪媛，终于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厂的一些人对她的长达十几年的株连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能立刻插翅飞越重重关山到北京，飞到她的病床边。但是尽管我身背“右派”恶名，被惩罚了足够培育一代人的漫长岁月，我仍然没能获得这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历史唯物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时尽管天际已经涌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他仍然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场所，去社会就业或回故地养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劳改建筑工程队一些满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着内装面盆饭盒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个并不令人留恋的所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誓不两立的营垒中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待，肯定也为时不远了。

但是，当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毛泽东刚刚离世就把那四只螃蟹烧上铁鏊的时候，空中响彻云宵的吼声仍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既然是毛泽东拍板的“反右派”斗争，当然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啰！于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没法忍受这茫茫黑暗的挤压。因为我的最大“罪过”，只不过是1957年响应党的召唤，说了一些真心话。即使

改“言者无罪”为“有罪”，对我的惩罚也早就过头十万八千里了。因为一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军籍、每月只给二十八元生活费并被发配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当年同是新四军一员的妻子就立即与我划清界线而别，刚会叫第一个单字“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多年染患肺结核一直靠我的济助维持生命的唯一的姐姐，由于济助突然中断，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苏北故土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也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一个年仅二十、又是一名小学代教师的侄儿，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只需人民币二百元动一次并不复杂的手术，就可挽救他的一条命，但是我们一大家子都穷得叮当响，当地政府又不愿为这个“右派”的侄儿而挤出招待上峰吃顿饭的这点儿钱，就看着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会的小镇干部，硬让我的五十开外的二哥戴作霖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没安好心：因为他“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钉。我的二哥说：“门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实在推不过，只得带头喊。“打倒江渭清”的这一句刚出口，这个会议主持人立刻宣布大会要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写好“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强迫他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那细铁丝吊着的大铁牌好几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细铁丝就勒破了脖颈鲜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绝症饮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没能回去为他送别。由于同样的羁绊，我的

老母亲辞世时，我也未能最后见她老人家一面……

这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这种人继续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断，我的第二个妻子身患难治之症的时候。

她比我年轻整整一轮。当我从北大荒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督劳动回到北京的时候，尽管她还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但她认为我并非“坏人”，而甘愿与我苦伴终身。由此她被人称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极端反动”，受尽了人间罕见的磨难。现在她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谁去?!

经说明情由，那个四周圈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一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的管教干事邢凤舞，给我开了绿灯。我回到了北京西单又一顺饭庄后面一座贫民窟小院里：一间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阴冷而潮湿。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着我，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客。两个女孩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旧棉袄，两眼汪汪地直流泪。我早听说，尽管她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只因为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就一直当不了红小兵。诸如此类的绝情悖理之为，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

后来在为解除妻儿苦痛而奔忙时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推托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1978 年 9 月 17 日的“五十五号文件”下发不久，我就得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当面通知：“国庆节后回社上班。”12 月 15 日，上班后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党组（当时称“核心领导

小组”）就批准了国内部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任庄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报告，并召开了相当隆重的平反大会。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在平反大会前，新华社领导就让我以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身份重操旧业，并与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多次谈话，为昭雪“六十一个人”的大冤案广泛搜集写作资料。在平反大会前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自己经手编发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错案的稿件，这是我在漫无尽头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断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着我的妻子床前时，万万未曾料到会这样迅速展现的美好现实。

后来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九百五十三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亲友众多。自我被打成“右派”并被全国各大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后，他们受到株连迫害、歧视，一直抬不起头的多达百人以上。许多“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也许没有这么多人。但仅以十人计，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组织部的有关同志的这场大解救，至少使全国不下六百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

同时还得知这场大解救，并非是胡耀邦们以“下油锅”的精神取得的唯一胜利，而只是一系列胜利的一个，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1978 年 12 月 25 日，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又为迅速解决一直使他深感内疚的项南的不幸遭遇，给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等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野苹同志并干审局、经济局：

我认为 1958—1959 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定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作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两三个同志办一下（也可以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　12 月 25 日

1979 年 3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并指出项南当年为提高共青团的战斗力的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这是一个错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项南即去中共福建省委任第一书记。梁步庭后来也由青海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时，对项、梁往事，耀邦才渐感

宽怀。

在这之前，即1979年2月，团中央在西苑饭店召开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陈模也被邀请到席。在这大半年前，即1978年夏天，为"右派改正"问题争论不休的烟台会议结束之后，陈模曾给耀邦一信，要求帮他平反"右派"冤案。耀邦给他回信说，现在中央五个部对"改正右派"问题的意见尚不一致，你的"右派"平反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他提议暂时先解决重新入党问题，然后再进而谋之。陈模向机关党委表示他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不能只来个重新入党。机关党委说，为了方便工作，这只是个临时变通办法嘛！陈模说那得允许他保留日后要求平反错案的意见。机关党委表示同意，于是党支部一致通过陈模重新入党。第二天，他就被宣布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不久，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

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拉坐下。耀邦进场时，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面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

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

耀邦已进人会议主题正式开讲了，陈模边作笔记边不时地擦眼泪。

单单是对“右”字号人物的关怀与解救，耀邦的这类故事就多了。作家丛维熙也对笔者说过，1978 年烟台会议与民族饭店会议之间，他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曾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反右”落难后的遭遇，并言明他不会很快回到北京；如果耀邦回信，请迳直寄到东四北大街一条小胡同他老母亲的住处。当他数月后回到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室内低于门外地面的陋室时，一封发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并署名“胡耀邦”的回信，已在家中存放多日了。回信似用“6B”粗铅笔，写了满满两张纸。内中说到王蒙等人给他的信也收到了。“你们都受了委屈了，但也都经受了考验和磨练。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我希望并相信你们都会不断写出催人上进的好作品来……”

这回信，成了丛维熙的笔尖源源流出优美亢奋文字的重大加速力。

二

1979 年 6 月，因中纪委第三次常委扩大会的一篇送审新闻稿，耀邦要我到他家去面谈如何修改，我没有向他当面表达我和我的全家及所有亲友的感激之情。对于“唯大英雄能本色”的人，他们之所以广及人间正义、恢复人间正义、解除人间苦难、振兴人间正业，不论遭遇何等风险或已经付出了惨重牺牲，难道就是

为了让受惠者去道一声谢么？

“文革”磨难

不少“老共青”都知道，在“史无前例”的岁月，耀邦也再一次经过了磨难——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

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浆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干，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

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濛，雨声淅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砺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汀、《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

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帮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1 年冬天，干校里查“五·一六”分子，一位年轻人也被怀疑审查，他去向耀邦诉委屈。耀邦安慰他说，年轻人也要学会坐冷板凳，切不要泄气，也不怕坐牢杀头。“古人说过，‘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这是南朝齐文学家孔稚圭说的。我们干革命，就应该有这个大肚量。”

耀邦见这位年轻人似乎听不懂自己随口引出的《后汉书》上的这段话，立即铺开一小张纸，行笔流畅地给他写了下来，后面还加上“孔稚圭”三字。这位年轻人把它视为珍宝地收藏起来，心境渐渐开朗，不久“五·一六”问题也雪化冰消。

1972 年 4 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1972 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1974 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 8 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 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1957 年 3 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

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瞭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耀邦认为知识分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1976年10月6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

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第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贴贴，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接着说：

>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传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1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三个版本，在个别词语的运用上虽然略有差异，但其中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若以二三两个版本为准，那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

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这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在第三个版本出来之前的 1977 年 2 月 18 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忧，对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找耀邦谈了话，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 3 月 10 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两个凡是”之后，3 月 12 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耀邦谈了话，耀邦在 3 月 14 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 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

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要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线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不得理，不得不诉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

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提前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 年 8 月 18 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

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 年 10 月 7 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

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同"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一个自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的人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的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振振有词地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在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处理时有材料依据，不要再费事"；"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

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选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年 5 月版）

魏新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前后后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然而，一度沉浸于欢乐之中的人们不久便发现还不能笑得太舒畅，因为那场未放一枪一弹就使“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漂亮行动并没有给“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划上一个句号。

如果说1977年到1978年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思想政治方面的大讨论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光明日报》则充当了正式引发这场讨论的“导火索”的角色。

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了。

1978年11月末，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位与会者发言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言立即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真理

标准问题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华国锋亮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邓小平则举起了实事求是的大旗

1976年10月6日，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这几个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标志着陷中国于10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华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了1949年金秋10月曾经有过的喜庆场面。然而，一度沉浸于欢乐中的人们不久便发现还不能笑得太舒畅，因为那场未放一枪一弹就使"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漂亮行动并没有给"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划上一个句号。相反，"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还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并在党内外仍保有不可小视的市场。党和共和国面临着坚持、维护"左"倾错误的势力和要求纠正错误、回到正确道路的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斗争。

在举国欢庆胜利、揭批"四人帮"之际，先是部分较早觉醒的有识之士、而后是越来越多的各界群众强烈要求进行拨乱反正，这种要求在政治方面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实际上，这两个要求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反映了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显然，这些问题不是仅仅揭批"四人帮"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到在当时还颇为敏感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问题，牵扯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是摆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面前的严重挑战。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步调一致的领导人在认识和处理上述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及其他几位领导人容许、鼓励人们揭批“四人帮”，但不容许人们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1976年10月下旬，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上，华国锋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年之际，中华大地上再次出现了花圈、诗词和标语。它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也反映着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然而，当时中央某些负责人的态度却与此格格不入。当时《人民日报》就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时，汪规定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泽东审查过的。与此同时，当《红旗》杂志就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请示时，汪东兴批示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理由是“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

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引起了华国锋的注意，但他却背离了人民的愿望。1月下旬，在按他的意图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持制止，不能容忍。”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之一李鑫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的矛头是对着谁呀？要写社论把人们的注意力扭转过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当天

的《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4号宋体字，加框刊出。同日，首都其他报纸和全国其他报纸随即也以同样的规格转载。这篇社论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针对性极强地表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它以在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形式出现，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事实上，它与华国锋等人此前的思想一脉相承，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对待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以至整个安邦治国的态度和方针：一切都不能容许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党和共和国还要按照以前的路线继续走下去！

这里有必要说明，这篇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这3个单位的负责人未与闻其事，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部也不甚明了。当时的宣传部负责人耿飙事先就毫不知情，并曾反对发表。实际上，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修改、汪东兴拍板的。

1977年3月，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14日，华国锋发表讲话。在谈到当时的思想政治动向时，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其中谈到邓小平同志问题时，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他却解

释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他还说，对邓小平同志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他认为，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说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国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在讲话中首先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并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接着又说，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他认为，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告诫大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的上述讲话表明，在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他虽然已经有了松动，即认为邓小平有功有过，适当时候要出来

工作；绝大多数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其根本态度没有变化，仍认为批邓是必要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在讲话中，他重申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两次表示并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说明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的。

与华国锋等人的态度相反，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人民群众关于拨乱反正的要求，对为进行这项工作设置障碍的“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斗争。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尽管华国锋一开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但并未奏效。13日，陈云在发言中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同时提出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王震的发言更为尖锐：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他们的斗争，得到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实际上揭开了中央内部拨乱反正的序幕。

邓小平，这位在中共党史上几落几起、不屈不挠的政治家，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在“两个凡是”的方针盛行一时，老一辈革命家及觉悟群众的正义呼声受到压制时，邓小平又一次挺身而出，并且以其特有的敏锐和坦率直指问题的要害。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

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5月3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实际上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5月24日，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直率而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这年的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领导职务。这无疑是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邓小平认为，要彻底从思想理论上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在

这次全会的闭幕词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着重谈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党的学说的问题，强调，"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号召一定要把这些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起来，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提出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践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中，通过论述我们党同张国焘和"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永远对党忠诚老实"。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他总结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说明"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

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老一辈革命家在是“两个凡是”还是实事求是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同时，还推动着一系列局部和具体问题的拨乱反正，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都不同程度地动摇着“两个凡是”的基础，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市场。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其中包括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需要有一个过程等因素，尽管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局部性进展，但围绕这些问题的矛盾和斗争仍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在一些问题上还占有优势。

当邓小平提出“准确地、完整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时，汪东兴、李鑫认为这和“两个凡是”的精神不一致，要求修改。

在 1977 年 9 月 3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的发言由于触犯了“两个凡是”，被拒绝在会议的简报上刊登。

1977 年 7 月 1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虽然在组织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两个凡是”的方针还是华国锋等讲话的主调。

1977 年 8 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却认为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报告虽然对“四人帮”的不少谬论和倒行逆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但却仍然坚持并且阐发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观点；报告仍然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这些错误虽然只代表了小部分人的观点，但却以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形式昭告党内外，说明在党中央高层占据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历史就是这样在徘徊中前进。由于受“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拨乱反正工作虽然取得了局部性进展，但仍然面临着根本性的阻力，难以深入下去；在“文革”中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旋而又掀起一次跃进的热潮，开始步入建国以来又一次大起大落的旧辙。历史越来越明确地提醒人们，党和共和国要从根本上走出“文化大革命”，跨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就必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正确而深刻的反思。要摆脱“左”的思维方式，走出“两个凡是”的藩篱。

历史的发展也为问题的解决创造着条件。邓小平的复出和老干部的陆续解放从组织上增强了党的正确领导的力量，使其开始与“凡是”方针相抗衡，人民群众可以公开听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声音了；拨正反正工作的进展及遇到的阻力都在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思索和觉醒。在这个思索和觉醒的过程中，理论界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事实上，人们已日益接近问题的核心和实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张成的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文章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文章还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

应该说，这篇评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本质。它虽然只有1000余字，发表的位置也不突出，被安排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尚没有引起轰动性的反应。即便如此，《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收到了20多封群众来信，其中多数来自基层的干部和群众。这一切至少说明，中央高层的争论和斗争已经开始引起理论界和部分群众的关注和参与。无疑，这个势头正越来越强。

矛盾的蕴育和发展必然导致矛盾的爆发和解决。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共和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了

如果说1977年到1978年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思想政治方面的大讨论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光明日报》。则充当了正式引发这场讨论的“导火索”的角色。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不长，只有7000字，却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争论。

实际上，这篇文章在前一日，即5月10日已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因此，交代它的由来还需首先从坐落在北京西北郊那所中共中央的最高学府说起。

1977年冬，1000多名在中央党校学校的中、高级干部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的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在当时视为“难题”的问题。主持中央学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认为，对此应该研究讨论。他明确提出了研究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这所庄严的马克思主义殿堂出现了气氛活跃、思想开放的局面，并创办了一份《理论动态》作为学习、交流的园地。根据学习、讨论的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酝酿着就真理的检验标准等问题撰写文章，进行宣传。

几乎是与此同时，或者更早一些，1977年10月，《光明日报》收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两篇来稿。这是此前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光明日报》的约稿。其中一篇是批判江青的，一篇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选中了后一篇，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加工，寄

还作者同意后，准备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

1978年4月初，这篇文章的大样被送到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手中审定。这位新任总编辑刚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他深切感受到了中央党校的活跃气氛，也知道党校理论研究室正在酝酿准备的文章。面对手中的大样，他敏锐地感到了真理标准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政治界的分量，于是决定，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然后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

修改的主要要求和目的是增强现实针对性。恰在这时，原作者胡福明来北京参加理论讨论会，报社便请他和中央学校理论研究室一起讨论修改问题，并由胡福明亲笔写出了又一次修改稿。这个稿子经报社编辑两次加工后，又送到中央学校理论研究室再加修改、润色。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十易其稿、历时七个月，始成定稿。这个过程正如胡福明后来所说，"当初写文章时是我个人的行动，但是文章以后的修改、发表，就不再是我个人的行动了。当时有一系列的同志出了力，还有相当一批同志在互相沟通。这是集体的努力，有组织的行动。"①

经过胡耀邦的亲自审定，这篇文章于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光明日报》于次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并用有力的事实说明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说明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联系到当时思想政治领域内的情况，文章强调指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

① 1998年5月13日《光明日报》。

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接着说：“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敢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历史已经多次表明，在有些时候，一个观点、一篇文章、一件事情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有什么惊人的新东西，而在于它提出、发表、发生的环境和时机，在于它对现实生活的作用和冲击。人们发现《光明日报》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以下简称《实》文），其基本内容不过是复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有些还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发表，其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针对性却是再明显不过了。因此，它立即在党内外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了人们和各界的不同反响。一场时代的大讨论就这样展开了。

《实》文首先引来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反感和责难。

5 月 12 日，即《人民日报》转载《实》文的当天，《人民日报》的一个负责人便收到了一个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

误”的电话。次日，新华社负责人也收到了一个指责新华社转发《实》文的电话。

数日之后，5月17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实》文和《人民日报》5月5日发表的《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说这两篇文章他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5月1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大家对《实》文“议论纷纷，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对《实》文和其他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对胡耀邦则点名批评，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特别说到，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认为，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受他们的影响，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对这场讨论长时间保持沉默。当然，沉默也是一种表态。当该刊负责人反映《红旗》的态度正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责难时，汪东兴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当《实》文受到责难、讨论受到压制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则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

5月30日，在同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批评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尔后，在同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7月21日，邓小平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

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9 月 16 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迫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 85 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文章送到，编辑们发现，文章除了回忆历史外，还讲了现实，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这显然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而作者又不愿删改，只好报送中央常委裁决。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在批语中对《红旗》提出了批评。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该登，不登《红旗》太被动，《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当中央高层围绕《实》文的发表及其讨论开展斗争的时候，中

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并没有坐等观望。他们从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支持中受到鼓舞，顶住来自“两个凡是”派的种种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实》文及此前《人民日报》“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发表以后，多数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同志对实践是否是“唯一标准”的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在当时是一个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针对这种状况，应《人民日报》的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于6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专门对上述疑问给予答复。该文认为，主张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作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一些同志的另一种混淆，是“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指针，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讲，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是承认理论认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承认这种反作用，决不能否认实践所起的根本的决定作用，不能用这种反作用来代替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

面对有些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种种责难，理论工作者不是避之躲之，而是勇敢地迎战，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和反驳。其中比较系统、比较尖锐、比较泼辣的是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长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有力的历

史事实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关系，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混乱，并针对当时的实际和对实践标准的种种责难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判。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某些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合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迫害。”针对有些同志发出的若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的责难，文章写道，“对于说这种胡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需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这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说理充分，针对性极强，有人称它是《实》文的姐妹篇。它是在胡耀邦及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关心、支持下产生并发表的。文章成稿后，《解放军报》社曾送请罗瑞卿阅，罗瑞卿先后细看了3遍，亲自打了5次电话，并亲自查阅有关著作，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要求文章无懈可击。这位由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高位截肢的将军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还特地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50大板”。① 对不久便辞世的这位将军来说，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心和支持，是他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

---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88年5月7日。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一个更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但是，当这场讨论开始后，自然科学家们还是感受到了它的实质及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分量，便旗帜鲜明地投入进来。早在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有关文章，并作出决定：支持这场讨论。7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面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罗伟、朱洪元、何祚庥、汪容、吴汝康、徐联仓、李宝恒、赵功民、于光远、吴江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作了发言。科学家们用自然科学史上的大量事例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在实验中得到证实的。他们提供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据对于这场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发挥了特殊的支持作用，7月5日至21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了有全国506个单位共1500多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的全国的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真理标准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大家认为，这场讨论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意义十分重大。

7月17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国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研究机关、新闻单位的部分理论工作者160多人举行讨论会，探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首先讲话。针对当时的一些不正常情况，邓力群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表，而且允许保留。要造成一种风气，不要随便把一个人搞臭。打棍子的人，并不是自己有什么高明，只是表明他没有道理来说服人，只能用棍子、帽子来压服人。这些同志连起码的理论知识都没有，没有起码的调查研究。批评一篇文章，也没有通篇看一看，通篇考虑，而是抓住句

把话，加上主观臆测，对这样的同志不用怕。他指出，今后的理论研究应该面对今天新的问题，因为新的问题太多了，这需要经过今后新的历史实践的检验，才能看得更清楚。在7月24日的闭幕式上，周扬以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讲话。他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强调科学没有禁区。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讨论会上，冯定、王耕今、马沛文、汪子嵩、胡福明、李秀林、林京耀等作了发言，联系实际，充分肯定了这场讨论的现实意义。这次讨论会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的高潮之一，它使这场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更广泛展开。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始终走在前面，发挥着先锋和引导的作用。根据讨论开展的情况及出现的主要思想问题，它们总是给予积极的、富于说服力的战斗性的分析和回答。9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精神对待各种新情况，推动历史的发展。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有人所说实践标准问题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出这种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是对坚持真理的同志乱扣帽子，是根本站不住脚的”。9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强调“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看实践；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看待

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总之，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总结了在“天才论”问题上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指出“天才论”早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障碍，扫除它已经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有人认为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妨碍高举，“那就只能说明：他这种‘高举’，并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是不怕实践检验，不怕批评的”。此外，这两家报纸还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署名文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此后，随着讨论的继续，文章也还在陆续发表。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在这场热潮中，有一种现象尤其引人注目，这就是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全国大多数的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大军区领导机构都相继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省委及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撰文或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高度评价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省、市及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高度关注、主动作出鲜明的表态，并见诸报端，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它却又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的。他们的发言一般都联系当时全国及本地区的实际，不但指出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更强调其政治意义。这至少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确实成为全党全军

和全国人民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表明实践标准的正确观点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和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的有力支持，权力标准、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在中央领导层中围绕真理标准讨论的争论和斗争处于某种程度的僵持状态时，他们的表态无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于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种种原因，中共中央领导层围绕“两个凡是”及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天平已开始向正确力量一边倾斜。这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和按劳分配问题，认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两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华国锋也同意这种看法，汪东兴没有表示异议；11月14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在那场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邓小平重新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这说明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群众提出的最迫切的两大要求已基本得到实现。这无疑标志着在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和斗争中正确力量日益占据优势，僵局已经打破。

然而，事件并没有就此了结，作为这场讨论和争论的最后一个回合，从而使其结局最终明朗化的，是发生在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场斗争。

最后的斗争不仅使人民赢得了这场争论，更重要的是通过它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工会会议。原订议题是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前夕，中央政

治局又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首先讨论从 1979 年 1 月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会议的中心思想。但是，会议开始后，与会代表提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特别是 11 月 12 日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应给予考虑和决定的 6 个问题后，会议的气氛更加活跃。其中也涉及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则是在 11 月 27 日之后。

11 月 27 日，党内一位同志在发言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说讨论是有益的，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来，到 11 月下旬，会议的讨论议题已逐步转入经济问题，但这篇发言又把与会人员的注意力拉回到政治问题上。发言登上简报后，立即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真理标准问题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这对似乎已近尾声的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又发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它将真理标准问题集中地提到了与会的 200 名中共高级干部的面前，使此前对这场讨论曾予以关注及还未曾重视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及中央、国务院的部门负责人又一次交流和探讨这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对实践标准的观点及其讨论给予坚决支持，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提出尖锐批评。这种情况一方面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结局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也使这场讨论的影响和作用更为深刻和广泛。

其二，在与会人员的要求下，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一些情况，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的同志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这说明围绕着“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将近两年的争论，以正确观点和正确力量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一段落。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其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这样的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随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刚刚结束时党的领袖及那次历史性的会议对它的评价。这个时候，如果说对于这场讨论本身来说已经产生了一个结局——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局的话，那么，对于这场讨论对执政党和共和国历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言，则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是个意义深远的开端。从此以后，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选自《解冻年代》，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版）

凌志军

农村改革第一步

公元 1978 年 12 月，中国旧历为戊午年冬月，也是北风南云犬牙交错的时节。北京城内，气候有些反常，风云雪雾间，忽冷忽暖。败叶枯枝，寒霜相逼，落满街头。

但是，这一点冷暖对于北京人来说，却是无关痛痒。京城一向为政治的中心，虽普通百姓也已惯睹政坛风云。当月国事频频，早把人们的心绪吸引去了多半。略去街头巷尾里种种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不论，只就官方发布的消息，也足令举国震动。12 月 16 日，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于各自的首都宣布中美建交，语惊世界。两天以后，中国共产党 169 名中央委员和 112 名候补中央委员聚会人民大会堂中，这便是后来被全中国认定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前后不过一旬时间，震撼人心的事件重重叠叠，接踵而来：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凡是派”的退却告一段落。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昭雪，在一轮激烈的争论之后，终于达成一致，这消息由本次事件的落难者邓小平出面宣布，更使全部经过极富戏剧色彩。12 月 24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和陶铸召开追悼会，以示平反。随后，广播里面宣布以薄一波为首的 61 个叛徒不再是叛徒。然而还有更为惊人的消息从中南海里传出来，十年前沦为中国最大的坏蛋、被开除出共产党又死于非命

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沉冤将洗，其魂灵也将重回共产党人的行列中。

至此，“文革”的赫赫战果已去大半，而官方的报纸在本月一连四次刊出毛泽东的书信文稿，其频繁的程度，即使在几年前以最高指示定天下的时候也不多见。这可能是借其八十五周年诞辰之机昭告世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今天依然如故，以求得在继承与纠正之间的某种平衡。

总之，在史学家眼里，即使没有忽晴忽阴的气候，1978 年 12 月也实在是风起云涌的一个月。

大事不暇应接，小事便为人们忽视。这些小事发生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又是由若干小人物一手造成，表面上看来系一时一地的末枝细节，不足为史家赘述，但是我们叙述的这一段历史，不妨由这里开始。因为这在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当中，乃是要点所在。它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若干大事的结局，也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掀起的更大波澜的源头。承前启后，因果相连，其对当代历史的影响，决不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以下。

这一月某日，北方的冷风和乌云席卷南下，笼罩了江淮腹地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当地人把它叫作小岗。

天气虽还不算酷寒，农事却早已停止。照老辈的习俗，此时乡下该是闭户居家的时节，只待来年冰融雪化，方能开始新的一轮耕作。然而当日傍晚时分，小村忽然蠢蠢而动，男女老少，仨俩相继，分赴村西。这些人多为严姓，具有血缘与亲缘的双重关联，依中国人的传统，既属一脉同宗，平时相逢便总会问寒问饥，说些家长里短。可是今日相顾却都无言，只默默并肩而去。

小岗处皖东淮水南岸，在地域上属凤阳县，距首都北京两千多华里，距安徽省的省城合肥也有数百里。中国从古到今历代的版图之上，从未有过它的名字。在以交通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汉文

化的历史中，它的被冷落并不奇怪。小岗实在太小，在 1978 年 12 月，只有 18 户农家，110 口人。然而它被遗忘的原因，除了因地域的遥远和偏狭所造成的文化上的隔离，更由于在我们庞大的乡土社会里，像这样的村庄至少有五百万之众，倘若中枢政要一一给以关注，在技术上实在难以操作，何况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眼光看来，这也确实是大可忽略的区区小节。

但是，对于小岗的农民来说，其利害关系全然是另一回事。北京发生的变故他们根本不曾与闻，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种种荣辱沉浮，地覆天翻，毕竟都是上面的事，离他们的饥寒是那么地遥远。眼前这个小村里的酝酿，才是事关自己生死命运的大计。

18 户人家的主持者悄然聚于一间茅屋里面。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层的一个集体，叫作生产队，共同拥有 517 亩耕地和十头牛。队长严俊昌在当村严姓居民中有着类于家长的位置，又具有秉公处置家族冲突和邻里纠纷的品质，虽不认字，却有相当的威严。另一个名叫严宏昌的年轻人，为严俊昌的堂弟，也是村民中唯一读过中学、识得几个字的人，所以在几天前被众人推举为副队长。此人大耳大嘴，高颧高鼻，其面相与他的那位同乡，也即六百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眼下，严氏兄弟望着治下这一群贫下中农，破衣烂袄，饥肠辘辘，一个个全是穷途末路的模样，凭着一点点的知识和直觉，他们对这个集体已经信心全无。二十二年前，也即五十年代初期，这个集体尚未成立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那时小村也穷，但还不至穷到用勒紧裤腰带的办法来忍饥挨饿。严氏兄弟永远记得，那是他们的村子最兴旺的时候。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惨惨凄凄，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麸、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175 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

蒿棘丛生，39 个人和一头牛。严宏昌劫后余生，竟然还能读几年书，只不过，惊魂依旧难定，而且越读越惊。这个农民用他所学到的最简单的加减法即可计算出，20 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岗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则由 500 公斤减至 50 公斤。

即使凭着简单的直觉，严氏兄弟也可以对党的干部们把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表示怀疑：就算“老天爷”连年地故意刁难，何以自从人民公社的大旗在小岗招展起来，这块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就从没有让人吃饱过肚子?!

政府每年尽其行政的手段赈济饥民，力使“三年悲剧”不至再现。但逢救济粮到，干部三吆四喝，社员端盆举碗，一致地翘首引颈，其情景犹如旧时豪门的开仓放粮，令他们经久不会忘记。所不同者，豪门放赈在于市恩养威，所以总归大喊大叫。今天党的干部则口口声声带领农民走过“社会主义桥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天堂”里面食不果腹不能算作光彩。因之，无论运来多少粮款，总是不肯声张。直到 1979 年底，也即对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绪已在中国大部地区公开弥漫起来的时候，小岗的上级凤阳县委才敢于公布这本账目：1966 年到 1978 年，总计 156 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 87 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去救济粮 114000 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钱 15000 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

即使如此，仍是不足为济。

每临秋冬时节，小村家家闭门堵户，老幼相携，往他乡乞讨。农家人沦为乞丐，在讲究名节的汉民族中，原是羞于见人的事，无奈生活所迫，且年复一年，人们渐以为常，凡能行走者大半离家行乞，竟至成群结队，步履遍及淮北江南。

到了 1978 年的 12 月，在外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一位女高音在村子边上高高挑起的大喇叭里，用轻快

的调子唱道：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壮瓜越大，
藤儿越壮瓜越大。
……

姑娘不知疲倦地唱了十几年，严氏兄弟及其家乡父老最初听到这首歌时的激动却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即使再愚昧也会发现，说公社是一根把大家连在一起的“藤”，倒不是骗人的，可是，作为公社的社员，他们似乎永远也不会成为甜蜜的“瓜”，而只不过是一个乞丐。以今日衡当初，究竟是公社养活了小岗，还是公社剥夺了小岗？

实际上，对于这群叫花子来说，诸如此类的疑问还过于深奥难测，这要留待他们吃饱肚子之后才有余力来回答。在当日他们所想的至为简单，那便是不再做一个叫花子而能自己养活自己。

既然求生的本能在公社的制度里面已经无法实现，严宏昌们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在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一间委委琐琐的茅草屋里之前，这办法已经了然于各自胸中，彼此心照。唯因这四个字在社会主义中国已被归入“另册”。十六年前，也就是1962年，毛泽东宣布这是导致中国分化为贫富两极，以至最终必会资本主义复辟的行为，并且由此演绎出那个著名的诊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若再打开这本“另册”，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举。

所以，在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对“包产到户”这几个

字，只是在“敢”与“不敢”之间徘徊斟酌，直到天明，终于痛下决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这时严氏兄弟已义无反顾，只是他们的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盘算。以其浅薄的政治经历，他们已经懂得在中国处世的第一精义。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具有怎样的个人动机，总要身着大义凛然的服饰，且将利益的动机翻译为意识形态的豪言，诸如“为党”、“为国”、“为民族”、为集体”、“为主义”云云，方能过关斩将，逢凶化吉。更何况若干年来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败，总数可以百万计，其下场的悲惨，严氏兄弟虽然不能尽知，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于非命，这二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发，种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即使不会酷烈到诛灭九族，他们和他们未成年的儿女也是断断脱不了干系的。

考虑到这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严宏昌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以他的拙朴的笔法写道：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干部肯以性命相搏来为百姓出头，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可算是难得的勇气。今天我们看上去，严氏兄弟在这里无疑已经集中了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但是，这几行字里面还是透着一种天真的悲壮。就其形式而言，它显然并不如后来舆论的评说是一份合同，至多只能算作一份农民的简单的契约，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杀头的一步，纵使严宏昌真的能够慨然赴死，其手下这些既无政治权利又无生活

保障的人们，难道就真有力量把他们的后代庇护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吗？

乞丐只求眼前一条活路，并不细想以后的事。所以严宏昌们一一具名，庄严承诺。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甚而成为人民公社大厦的最后瓦解、国家由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加速分化的催化剂。

今天，当我们准备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必须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来的顺序，这些名字如下：

>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十七个指印，三方图章①。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二十个人郑重其事，相约守密，绝不让外人知晓此事，其情景犹如旧时走投无路的饥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为盟。

---

①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物都认定，此合同书上有十八个人的签名和十八个指印。但是依据原件，签名者为二十人，另有十七个指印和三方印章。此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1993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大写意》一书中提到小岗这一晚签署的“保证书”。作者李超贵亦说此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但他的关于几个细节表述，与博物馆所存实物有出入。其一是时间，李超贵认定为1978年11月24日。其二为签章，李超贵列举人名为十八个，并且认定为十八个手印。

直到六年以后，也即1983年，人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纸文书。它最先出现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这时包产到户已势如破竹地横扫全国，史家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它的源头，于是纷纷地奔赴小岗。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张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终于发现，小岗的文书已被电影制片厂一个叫王影东的人带回北京。再经一年的辗转曲折，张终于无偿地把文书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官方收藏。叫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竟是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件。“嗨！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不看，偏偏都来找这张纸”，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个上午，她为了来访者已三次入库开柜取出那张纸。

无数人登门争相一睹的只是几行稚拙的方块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红色的手印。这一切似乎成了小岗革命的物证。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很多熟知小岗事变过程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声称，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纸文书。当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为小岗的上级领导，无疑是决定小岗命运的关键人物。自1978年之后，陈多次往返于小岗，自以为深知这个小村的一切秘密，但是那纸“合同”于电影上出现之前，他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许当初的小岗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合同”，而现在的文书只是后来某一时间的补充。这种假设甚至暗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小岗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所出现的种种情节，只不过是某位一心邀功请爵的地方官员，或是哗众取宠的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中国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起落变幻，对于政治风云中的种种微妙多已了然于胸，对无中生有或者蓄意升华的榜样与英雄也习以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来检举小岗作弊，外人决不至于感到奇怪。

世人的争论在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物是否为伪作？

如系伪作，则是否有过真品？

此物今天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藏品号为GB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顺，有错字，无标点，既无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书的书写之规，系出农民之手无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头处即注明日期为“1978年12月”，既然这个日子在书写者的心里如此重要，何以只有年月而无日？其二是所有签名均为一人所具，笔迹与文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向无恪守阳历日月的习惯，且这样一群人大都不识文墨而需由人代笔，所以，这两处的疑点仍不足成为此件系伪作的证据，只要指印和图章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为真。

最大的疑点发生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纸大小相当十六开，全白，四围无缺无絮，整版无一丝皱折。依据博物馆文物登记卡的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假如此录无误，则这张纸在一群叫花子的手里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农家的生活习性一向散漫无矩，尤对文字本章之事极不经心。这张纸在这群农民手里历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实令人难以置信。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以功进升，又由远吏而为近臣，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还会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这是后来人们对这纸“合同”提出的全部疑点，但这些疑点并没有人去加以追究，这导致人们的认识趋向并不一致的两极。一方面，在所有谈及小岗的公开出版物中，人们照例认定这“合同”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改革的开端。即使了解真相者如王郁昭也会在他撰写的涉及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本书中，以“十八个鲜红的手印”作题，用作全书引言。他用一种随它去罢的口吻说道：“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地承认这合同是真，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私下已经认定“GB54563”为伪作，由此而及其他，任何提及小岗的文章书籍都蒙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

但是，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断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小岗确曾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契约。张在当时为新华社驻安徽的记者。小岗的那个夜晚之后，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外人，时为1979年初，小岗的分田到户仍在保密之中，但张终于听说公社社员私下里按手印背叛了公社的事。尽管他对这个举动抱以同情之心，这消息在当时还是令他极为吃惊，以至十三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坚称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同”为后来的补充，在当时肯定也有过一份类似的契约，因为他在1979年初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听说了此事。可惜他不曾真的看到他认为肯定有的那一份契约。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重名而轻实，形式的价值常常重于内容的价值。这一点总是使人忽视了对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不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纸契约是否为当时所出，既然能够断定小岗在1978年12月的这个晚上确实采取了如契约内容的行动，便已经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小岗。到目前为止，所有去过小岗的官员、学者、记者、作家，都对此坚信不疑。根据他们提出的理由，假如小岗事件只是后来人杜撰出来，以满足某种需要，它又怎能在当时即掀起轩然大波，而这些人虽然没有在那个夜晚涉足严家，却十之八九都经历了由此引发出来并且势震全国的种种变故。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小岗的那个夜晚中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力，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力，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日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第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力。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

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五十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土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意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78 年 12 月小岗蠢蠢欲动之时，华国锋在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已有两年零两个月，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忠诚的确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在取得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人民展示了一张纸条上，上面是毛泽东用歪歪斜斜的笔划写的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显然是以此证明他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意味着他将坚持毛主席的过去方针，决不允许有任何背叛行动。

此刻，中国的党政要员全在他的眼皮底下。在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这些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心里想的全是圈土地办工厂、与左邻右舍比规模、争速度。那时候，党的高层领导的首要话题，

仍然是重新估计党的农村方针。小岗的事变尚未传到北京，但很难说华国锋对农村中日愈增长起来的消极情绪不曾与闻。他出身乡下，如今即使为党中央主席，仍能忙里抽闲地走东访西。北京的上流社会里流传的一则消息说，华国锋在一次乡间走访中偶遇一老农。那老农正在插秧，却又只顾与人说笑，一副爱干不干的样子。主席问他何以不肯认真地干活。老头儿说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话来：

插秧插秧，为谁插秧——
第一砘秧，插给大队书记；
第二砘秧，插给公社书记；
第三砘秧，插给县委书记；
第四砘秧，插给地委书记；
第五砘秧，插给省委书记；
第六砘秧，插给工人老大哥；
第七砘秧，插给亲人解放军；
……
第十三砘秧，这才是给我自己插的。

老头儿当然不知道面前这位憨态可掬的人竟是党中央的新任主席，否则他决不可能将心中之怨如此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事实上，华国锋的视察大半被一群报喜不报忧的地方官员所包围，对真正的民情则无从洞悉。但据说这个“十三砘秧”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屡屡提及此事，这证明他已经看到农村中弥漫着的消极气氛。

省委书记万里进京与他面见的种种情节，也必定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华国锋还记得万里当时痛陈农民的贫困与绝望，并且认定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

局。万里的为民请命，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理由：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失去农民的信任，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也无法重建农民的热情和农业的前途。事实上华国锋所见到的事实，与万里所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华国锋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他认定人民公社的精神必须彻底地灌入农民心中，方能振兴农村。

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党的高级领导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时为 1978 年秋季。冲突之一方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另一方是党中央的主席。根据万里后来对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回忆，他并不是势孤力单的，在党的最上层里有着一种力量在支持他。当华、万二人发生明显的分歧时，在场者至少还有邓小平和叶剑英二人。邓小平重申了他的曾被毛泽东批判过的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叶剑英则较为和缓地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这等于是合二人之力，含蓄地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当时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治下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万里所辖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一个兴风作浪的小岗。

1976 年 12 月，也即“小岗事件”之夜的两年前，华国锋着手为中国农村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的舞台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其序曲是按照二十多年屡试不爽的办法——意识形态之战——展开的。

会议在这一年 12 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 1976 年 10 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他本人则在适当的时机出面肯定报告的内容。这不仅因为今天他已位及至尊，照传统的为政之道当超然于第一线的角逐，而

且更由于有关华国锋的种种颂扬与溢美，以及他与江青的种种仇隙与争执，如果由其本人亲口陈述，显然还有若干技术上的细节难以处理。从华国锋的心理上来说，他召到北京来的这五千位代表，包括了二十九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五百多个地委书记，以及两千多个县委书记。这些人构成了八亿农民之上几乎全部的领导力量，足可左右农村之局面。而他在刚刚完成权力的转换之后，对于自己驾驭局势的威信显然还不具有充分的信心，因之更需有人为他代言，以试群情。

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①

他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在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其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我们后面还要更多地涉及。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

---

① 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令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激起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具有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陈永贵肯定相信他的大寨具有这样的神通，他不正是从这个小村走出来的吗？他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以云、贵、川、闽、浙、赣六省为例，述说那里由于“四人帮”的阻止而令学大寨的运动夭折，以至贫下中农受气，阶级敌人高兴。这六省在中国由东南到西南占据了五分之一的版图，如此广大的地区发生了问题，可见事关重大。所以，陈便以一敌一地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也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等于是为今后的农村工作方针定下了主调。

按照华国锋对七亿农民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筹划“包产到户”，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华国锋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战争”细致地分为四个

战役，并且计划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胜利①。不过，他此时没有想到，随着江青和她的同党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争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间也只剩下一种厌恶，不会再有崇高的激情。他更不会料到，两个月后他发明的“两个凡是”，在新政权中间引起第一次重大分裂，使眼前这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实际进程与设计之间，形成极大差异。这是后话。现在，华国锋的动员立竿见影，五千名代表连夜学习，连夜批判，把北京大大小小的宾馆里糊满了大字报。中共最有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它的版面上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气象：

> 怒火，在代表们心里熊熊燃烧！
> 仇恨，在代表们胸中翻滚激荡！
> 来自祖国各地的五千名代表，
> 同仇敌忾上战场，
> 万炮齐轰“四人帮”。

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指斥与声讨，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气氛，而于理性的判断则要大打折扣。但对华国锋来说，仅仅有这些也就够了。不过，事情还是出了一点麻烦。经过二十年政治上的划线站队，中国人的心态已如条件反射，每有风吹草动，先自分开阵营。这时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帮”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台之后，由毛泽东率领的对林彪的批判。当日对于林彪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曾经众说纷纭了好大一阵，不得不由毛泽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毛泽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林彪形“左”而实右，是极右。仅仅这一句话便将左派林彪赶出了

① 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左派的阵营。现在，同样的命运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泽东逝世已有三月，事情只能由华国锋来作了结。这一来，便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华说道：

> “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①

看得出来，华国锋对江青的判断是继承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判断，但他的表述显然不具有毛泽东那样的简洁与自信。为了支持他的结论，他提出的证据冗长而笼统。他实际上是在述说中国若干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包括周恩来这一代开国元勋；包括依然权力在握的和失去权力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包括工人和农民；包括青年；包括军队；包括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华国锋希望中国所有的人，都能和他站在一起来痛恨“四人帮”，这无论从心态还是从策略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图画之黑暗，与过去几十年党在人民中间极力渲染的光明成了鲜明的对照。党中央主席有勇气承认这样的事实，令人惊讶。华国锋的错误不在这里，可是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四人帮”，并且作出“右得不能再右”的结论，则令人生疑。他把毛泽东列入受迫害者的队伍，显然是想把毛泽东的夫人排除出毛泽东的体系之外。既然毛泽东是左派，江青们是一定要成为右派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敌人。这样的推理固然可以成立，但它在日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又出乎“英明领袖”的意料之外。

现在，面对五千领导者和他们背后的亿万农民，陈永贵尽其

---

① 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所能为华国锋的逻辑提供注释，不过，显然并不成功。他对着听众陈述了“四人帮”反对大寨，反对华主席，也反对毛主席的罪行。所列虽然详尽，却有些琐碎。平心而论，江青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确已势同水火，但是若说江青一贯反对大寨，实难令人信服。凡对中国农事稍有注意的人都会知道，“四人帮”是如何鼓动“学大寨”的风潮，大寨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感极而泣地迎接江青的到来，而且，人们也很难看清大寨的经验与“四人帮”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有何区别。所以，将“四人帮”归入“极右派”，就连华国锋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是否完全同意，都很值得怀疑。这一点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证实。而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能意识到，在他们的“万炮齐轰”之下，不仅“四人帮”的理论将在中国破产，而且人民公社的理论也会遇到麻烦。对人民公社的理论进行修正是必要的，而学大寨运动的继续推进，无疑是在强化这种理论。在把有害的大寨经验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加以巩固的时候，又怎能在七亿农民中间清除“四人帮”留下的遗产？

但是，按照华国锋的作法，当日农村中弥漫着的对于大寨和对于公社的种种不满和失望，便成了“四人帮”的罪孽。陈永贵在他的报告里面，即用很大的精力来指责“四人帮”到处破坏学习大寨，“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陈还把一个叫做温州的偏狭的地方作为攻击的目标，毫不含糊地说，那里的分田单干是“四人帮”纵容的结果。这位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包产到户是“四人帮”向学大寨的运动发起的政治挑衅，因之，与“四人帮”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对少数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要坚决纠正”①。很明显，这样的方针如果得以延续，将给中国农村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

---

① 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陈永贵的讲话令满场掌声经久不绝。这些鼓掌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正是由于与“四人帮”奉行的理论的决裂，导致了两年之后的中国出来一个“分田单干”的小岗，且从此一发难收。

华国锋取得了胜利。他打倒了“四人帮”，但却留下了中国农民已经厌恶的一种制度。他的胜利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77年，而人民公社终于日暮途穷以至败象毕露，亦出现在这一年。

1977年是人民公社这个幽灵在中国农民心中日愈可怕起来的一年，但是，在整个中国，大多数像小岗一样的村庄，仍然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那时候，中国人还未从大同社会的梦呓里醒来，邓小平还在京城北面一个无人注意的四合院里养精蓄锐，他在日后发动改革所倚重的左右将帅还毫无影响。华国锋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两亿多个有线广播喇叭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京城的信号传到江淮丘陵的时候，已是这一年年初。隆冬时节，日短夜长，凌晨，星光未褪，凤阳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古老的钟楼再度成为革命的心脏。那上面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重复着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其主旨在于动员农民行动起来，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横七竖八的广播网络则把那钟楼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这样，华国锋充满激情的声音，便控制了整个凤阳县的村村户户。

凤阳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居之地，时称濠州。他在天

历元年，即公元 1328 年生于一个佃户家中。佃户没有耕地，靠租种他人土地为生，在乡下是最贫穷的一类。朱元璋十七岁为行童，游方化缘于淮西，也就是出家到寺庙里做了一个小和尚，云游四方乞讨度日，二十五岁投郭子兴麾下为卒，离凤阳平天下，直至四十一岁称帝，是为明太祖，次年下诏于凤阳营建中都。所以，这里至今仍然留着诸多关于朱元璋的遗迹，其中最为隆重的一处，是古城中心的钟楼。楼高数丈，由小块望砖所筑，色青。到了公元 1977 年，已经数百年风雨剥蚀，斑斑裂裂。城头间有野树杂草，淡妆浓抹，如一条恍恍惚惚的龙蜿蜒在空中。当日统辖太祖中都的地方官吏主持修筑这个建筑，乃是为了永久地悬挂一口铁钟，钟脊筑有“皇图巩固”、“帝道遐长”八字。中都城门之上，镌有“万世根本”四字，字体楷书，雄浑庄严。这些一厢情愿的箴语，价值并不在于实际的效用，而是具有某种象征。在我们这个国家漫长的历史里，为人君者数以百计，无不希望家传万世，却没有一个可以如愿，朱元璋亦不能例外。但他毕竟生长于乡间贫户，深知物力艰苦以及土地之于农家的珍贵，他之所以沦为行童游走四方，说来就是因为没有土地！在他看来，土地乃是万世之根本，其所具有的意义可以成为大明王朝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平均地权，建立了一个自耕农的社会。而在共产党看来，乡村土地的私有恰为王朝倾覆的原因，所以党在取得政权之后采取的第一个大规模行动，就是把自耕农的地权收归集体。

在 1977 年初这个寒冷的早晨，大明皇室的子孙们由自耕农而为公社社员已有近二十年，政府的官员们不断地告诉他们，只有人民公社才是他们真正的“万世根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由“万世根本”的城门之下蹒跚东去。一人名徐桂仁，一人名范云珍。徐为生产队长，范为妇女队长。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同是共产党员，其职务在旧时相当于村长，现在分别管理着全村的男女。依照党的纪律，此时他们应当在自己的

家里召集党的会议，来动员农民紧跟华主席的部署，鼓起学习大寨的高潮。但现在他们径自离去，甚至对那象征着主义与权力的高音喇叭望也不望一眼。寒风之中，破衣缕缕，饥肠辘辘。他们将沿街乞讨，最终到达几百公里外的上海，那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他们就在那里浪迹街头，靠城里人的施舍度过寒冷的冬天。

人民公社社员沦为乞丐，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期。尽管政府在公开的场合屡屡宣布乞丐为非法，但诸如此类的行为仍然在社会底层蔓延开来。党的干部从来未对公众承认过这个事实，私下里也只是把乞丐叫做“外流人员”。每年第一季度，均为农民外流的高潮。此时为农闲，可有充足的时间，在城里则有元旦和春节相接续，食物的储备及冷菜剩饭也较一年中其他时间为多，因此被乞丐们视为黄金时节。除去旧时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农，乞丐均具有社员的身份。他们一半是生产者，一半是叫花子，其总数并不稳定，可因年成的好坏或多或少，但总的趋势是生产者渐少而叫花子渐多。此种情节，凤阳党的领导每年数次报告给他们的上级，其用意在于申请救济粮款，或者表白流民的嚣张和自己制止流民的成效，这些报告所列情况，较之当日一切报纸的宣传更为可信，故择要记录：

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9900人，至3月18日，达到18000人之多，大部分去南京及苏北。

1969年3月，百分之三十七的农户以及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外流他乡，流动范围所及包括皖苏浙三省。

1970年春节，全县4000余人外流。

旧历新年本为乡下最隆重的节日，而农家仍不能回归乡里，可见其谋生手段除行乞外已别无他途。到了1974年初，形势的发展已非政府力量所能控制，某大队全部1119人中，外流者竟有900余人，其中行乞者十有其八，这等于是除了老弱病残不便行动的

人，余者全部背井离乡，其乞食要物的范围已扩大至十三个省市。

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诸如此类的情节实在是一些不光彩的剪影，或者如政府官员所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按照当日中国政治的要旨，凡事必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透视，于是出现了 1973 年 9 月 2 日凤阳党的领导的一句著名的断语：农民的外流行乞，“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而煽动外流要饭的显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其罪恶用心是煽动群众对党的不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压力之下，共产党员和干部不是出于极严重的客观原因，绝不敢妄自菲薄，卷入乞丐行列。所以，直到 1976 年春季，凤阳县的共产党员行乞，均采取一种隐蔽或曲折的方式。比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薛其让，一边在党的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讲解华国锋主席的“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一边却不得不因家计的艰难而在心里做出更切实际的盘算：去年秋季的收成只给他这个书记的全家分得 150 公斤粮食，凭此，他一家四口人将何以度过大约半年的严冬和春荒？看来，沦为季节性乞丐是他唯一的活路，而作为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他又不得不在社员们面前保有他的形象。他身不由己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党的书记与乞丐，阳与阴，崇高与低贱。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薛其让的办法精巧而以简单，他让妻子携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而他本人则坐食全家的粮食，同时也可以身作则地动员他的社员坚守乡里。这样也就勉强地把他领导的 130 人中的 95 人留在村中。

到了 1977 年初，徐、范二人走出古城的时候，事态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基层干部撕去最后一层遮羞布，不仅公然加入了乞丐的行列，而且率众出游。既然党员干部可以去做叫花子，普通百姓的仿效当在情理之中。依中国农村党政合一的权力体系，其一呼百应的效果还在其次，他们更可以用自己的权力为叫花子

们的乞讨出具“证明”。在这些证明上，要饭的理由颇能动人恻隐，或者说是偶遇天灾，收不抵食；或者说是缺少劳力，家境维艰。种种理由加上党组织的红色印章，也就使原来非法的乞丐具有了合法色彩。

从客观条件上看，党的基层领导者率队行乞实在是无法避免的。以当日农村的贫苦，农民对生产又极少诚意，任何通达富有的政府，也不能对各种底层的问题都有周密了解和实际解救办法。凤阳县的领导者也曾一意改弦更张，制止社员外流。他们与不断扩大的乞丐队伍历十几年斗争而不懈，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却始终未有所得。直到 1977 年 2 月，一些精明能干且讲究实际的官员终于懂得了，依靠伟大的精神和严厉的批判，解决不了世俗的问题。他们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来到当时乞丐最多的庄徐生产队，这显然是下层官员为响应党的号召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个工作队本次下乡终于还是收起了大批判面孔，而以发放粮食的办法来阻止农民外流行乞，一度竟有奇效。可是在 2 月 25 日，工作队员们放假回城这一天，便又有 19 个社员扬长而去。工作队未能制止这里农民的行乞，却终于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小村的 16 户人家 91 口人，当日存粮共计 933 公斤，平均每人大约 10 公斤，而且包括了大约一半的山芋干。以农村人口的粮食结构，纵使山芋可以十足地代粮食用，也只有半月口粮，而农家则需等到 6 月夏粮收获之时方有新的进账。即使能够按照他们的周密设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又焉能以半月口粮度过四个月的时光？

这些情节可以证明，社员的冬闲外出和春忙回归，乃是不得不为之的谋生方式。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生命的延续，农家作了另外的一种设计：吃外面的，省家里的，回来还能带回一点。这种惨痛的生活经验后来被党的官员判为“反革命谬论”，对之大动干戈。1977 年 5 月，凤阳把具有这种经验的全体社员集合起来交代

问题，总计 861 人。所有人等不许交头接耳互相包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付政治上的敌人的办法，中国人有一个生动的说法来描述它，叫做“背靠背”。但是在凤阳的这个学习班上，“背靠背”的结果证明，农民的设计更为精当有效。从 1976 年 12 月下旬，也即党中央号召再掀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那个月，这些人出游行乞，至 1977 年 4 月被强迫送返乡里，共讨得 22074 元 9 分现金，和 8822．5 公斤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一事实显然具有讽刺意味，人民公社给予社员的一切不足以令其维持生计，而社员向往的“分田到户”又为人民公社制度所不容。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流浪行乞的生活。这种弥漫在农村下层中间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的灿烂辉煌和乐观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老百姓公然撕去伪装，将自己的真相显露出来。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面的夸夸其谈，看上去成了掩盖当时痛苦现实的遮羞布。政治口号与下层情绪之间的不相协调，因之更加表面化。我们庞大的国家本以精神力量为施政的基础，依靠万众一心或疾或徐地运转。听任现在这种状况的发展，在中央政府是失控，在地方官员是失职。所以，凤阳在 1977 年年末将 11 个乞丐“要犯”提至公堂批判，其后将徐、范等人撤销职务，又在党内给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另外一位会计虽未亲自出走，但他利用职权给乞丐开具证明，有支持纵容之过，也予撤职。另一社员则属屡教不改，罪不容赦，当场由警察拘留收监。所有这些程序均为公开进行，并伴有数千人的批判大会和乡里亲朋瞩目下的游街示众。

此种打击的主旨无疑在于杀一儆百。中国向有“法不责众”的古训，而当日有违党的宗旨的行为又如此普遍，以凤阳的状况而论，有过行乞行为的农家已十有其八，即使用最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来加以分析，亦不能将这些人统统地等同于想像中的敌人。这

一点在当时已经由凤阳县党的委员会所承认。在 1977 年的夏季，他们将自己属下的乞丐大军加以分类，结果证明那里面有百分之一点五是党员；百分之五点二是团员；百分之五点九是干部；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是社员；而在每一百个叫花子里面，真正可以指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足一人。党员和干部在乞丐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例，党在农村中的中坚力量贫下中农，也愈来愈多地离开了既定的道路，这对我们庞大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正在掀起的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是一个至为危险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打击少数人以对千百万人施以严重的警告，乃是一种必然选择。

然则事态已经发展成为全局规模，局部的杀一儆百已不足以达到初衷。所以，到了 1977 年年末，打击叫花子终于演变为全国范围的联合行动，它包括上至国务院的紧急命令，由省到县大大小小政府官员的紧急动员，以及数百城市公安警察的一起出动围剿。只不过，公开的舆论对此保持着沉默，所以城里人感觉不到这种弥漫于农民头上的紧张气氛。两年以后，党的公开出版物才把这些事情透露出来。这些调查材料说，中国农村下层百姓中，至少有两亿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区，在地域上横跨中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其中包括山东南部、福建西南与东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四川陕西湖北湖南河南交界区、四川湖南贵州湖北交界区、江西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以及西藏的全部。饥民的队伍庞大无比，以至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官员和警察们一起动手，强迫他们还乡。这样，就有数千属于凤阳的叫花子们在这一年冬季被押送回来。他们未能回到家里，便先在干部的监视下走进公社的会议室，接受批评，流着眼泪检讨要饭的可耻，并且把自己伸手要来的财物又伸手交给公社。12 月的第一周，一个叫做黄湾的公社，从 59 个乞丐手中收缴的这类

财物，包括 841. 8 元人民币、326 斤粮票，以及 551 斤粮食、212 件衣服和 20 双旧鞋子。

从理论上讲，凤阳县的 50 万农民都属党的县委员会统辖，因之对县委官员的任何一种指令都必须服从。依照中国的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里的属民，农民也没有离乡背井的权力。有鉴于大批饥民涌入城市，对于城里人的物资供应、生活秩序、街头景象，以至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有着极大威胁，所以政府上下一致认为，应用强制手段驱赶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凤阳有一天被遣送回来的乞丐竟多达 5000 人，即是基于这种不成文的法定理由。看来，党中央的号召和政府的联合攻势发生了作用。就在 1977 年农历年末，也即阳历公元 1978 年 1 月，凤阳县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个早晨出县城赶到临淮关。此关倚巫山，临淮河，旧时曾是淮盐集散地，盛名远播，而今却已沦为乞丐集散地。县委书记在这里看到的是刚刚从江浙一带被遣送回来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垢面蓬头，寒风中一堆一堆蜷缩在一起。因为冷，更因为自身的犯罪感和这位父母官的到来引起的恐惧，他们瑟瑟颤抖。陈庭元本来是应当长出一口气的，因为终于又有一批他治下的百姓加入他的学大寨的行列，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行政的管制纵使能有效控制农民的躯体，却不能驾驭农民的灵魂。

令他终于大彻大悟的时刻，是在旧历腊月 27 日。这一日，他和安徽省省委书记王光宇一道进入前王生产队，偶遇史成德的妻子。史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五十年代初赴朝鲜作战，又作为“最可爱的人”凯旋归国，现在，他正领着孩子浪迹天南海北，据说已行遍大半个中国，所以人称“长脚老史”。“最可爱的人”沦为乞丐，留下自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滚滚风尘中艰难地翻耕土地，这叫共产党的两位书记顿生恻隐之心，于是找来铁锹相助。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我们的国家一向视官员亲耕为崇高道德的表现，更何况此情此景并不同于种种演戏般的干部参加

集体劳动，它确属两位官员发自内心的见义勇为。依照常理，百姓对于这一场面的反应必是纷纷闻讯赶来，或含蓄或热烈地抒发感激之情，甚至应该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这一次陈王二人感觉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冷漠，人们远远地望着他们，满脸的木然，甚至无人上前施以援手。

在我们的国家中，像王光宇这样的省委书记有数十个，像陈庭元这样的县委书记有两千多个，他们或间接或直接地管理着几万万农民。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专靠北京发出的空泛号召是不可能的，其要旨在于通过全体干部集体的和衷共济，以主义和道德的力量去动员各自的属民，行政强制的手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当一个官员仔细查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不论精神的攻势与行政的管理如何无隙可击，农民的世界中有一个领域是官员们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人心。陈庭元所遭遇的冷漠不消说令人悲观，“主义”与“道德”的力量已难以令农民激动，反而使整个集体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姓的无动于衷，与其说是对着两位官员的善举，不如说是冲着整个公社。比如陈庭元惊讶地发现，当生产队长吹响上工的哨子时，社员并不开门，他们只把一双眼睛放在自家小小的窗洞后面，静静地张望，有时就这样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不肯出门。另一件事是几乎每个犁地的社员都要躲开土地的边角只在地的当中转圈，其本意在于尽量减少自己的劳动，但这样一来，就把公社的方块地犁成了圆地，因而使公社实际的土地面积大为减少。更令陈庭元伤感的是，他看到公社的耕牛全都没有了鼻子，只在嘴的上部朝天挺着一个大大的黑洞。因为社员们都是用很粗的铁丝穿过牛鼻恣意拉扯，直扯得可怜的耕牛鼻破嘴豁，浓血一团。细心的陈庭元甚至还看见苍蝇在溃烂的牛鼻子上嗡嗡地生产蛆虫。

党的方针不允许公社社员沦为乞丐，而公社社员对党的方针又是如此缺乏诚意，这使得陈庭元和所有像他一样熟睹下情的地

方官员深为不安。他们发奋力挽狂澜，却苦于无力回天，只好自己坚守在公社的营垒之中，静待社员的觉悟。殊不料社员的觉悟竟是以他们无从想像的方式表现出来，时间是在第二年的年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 1978 年 12 月，也即中国旧历戊午年冬月，小岗的事变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今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发生。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用自己的生死为赌注，对未来作出抉择的这一个夜晚，他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为近二十年的人民公社划了一个句号。

（选自《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版）

倪振良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

一、风云人物

1992 年初春，当代风云人物邓小平来到了阔别 8 年的深圳。

百花颔首，千树起舞，座座高楼绽开了笑脸。1 月 20 日早上，国贸大厦里里外外楼上楼下，挤满了愉悦的人群。邓小平一行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乘坐观光电梯，徐徐登向 53 层旋转厅。

一夜城

满眼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彩色的人潮。

进了国贸大厦至高点，坐在缓缓旋转的环形大厅里，透过明净的玻璃，看到的是立体的活动着的一尊尊巨雕，一幅幅彩图。多姿多彩的现代化楼宇，一栋栋、一群群、一片片，汇成了楼的山、楼的海、楼的森林，其间绿荫浓覆、人影憧憧。

仿佛就在昨天，这里还是个荒凉的边陲小镇。镇上除了破旧的平房外，只有几座旧楼，人口也不过两三万。多处是乱石、水

沟，还有出没在水草间的青蛙、水蛇……转眼间，这里崛起了一座现代化锦城，已有两三百万人口，数千栋大楼，十几万辆汽车，还有纵横交错、数不胜数的林荫大道。

记得8年前，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深圳滚烫的热土，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幢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建筑群。到处是来往的推土机，起落的起重机，灰色的脚手架。透过这一切，邓小平看到了深圳的未来，看到了它的生命力所在，便欣然命笔道：

>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那次离开深圳后的第二个月，即1984年3月，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决定。

中华民族奋进的航道已经开通，风帆已经扬起，定然驶向成功的彼岸。1988年6月初，邓小平在会见“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会议代表时，兴致勃勃地说：

> 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50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这个再造香港的构想，其实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已在深圳率先实施了。经12年奋争，12年拼搏，深圳已建起七八十平方公里的新城，已看到了第二个香港的雏型，已显示出了她无限旺盛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对面的香港，早已租给老牌资本主义英国，它的兴旺与繁荣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50年代以后，随着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东南亚的一些华裔资本家将数百亿美元存入香港，香

港的经济便急剧发展了起来。那时至今，已有三四十个年头了。而深圳特区，刚创办 12 年，她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比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的速度高出了 26 个百分点，难怪香港人惊呼深圳是“一夜崛起的城市”。

且看今日深圳，在 80 平方公里新城内已建成九个工业区、五十个住宅小区和一大批商贸、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等设施；各类房屋竣工面积达 3000 万平方米，还建成了大型机场、大型铁路客站和八个港口码头、四个陆路口岸，300 多公里市区通路。

大量数据证明了一个辉煌的事实：十二年来，深圳的发展速度，深圳的经济效益，深圳的社会风尚，都要比香港高出一筹：

啊，深圳，

不是香港，

胜似香港，

大海可作镜，

高山可作证！

面对这一番情景，作为创办深圳特区的倡导者邓小平，精神矍铄，喜形于色，侃侃而谈。他的目光注视着深圳市领导，语重心长道：

> 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讲一百年，动摇不得。

邓小平一字一顿重复着这样一番话，是那样郑重，那样坚毅。这位久经磨砺，年近九旬的老人，似乎在给十几亿中国公民指点着赖以生存与奋争的道路，又似乎是在解剖着中国革命苦涩、曲折而又十分恢宏的历史——

三起三落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邓小平在其中就经历了三个大起大落。

邓小平第一次受打击是在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突然被党内“左”倾领导撤了职，被发配到敌我交界的边远地区安乐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谁料到，三十三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又发配到了江西，被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邓小平日出而去，步行去一里路外的拖拉机厂接受劳动改造；日落而归，“闭门思过”。寒风侵骨，冷雨敲窗，多少战争年代里为国捐躯的战友、英烈的形象在他面前闪过。在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一片喧嚣声中，他在苦苦思索：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究竟该怎么搞？

七十年代初，林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后，中国似乎有了转机。邓小平结束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回到北京，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那是在1975年，经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后，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江青一伙大搞什么评法反儒批周公，把矛头指向病中的周恩来；紧接着又来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硬是又把邓小平打下去。

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1976年10月，它终于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77年7、8月间，邓小平第三次重上政治舞台，恢复了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领导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才略过人、力挽狂澜的邓小平肩上。

历史的转折

面临的国情是极其严峻的，拥有十多亿公民的泱泱大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几，几亿公民的生活尚在贫困线上徘徊。难道中国向来就那么穷吗？不。远的不说，就说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与中国并驾齐驱；到了七十年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中国的经济，一落千丈。也就在六七十年代，正当中国这条巨龙被无休止的运动、斗争折腾得精疲力竭、回天乏术的时候，在中国的周围出现了群龙腾飞的局面，与中国大陆同祖、同根、同一文化圈的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以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了起来。雄辩的事实告诉我们：疯狂的口号喊不出高速度，无休止的斗争斗不出"灿烂的经济之果"，得赶快悬崖勒马，否则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全党的思想观念、中心工作必须要来个根本的转变，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上来！

经济建设怎么搞？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勒紧裤带，蛮干苦干？殊不知，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时，世界已在拥抱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了；当我们闭门高喊要解放全人类时，人类已经登临月球，飞向宇宙了。当今的中国，只有革除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体制，扫除一切阻挡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彻底解放生产力，才有望实现经济的腾飞。只有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引进高科技；同时，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市场，让中国汇入世界经济和大循环的洪流，才有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于是，邓小平提议，中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要实现这个根本的转变，需要足够的勇气，胆略，还需要必要的试验田、排头兵。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首先在安徽、四川等乡村

开始了；城市的改革、开放、搞活，该选择哪里作“排头兵”、“试验场”？

邓小平浏览着色彩斑斓的雄鸡形的中国地图，渐渐把希望的目光移向了南方——

二、二十年怀胎

中国的南方，连着大海，向着东南亚。

自从140多年前，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南大门后，有多少洋人洋货从这里拥进华夏，又有多少中华儿女从这里飘向海外，走向世界。

到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桎梏的中华民族，以极大的热情与干劲，投身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事业。

可叹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巨轮，在剧烈的政治风浪中颠簸震荡，失去了多少赖以腾飞的良机，将多少极其宝贵的岁月付诸滚滚浊浪！

坐失良机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震动世界的“亚非会议”，这是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与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显示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英勇气概。太平洋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随之高涨了起来。

这个时候，亚非国家的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其中的不少华裔巨富，纷纷将资金转入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避风，一时间，数百亿美元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似洪水般涌进香港的银行。香

港的银行家不得不将沉积的资金，以极低的利息贷出。

香港的大小企业家们，便张开口袋来借用大笔的低息贷款，去建大楼、工厂，开商店，随之财源滚滚而来。

目睹香港这种情况，我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等坐不住了，即向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汇报。陶铸觉得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与省委书记林李明议定即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计议利用香港银行低息贷款，发展我南方的工农业生产。

说来也巧，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到南方来了。陶铸忙召来了饶彰风、黄施民等，赶到了珠江畔的毛主席下榻的一座小岛宾馆内，郑重其事向主席汇报着香港的经济情势。

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抽着烟。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与掌舵者，还没有迈出祖国的南大门，也没有去过港、澳、台，缺乏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感性认识。

广东的官员则兴致勃勃："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某个地方办工厂，发展工业。"

毛泽东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还是默然抽着烟。

半小时后，当毛泽东走出宾馆，临上扑向大海的游艇时，才若有所思地告诉陶铸、黄施民等：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广东省委很快写好了这个报告，立即送呈给了毛主席、党中央。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提到最高决策层商讨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广东省委在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杳无音讯。

第二年春天始，是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然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后是"反右倾"，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四清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揪党内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路折腾下来，已

是20余年过去，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打开国门

中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制造十年动乱的祸首们已经覆没，邓小平又开始重新工作。中国百废待兴，举国上下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中国应打开国门，去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忙着组织出国考察访问代表团。

谷牧是中国经济建设新时期的一位杰出领导人。解放后他先后当过市长、市委书记，全面负责过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工作。多年的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实践，使他深邃地洞察到，要振兴我中华，就得打开国门，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另一方面扑向大洋，去开拓世界市场。

1978年新春伊始，谷牧就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让其对香港、澳门作实地调查研究，要求写出有根有据、有开拓性见识的经济考察报告来。这个考察组4月初就前往港澳了。

5月初，谷牧副总理则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飞向了西欧。这个考察团，由谷牧亲任团长，由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计委王全国、北京市的叶林等诸多部长，还有李灏、胡光宝等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一行30余人，可谓阵容齐整，蔚为大观。这样规模的经济考察代表团，大张旗鼓去西方考察经济，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显示着中国这头雄狮觉醒了，正重振雄风，向世界走来，那自然引起西方世界的震惊。西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都以相当的规格和极高的礼仪，接待着由中国政府高级官员

组成的经济考察团，我考察团成员则认认真真座谈、询问、参观、考察。从管理部门到科研单位，从设计部门到生产车间，大多是那样井井有条，紊丝不乱。一座座厂房是那样整洁、规范，偌大的车间里，只有几位先生、小姐操作着电脑，控制着各个生产程序，崭新的成品便源源不断而出。电脑代替了人脑，自动化代替了“人海战”，机器人在高速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在这琳琅满目的国际市场上，世界各大国家的商品几乎都有，中国货也有，但大多是摆在最廉价的柜台里，而且居多是中国最好的上海货。这怎么不使目睹这一切的中国人感到汗颜！

西欧诸国给考察团员留下的印象与感触是极深刻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成就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借鉴。西德崇尚信誉，注重高效、优质的生产，英国恪守规矩，法国讲究艺术，瑞士恬静、富有，丹麦活跃兴旺……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风俗，沿袭、发展着不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塑造着不同的素养、性格。所见所闻是五光十色、纷繁复杂的，感触最深的还是科学技术与严密的经营管理带来的高效率与高速度。

这次经济考察活动。从5月1日进行到6月上旬，先后考察了西欧五六个国家，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学其所长，避其所短，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更加直观、更加强烈了。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当时谷牧的秘书胡光宝与笔者谈起这一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说干就干

受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谷牧从西欧返回前几天回到了北京。谷牧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该组写的《港澳经济

考察报告》，报告反映了西欧考察团同样的感受，字里行间溢满了改革开放的呼声，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三五年努力；把宝安等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在6月3日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并作了指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快快打开中国的大门！"世界在呼唤，中国在呼唤，形势迫人，上下共识。宝安、珠海在行动，赶在头里的要算是我驻香港招商局。

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最早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由李鸿章创建于1872年。本世界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将它改为国管，归属交通部，抗战期间，中国招商总局曾迁至香港。1950年，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招商局，驾驭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成为新中国交通部的驻港商业机构。

到了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这样一个文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指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的香港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

……

这份报告引起了李先念副主席高度重视，立即与谷牧副总理作了认真研究，马上决定将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两位请来，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远在香港的袁庚，接到通知，赶忙登上了直飞北京的班机。

三、中南海决策

直飞北京的银燕从香港机场腾空而起，扶摇直上。

初春季节，海湾雾多，舷窗外一片茫茫。飞机在雾海中穿行、升腾。

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的心潮，随着那机窗外的云雾滚滚翻卷——

冲破束缚

见了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谷牧副总理，该说些什么呢？袁庚接触招商局的工作还不到半年。开始是根据港澳工委的意见，交通部长叶飞派外事局长袁庚去香港招商局作调查研究。作了两个多月的调研后，袁庚代交通部党组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这个请示报告是1978年10月9日送上去的，3天后，即10月12日，中央5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并作了重要批示。10月18日，袁庚奉命从交通部外事局调到了香港招商局工作。

一到招商局，袁庚不负重托，日夜奔忙，马不停蹄，奋力发展工厂企业，招揽经营项目。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袁庚决意增设浮船坞，扩大船只修造量；兴建集装箱码头，增加航运吞吐量。这就急需合适的地方，袁庚四处奔走，八方寻觅，终于看中了香港一个微型的小岛，想把它买下来。一问价钱，不禁望而却步了：把

香港招商局百年来的所有资产全部抵押出去，也买不下这一块地方。

是啊，香港万商云集，寸土寸金。连大海中也在填土造房，哪里还能买到廉价的地皮？

怎么办？驻港的中资机构，难道就这样被困死在香港，无所作为了吗？倏然，他想起了对面的宝安县，能不能在那里辟块地皮，搞个招商的工业区呢？这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中央要改革开放，不妨先去看看。

游子还乡

袁庚是宝安县人，阔别故土已有几十年了。过了罗湖桥，就是宝安的县城深圳，七十年代末的深圳，依旧只有几栋旧楼，一排排凌乱、破旧的黑瓦平房。

深圳，又名鹏城。从飞机上鸟瞰深圳全景，左右两边有两个伸向大海的半岛，酷似展翅南飞的大鹏的两翼，其左翼是蛇口，右翼是大鹏半岛。袁庚的故乡就在大鹏半岛，三四十年代，袁庚就是从这里揭竿而起，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参加了抗日游击东江纵队，担任了联络处处长，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杀到日寇大败，一直杀到香港，与英国少将一起接受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袁庚又随东江纵队，投入解放战争，参加淮海战役，担任炮兵团长，又挥师南下，参加解放家乡宝安县的战斗。在那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为了山河的光复，民众的解放，多少战友、英烈血染热土，为国捐躯。袁庚算是幸运者，盼到了全国解放，盼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可当他驱车返回别离二三十年的大鹏半岛时，不禁怔住了：当年的邻居、熟人，包括他们的后代许多都找不到了，仔细一打听，他们早已远走他乡，移居英国、美国、荷兰等国了。解放初期的两万多乡亲，只留下五千多人了。岁月流逝，人去房空，还是那几条小河浜，那几座小

石桥；还是那几个住宅群，那几排小平房，而且已破旧不堪了。同样在这二三十年里，对面香港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入夜，香港灯光灿烂，这里却是一片漆黑；对面沸腾的夜生活刚刚开始，这里冷冷清清，万籁俱寂。

面对这一情景，老革命袁庚的心在颤抖：中华儿女当年用血肉换来了江山，后来为什么一个个离她而去，远走他乡？贫穷与落后，能说就是社会主义吗？不，闭关自守，穷干、蛮干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该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建设我贫穷落后的乡村。招商局是大陆驻港的唯一有经济实力的中资企业，该率先到深圳来“吃螃蟹”，搞一个经济开发区。

深圳南头以南有个半岛，形似蛇头，又名蛇口，那边可以建船坞，造码头，与香港的海上距离又最近，可利用香港的电力，又靠近深圳西丽湖的水源，在那里辟一块地方，建工厂，办企业，招收内地的劳动力来做工，为民造福，为国增收，那该多好！返回香港，袁庚恰遇刚从西德考察回来的交通部长叶飞，他俩想到了一起，谈到了一起。离港返京时，叶飞取道广州，与广东省负责人专门洽谈驻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问题。

广东省与交通部两方负责人的思路一拍即合。是啊，早在二十余年前，广东省负责人就向毛泽东与党中央打过类似的报告，谁料如沉大海；而今，中国与世界都在呼唤改革开放，广东省地处南疆，面向大洋，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机不可失，该尽快把国门打开！

广东省、交通部即联名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招商局在蛇口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这份报告于1979年1月6日发出，就在当月下旬接到了中央

主要领导接见面议的通知。在这应召赴京的途中，袁庚怎么能不心潮滚滚、满怀憧憬呢？

中央点头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许。

北京中南海。

谷牧副总理健步向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副主席处走去。

进了办公室，谷牧一直走到李先念办公桌前，轻声说："他们都到了。"

在埋头批阅文件的李副主席这才抬起头来，拿起案头的一个文件夹，站了起来："走吧。"

先念、谷牧一进会客室，等候在那里的交通部负责人彭德清、招商局负责人袁庚都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李先念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分外亲切。

一坐下，先念便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早有准备的袁庚便滔滔不绝述说起来。

李先念副主席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点着头。这位解放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将，解放后已担任二十六年副总理，并长期兼任财政部部长，前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正值全国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在这日理万机之中，与谷牧一起专门请彭德清、袁庚来研究招商局在宝安建立工业区问题，显然不仅仅是涉及几平方公里的问题，而是寻找排头兵，以打开突破口，牵动整个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问题。

当袁庚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和内陆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时，先念插话道："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

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去搞。”

袁庚忙接上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要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

李先念笑道：“给你一块地也可以。”他瞧瞧案头的宝安县地图，指指南头以南的蛇口道：“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听，眉开眼笑了。他心里在想，那太多了，招商局还没有那么大胃口呐，有两平方公里左右就够了。

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先念马上又说:“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个特殊政策，不然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稍顿了顿，先念又以征询的目光望着谷牧副总理，问:“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胸有成竹道:“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

袁庚又进一言：“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签个字，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先念一听，欣然道：“好，我批。”说着拿过批示笔，在这份报告上写道：

>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
> 先念　1979 年 1 月 31 日

彭德清与袁庚一看，相视一笑，眉宇间溢满无限的喜悦。

先念则瞧着他们说:“交通部就是要利用香港招商局，搞好国内外的结合，可以创造外汇，要把远洋船队管理好，要为外贸服务。”

袁庚说：“有了地方，我们可以发展修船业，也可以拆船。”

先念说:“拆船可以搞大一点，轻工业部不是也搞拆船吗？要

搞活一点，给他个任务。拆船有很多副产品，船长、大副的房间就有不少可用的家具。”

一个党中央副主席，对拆船业谈得如此具体深入，实令袁庚感佩。

先念又说：“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钱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自己去奋斗。长江二三千吨的船要买一百几十条开到国内来嘛！我们被耽误了十多年，‘四人帮’说什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刘少奇讲的，其实刘并没有说过，是坏家伙编造的，要不是少搞了十几年，我们的造船业，现在已达到1400万吨了。”

先念联系到那年月配合小平苦撑危局领导经济建设的历程，说：“那几年，什么都不好做，‘四人帮’总是横加干涉，凡是有赤字出现，都与他们有关，损失可不少！王洪文有两个关于买船造船的文件，接着是风庆轮事件。”

彭德清插话说：“还有更生轮。”

先念嘘了口气对彭德清、袁庚说：“现在好了，交通部生意还可以做大些，国内外结合起来，很好。国内投资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利用外资，你们现在有了个路子，1000万吨船（包括沿海），十多年经验，没花国家一点钱，说明路子开了，对了，要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干起来！”年届七旬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先念同志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偕谷牧与彭德清、袁庚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11点45分，整整105分钟。

临别，先念又嘱谷牧尽快召集有关部负责人开会，将招商局这件事落实下来。

四、“特区”的由来

从中南海先念处出来，袁庚感到格外踏实、舒畅。为国为民

奔波四十余年，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顺当、来劲。袁庚已年逾花甲，拼搏的机会不多了。眼下，中央的意向已定，就看我们怎么干了。对于涉外的政治经济贸易活动，袁庚也并不陌生。

新中国成立后，袁庚就被派去越南，参加了胡志明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随后又由外交部派往印度尼西亚当了七年领事；回国后在中央一个部，负责东南亚，包括香港在内的外事工作。“文革”中，被康生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秦城监狱五年半。出狱后，袁庚担任了交通部外事局长，参与了不少涉外经济洽谈活动。三年后调到了香港招商局，算是驾轻就熟，虽刚上任两三个月，但对那边的经营管理、运行机制很快就掌握了，他决意运用香港经济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到宝安开发一个蛇口工业区，先念已有明确批示，就等谷牧副总理召集有关方面来具体落实了。

得天独厚

谷牧办事从来就是及时、高效的。中南海谈妥后，只隔了一天，即2月2日上午9时许，一辆辆红旗、吉姆等高级轿车，南从灵镜胡同，北从西安门大街，缓缓拐进西黄城根街，进入了一个有武装警卫的大院落。

那个特殊会议，就在这里的南会议室进行。

到会的有：国家计委段云、顾明，国家建委彭敏，外贸部刘希文，人民银行乔培新、卜明，财政部王丙乾，交通部彭德清、袁庚、江波等。

9点30分，会议准时开始。主持会议的谷牧开诚布公道：“现在主要议一议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香港招商局原来设想在香港设厂，受条件限制，他们已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我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已作了请示。”谷牧一字不漏宣读了先念的批示后，请袁庚把主要问题向大家说一下。

袁庚对香港招商局107年的历史作了对比，谈到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不开放，在港的14家中资银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从东南亚拥来的大量资金从门前流过；而香港的一些小银行，如恒生银行，抓住机遇，大胆贷款，猛然发展。袁庚又通过香港其他英资财团、华人财团的发展，具体阐明我们曾错过了大好时机。他颇有感慨地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1平方英尺要15000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英尺也要500元以上。加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工资高，招商局要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有不少困难。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委交换了意见，有了共识：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又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内地和香港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袁庚言之有理，在座的颔首称是。

特殊政策

“交通部与广东省已商定了具体方案，但进出口免税问题要中央定才行。”袁庚着重说。

谷牧一语道破：“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

袁庚说：“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派行政管理人员。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200元人民币。”说

到这儿，袁庚提高了嗓门："这个工业区的建成，不用财政部、银行一个钱，要求财政部免税十到十五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袁庚讲到这儿，打住了。谷牧对他说："你把想要办的工厂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袁庚笑了笑，说："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五六个厂，如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装配厂及玻璃钢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与会者听着，有的沉思，有的点头，有的若有所虑。

财政部王丙乾道："其他没有什么意见。关于纳税问题，是否可以考虑，不按国内的办法，而按香港的办法收税，在香港你们怎么纳税的，你们也怎么向国家纳税。"

袁庚一听，绽开了笑脸："我双手赞成这个意见。香港为什么近10年之内工业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因为它是自由港，出进口都免税，吸收了大量外资、技术、人才。我们在香港纳的只有所得税。我赞成按我们招商局向港英当局的纳税办法向财政部纳税。"

外贸部刘希文说："第一，对这样办无意见。第二，目前看来，你们的产品是为了满足交通远洋船的需要，还涉及不到外贸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关于海关进出口税问题可以给予优惠，但具体怎么办，我要回去和海关商量一下。"

计委段云欠了欠身子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

谷牧插上说："广东不仅两个县可以搞，广东、福建很多地方都可以搞。"

"我看说用香港的办法管是否妥当?我的意见比国内放宽一些就是了。"

谷牧点头："那个地方就是要特殊化嘛!"

计委顾明说："一、这个地方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

家不给钱；二、在国内销要按国家进口办法，要纳税；三、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这样就可以统一了；四、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独立核算，要少干预为好。工资福利不能过高，也要有一套办法：一般在自由贸易区有所得税，所以要纳所得税。”

在国内划一块地方，让驻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只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已到中午了，谷牧摆了摆手，说：“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 300 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这样按先念批的‘照此办理’起来。”谷牧把目光移向袁庚道：“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再作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尊敬的读者，读毕这篇会议纪实，不知你是否留意到，主持会议的副总理谷牧，在会议开始、结束及中间插话，先后三次反复提到邓小平的意见：广东、福建很多地方可更开放一些。可见，驻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招商局的问题，而是让招商局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棋盘上先行一步，作个过河卒，探探路子，牵动全国，震撼全球的战役还在后头呐！

智慧的火花

1979 年 4 月，中南海春意盎然。

檐头的迎春花，似金色的瀑布，凌空倾泻下来。

带着缕缕幽香的暖风，悄悄地溜进了窗户，轻拂着案前的红花、绿叶、金果。

邓小平坐在藤椅上，正静静地听着广东省负责人的汇报。

正在发言的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二十年前，他

就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了。去年，中央派他去广东，主持全面工作。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国际交往频繁，是我国的主要口岸之一；广东又是著名的侨乡，在国外的华侨有820多万人，港澳居民大多数是广东籍。每年从广东口岸出入境的外宾、外籍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达数百万人次。开放、搞活，在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习仲勋通过广东经济的现状，阐明了中央对广东在经济上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非常英明、正确与及时的。接着便谈了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规划设想。其中着重谈到："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听到这儿，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示意习仲勋继续说下去。

他一面听，一面沉思。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找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踏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关系不大。

那么，这一块地方，该选在哪里呢？邓小平的手指随着目光在移动，移向南方，移向东西方政治经济的交汇处——深圳！

在座的都看明白：是把这块地方划出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

这块地方该叫什么呢？工业区，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都不准确。邓小平没有表态，他在细细寻思。

傍晚，参加了一天会议的邓小平在中南海院里散步，别说他年届七十五高龄，步履依旧是那样稳健，比他年轻九岁的习仲勋信步与他走到了一起。

邓小平与习仲勋，还是那年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相识的，那次同桌吃的是朱老总做的四川菜。那时，习仲勋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参与中央领导创建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

谈起这段往事，似乎就在昨天，历历在目，两位老人还饶有兴趣。

他们边聊边走，缓缓从中海走到了南海边，平静的海面上升腾着淡淡的雾霭，海边倒映着彩色的亭阁，浓覆的绿荫中传来百鸟的鸣叫声。倏然，邓小平停住了脚步，若有所得道："深圳，就叫特区吧！""特区？"习仲勋一怔。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熟悉的四川口音，落地有声，扑向南海。

仿佛当年发布战斗命令一样，一场硬仗，一场特殊的战斗，在邓小平的精心谋划下，将在山与海的交汇处打响！

五、深圳河边

邓小平关于创办"特区"的指示一下达，谷牧副总理即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飞往了南方。

50号文件

他们先在广东省连着开了十多天会议，接着又去福建省，广泛征询，仔细分析，深入研究，返京后，形成了中发[1979]50年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开门见山道：

……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势条件，抓紧

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批转的广东省的报告中，对计划体制、对外贸易、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物资体制、劳动工资、物价政策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灵活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

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

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这份报告，还明确了特区的管理原则和基本建设等事宜，确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为创办深圳特区拉开了序幕，擂响了战鼓。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亲自挂帅，任仲夷、吴南生坐镇部署。

自从邓小平指定创办深圳特区后，广东省委决定在原宝安县城深圳所在地，建立一个深圳市，行政级别比宝安县还高半格——副地级，抽调省外经委主任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另从江门等地抽调曹喜芝、贾华担任副书记。又从省有关部门及地区，选调了40多名干部一起开赴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深圳。他们算是创办深圳特区的第一批前线指挥官，集中住在新园招待所里——一座破旧的二层小楼上。

不料，张勋甫等一线指挥官首先遇到的并不是接洽外资、外商问题，而是要围追堵截外逃的民众。

人心外向与内向

中央对深圳“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风声早已传到了南国边陲，有些人误以为，这一下开放了，搞活了，可以撒开腿往香港跑。这些年来，从这里跑往香港的，几乎没有不富、不阔的。是啊，同样是打工干活，那边的收入比内陆高出几十倍！眼下，一听说“开放”了，“人心外向”的民众闻风便是雨，竟有共产党员抢先跑过去，在香港的山脚下研究如何在那里落脚谋生的……

这还得了，人去山空，还怎么引进外资？有情报说，今晚有许多人要集体偷渡。市委全体干部闻风而动，紧急动员全市基干民兵，配合部队，前往堵截。

这里与香港只隔一条蜿蜒而去的河，窄处不过几米宽。河对面的土地本都是新安县（现深圳市）的，是三次不平等条约，逐步割让给了英国。第一次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半岛割让给了英国；第二次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把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第三次是1898年，英国人借中国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机，逼清政府签了《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陆地及邻近23个岛屿，共962平方公里土地，全部“租”给了英国人，“租”期99年，“租”金分文没有。从此，河对面的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这个“没娘的孩子”，1842年离开祖国母亲时，只是个5000多人口的小渔村。没有料到，130多年后，这里成了拥有500万人口的国际大市场，一条崛起于亚洲的小龙！而一水相隔的深圳“同胞”依然冷冷清清，经济上落后了一大截。

这难道能怪深圳民众“人心外向”吗？

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有位高级干部向我讲了这样一段趣事：1977年，邓小平与叶剑英来广东视察，省领导汇报到，港澳边境，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这时，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

口音道："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顿了顿，又说："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在座的听了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政策很明确，不准偷渡外逃；这本来是边防部队管的，怎么说他们管不了呢？

时隔十几年，当深圳崛起后，深圳人谁也不想离开故土了，当年偷渡去香港的，也有些返回深圳来了。这时，重温邓小平这两句话，才恍然大悟：要不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边防部队又怎么能刹住偷渡风呢？

再说当初，算是难为了张勋甫，他一面疲于奔命拦阻偷渡者；一面又要千方百计建特区。

这特区究竟该怎么建？圈出一块地方，加工生产出口商品；划出一条老街，作自由市场，搞贸易活动，反正要开放、搞活，能引外商、外资来就行。

不少外商也搞不清共产党为什么要办深圳特区，有的说，无非是要张开口袋赚我们的钱呗，可要当心，别忘记了当年的"公私合营"啊！有的说，说不定我们还能捞一把，可别错过了时机。一些小商小贩则不言不语，提包背囊走过罗湖桥来，兜售香港的喇叭裤、牛仔服，清仓的打工装；还有电子表、打火机等洋百货。

清静了多少年的老街，似乎热闹了许多。但尽是些小商小贩，大款巨富谁都不来。是啊，创业伊始，既无高楼，又少平地，怎么来呢？

叱咤风云

转眼就是第二年春天，深圳湾混混沌沌，一片迷蒙，春雨淅淅沥沥，连绵不断。茫茫雨丝中，出现了一群陌生的干部，走在头里的中等个子，壮壮实实，四方脸庞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他抬眼望望一滩滩泥浆，一汪汪积水，操着上海口音问旁边的一位："老秦，这儿的地势看样子比海平面还低。"

“是的，低两米呐。”老秦，即后来的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

他又抬眼望望不远处的两座山包，说：“把这座山移过来，填平了这个低洼区！”

老秦说：“对，我们计算过了，这两座山包有160万立方米土，恰可用来填罗湖小区。”

他点了点头，眉心蹙成了一个“川”字，似乎在深思、酝酿着什么，他就是9年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当时，他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率一个代表团，考察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等国的出口加工区，返京后撰写了一个颇有份量的《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随后就飞到南方来了。

“老江！”一位身材颀长的干部赶了上来，他长方脸庞，略带一点广东口音，“看来，工程量很大，得有个总体规划。”说话的就是5年后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当时是国家进出口委专职委员、党组成员。

江泽民点了点头：“胸中有了一盘棋，才能迈出高明的一步。”

“有些事，这次是否得定下来。”李灏说。去年春天，他随谷牧来到南方，参加起草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50号文件”；这一次，他又与江泽民一同南下，要解决一些创办特区的实际问题。

江泽民、李灏等在深圳实地考察一番后，又到了广州，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作了细致研究部署。决定将深圳特区，明确定为“经济特区”；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任广东经济特区委员会主任，将深圳市行政级别再提半格，成正地级市，由吴南生兼深圳市委书记坐镇深圳，领导开发经济特区。

1980年6月13日，早晨闷热，吴南生率正地级深圳市的新班子成员秦文俊、黄施民、罗昌仁、丁励松等，一同登上了前往深

圳的列车。

一到目的地，吴南生就宣布了省委的决定，他们5位被一一任命为深圳市委正副书记、秘书长等职。

深圳市不到两年连升了两级，且有了五六位资深书记，可谓实力雄厚，风靡云蒸。

新班子上任后，首先按既定部署，大张旗鼓制订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由吴南生挂帅，省建委副主任廖伟具体负责，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共108位。108将集中在当时深圳唯一的高级招待所——华侨饭店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强手林立，百家争鸣。智慧的火花经碰撞而迸发，经迸发而燃烧，经燃烧而融化，经融化而升华，终于产生了共识——

> 充分利用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风景优美、土地充足、劳动力充裕等有利条件，努力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和良好的经营场所，积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把特区办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农、牧、住宅、旅游、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以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制订特区经济发展规划的最初指导思想，尽管很不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根据这个思想，拟订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在科学分析深圳地形地貌的基础上，绘制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蓝图。

深圳市的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

327．5平方公里，东西长50余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6公里多。从飞机上鸟瞰特区全貌，仿佛是条狭长的海带漂浮在山脚下、大海边。其中可规划开发的有110平方公里。

根据特区独特的地形特点，吸收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的优点，深圳特区的总体布局，既不能由一个中心向四面辐射，也不能成轴对称，而应是带状组团式的结构。如果说特区仿佛是一排葡萄架，那么一幢幢大楼像是一串串葡萄，均匀地分布在绿色的长廊里。组团间隔有一条条绿化带，各组团的功能和人口分布合理；楼宇多姿多彩，楼层错落有致；公用设施配套完善，环境优美，居住舒适，空气清新，公路四通八达。

经济特区由生活区、工业、仓库区，农田、山林区，游览区组成。计有三片（后定为罗湖、福田、南头三区），十八个区（组团，其中工业区就有十个）。

五彩纷呈的经济特区建设蓝图把深圳人的思想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然而，何时能把这个画在纸上的神话世界实现，谁也说不上来。吴南生在抓总体规划的同时，正着手部署开发建设，他提出在罗湖区先开发0．8平方公里，后来觉得小了一点，在市委书记会上提出要大干，决定开发2公里。深圳人听了还为书记捏了把汗：开发2公里，要多少钱啊！中央明确不给钱，借给的3000万元贷款，已花去了大半，还拿什么来开发建设经济特区呢？

六、黄土变成了金子

正当深圳人被资金的匮乏困得举步维艰、叫苦求援的时候，深圳河对面的香港人笑道："你们是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呐！"

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一听，认真了起来："别开国际玩笑了！"前不久，他与市委书记张勋甫去访贫问苦，"三代同室"的随时可见，有的婚后孩子都快上学了还是无房户。作为管

住房的领导，心里有多焦虑啊，“要是真有金饭碗就好了！”

香港朋友又认真地说：“你们脚下踩的都是金子呀！”

“分明是黄土、荒地，哪是什么金子?!”

“别忘了，当年香港也都是这个样子。把荒地、黄土换成了金子，香港很快就发了，繁荣了。”

何以成金

骆锦星怔了一下，他是广东惠阳人，1957年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惠阳地区当干部，了解香港的发展轨迹：对面的摩天大厦不正是这样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嘛。“不过——”他摇了摇头，想到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骆锦星只能叹气了。

香港朋友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走了。

骆锦星望着他的背影，望着对面影影绰绰的锦城，心里在嘀咕：“资本主义的土地是金子，社会主义的土地怎么就不能变成金子呢？”

天渐渐暗下来了，落叶在寒风里呼呼地打着回旋，像是画着一个个问号。骆锦星去食堂吃完晚饭，没有回宿舍。晚上他总爱去办公室，看看文件、翻翻书报，思考思考。这会儿，他却什么报纸、什么文件都没有心思看，满脑子转的是土地、土地——

上下数千年，多少朝代，多少将士，为着土地，你争我夺，拼死疆场；又有多少劳苦的农夫，为着几分土地而拼死拼活，鞠躬尽瘁。到了后来，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则用“分田分地”动员组织起了千军万马，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将土地夺回到人民的手中。但这里属于人民的土地，为什么成年累月荒芜着，空闲着，不能用来造福于人民呢？骆锦星百思不得其解。他下意识地走到了书柜前，依稀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到过土地问题，但究竟在哪一篇里呢？他随手取下一本《列宁选集》，从

目录上看到了“住宅问题”一节，便翻开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眼发亮了，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论说道：

> ……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对呀，在这缺少资金的过渡时期，将地租转让给社会，不就能解决燃眉之急吗？”骆锦星不禁激动起来，拿起这本书就去找市委书记张勋甫。

“房产补偿贸易

张勋甫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正在批阅文件，一见骆锦星推门进来，就笑道：“我正要找你。”

没待书记往下说，骆锦星就先将《列宁选集》上这段话读给他听。

张勋甫一听，又补充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骆锦星说：“那好，我们不妨租点出去，用租金来搞建设。”

张勋甫想了想，说：“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上头毕竟还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可否先想个变通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张勋甫负责过省进出口委的工作，他油然想起已经采取的“补偿贸易法”：我出土地、厂房，外商出设备、资金，用此生产的产品赚得的钱，双方分成。想着，张勋甫就说：“刚刚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港商愿意出钱给我们盖房子，卖房所赚的钱双方分成。你看怎么样？”

骆锦星笑道："好，这叫房产补偿贸易法，我看行！"

张勋甫点点头："那就请那位港商来谈谈。"说着，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起来。

时值1980年元旦前夕，张勋甫让港商过了假日来谈。港商却在元旦那天急急赶来了。他叫刘天竹，算是第一个港商与共产党谈生意的人，骆锦星代表中方，在外宾接待室里与他洽谈第一笔房产生意。

刘天竹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

骆锦星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盖一个东湖丽苑，如何？"

刘天竹早看过那块地，就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

骆锦星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

刘天竹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锦星沉吟了一下，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天竹若有所思道："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

就在这1980年1月1日当天，开年大吉的日子，我深圳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与港商刘天竹，签订下了第一份中外合作经营房产的合同书。随后，深圳市即成立了房地产公司，由骆锦星兼任总经理。

刘老板拿到合同书，返回香港，马上请人设计，很快就将东湖丽苑的108套新房图纸设计出来了。到春节前后，刘天竹就将这画在纸上的东湖丽苑登报出售，这立即引起了港人的莫大兴趣。深圳的房地产必然看涨。当时香港的两室一厅已涨到20万港元，而一河之隔的东湖丽苑，一套又大又好的住宅，还不到10万港元，太便宜了，港人自然争先恐后来订购。没有几天，这108套还在

图纸上的房子一售而空。

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从新加坡、泰国考察回来，路过香港，得知这一消息，就与刘天竹商定，再搞同样的 108 套。结果，又是一售而空。

这 216 套图纸上的住宅，光定金，就是 500 多万港元。这是令深圳人所预料不及的。

东湖丽苑很快破土动工，钢筋、水泥、黄沙等各种建材源源不断运来，工地上一片沸腾。

与此同时，香港高资公司老板，《文汇报》老板等，也纷纷与深圳市房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签订合同，来深圳投资盖房。翠竹苑、湖滨楼相继破土奠基。

但是，有人偏不理解："深圳的土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让资本家来盖房、买房，不是搞卖国主义吗?"也有人责问："你们这样做，报告中央没有？上级批准没有?"

恰在这时，省委副书记吴南生来了，他是来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

面对种种风言风语，吴南生召集了市委常委会议。

会上，新来的市委副书记秦文俊说："列宁在苏联革命刚刚胜利的时期，就主张借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说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 1/4 和巴库的 1/4，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 3/4 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吴南生说："是啊，中央不给钱，地方财政也力所不能及，借外资发展自己倒是个好办法。"新书记、市长充分肯定了前任深圳市领导在房地产经营上迈开的第一步，决定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继续往前闯。

深圳房地产业的开创时期——补偿贸易，就这样闯了过来。东湖丽苑、翠竹苑、湖滨楼相继拔地而起。

合作盖房

深圳没有花钱，黄土上开始冒洋楼了。不过，深圳的开拓者又很快意识到："中方虽然将拿到85%的卖房利润，但房却全被港人买走了，深圳紧缺住房的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这该怎么办？"市委新任秘书长丁励松，专门找骆锦星商量这个问题。

骆锦星想了想，说："那就再搞一种办法：不要钱，要房，即让外商出钱，我们出地，将盖成的房双方分成。"

丁励松笑道："这叫合作盖房。"

根据香港行情、国际惯例及深圳的优惠政策，他们很快研究出了一个办法：合作盖成的房，高层我拿80%，外商拿20%；低层我拿70%，外商拿30%。这个办法，通过新闻媒介，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上迅速传开了，这又引来了不少前来投资的港商、外商。

就这样，深圳的房地产业进入第二个时期，合作盖房。于是，国商大厦、金城大厦、高家花园等又破土夯基。

深圳纵横交错的马路在烂泥浆上延伸。

深圳经济特区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蓝图渐渐形成了。大片大片的处女地等待开发：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这些都需要钱。

然而，"补偿贸易"的房地产利润，要待盖成了楼才能拿到，那还得过两三年；合作盖房，即使房盖成了，也只能分到房，拿不到钱。

可眼下，开发经济特区，急需钱花，吴南生把目光注向了房地产业，要求尽快拿出个办法来。

收取土地使用费

"干脆收地租吧。"秘书长丁励松脱口而出。

秦文俊似有所思："这样宣传起来不太好听。"

骆锦星说："列宁在新经济时期谈到，可以收取土地使用费。"

秦文俊笑说："对，就称收取土地使用费。标准怎么算，可以参照'补偿贸易'与合作盖房，细细核算一下。"

骆锦星遵命，很快拿出了一个方案：低层建筑，每平方米土地使用费要收4500港币。这个标准，对深圳来说，已相当可观；但当时香港中介地租每平方英尺已达15000港元，相比之下，深圳的地价只是香港的十一分之一。正是深圳的这个地价低谷，致使河对面的港人争先恐后来深圳做房地产生意。

很快，罗湖区0.8平方公里拟开发的土地，全部出手，计收到土地使用费上亿元！

至此，深圳的房地产业发展到了第三阶段：收取土地使用费。

14年来，一直在深圳房产业上拼搏的骆锦星，回首以往时，对笔者说：开始被逼得无路可走，张勋甫点了房地产之火；吴南生接着把这火拨亮了；后来梁湘又加了一把油，使之熊熊燃烧起来；李灏则设法将之写进了宪法……

从来都是由国家统一调拨，看来一文不值的土地，就这样魔术般地一下子值了大钱。深圳人忽然觉得脚下的黄土、荒地变成了黄灿灿的金子。

金子不断闪光，特区日益兴旺……

（选自《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

江　迅

缔造一个新香港

——写在香港回归以后

世上万千生灵的诞生，似乎都痛不堪言。然而，这生的奇观却是美的礼赞。

1997年7月1日凌晨零点零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和紫荆花特区区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政权交接仪式上冉冉升起，香港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治时代，这颗“东方之珠”从外国势力割让状态回归母体。

历史终于揭去沉重的一页。让耻辱成为历史，把历史告诫后人。

自1841年起，如果三十年为一代，至今香港人已是第五代了。但香港社会发展快速，人口流动性大，二十年便一代，至今又可算为第八代，经历了这么多的世代，乱世求生也好，盛世浮生也好，香港始终是香港人的家。

6月下旬，和朋友小聚后分手，香港人常会挥挥手，喜孜孜地说“特区时再见”。不料几天一过，一觉醒来，除了案头上的回归倒数钟不再倒数，起床后身处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究竟跟昨天的香港有啥分别？没有了金色的皇冠，没有了穿裙子的英军。踏入

“50 年不变”的第一天，香港人都在调校心态，扶正认知，以适应多少有点陌生的新时代的来临。

“我的香港是什么？”

这是 1956 年的电话簿。一时厚的电话簿，分中英文版，一本便囊括了全城住宅和商业用户号码。

这是 1997 年的电话簿，集齐一套有五本之多。它分门别类，仅仅《黄页消费通》按区域分为香港、九龙、新界三本，另加《工商通》和《商业电话簿》，五本的厚度足有七吋。

香港人口数不时上升，商业活动也日趋频繁，当年是五位数的号码，如今已达八位数。

一本四十年前的电话簿，透出旧香港的面貌。当年的电话簿里，有图文并茂教用电话的方法，显示有能力安装电话的人不多，从电话簿的广告内容和行业类别则可探寻当年的社会状态和港人衣食住行的端倪。

五十年代，香港人以白米为主食。在电话簿里，白米批发商和零售商广告占五版之多，广告的大字标榜“无砂白米，多少欢迎，专车送货。”而今日电话簿只有半版。正如香港食品委员会主席李广林说：“以前一个三代同堂家庭，每月起码要买 100 公斤米，米铺伙计用大麻袋送上门。现在流行两夫妇小家庭，又多了其他的饮食选择，一个月吃不完一包 5 公斤装的白米。”据统计，1956 年香港有 260 万人，每年耗米 26. 4 万公吨，人均食粮 100 公斤，而 1996 年，人口增至 650 万，耗米仅 33. 2 万公吨，人均耗米量六十公斤，进入九十年代，香港人的饮食习惯也大为改变，翻开电话簿，只见快餐店、法国菜、印度菜、泰国菜、缅甸菜、韩国菜等各国菜式店铺，与五六十年代以中菜为主，已截然不同。在当年的电话簿里，有一则酒楼广告“乾隆御席，每席 500 元”，一

席酒菜已吃掉当年普通家庭三个月的收入。

五十年代的香港是木屋的天下，翻开电话簿，最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治白蚁”的全版广告，上写“白蚁之患，甚于洪水猛兽，阁下欲保物业安全，请急切消灭白蚁。”如今的香港已成了“石屎森林”。1956年的电话簿里，只有三间地产公司的电话，而今时今日的电话簿，单单九龙版的《消费通》，已有两版半的地产公司登记。

从一本电话簿，看出了风云变幻。回头一望，弹指间，年代遥远的生活景象，至今只是凤毛麟角。回归前的三五个月里，“香港精神”和“香港学”成了香港人的热门话题。香港的所有媒体，每天都有整版的追寻历史遗风的图片和报道。那些黑白照片，令人惊觉香港的变迁，摄影师用镜头把历史的一瞬凝固，对今日的香港人来说，照片里的街道和山水既熟悉又陌生。都过去了，这许许多多的岁月，纷繁扰攘的日子，恬淡如水的时光。香港人说，该丢弃的已经丢弃，不该丢弃的，就像一本本古老的线装书，在记忆的阁楼里典藏。

香港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结合东西方文化，创造了全球经济的奇迹，香港的人均国民所得，早已超过英国，高达2.4万美元，若把购买力计算在内，甚至超过日本，而从经济自由度来看，更名列世界第一，香港的人均外汇储备已名列世界第二，贸易量则仅次于欧洲联盟、美、日，名列世界第四，邓小平生前有过一句名言：香港的繁荣是以香港人为主体的中国人干出来的。

是的，九十年代的香港，不再是五十年代的香港；7月的香港，也不再是6月的香港。帝国斜阳在雨水中已经消退，大转变的一瞬已经过去，但大转变的时期还得有一段日子。最后倒计时雷鸣般的欢呼声平息了，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火树银花的焰火弥散了，香港从未有过的五天公众长假结束了。在这非常年代，香港人正以平常心情冷静思考：香港究竟是什么。

香港是沧桑。

香港是奇迹。

香港是机会。

香港人心中的香港：一个梦想、一份情怀。如今，香港“天变道不变”，香港人希望这口“井”要水常满，游得自在，活得开心。

把历史和文化穿在身上

生于斯，长于斯，或生活于斯，香港人都以成为香港人为荣。不过，香港人又对香港认识多少呢？

香港在何年何月何日开埠？《南京条约》真本现存于哪里？南丫岛上有什么古代遗址？香港第一名华人西医是谁？启德机场以谁的名字命名？香港哪年通过公娼制？香港第一次金融风暴发生在哪年？《英王制诰》是英王发给谁的委任令？孙中山在香港哪里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的？何为旧香港八景，现代香港八景又是什么……这是香港几所中学的历史常识竞答百题。从抢答现场看，这些中学生作为香港人的资格是大可存疑的。日前，香港一家媒体，就鸦片战争后港岛割让给英国的一段历史的五个简单问题，作了一次读者调查。发出一百份问卷，被访者年龄介乎十二至七十三岁之间。结果只有三成人答对超过三题以上，只有三人得满分，有13人得零分。

在香港回归之际，香港已有人提出香港人更需要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在一次中学生的考试中，不少学生把上海“搬到”西安，把长江“移到”内蒙古，这不仅仅是地理知识的贫乏。不过，这几个月来，香港的媒体“狂轰滥炸”地说历史，给香港人补了一课，浮光掠影说历史成了一股潮流。

香港人竞相凑兴赶潮流，不少港人都用“胸前”来说香港历

史，也给自己涂抹点回归色彩。

香港一间便服连锁店乘着“七一”回归，推出“自强文化衫”，用“穿”来解说中国自强起来的历史。“自强文化衫”第一套，是以鸦片战争、虎门销烟、南京条约、孙中山先生、女革命家秋瑾和黄花岗烈士等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主题。

这家服装连锁店创作部的梁姓职员说，这文化衫系列反映的历史，从割让香港到今日回归，一百多年来中国逐步强大的发展十分明显，导致今日顺利收回香港，每套文化衫都加入了一些看似与香港无关的事件和人物，在第二套中有五四运动新青年代表，第三套中有中美建交，第四套则由1984年中英谈判签订联合声明开始至今。梁姓职员说，希望借“自强文化衫”教育香港年轻人，他们仅靠背诵书本知道历史而对课文的记忆又日见模糊。

香港人就这么把历史穿在身上。

步入旺角400米长的通菜街（女人街），摊档上悬挂着几十种“回归”T恤，“1997”、“Hong Kong”、国旗、特区旗的字样和图案尽收眼帘。不过，另有一类“回归服”，它并没有“回归”之类的标识。

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的外籍摄影师耐尔·法林，穿着这件“回归服”走在闹市街，引得路人好奇而纷纷回头注目。这套回归服饰是他自己设计的，最特别的是“一半中一半西”，用他的话说，意味着香港是中西交流的繁华都市，亦象征香港回归，政权由英变中。它中式的一边，唐装胸前有一挂表，而西式一边，西装里白衬衫衣领上有一半黑领结。其实，穿这套服饰的滋味并不好受，右脚是平而贴地的布鞋，左脚则是有跟的皮鞋；右上身是棉夹衣，左上身是西装，在夏天酷暑下行走，个中感受只有穿者才能领会。

不过，这一阵，中国服饰倒真真确确被香港人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朝代更替，时装潮流也迅疾逆转。香港回归掀起了一股中国风，各界仕女纷纷对中国“长衫”重新估价，各世界名牌也

争先推出中国衫，诚如香港才女作家林燕妮所说："旗袍是全世界公认的美丽国服，评价之高，肯定高过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服装。"九七临近，难怪香港政坛也出现了"旗袍族"：特区政府的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律政司长梁爱诗、工商局长俞宗怡等。近来的派对上，阔太阔少都改穿旗袍、中山装，而清装唐装争艳斗丽。

香港百利商场的新潮旗袍店开得成行成市，地处中环毕打行的"上海滩"服饰店，创立才三年，但乘回归之热，已飙升为时髦名牌。它也办了个旗袍展，上海裁缝师傅长驻店内候客，仕女可在店内挑布料、拣款式，当即度身订制一件旗袍响应回归。自5月始，香港名流纷纷来此订制唐装旗袍，指明是参加回归派对的，订单比平日上升七成半，多300套，工场10多个师傅为赶工，已几个月没放假了。

前不久，影星巩俐身着旗袍为"上海滩"做的地铁灯箱广告，惹得港人喜爱；前上海舞校学生、现任香港芭蕾舞团演员梁菲等人身着唐装、小凤仙装，由名人张天爱设计、导演的一组"上海滩"造型照，在香港刊物发表后，颇获好评；香港演艺界明星莫文蔚被誉为"旗袍天后"，她身着传统型、高贵型、新潮型各种款式的旗袍玉照刊登在周刊上十分抢眼。

愈近回归，愈多港人在学做一个"中国人"。旗袍、中山装、小凤仙装、功夫服……竟在香港的写字楼同一天粉墨登场。"香港公益金"日前宣布，在回归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7月3日，举行首次"华服日"的慈善活动。这一天，香港人穿上中国服饰，借此纪念香港回归祖国，既推广传统文化，又筹得200万港元作公益金。参加者每人至少捐款50港元，这一天不再像往日那样，上班穿西装、着套裙，做绅士、扮淑女，正襟危坐，而可以穿华服，轻松解脱。

"华服日"由歌星刘德华穿改良中山装，高歌《中国心》做形象宣传。正如香港雪茄大亨、主理"上海滩"的邓永锵所说："人

最贴身是衣服，回归是每个港人最贴身的事，不穿华服不算庆回归。”

香港人的视野拓宽了。然而，穿在身上的毕竟还是一种表面的象征。

董建华庄严而漂亮的中文演讲

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天。

微雨中，中环威尔斯亲王大厦门口，军人如常地站岗。但与往日不同的是，守卫的不再是红发蓝眼的英国军人，而是穿著整齐绿军装、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早上到夜晚，一群群市民拥挤着前来一睹解放军的风采，作一番评头品足。戴白手套持枪的解放军，风雨中目不斜视而岿然不动。香港市民拖儿带女看解放军成了假日的一档新节目。一家老小站到站岗的一脸严肃的解放军身边拍照，成了新香港的一种时髦。

香港人好奇，是因为大多数香港人没见过解放军。回归以后，香港人会遇到多少新鲜事，会面临多少新转变。回归后的第二天，就有人在香港媒介上呼吁，“上班族”要以尽快的速度装备自己，学习普通话，学习中文、学习中文电脑，学习祖国的法律，学习祖国人民的成功之道，否则会被社会淘汰。

香港人那些不咸不淡的普通话常常闹出笑话。前几天，一位女艺员接受北京记者采访，双方用普通话交谈。记者问她：“您今年几岁？”女艺员答：“洗脚水。”在场的听了捧腹大笑。其实，她想回答的是十九岁。三个香港人趁回归五天长假去北京旅游，他们同乘一辆出租车去建国门内大街，三人所去的地方不同，一个在大街东下车，一个在大街中下车，另一个在大街西下车。他们以普通话对司机说：“这里杀（下）一个，前面灯位杀（下）一个，

到街尾再杀（下）一个。”司机听了笑了：“一条街就杀三个人，全市很容易被你们杀光了。”

随着回归日近，香港多个媒体纷纷在街道上挂起庆祝回归的旗帜和标语，但一旦用字不慎，一字之差，惹来市民满腹疑团。葵青区挂起的“庆回归”旗帜中的“庆”（繁体字行书体）写成了“废”字，遭到居民的投诉。根据1995年祖国内地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字海》，旗帜上的“庆”字，字形的确与现代书法家启功所写的“废”字相近。但葵青各界庆祝回归活动委员会执委接到投诉后与制造商研究，又证实此字没有错。于是引出了一场关于中国书法的争议和认知。

香港圣公会吕明才纪念小学今年5月就开始举行国旗区旗升旗礼仪，但音乐老师并不全懂普通话，教国歌遇到了困难，学校请两年前从北京来的学生萧杉作“小导师”，录下她唱的国歌，让老师和同学跟着学唱，以此训练全校师生唱出最“字正腔圆”的版本。另一所宝血小学下午校校长陈修女说，学生学会唱国歌很有必要，不仅要学会唱，还要靠公民教育，让他们对祖国有认同感。学校先安排普通话老师教音乐老师歌词的正确读音，然后才在音乐教室教学生唱。如今，这首《义勇军进行曲》都能背能唱了，但学生对国歌的内容不太理解。

这是7月1日凌晨，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在宣誓，13名行政会议成员、59名临时立法会议员、终审法院大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依次向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他们都承诺尽忠职守，奉公守法，为特区服务。

看来，行政会议召集人钟士元和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说英语要比普通话流利多了。宣誓仪式以普通话进行，钟士元事先练了多少遍，只有他清楚。他带领行政会议成员宣誓，他浓重的广东腔说普通话那么笨拙，那么吃力，香港市民在电视屏幕前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在6月29日的宣誓彩排时，他的念法曾引得

哄堂大笑，监誓的董建华笑得拿手帕抹眼泪，台下的议员和官员笑得东倒西歪，连鲁平也摘下眼镜抹笑泪。终审法院大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们，由李国能率领宣读誓词。李国能也以不伦不类的普通话念出誓言，承诺维护法制，主持正义，为特区服务。法官中约有一半是外籍人士，无法以普通话宣誓，李国能又以流畅的英语率众再次起誓。

不过，董建华的就职演词赢得了香港市民的一致喝彩。

7月1日凌晨1点30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正式宣誓就职。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董建华宣读了他的就职演词。庄严的会场悄然无声，在肃穆的氛围中，他用带有些微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念出了那一篇庄严的中文的演词。

香港散文大家、著名的中英文语言文字学者董桥，素来对香港政府发出的中文文件，从语言文字角度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一回却大赞这篇中文演词铿然有声而没有废话。

他说："演词用漂亮的中文撰写，既描绘了中国的沧桑，也描绘了香港的前景；既流露了绵长的感情，也流露了崇高的尊严，这样的中文，既洗脱了过去港英政府积累的中文疲态，也创造了今后特区政府应有的中文生机，香港人应该引以为荣。"

董桥说，外人不知道这一篇演词是不是经过祖国内地高手的润饰。如果有，那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那就证明董建华身边已建立了一个深具中文修养的写作班子。董建华的这篇演词，正是香港中文教育需求和期望的目标。

董建华的这篇演词，成了香港人学习中文的范文。

北上求学以探青云路

6月12日，香港高等法院。大法官杨振权审理着一宗偷渡客的上诉案。上诉人以普通话答辩，杨法官本以广东话审案，当听

完上诉人祈求后，他突然“转台”，以流利的普通话宣读判词，他顺应回归“露一手”，令在场采访的记者一愣。

高等法院是否随着政权移交而采用普通话审案，至今仍是未知数，但香港18万公务员补习认识中国已经开始。

在英治时代，香港不少公务员忌讳认识中国，而如今，公务员培训处已推出8套自学课程，其中有6套与中国事务有关。除了普通话和中文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及行政体制》、《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中国法律》等。正如公务员培训处处长司徒阮明瑄说：虽然有“两制”，但我们还是在“一国”底下。

这是公务员的认知，这也是香港人的认知。

17名香港行路上北京行动成员，连续步行四个月，走300万步，平均每人踏破三双鞋。回归前夕抵达天安门广场。此行筹得2000万港元，资助内地贫困失学儿童完成学业。

香港青年民族研习社创办人吴卓明发起，10多位青年组团前往黄河发源地竖立回归纪念碑。

97名香港中学生和1900名北京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18岁成年宣誓仪式”。

由“健康香港基金”筹资1900万港元创建“健康快车”——中国首列火车医院，已由香港出发，驶往内地，医治白内障致盲人士。

……

到祖国内地去，这成了一种时髦。时髦从年轻人开始。多少在过去看来是不可能想象的东西，在今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了；在今天看来不可想象的，在明天又会成为不可逆转的。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从新潮突起走到浪潮滚滚。

李秀恒，香港人对这位蓄有两撇胡子的港事顾问并不陌生，众人都说得出他家的洗手间是全自动的。

1991年，他获得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奖，1992年，又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但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位金宝时计集团董事长变得趾高气扬，他没有一身名牌，收藏了数百万元的名表、古董表，但手上戴的却是满街都有的"卡西欧"。

李秀恒的学士学位是美国的，硕士学位是美国的。而今，他却攻读祖国内地暨南大学博士函授课程。47岁的李，住在半山300平米的洋房，又是万人之上的集团董事长，人生理应无憾，但他在学业上依然是位斗士。

像李秀恒这般选择北上求学，已成了一股潮流。香港人以往去外地求学，素以英、美、加、澳为热门选择，随着"回归"来临，港人对内地学历不被认可的疑虑已大为减低，内地不少大学在世界享有盛誉，学术地位日益提高，考虑回内地升学的港人正愈来愈多。

"九七北上青云路"、"中国十大学府"之类的专版，近期在香港媒体时有所见。这是一家日报刊登的"古灵精怪龙虎榜"，推介祖国内地的大学，其中有最大学校、最小学校、最多毕业生成为高官的学校、最多藏书量学校、最年老学府、最年少学府、最多教授学府……就连"最好玩学府"、"最大食府的高校"都有介绍："上海交通大学有三个运动场、两座泳池、一个溜冰场，不怕没地方玩"；"清华大学有16个食堂，一天吃一处，都要半个月才能食完"。

回内地上大学成了香港时髦事，去年报读的香港学生比前年增加了90%。四十一岁的施仲谋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学任教期间又考取了哲学硕士、文学硕士、佛学硕士、教育博士，而后，在香港大学中文系当讲师，他又北上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个来自香港的博士生。进修五年，已有一子一女的施，每年去北京三次，每次逗留半月一月。他说，在北京研究与教学颇为得益，不仅认识了众多学者专家，亦扩大了学术和生活圈子。

“这些年内地的发展，对法律的需求相当迫切，时有新法规出现，特别在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贸易发展极为快速的现状下，其法律的诠释实在重要。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重返校园生活，时间能一年两年，而不是蜻蜓点水式的。”香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合伙人邝家贤说。她已有一子一女，是中山大学法律系“海外经济法”硕士课程学生。她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历史系，而后又远赴英国进修法律取得学位。

学普通话、攻中国文化、修中国法律已在香港成了时髦，要说热门课程，中国法律最受欢迎，香港城市大学和树仁学院课程始终门庭若市。树仁学院已计划政权移交后两个月，即与北京大学法律系合办学士学位课程，推广至全日制，招收香港预科毕业生就读，这将是第一个接受毕业预科生申请的中国法律课程。

记得，美国阿波罗号太空船登陆月球，太空人第一次踏出火箭舱时说：“这是我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1997 年，从 6 月 30 日到 7 月 1 日，这是历史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对众多的香港人来说，却是一小步，但是，他们正以不间断的一步步，走向一个新香港。

（原载《文汇报》1997 年）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命运
作者=未未主编
页数=561
SS号=0
出版日期=